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世纪辉煌

百年党史中的成华记忆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宣传部
成都市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史研究室

策划

成都市成华区作家协会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世纪辉煌

百年党史中的
成华记忆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宣传部
成都市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史研究室
成都市成华区作家协会
策划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辉煌：百年党史中的成华记忆 /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宣传部，成都市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史研究室策划；成都市成华区作家协会编.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9

ISBN 978-7-5411-6121-6

I. ①世… II. ①中… ②成… ③中… ④成…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成都—文集

IV. ①D235.7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77542 号

SHIJI HUIHUANG: BAINIAN DANGSHI ZHONG DE CHENGHUA JIYI

世纪辉煌：百年党史中的成华记忆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宣传部
成都市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策划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史研究室
成都市成华区作家协会 编

出品人 张庆宁
责任编辑 罗月婷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封面设计 魏晓舸
责任校对 段 敏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7mm×235mm 开 本 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21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2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6121-6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序

时光荏苒，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她光辉灿烂的一百年！

百年风雨，峥嵘蹉跎，一路艰辛；百年时光，砥砺前行，阳光弥漫。

当装满理想和希望的红船从嘉兴启航时，古老的中国还深处一片黑暗，而当天安门的红旗冉冉升起时，东方已经是霞光万丈。

一个世纪的历程，把鲜花在巍巍华夏铺就；一个世纪的过往，将名字锻造成民族前行的北斗。

一百年不算长，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仅仅是短短的一刻，但这一时刻却开天辟地，亘古未有，辉煌之光照亮了全部历史的幽暗。

在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来临之际，由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宣传部、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推出，成都市成华区作家协会承办编写的这本纪念文集《世纪辉煌：百年党史中的成华记忆》，是成华人献给建党百年的馨香花束。

2021年3月，征文发出仅一个月，就陆续收到了数十篇稿件，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丰富的史料、生动的叙事，讲述了一段段与成华有关的党史记忆。

成华只是广袤祖国版图的一小块，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长眠

于此的共产党人，也只是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中的一小部分。但，一滴水珠可以折射阳光七彩，众多溪流就能汇聚成滔滔江河。成华共产党人的事迹，作为百年党史不可或缺的一页，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走过的艰苦而伟大的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同年12月30日，当人民解放军将士铿锵有力的脚步踏过成都城东北的驷马桥，千年的沙河惊醒了，古老成都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而最早迎接这黎明曙光的便是成华这片土地。百岁老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成都解放断忆》真实记录了这一重大史事。征得马老同意，书中特意收入了这篇作品。

本书所录的数十篇原创稿件，分为七个单元，涉及的人和事，时间跨度几乎与党史同步，涵盖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其中包括发生在成华或与成华有关的重大史事，如“二一六”惨案、凤凰山机场稻草事件、解放军入城、龙潭寺剿匪，以及东郊工业基地建设、东站变迁、企业改制、东调北改等；所写的人物更是多姿多彩，他们中有老红军、老八路、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也有和平年代的建设者、改革开放的探索者。这些众多的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曾战斗生活在成华这片热土，有的则是故去后永远长眠于成华秀美的山林。这些不同时期的共产党人，共同奏响了成华大地上动人的历史乐章。

牢记历史，不忘初心，是我们对建党百年最好的祝愿！

是为序。

成都市成华区作家协会

2021年6月

目录

第一章

伴随共和国的诞生，成都历史迎来了新的曙光。人民解放军踏入成都城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成华；随后在巩固新政权过程中打响肃清匪患的第一枪，也发生在成华。

成都解放断忆（马识途）/003

打响川西剿匪第一枪（林元亨）/026

第二章

先烈不朽，青春常在。追寻革命者的足迹，回眸前辈的奋斗历程，蓦然发现，成华曾是一方英雄的热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这里就留下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身影。他们用理想、信念为后人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历史风景线。

杜鹃啼血染丰碑——记成都“二一六”惨案

（文如意 姜小雨）/037

“稻草的阴谋”——1937年凤凰山事件始末（雷文景）/048

成都也有“挺进报”（廖云）/059

第三章

这里的每一位前辈，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用信念书写着动人的故事，而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与百年党史紧密相连。他们是百年英雄交响曲的精彩音符，他们是历史大叙事的华美篇章。长眠或战斗、生活在成华的这些前辈，已把嘹亮的时代回声永远镌刻在了成华的土地上。

红军赵子龙：独臂上将贺炳炎（曹蓉）/067

朱向离将军血洒龙潭寺（林元亨）/080

百战沙场铸忠魂——记老红军谢荣德（刘云奇）/090

天宝的故事（王跃 泽里扎西）/098

李劫人与他的共产党朋友（张义奇）/104

上甘岭英雄的平凡生活（傅厚蓉）/112

第四章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东郊工业建设的火红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共织军工梦。青春岁月，马达轰鸣，机床飞旋，满腔激情开启新局。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书写了东郊工业建设的宏伟华章。

420：军工千里大转移（曹树清）/121

65 年的光荣与梦想（曾灵 阎筱天）/129

“火炬号”，中国第一辆双层公共汽车（张建军）/139

成都东站进行曲（刘宝库）/144

成都机车车辆厂：一路风雨一路歌（唐澜芯）/155

第五章

在成华区这块热土上，留有老红军、老八路、艺术家、企业家们闪光的足迹。每一个足迹，都是一部传奇……他们历尽磨难，却殊途同归，或用慷慨赴死的革命历程，或以传承薪火的艺术生命，或以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诉说着一个共同而坚定的命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永恒跟随！

一生甘为人民的牛——成量厂杨亭秀的传奇人生

（杨传球）/167

红军厂长赵一（徐小强 袁慧玲 李乐欣）/174

老八路的人文情怀（张义奇）/181

我们的郭老头——784厂第一任厂长郭克（杨传球）/188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记成电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吴立人

（杨红）/195

入党宣誓72载——红光综合厂原厂长高富许的革命生涯

（钱玉趾 刘婷乐）/200

要入就入共产党——记川剧艺术家晓艇（刘云奇）/205

第六章

成华共产党人的脉搏总能紧随时代一起跳动。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慧、果敢、魄力和闯劲，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哨，勇立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的潮头，披荆斩棘，树立丰碑，成为后来成华人破浪前行的航标灯。

“蛋壳”里的智慧灵光——刷新全国纪录的原成都热电厂

冷却塔建设（冯荣光）/213

沙河桥头的秘密改制（周明生）/223

国光的中流砥柱（周明生）/231

第七章

“东调”，是成都市在 21 世纪伊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长袖善舞抒心意，实现了“腾笼换鸟”的华丽转身。转眼间，惊鸿一瞥，成华展现出新时代崭新风貌：沙河岸，柳浪闻莺；东山旁，崛起高铁新城；斧头山，熊猫家园屡立外交新功。

东调北改：成华的瑰丽转身（龙德瑛）/239

斧头山的熊猫外交（雷文景）/247

巍巍天府熊猫塔（冯荣光）/257

Chapter 1

第一章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城

伴随共和国的诞生，成都历史迎来了新的曙光。人民解放军踏入成都城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成华；随后在巩固新政权过程中打响肃清匪患的第一枪，也发生在成华。

成都解放断忆^①

/马识途

成都解放的往事，回想起来，历历在目。但是到底已经被四十年的历史风雨吹打得只剩下雨丝风片，我年事已高，要我作接管成都的系统回忆，已无能为力了，我只有把零星回忆拾缀成断简残篇的能力。

我是解放成都时入城部队的带路人，陪着张经武参谋长坐在第一部吉普车上开进成都城门的。后来我又作为成都军管会委员参加了成都的接管工作，并且参加筹建中共成都市委和成都市人民政府。

一、快点，解放

我们到解放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的几个地下党员，辗转从四川经香港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又从北平到武汉、转南京，最后到了西安，已经是瑞雪纷飞的1949年冬天了。我和老王奉命到设在山西临汾的南下解放川康的大军总部向贺龙等领导同志报到。我们受到了热

^① 该文选自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成都解放》一书中的“附录·回忆录”。著名作家马识途在文中回忆了1949年12月30日随人民解放军从城北驷马桥进入成都城的亲身经历。马老的记述清楚表明，成华是成都主城区最早迎接黎明的地方。

情的接待和亲切的慰问。贺司令员看出我们希望早日南下解救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四川人民和正在遭受追捕屠杀的地下党员的焦急心情，宽慰我们说：“你们放心，包你们回成都去过新年。”

我们听了很高兴，回到招待所后，由城工部的老李陪着去鼓楼下吃胡辣汤和牛肉泡馍，吃得满头大汗，感到特别有味道。

奇怪得很，在南下到西安的铁路线上，我老是听到飞转的车轮在唱：“快点，解放！快点，解放……”

二、不要叫地头蛇咬了

在西安，贺老总要我们向南下干部报告四川境况。地下党同志讨论了几夭，起草一个报告，由我去讲。报告中提到，成都除有纺纱厂、电厂、面粉厂等几个小厂和手工业外，没有什么生产事业，几乎是一个纯消费城市，大量的市民依附于反动的政权、军阀、官僚、地主阶层而求生存，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入城以后，如何恢复生产，保障人民生活，是一大问题。报告中还提到川西坝子叫天府之国，靠的是都江堰，但是今年岁修已经耽误，入川后如不抓紧岁修，明年农业生产将违时，影响极大。这些都引起了领导和干部的关注。但是当我提到，国民党军队士无斗志，军心涣散，已不可怕，可怕的是地头蛇，对那些尚未受到打击、盘踞农村的袍哥、土匪和地主武装，不可掉以轻心时，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且说：“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打垮了，还怕几条地头蛇？”

我们听了有点着急，向贺老总反映了，贺老总说：“我在四川驻过防，我知道那些地主、袍哥的厉害，是要大家注意，不要叫地头蛇咬了！”

三、善之善者

我们南下停留在汉中附近，只见领导天天在开会，我们却闲得发慌，巴不得明天就回成都。我遇到贺老总，反映了我们的急切心情，问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呢？

贺老总笑一笑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是要拿下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胡宗南的几十万顽军溜掉了，所以我们要慢慢走，把他们吸引在大巴山和川西一带，等二野刘邓进军封住他们的退路，我们再迅速进军，把他们歼灭在川西。这是中央攻而不进，先慢后快的方针。”

哦，原来是这样。想想贺老总路上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已经够忙的了，我还拿这样幼稚的提问去干扰他，多不应该。看他那么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又是多么亲切，果然是大帅风度。

我们听到国民党的报纸还在吹牛，说他们的巴山防线“固若金汤”，心中暗暗感到高兴。吹牛吧，雷霆万钧就要落到你们的头上来了。

从西北南下解放川康的大军只有几万人，而对付的却是国民党几十万顽军，其中还有蒋介石的王牌军胡宗南的部队。贺老总毫不畏怯，却又十分谨慎。用巧妙的作战方法，歼灭了敌军八万人，其余则采取围而不歼、动摇瓦解的办法，不战而胜，这种打法真是高明，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我们随大军前锋南下，过秦岭大散关时，还是大雪纷飞，寒气逼人，一过巴山，却是青山绿水，大地春回的景象了。是的，春天随着解放大军回到四川来了。

我们坐汽车到了剑门关下。举眼望去，只见一片齐天的悬岩屹立在前面，像城墙一样堵住去路。剑门正像一座紧闭的城门。战斗部队

的指挥员叫我们暂时停下，并注意隐蔽，一问才知道是敌人妄想凭借这古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天险，负隅顽抗。我解放军在一片冲锋号声和一阵紧密机关枪声伴奏中，破关而入了。

大军在梓潼又作了短时的停留，贺老总在百忙之中，还不要忘记调查民情，要我们和他一起，找当地的代表人物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宣传政策。特别要我们去把当地的地下党同志找来谈话。当他们谈到前两天国民党反动派还枪杀了两个同志时，贺老总也不觉黯然。我们更不用说了，眼见天快亮了，他们却在璀璨的朝霞满天的时刻倒下去了。仍然在敌人暴虐统治下的成都的同志们怎么样了？我们多么想明天就跨进成都城呀！

四、城外，战友重逢

前锋已经直逼成都城下，大军总部设在新都。我们不知道成都城里的情况，正想设法先潜入成都和地下党联系时，忽报有地下党出城来迎接大军来了。我出去一看，原来是老江，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把他介绍给贺老总后，当天晚上，就在一盏油灯下畅谈起来。老江还保留着白区工作的习惯，低声细语，几乎听不清楚，好久他才从我们的纵声大笑中醒悟过来，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他不禁哑然失笑，也放大声音说起话来，可是过一会儿，他又变得轻言细语了。我们谈了一宿，那种欢乐心情，不是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煎熬出来的同志，是很难理解的。而当他说到前几天敌特把三十几个党员和进步人士拉去十二桥枪杀的事，我们又都沉默了。血呀，总算流到尽头了。

第二天一早，老江赶回城里去向地下党的同志传达指示，准备迎接解放。走时我再三叮咛他小心，不要在这黎明时刻，还被敌人咬一口。

五、我们回来了

张参谋长要我带路，先进城里去检查，以便明天顺利举行盛大的人城式。我们吃了早饭，张参谋长带了少量参谋和警卫人员出发了。

成都的冬天常常是雾蒙蒙的，我们解放大军进入川西平原后，却一直是晴朗的日子。早上，太阳出来，晒在军棉衣上，暖烘烘的，加之心里很热，简直穿不住了。一路走去，正是寒梅怒放、大地春回的景色。公路两旁，解放军正逶迤向成都进发，兵强马壮，红旗如云，这般豪迈景象，人生几曾得见？

我坐在第一部吉普车上引路。过了天回镇了，过了驷马桥了，来到了北门口。我回想起几个月前，敌人在四门设岗要捉拿我们，我费了好多手脚才混出了城。此刻，我却大模大样地回来了，坐着吉普车。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的车子进了北门，在大街上缓缓前进。大街边，站满了人群，在鼓掌欢迎。我看到了许多国民党的士兵，也站在马路边，望着我们笑，我知道他们都不过是穿了军服的农民，他们大概知道，他们获得解放的日子也到了。

六、需要多少就来了多少

我把张参谋长他们一直带到国民党省政府，进了省主席的办公室。这个地方是敌人统治四川人民的神经中枢。两年前我们曾经领导成都的学生冲进来占领过一天。正是这个地方，一年多以前，发生过“四九”血案，省主席王“灵官”下令逮捕了一百多冲进来的学生。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的红旗已经高高地挂在旗杆上，在阳光中得意扬扬地飘扬。

不多一会儿，国民党成都市长来了，他是来向张参谋长移交成都市的。张参谋长客气地接待了他们。

各色各样的官吏来了，各色各样的新闻记者也来了。他们说出各色各样好听的话，提出各色各样奇怪的问题。张参谋长向他们宣传了“约法八章”。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我们早已知道的特务、报纸的女记者。她穿红着绿，打扮得很妖娆，用娇滴滴的声音向张参谋长提问题：“到成都来了多少解放军？”

我把这张报纸的背景悄悄告诉了张参谋长，张参谋长笑一笑回答：“需要多少，我们就来了多少。”

那位女记者悻悻地走开了。

张参谋长叫我们快去把地下党员找来，布置工作。要我们尽量发动群众，明天一路欢迎解放军，把入城式搞得特别红火。同时要我们了解敌特方面的动态，保证明天入城式的安全。

我们派人去分头通知地下党同志的时候，我随张参谋长坐车到全城主要干道去巡视。他除在进北门的时候，已经命令解放军把北门接管过来，加以戒备外，还在巡视中派解放军占领一切制高点，加以控制，并且和北门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真不愧是一位英勇睿智的参谋长，对待在城里已成瓮中之鳖的敌人，还是那么谨慎。下午，我们去一个银行楼上和地下党的一些领导同志见面。我们在患难中分别，在欢乐中再见，说不完的高兴话。但这不是叙旧的时候，我们要讨论明天入城式的准备工作。听了许多同志的报告，他们早已作了部署，群众的情绪十分热烈，盼望解放军入城，看来明天万人空巷迎接解放军，是无疑的了。

只是有一件事情，一个同志提出来，却使我也感到为难。他说：“群众都要上街参加游行，就要做彩旗、彩花、彩球，特别是做五星红旗用的红布，商店里都被买光，再也没有了。怎么办？大家都想做一面新的国旗呀！”

另一个同志却替我解了围，说：“我们也碰到这个问题，解决的

办法是连夜把白布浸在红染缸里染红，赶着做旗。有的还把国民党的国旗上的那块红布剪下来，做小的国旗。”

“好。”大家齐声说，问题就算这样解决了。

还有的同志提出，大街巷立的木栅子门，妨碍游行，必须连夜发动群众把它拆了。大家都赞成。

七、入城式

今天要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天公作美，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我们乘车出城到川陕公路上去接引大军入城。我们才过驷马桥，已见旌旗蔽天，烟尘滚滚，知道解放军大队伍已经来了，在驷马桥整顿一下队形，就向北门进发。

我还是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在前面带路。还没有走近北门，欢迎的群众已经把道路快塞住了，我们只得缓缓前进。群众在车前和左右载歌载舞，如醉如狂。我们只得把车子停下来，等到群众觉得是应该让开一条路来的时候了，才缓缓开车前进。有许多花束向我们没头没脑地抛了过来，花片像雨一般洒在我们的头上、脸上和衣襟上，不多一会儿，一路汽车都变成了花车。

几百辆汽车在前面，后面紧跟扛着各种武器、仪容整洁的解放军大队伍，威武雄壮。越是进入城中心，欢迎的人越多，真是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各种锣鼓敲得震天响，却压不住更为响亮的满街爆竹声。许多陌生人，像老朋友一般，跑过来抓住我们的手，凝望着我们胸前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久久微笑不语，有的却流出成串的热泪。我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有一些群众，并没有经过组织，就跟在大队伍的旁边和后边游行起来，都是那么扬眉吐气的样子。好像这是他们当然的权利，总算等到抬起头来过日子的岁月。

我们的车子好不容易缓缓地开到盐市口，忽然看到前面有那么多男女青年在扭秧歌，虽不熟练，却也难得，我知道这是四川大学的

同学连夜赶练的。他们在尽情地唱，过去他们只能用压抑的低嗓子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今天却可以拉开嗓子高唱《东方红》了，有几个同学背上写上“天亮了”三个大字，跳得更是欢快。这的确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感受，现在黑暗到了尽头，曙光已在前面，真的天亮了。

在这队伍里也有我认识的地下党同志。有的趋前握手，有的挤到吉普车上来，和我们一同欢笑，然而我发现他们成串的眼泪滴落在衣襟上，这里面有欢乐的眼泪，也有辛酸的眼泪，也有悼念的眼泪。他们告诉我一些同志已经在天亮前倒了下去的消息。他们用鲜血为我们铺筑了光明的道路，胜利的道路，我也默默地悼念他们，不觉黯然神伤。

我忽然看到游击队的旗帜。在旗帜下站着穿着农民服装的武装战士，我立刻想起了曾经领导武装暴动的老丁同志，他已经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了，但是我仿佛看到他仍然站在游击队前面，褐红色的脸膛，头上包着白帕子，安详地在向我微笑。呵，还有和他一起的老陈和老吕。要不是震天的爆竹和室人的火药味把我从幻觉中唤醒，我简直要下车去和他们握手，然而他们都已经英勇地牺牲了。

我正在触景伤情，为烈士们悼念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启明电灯公司的工人。解放前夕，他们在地下党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厂房和机器的周围安上高压电网，守护十昼夜，粉碎了敌特爆破电厂的阴谋。那是裕华、宝星纱厂的女工，穿起过去谁也瞧不起的“纱妹”的雪白围腰，戴上雪白的工作帽，这过去是卑贱的记号，而今成为光荣的标志，真是今天和昨天，一夜全变样。她们举起用棉花扎成的彩牌，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从邮电工人的行列里传来喜讯，他们在迎接解放的同时，已经修复和接通了全国的电路邮路。

在街道两旁，在卡车上，在楼顶上，不知站了多少欢迎解放大军的普通老百姓。看到自己的子弟兵扛着那么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大炮、机关枪、步枪，在街中间踏着雄健的步伐前进，唱着《解放军进

行曲》，看到子弟兵个个身强力壮、浑厚朴实，红而健康的面孔上露出威严而亲切的神情，老者在赞叹：“这才是王者之师，堂堂之师呀。”

群众自动地把一朵又一朵红花挂到解放军战士的胸前，有的挂到刺刀尖上。当战士们忙于答礼，措手不及的时候，又一群人拥上去，把黄澄澄的橘柑塞进战士的口袋。战士们忙把自己身上挂的纪念章取下来，送给欢迎的群众。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

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钟，解放大军的队伍终于全部通过了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汹涌的人流还不散去，又紧紧包围了随军入城的解放军宣传文艺队伍，他们在那里扭着秧歌舞，唱不完的解放新歌。直到天黑下来。

这一天是成都人民最欢乐的一天，因为新的幸福生活将从这一天开始。这一天便是成都的解放日，20世纪前半叶的最后一天的前一天1949年12月30日。

八、同志们，天亮了

我们入城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地下党、地下团的同志见面。显然没有一个同志愿意闲着一天不干事情，许多过去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志，川流不息地来找我们，第一句话便是：“快给我工作吧。”

入城的第二天，我们就召开了一次地下党的全体会议。按系统发了通知，层层下传。

在一个大军阀漂亮的公馆里，豪华的舞厅大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站在门口迎接来参会的同志们，热烈地握手，伴随着滚动的泪花。

来的同志中，认识的只是少数，大半都没有见过，有的过去知道名字，许多是连名字也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纪律所要求的。有的同志是从其他地区转移阵地过来的，风尘仆仆；有的同志是才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的，脸色苍白，还跨着大八字走路，手上铐痕犹新；有的同志是才从敌军中做完策反工作回来的，还穿着国民党的黄军服。当

然，有的同志，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门口等他们多久，是再也不会来的了，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战斗任务，长眠地下了。

不大一会儿，舞厅里已经挤满了几百人，许多同志面带惊诧地互相望着，也许原在一个单位，也许共同斗争过，然而并不知道是同志。也许有的为了完成党的特定任务，曾经被同志们怀疑过吧。今天都在这会场里会师了，互相热烈地握手和亲切地交谈。

我宣布开会，当我才说出三个字：“同志们！”会场突然鸦雀无声，好像因第一次听到这么响亮叫出的三个字而吃惊，愣了一下，接着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重新说，“天亮了，成都解放了。我们终于见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们再也不必过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东藏西躲的日子了。今天，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大街上走着，骄傲地大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

全场都不禁欢呼起来：“共产党员，共产党员……”

“但是我们有不少好同志今天没有来，他们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伟大称号，让我们为他们默哀。”

全体站起来，低着头，默不作声。但是我隐约听到了哭泣声，来自后面一位女同志。她努力在压抑自己的哭声。我听出来了，那是小徐。她的爱人是我的一位老战友，他们新婚不久，他便被捕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我走了过去，想去安慰她，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小徐，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吧。”但是她忽然收住了哭声，说：“对不起，你继续主持会去吧。”

是的，今天不是我们应该哭泣的时候，是我们应该欢乐的时候，更是我们应该卷起袖子来，投身于工作的时候。有多少的事情需要我们立刻去做呀。我接着传达了川西区党委的指示。成都虽然解放了，困难却很大，任务特别重，各种机构有待接管，革命政权有待建立，民主人士有待团结，特务土匪有待肃清，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待整编，特别是物价有待稳定，生产有待恢复，斗争仍然很激烈，任务十

分艰巨。建设一个新世界比破坏一个旧世界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不可能是万事大吉、一帆风顺的。

对于我们地下党员来说，我强调：“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没有用了，不熟悉的东西却要强迫我们去做，这是毛主席说的意思。而我们地下党过去限于环境，党的政策不够熟悉，思想水平较低，困难可能更大。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和南下同志搞好团结，在新的斗争中磨炼自己。”

大家在细声地议论，我们必须从头学习。

当我说到马上要分配大家去工作时，大家都兴奋地说：“快点给我工作吧。”我说明分配的大概方向，一是回各单位去协助接管，一是到基层去发动群众，还有一些同志要到公安部门去参加肃清反革命的斗争。

要求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的比较多，这是我们过去最拿手的，本来和群众有血肉的联系，而觉悟的群众是我们一切的基础。报名到公安部门去的也不少。我们的城市知识较多，情况较熟悉，又长期从事隐蔽工作，是适宜于和特务进行斗争的。我们从过去被敌人专政的地位转变为现在对敌人专政的地位，也实在是最痛快的事。过去眼见他们捕杀我们的同志，眼见他们对人民行凶作恶，无不切齿痛恨，暗地立下誓愿：“总有一天找你们彻底清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谁不想去看一看反革命面临他们的末日审判？

小徐噙着眼泪报名要到公安部门去工作，我说：“很好，要为人民报仇，也为你的爱人报仇吧。”

九、会师

我们入城的第三天，举行老区南下同志和地下党同志的会师大会，这真是人生难再逢的盛会。

我们都准时到了区党委礼堂，谁都要注视挂在墙上的会师大会的

红色横标。贺龙同志和区党委领导同志都来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贺老总嘴上的那撮小胡须和他老是含着的那个烟斗，相当引人注目，他随意和碰到的每一个地下党同志亲切地握手，随便交谈。这和大家熟知的威名，似乎不称，然而这正见他的长者风度和大帅气度。他的谈话总是那么风趣又耐人寻味，革命的道理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却是那样的平淡和朴实。我们常常为他幽默的讲话爆发出笑声来。

贺老总和其他领导同志才入城，工作千头万绪，他们的时间可以说是以分来计算的，但是他们还是在会师大会结束后的当晚，赶来参加招待地下党的会餐。在席上，贺老总举起酒杯，要我们都举起酒杯同他一块儿喝“团结酒”，并说了些很风趣的话。

席散后，大家还是兴致勃勃的，有些同志又回到我们的住处，围着火盆闲谈。炉火熊熊，夜深人静，别有情趣。我们什么都谈，对过去工作的估计，得失的检讨，各人对今后工作学习的打算以及向老区同志学习，增强团结等问题都谈到了。我们回味了贺老总在会师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到“有功不居，有过不避”的古训和一切功劳归于党、归于人民的教导。

时间过得很快，我把窗帏拉开，东方已经泛着灿烂的红霞，太阳将要升起，新的工作日开始了。大家站起来，伸下腰，道声再见，都各自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了。

十、安民会

区党委和军管会在贺老总领导下开了一整天的会。除按照中央方针原封不动地接管全部机关、企事业单位外，还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贺老总还提出当前急迫要抓好的，还有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和整编几万国民党军队等事项。不把各界代表找来进行政治协商，建立起政权来，难以安定社会；不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安顿好，万一有个异动，将造成极大混乱。

军管会在原省议会的地方召开了各界代表会，除工人、部队、青年、妇女、学生和一些教授、作家、教员、演员外，还特别请来过去这地方的政治头面人物、起义军人和工商业资本家，真是各界代表人物济济一堂。军管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贺老总不知疲倦地在各种人物中周旋，以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一下就和各方面的人物搞熟了。我留心到，他除首先和我们的基本群众青年、学生、教授、教员等接近外，很注意和地方头面人物、资本家等打招呼、谈话，征询他们对于安定地方、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的意见，这种座谈，把党的政策直接交底给他们，使他们放心，只要这些代表人物的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便稳定了。果然他们都在座谈会表明了态度：拥护共产党，协助接管，工厂复工，商店营业，各安其业。这真是一个安民会。

在这个会上，有两个小插曲，至今还没有忘记。一个插曲是由著名作家李劫人（后来被选为成都市副市长）代表我们向前来投诚的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和一批特务宣布了勒令，要他们向人民投降，规规矩矩，不得妄动，否则严惩不贷。这对于潜伏在成都的特务等破坏分子，无疑地起了震慑作用。另一个插曲是把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著名川剧演员“当头棒”请到会上来。他是因为在舞台上讽刺了国民党政府而被捕的。在最后一天举行的宴会上，他端着酒杯跟着大家走到贺老总和领导同志面前敬酒。贺老总和他握手，当他的面，一饮而尽，“当头棒”的眼里顿时冒出了泪花，嗫嚅地说：“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大会，和首长平起平坐，一同喝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十一、最重要的工作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有几十万，最后都被赶到成都周围，被解放大军包围起来，虽然他们溃不成军，士气涣散，有的起了义，有的投了降，但他们中的顽固势力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要是一旦作乱问题就

大了，因为我们进城的部队只有几万人。贺老总对于这件事十分关切，要我们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有的起义部队中的特务，在进行阴谋活动，想和本地的“地头蛇”袍哥头子、土匪勾结起来，兴兵作乱。

我看贺老总为这事日夜操心，除派了大批军代表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外，还亲自找国民党的那些高级将领来谈话。晓以大义，明以政策，指明前途，警告他们不要异动。同时经中央批准，迅速把大批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调出四川，分散到各地去进行整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当机立断是非常高明的。

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张赴宴的请帖，我一看是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给我送来的。罗广文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司令，他的部队战斗力较强，前几天才在彭县宣布起义。他是我的小同乡，我们两家上辈人有通家之好，因此我们认识，只是各人走的路不同。我知道他现在给我送请帖来，无非是知道我是军管会的委员想来拉关系吧。我拿着请帖，十分犹豫，去不去呢？最后我把请帖拿去向贺老总请示。我说我的意思是不去，我以为这样才能划清界限。

贺老总却对我说：“去，为什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利用？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于是贺老总向我布置：“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实接受改编，准备开出四川到指定的地方去整编。只要他把他的兵团完整地交出来，不但既往不咎，还要立功受奖，有他的光明前途。”最后贺老总对我说：“你劝他，他要想掌握好他的部队，就要把在他部队潜伏的特务清除干净。”

我按时前去看罗广文的公馆赴宴。他还请来几个小同乡作陪，他的高级将领也来了不少。在宴会上，他们提了许多政策性的问题，有些问题提得使我十分惊奇。“入城约法八章”早已公布，他们似乎不大相信，问我不是一交出军队，就要对他们实行清算。这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对他们的煽动，想挑起叛乱。我才明白贺老总叫我来赴宴的用意。我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一一按政策作了解释，指明利害。

宴会以后，我又和罗广文进行单独的谈话。我告诉他，前几个月，他驻防重庆川东一带时，我在武汉的城工部领导曾经要我写一封信给他，要他相机起义立功，必有大奖。可惜城工部的人没有送到，因为他已经转移到川西，而解放大军已经攻占重庆了。这一回再不要拂贺老总的好意，错过了机会。我最后对他说，我传的话是贺老总叫我来告诉他的，他感到放心多了，他要我转报贺老总，决不辜负好意，诚心接受改编。

我赴宴回来，向贺老总汇报了情况。后来罗广文把他兵团中的特务清除了，成建制地带到浙江，接受了改编。罗广文本人后来也当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十二、烂摊子

解放前的成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的青年知道的恐怕不很多，所以我要趁此啰唆几句，看看我们当时接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成都在旧朝代完全是一个消费城市，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腐集着国民党的军阀官僚集团，四川的大地主集团，黑社会的“袍哥”势力，以及依仗他们的土匪和烟贩等。城里林立的各种衙门，省党部、省市政府，特别是警察局、宪兵团、警备司令部以及在各种名目掩护下的特务机关，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大街小巷的茶铺、酒楼、饭店、戏园、影院、鸦片烟馆，供他们享乐的舞厅、妓院，以及交际名花、高级妓女，为他们保镖的特务、打手、流氓，还有为他们提供用人的“人市”里的受苦人，应有尽有。在成都也有所谓生产事业，主要是些手工业作坊，最负盛名的织锦机房、金丝银丝作坊等，是为有钱人的生活服务的。城内大量的黄包车夫、搬运力夫等下力人也是大半依存于有钱人的消费生活的。那时的成都就是这样一個由上层少数统治者、有产者和深受压迫剥削的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构筑而成的消费城市。

这个消费城市，金字塔型的糜烂社会，当时好像也还热闹，春熙路一带，有时甚至发出虚假繁荣的炫光。但是一下解放了，这个腐朽的建筑突然坍塌了，过去的生活秩序全打乱了。偌大一个城市几十万人的生活不能不重新组合，要做到各得其所，有工作，有饭吃，岂是轻而易举的事！最糟糕的是我们接收的是一个完全崩溃了的经济结构。在这腐烂了的经济结构中还隐伏着许多经济蛀虫，那些投机倒把分子，那些银圆市场的“烂滚龙”，大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潜伏下来伺机破坏的特务、流氓集团，这些势力裹挟在一起，企图在经济上跟我们搞乱，就更不用说了。

当时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一个生产停顿、物价飞涨、粮米奇缺、大批群众失业、社会秩序混乱的烂摊子。要使几十万人走上新的正常的生活轨道，秩序稳定，安居乐业，谈何容易。我们进城才几天，就听到一种谣言，说共产党打仗有一套，管城市经济根本不行，这个烂摊子收拾不好，要不了三个月就站不住脚。当然这只是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不过我们面临的三个重大威胁却是现实的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头一个就是物价飞涨。这是国民党留下来的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从老区带来的和入城以后接收的银圆、米粮和棉纱并不多，无法控制市场。什么东西都跟着银圆、米粮和棉纱涨价，而银圆市场、米粮市场和棉纱市场都被大商人和投机倒把分子操纵了，他们说涨价就涨价，要涨多少就涨多少。在国民党统治下受够了物价暴涨之苦的一般人民，像惊弓之鸟，一看物价在飞涨，人民币在贬值，都不愿意在自己手里保留我们改造的人民币，纷纷拿去市场换银圆、米面和纱布。这样更加重了市场的压力，加速了人民币的贬值，加以特务分子故意散布谣言，弄得人心惶惶。我们虽然禁止了银圆黑市，抓了一些银圆贩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依然刹不住这股涨风。我们当时面临的局势，的确是十分严峻的。军管会开了许多会研究对策，说到底还是要有物资的后盾，首先要有充分的平价米供应市民，人心安定，其他都好

办。于是我们派了大量干部下乡去征粮。有了充足的米粮按户供应，黑市米价自然下跌，其他的东西虽然还在涨，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了。

但是干部下乡征粮，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下的粮食都在地主富农手里，他们不愿意交粮；而农民群众没有被发动起来，我们对情况不明。一面是城市要粮，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也要由我们保证他们吃饭，急如星火；一面是地富藏粮抗拒。严重的斗争不可避免，骚乱发展为武装冲突，依附地主阶级的民团、土匪武装蠢蠢欲动，偷偷杀了我们不少征粮干部，局部地方深化成为公开的暴乱。我们不得不面临另外一场更严峻的斗争，平息武装暴乱和清匪反霸的斗争。

十三、棉纱之战

成都有了平价米的供应，并且采取合理的分配办法，军需民粮都有了保证。老百姓有了平价米，吃了定心丸，物价上涨的势头刹住了，人心安定，对共产党也更信任了，说：“谁说共产党搞经济没有办法？国民党这个不可收拾的经济烂摊子，一下就拣顺了。”

我们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能就此放松。我当时在军管会和市委工作，贺老总一再告诫，当前，我们不仅要准备打许多个回合的没有枪声的大战，更要准备打一场有枪声的大战。

我就亲眼得见贺老总带领军管会打过一场无枪声的大战——棉纱之战。

成都的棉纱被一些专搞投机的所谓棉纱大王操纵着。市场上有多少件棉纱，在谁手里，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兴风作浪，一吐一吞，就把小户和我们那点棉纱吃光了，然后提价抛出。我们没有比他们多的棉纱，在经济市场上是难以和他们较量的。贺老总便暗地派了一些军车到重庆去，悄悄运回大批棉纱来，按投机分子哄抬起来的市价，在

市场抛出一部分。这些大王张嘴就吃进去许多。他们想：你们有多少件棉纱，我们心里有数，只要把你们抛出的棉纱吃光了，我们爱涨多少就涨多少。

大王们既然爱吃进，我们就继续抛出。他们的资本都陷进去了，“头寸”不够，只好向银行贷款来吃进。我们还是继续抛出，他们就吃不住了，不知道我们哪来那么多棉纱。我们进一步不仅抛出，而且还压价抛出，从他们哄抬上去的每件一千七百万元（币制改革前的人民币），逐步压价回到他们哄抬前的每件七百多万元。看样子我们还有底货，还要压价。他们怕我们再压价，带来大损失，于是惊惶失措地以我们定的五百多万元一件全部抛到市场，我们全数吃进。这时我们又叫银行抽紧银根，要他们还本付息，大王们不得不宣告破产。棉纱既然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稳定棉纱布匹的价格，其他跟着棉布走的东西也涨不上去了。听说贺老总又下命令，把棉纱用军车运回到重庆去，到那里去斗争去。

这一仗打得很痛快。后来“五反”运动时，我管工商界的运动，我遇到一个当时的大王。他把当时打败仗的事交代了，对我说：“我们以为你们不会做生意，结果我们触了大霉头。”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我们在成都怎么一下搞到那么多件棉纱。对此，我笑而不答。

十四、下令坐黄包车

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地主官僚统治阶级垮台以后，直接或间接为他们干活的大量市民便失业了。成都原来的无业游民本来就多，又有大量从全国各地跑到这里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怎么使这批大量的无业者各谋其生，有吃有穿，是另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对我们新政权的另一个严重威胁。

我们除尽量遣散一些可以回到原地或别的地方就业的人以外，就是努力做好工人工作和工商业资本家的工作，要求劳资合作，为他们

提供生产条件，尽快恢复生产。还尽量说服工人不要提过分的要求，要叫资本家有利可图，就不能不暂时忍受剥削。这个工作当然也是很不好办的。不仅有些资本家听认谣言的煽动，抽资歇业，还有一些混进工人队伍中的特务、袍哥头子打起为工人谋福利的幌子，制造事端。我们只得用民主改革方式清除这些败类，而绝大多数工人是听共产党的，努力生产，给我们保证供应，稳定秩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才明白中央提出的进城以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多么正确。

还有一大批原来无业的市民，他们欢欢喜喜地迎了解放，总希望解放以后，能够就业，谋个生活之道。这却给我们又出了难题。生产不发展，就业无法扩大，刚刚解放，一切建设无从谈起，哪来就业机会？于是我们只好就地分散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找些生产自救的门道，搞些新的服务和手工业活儿来干，同时我们还组织淘挖金河、御河和府河，以工代赈，还辅之以社会救济工作。这就叫作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使大家有谋生之路。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黄包车夫请愿的事件，使我们大伤脑筋。

成都有几千上万的拉黄包车的工人和搬运工人，还有许多服务行业（饭菜馆、澡堂、茶楼等）的工人。由于原来服务的对象变了，生意不多，求一家的吃饭钱本来就困难，加以黑市猖獗，物价暴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威胁。这可是多少万人的生活大事，我们正谨慎小心地对待，偏偏这时出了一件事。据说有一个解放军（那时入城接管的干部全都是穿解放军制服），在街上看着黄包车夫拉着有钱人飞跑，认为很不人道，命令那个坐车的人下来，训了他一顿，说这是人骑人，是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件事到底有没有，一直没查清楚，也许是敌人的故意造谣，制造混乱，但是这件事一下传开，大家不敢坐黄包车，雇搬运力夫了。黄包车夫失了业，闹了起来，成千的人拉起车子到军管会门口叫嚷，要求拿饭来吃。搞得我们很恼火。虽

然经过说服，大家散去了，可是没人坐车，还是没法。贺老知道了，很生气地说：“乱弹琴，不准人坐黄包车，他这个人道主义倒好，叫工人饿肚子了。”

我们努力进行宣传解释，准许坐黄包车。贺老总认为还不够，他说：“你们找人穿上解放军衣服，坐黄包车在城里转一圈就行了嘛。”

果然，这么一办，把一场工人请愿的风波平息了下去了。这样一来，像澡堂擦背的、修脚的，饭馆递茶倒水的，还有一些其他服务性差事，都知道被允许存在。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早晨把对群众有利的东西都办完，这一条算是明白了。

十五、和平解放并不和平

我们入城以后，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治安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军管会的领导，特别是贺老总，是早就预料到了。他告诫我们，成都本来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又解放得最晚，国民党的反动分子腐集于此，国民党特务又专门做过潜伏布置，办过游击干部训练班，顽固的地主恶霸势力、土匪流氓武装，基本上还没有触动，对这些情况我们都要充分估计。

为了养活成都八十万人民和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起义部队，为了打击城市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的奸商，我们不得不下乡征粮。这不仅触犯了乡下的地主恶霸的利益，也惹恼了住在成都的大地主官僚，他们到处叫喊征粮多了，扬言这样将激起“民变”。所谓“民变”，就是地主恶霸、流氓土匪将要勾结在一起，发动暴乱，以武力抗粮把我们饿死、困死在成都。

过不多久，敌人首先在成都东北十五里的地方龙潭寺发动暴乱，武装进攻派到那里征粮的解放军工作队。解放军寡不敌众，在撤回成都的路上被敌人包围，全部牺牲。敌人占了龙潭寺以后，就到处“飞帖子”，号召暴乱。没有多久，川西以及和川西接壤的西康、川南、

川北的部分地区陆续发生了暴乱，打出了各种国民党西南反共游击纵队的旗号，虽是乌合之众，估计却不下几十万。他们不仅用酷刑杀害了我们下乡征粮的工作队和解放军，还围攻一些县城。县城里我们的人不多，由县委和少数武装力量日夜守城，血战待援，有的县待援不至，就只好突围撤出了。成都周围很不平静。晚上我们到西城墙上去巡视，在青羊宫也有敌人用机关枪向城里扫射。

这时，在城里的特务和地主袍哥头目也蠢蠢欲动。有的放出谣言说：“解放军打了三千把大刀，贺龙要血洗成都逃跑了。”号召什么“杀猪（朱）拔毛”。特务流氓公开在街上肇事，把我们市委门口停的一部卡车烧了，把东门外大街一部吉普车打烂了，说目标是打军管会的领导，甚至还有人打黑枪。他们故意制造恐怖和饥荒，来配合城外的暴乱。这时，竟然有利令智昏的头面人物放出话来，说是只要少征粮食，请他们和袍哥的总舵爷出来管事，他们出去“拿言语”，就可以把事情“搁平”了。

看起来和平解放了的成都，并不那么和平，毒疮毒瘤不开刀，是治不好的。一场平息叛乱的战争，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十六、依靠群众扫平叛乱

区党委、军管会和部队连夜开会，贺老总进行紧急部署，决定武装镇压叛乱，同时在城里搜捕特务和反革命分子。

贺老总和解放军跨过多少大江大河，这点风浪算得什么？几个蠢贼，一群乌合之众，敢来捻虎须，会有他们的好下场吗？贺老总派王新亭司令员带上精干部队，直取叛乱老巢——灌县聚源镇。挖了老巢，然后左右扩张，一下就把川西平原的交通要道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打通了。成都附近的叛匪，见势不妙，迅速逃走了。打通成灌路，也是为都江堰岁修提供安全保障，以免误了川西坝的农时，这可是生死

攸关的事。王司令员回来摆起来，我们十分兴奋，贺老总却不动声色，好像他早已料定这样的结果。前两天他布置战斗后，就显得很轻松，老咬着他的烟斗和我们下棋，说闲话，显得十分悠闲。我忽然想起东晋那个指挥若定的谢安将军来。他的部下打了大胜仗回来向他报告，他正和别人下棋，听了也无动于衷，好似早已料定了。

为什么这么成竹在胸？贺老总除深知解放军以一当十的战斗力的，知道气势汹汹的敌人不过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更知道人心的向背，我们站在人民一边，便会无往而不胜，所以他布置战斗总要说依靠群众平叛的问题。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发生过的一件事。据报告说，有一次，解放军打进了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子，那里的群众还没有见过解放军，土匪欺骗和威胁他们，都跑上山躲避去了。但是有一个青年妇女正在给自己才满月的娃娃喂奶，没有来得及跑掉，便把奶娃放在床上，自己匆匆地钻进一个柴垛里藏起来。解放军进村后，发现了这个正哭着的奶娃，非常慈爱地抱起来，可是找不见孩子的妈妈。战士们只好一边熬点米汤来喂奶娃，一面从一头没有来得及拉走的奶牛身上挤点奶来喂奶娃，还给换尿布，诓他不哭，做得很周到。这个躲在柴垛里的妈妈什么都看到了，再也不怕了，从柴垛里跑出来，流着感激的眼泪，向解放军下跪，战士忙把奶娃还给她。

这个妈妈和一个跑不动的老大爷发觉解放军真是秋毫无犯，爱民如父母。凡是没有锁上的门，都代贴了封条，自己宁肯住牛棚，在外边挖灶煮饭，也不进屋去。牛棚里的牛没有被拉走，猪圈里猪没有被牵走的，解放军割草把牛喂好，把猪食煮好喂猪。老大爷和那个年轻妈妈看在眼里，便悄悄上山去把村里人都叫回来了。他们对解放军特别亲热，送信带路，积极支持平叛，受骗参加叛乱的被瓦解回来不少，剩下几个顽固的站不住脚，逃进深山里去了。

这个故事我当时听了十分感动，至今没有忘记。贺老总称赞说：“都像他们这样做群众工作，再厉害的叛匪也站不住脚了。”

果然，用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的办法，依靠群众，不出几个月，把叛乱平息了，匪首大半被抓到，归案法办了。加上在城里充分供应粮食，打击投机倒把，严厉镇压反革命，逮捕潜藏的特务，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了。

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艰巨任务还正等待着我们。

1989年8月

打响川西剿匪第一枪^①

/林元亨

—

“西南局并中央：我们两月多的工作业已结束，现将下列六个问题作综合报告，希审阅指示。”1950年2月5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最后一遍校阅文件后，发出了他的报告。其中，在“关于成都的接管工作”中，他提到：“入城以来……我们力量放在了解情况，准备接管上。这期间虽尚未发生混乱和大的案件，但由于特务尚未搞清，散兵游勇尚未完全登记处理，起义官兵尚未严加控制，加以旧社会遗留的土匪封建会门、流氓小偷更非短期内所能澄清，故社会尚未安定。”

在电报发出的同一天，接到赴任保加利亚驻外武官调令的18兵团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正带着一个加强班的战士，一行19人，从其担任总军代表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三兵团朱鼎卿司令部驻地石板滩出发回成都。没想到，走到龙潭寺院山坡附近时，遇到穷凶极恶的巫（邬）杰（一说是汪荣芳或王荣芳）为首的一股匪特埋伏袭击，全部

^① 参考文献：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年。

壮烈牺牲，惨状不堪描述。而在这之前，三名战士骑马路过龙潭寺时，一名战士就已被巫杰一伙枪杀，马匹被抢。

当晚，这批匪特又纠合所谓“川西反共救国军六纵队”与新店子、龙王场等地的反动武装，围攻石板滩，提出“保粮”“保枪”“川人治川”的反动口号，胁迫部分民众参与，教唆国民党起义部队再次哗变。其中，石板滩仁和场乡长、袍哥头子刘熙廷（又作刘席廷、刘锡廷、刘西黎）带领 300 人的教导队，杀害了解放军军代表副营长赵德修、指导员刘伯周及通讯员共 26 人，一部分起义部队近千人被冲散和裹挟。

第二天凌晨，龙潭寺、石板滩两地暴乱的近千名匪特，又围攻华阳县政府（驻地中和场）派往龙潭寺护送公粮返县，夜宿龙潭寺曾家粉房（同乐村二组）的解放军护粮队一个排。赴石板滩换防的解放军 60 军一个连队途经龙潭寺，见街上关门闭户，突然有人叫他们去谈判，连队派一个排长带着三人刚刚走到第二个巷子，一颗子弹射来，一名战士当场牺牲，而后连队也被包围，伤亡十分严重。同时，正在石板滩被叛匪围攻的“第三整编委员会”处境也万分危急，军代表 60 军 179 师 535 团副政委郭铁和 178 师 533 团副团长陈青林竭尽全力自卫，在起义部队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的毅然协助下，迅速组织“编委会”全体工作人员并发弹发枪武装两个营的起义部队兵力进行抵抗，面对上万人的匪特攻击，坚持了三天三夜。

匪特暴乱的消息从龙潭寺、石板滩一个个传来，成都震惊，西南局震惊。以朱向离等同志被杀害为导火索，人民解放军在龙潭寺打响了川西乃至西南和全国剿匪、平叛的第一枪。

二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成都，有成都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在的北较场成了临时总指挥部。12 月

3日，蒋介石在校长张耀明的陪同下，最后一次检阅军校官生，升旗时旗帜突然跌落。10日，成都面临解放，在城北凤凰山机场匆忙逃离的蒋介石，不知是什么心情。据其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回忆录说：“12月10日，成都整个局面已难控制，当天下午，蒋介石和蒋经国即由少数侍从人员，循着小路护送到凤凰山。”下午两点，蒋介石父子搭乘由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C-54座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18时30分到达台北。爱写日记的蒋介石，直到16日，才在写“上星期反省录”时，“接十日记事”记述说：“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到台北后与薛（缺‘修’字，应是陈诚）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

虽然匆匆逃离，但离开之前，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为成都的解放埋下了无数的“地雷”。这些“地雷”，随时都会被踩响和引爆。一份由西南军区编印的材料“西南土匪特务情况之一斑”显示，在西南解放前，蒋介石就已经开始着手训练干部，组织潜伏武力，并将特务转入地下，企图作垂死挣扎。

其实，早在1949年3月，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就在重庆召开“西南地区工作会议”，制订应变计划，决定派遣特务到西南各地潜伏和组织反共武装力量，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使张耀明，在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办了多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和其他一些反革命的领导骨干，这些人中有军统特务，也有惯匪、地主、地痞恶霸、散兵游勇、袍哥头子等，总共4700多人。他们一面对其封官加爵和重金收买，一面安排这些人携带武器弹药、电台和大量银圆等，秘密潜往西南各地，建立匪特反共武装组织，采取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和新生的人民政府作对。

龙潭寺袍哥匪首巫杰的上司，朱向离一行被杀害的始作俑者，军统特务、“游干班”学员，隐藏在石板滩的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防大队长李干才（材），就是蒋介石为成都解放埋下的一颗

“地雷”。这颗雷，终于在1950年2月5日，距离春节还有11天的时候，在东山龙潭寺引爆了。紧接着，成都周边十余个县的武装叛乱同时发生，三十多座城遭匪特围攻。成都向外伸延的8条公路，除解放军控制的川陕公路还能通车外，其余7条均为土匪所断。武装叛匪从东面对成都形成包围，距成都东门一里路的牛市口，也有土匪出没。18兵团情报参谋都爱国记得：“匪乱第一周统计，我下乡征粮和建政小分队行动人员，被匪杀害1111人。”

当时，西南军区编印的档案材料《土匪残害人民之罪行一部》，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新都二十四个农民妇女及积极分子被害”、“我政治部主任被挖眼剖腹”、“民主人士莫风楼拒不从匪，全家四十三口惨遭杀害”……由此可见，这些匪特的穷凶极恶和最后的疯狂。

“抗粮反共”，“反征粮、不交粮、反合理负担”，“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反对禁用白洋”，“抗用人民币”，“只打北方人不打四川人”，“只打解放军不打义军”，“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匪焰猖獗，谣言四起，不断有老百姓被匪徒杀害，一时间，刚刚解放的川西坝子人心惶惶。

三

“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指出，决定把剿匪作为西南区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集中兵力，重点进剿。确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周围之匪，而后推至边缘贫瘠山区。邓小平提出：剿匪工作应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要“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事实上，早在1950年1月3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中，邓小平就意识到，西南解放后压倒一切

的中心工作是征粮剿匪，这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

“（西南匪乱）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实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2月18日，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和中央的《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提到了新政权的征粮工作与匪乱之间的关系，“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

“……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完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3月15日，邓小平和贺龙联名急电《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传至中央。

“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来自西南的急电，让毛泽东和党中央异常震惊。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3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指出了运动的

重点是打击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随着龙潭寺打响的川西剿匪第一枪，一场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斗争，与新中国三大运动之一的“镇反运动”相结合，迅即在全国展开。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 39 个军 140 多个师的 150 万人的兵力，从 1950 年至 1953 年，歼灭匪特武装 240 余万人。

四

1950 年 2 月 7 日凌晨，60 军参谋长（兼绵阳分区司令）邓仕俊亲率担任成都警备任务的 178 师 532 团、533 团（一说 180 师 540 团）开赴龙潭寺平息暴乱，直至 8 日凌晨 3 点，连拔匪特固守的几座碉堡和据点，俘虏击毙土匪 200 余人，其余溃逃。紧接着驰援石板滩，坚持了三天三夜的原朱向离所负责的“第三整编委员会”终于被解救了出来。事后得知，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至 2 月 18 日，除匪首巫杰外，击毙匪首周子高、林海东，歼匪近千人。第一次龙潭寺、石板滩叛乱被扑灭不久，3 月 7 日，龙潭寺又发生了第二次武装叛乱，清剿部队先后活捉杀害朱向离的凶手巫杰和石板滩仁和场原乡长刘熙廷，并在龙潭寺召开了公审大会，对两个匪首执行了死刑。

参加了龙潭寺剿匪的老战士李福其回忆，（有一次部队）打得没子弹了，（军队）派了三辆汽车，送的手榴弹、子弹各种弹药，走到半路，土匪就把这三辆汽车抢了，三辆汽车一个班，子弹都让土匪抢了去，把这些战士都活埋了。

3 月 13 日，60 军 179 师 538 团一个加强连，在石板滩剿匪时，回撤的伤员 3 人（包括两名负伤的干部）、警卫 3 人和抬担架的民工 6 人一共 12 人，在石板滩外三里“叫花村”休息时，被匪特分子王成

禅下毒，全部致死。6月14日，潜伏于成都城内化成寺街的王成禅被抓获，与其一同落网的还有况锦天、屠亚杰、郑思安、齐光、包福寿等特务。

4月16日，匪特李干才等再次在龙潭寺发动暴乱，抢劫军车，袭击武工队，杀害军政人员和群众200余人，烧毁民房300多间，抢走耕牛100多头。川西军区和温江军分区再次派兵合剿。

在“重拳”砸下的同时，从2月初到4月底，成都平原上的川西剿匪主要从东西两面展开。东面，由60军参谋长邓仕俊指挥，先后投入4个团的兵力，合围龙潭寺及石板滩一带。西面，由18兵团副司令兼副政委王新亭亲率6个团进剿郫、崇、彭三个县接合部和成灌公路上的安德铺、竹瓦铺、崇义铺三镇匪占地区。

直至4月底，川西剿匪部队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地区两股大规模的匪特，歼灭匪特1.9万余人。随后，又对邛崃、大邑和双流等地区股匪组织多次围剿作战，至7月底，共歼灭股匪5万余人。8月以后，川西剿匪部队转向汶（川）灌（县）彭（县）边和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以及懋功、抚边、绥靖（今金川）地区清剿，歼灭股匪2.6万余人。至12月底，1950年全年共歼匪特8.3万余人。

五

情报显示，朱向离被害和龙潭寺、石板滩暴乱的始作俑者都是狡猾、凶残的军统特务李干才，但几次龙潭寺、石板滩剿匪，都让其侥幸逃脱。档案材料显示，其实，李干才曾经与解放军有过一次正面的交手。

1950年1月17日，位于华兴东街45号成都市公安局（同时也是市军管会、川西公安厅），侦查员在保卫室曾经审讯过一个刚刚被押来的人。这个人五短身材，面部瘦小，双眼狡黠，身穿土布蓝衫。在核实其身份时，没想到他异常配合，交代他是军统特务，叫李干才，

曾任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防大队长，并在稽查处长周迅予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边区反共突击军总指挥后，代理稽查处处长兼执法大队长，少将军衔。李干才表示“愿立功赎罪，争取从宽处理”。按照当时的政策，李干才随即被释放。

随着龙潭寺匪首巫杰的落网，幕后元凶李干才浮出水面，军方和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利用秘密情报站，对其秘密处决。4月8日，成都市公安在正府街捕获李干才的贴身亲信吴华廷，此人正是石板滩杀害军代表的凶手之一。线人、原军统特务徐伯威，通过中间人、前特务曾渊亨，与李干才的下属徐银生搭上了线。在曾渊亨的策动下，徐银生决定戴罪立功。

4月16日，李干才再次遥控发动暴乱的当天傍晚，在龙潭寺的乡间小道，徐银生突然掏枪对走在前面的李干才头部连开数枪，罪魁祸首李干才当场死亡。次日清晨，徐银生在曾渊亨的带领下投案自首，交出了击毙李干才的枪支。徐银生因表现有功，后来被从宽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随着李干才被处决，徐银生自首投案，加速了“东山五场”（石板滩仁和场、洛带甄子场、西河西河场、龙潭寺隆兴场、清泉廖家场）叛匪的分崩离析。4月27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龙潭寺的叛匪。“东山五场”的天空，再次天清气朗。

六

1950年春剿匪平叛胜利后，温江专区在和盛（今和盛中学内）建立起一座纪念碑“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纪念朱向离将军、川西剿匪殉国烈士和正义人士。

据统计，仅西南地区1950年4月份就歼匪85433人，投诚者有38676人。经过军民协同作战，反复清剿，截至1950年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大部已被剿灭，共歼匪98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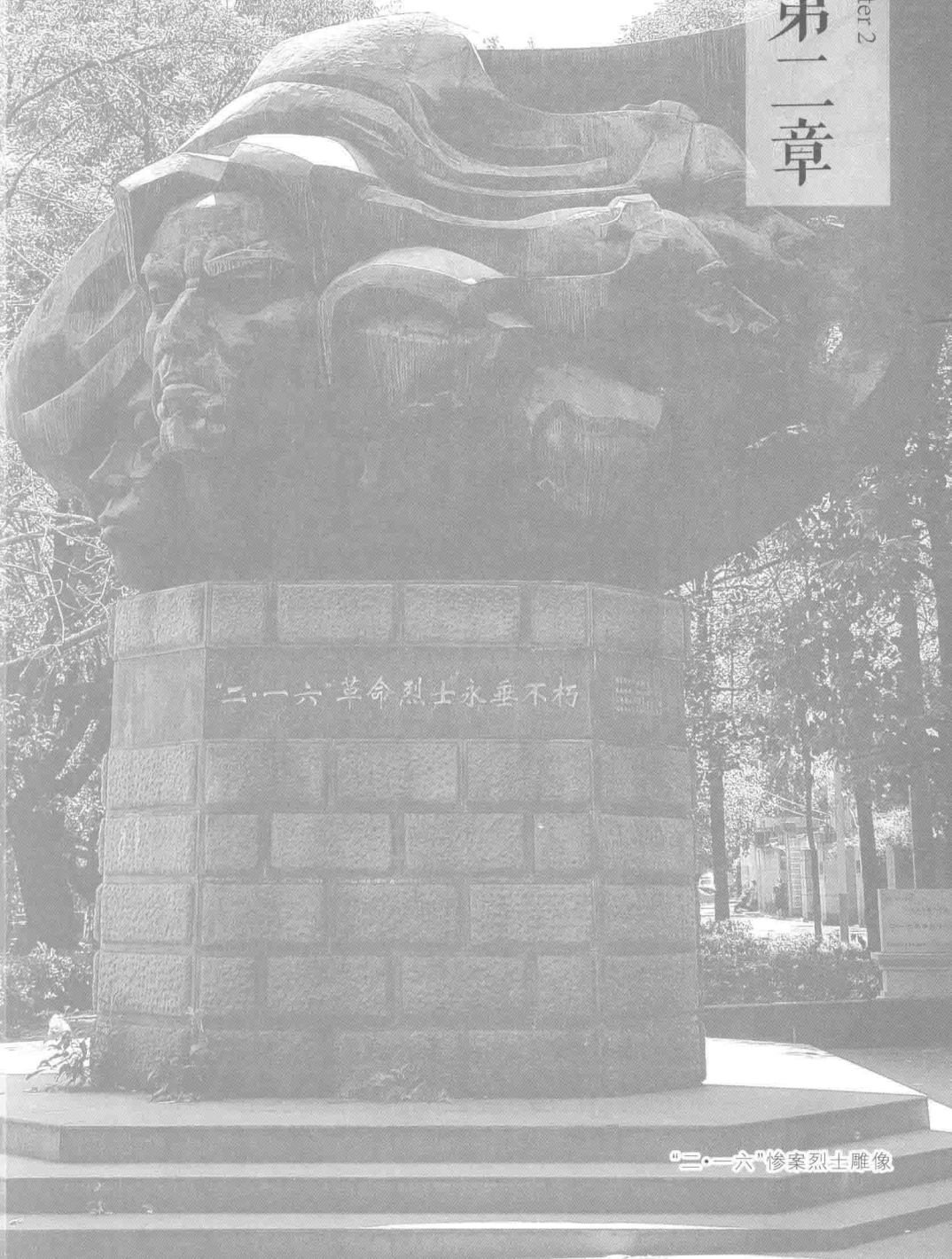
1951年1月5日，邓小平和贺龙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1年至1953年，西南军区在四川及西康省、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土匪24万余人，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2000年3月27日，成华区委、区政府修建院山坡烈士陵园，将朱向离烈士遗骨从天回镇成都军区总医院迁移至院山坡，与他当年一同殉国的战士们永远在一起。

今天，萋萋院山，雨润烟笼，子规声里，魂兮归来。在龙潭寺院山坡，朱向离和18名战士面对混杂、裹挟着群众的匪特，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英勇赴死，虽然一枪未发，但他们却以血肉之躯、铮铮铁骨打响了川西剿匪乃至共和国西南剿匪的第一枪，用鲜血浇筑了一座川西剿匪夺取胜利的永恒丰碑。

第二章



“二·一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先烈不朽，青春常在。追寻革命者的足迹，回眸前辈的奋斗历程，蓦然发现，成华曾是一方英雄的热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这里就留下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身影。他们用理想、信念为后人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历史风景线。

杜鹃啼血染丰碑^①

——记成都“二一六”惨案

/文如意 姜小雨

引 子

在成都城东成华区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不仅有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有动人心魄的革命遗迹，风景宜人的磨盘山南麓的公墓中，就矗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大墓碑，纯白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二一六’革命烈士之墓”。

早在1981年，“‘二一六’革命烈士之墓”就被公布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至2019年，四川省政府公布了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96处，“‘二一六’革命烈士之墓”为其中之一。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岁诞辰，那巍然伫立的丰碑告诉我们，革命之路，历经艰险，革命之人，虽死犹生。回首百年，血雨腥风，重温先烈的悲壮事迹是为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① 参考文献：《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张澜》，群言出版社，2005年；廖友陶：《成都“二一六”惨案》；沙汀：《省立师范“二一六”惨案前后》。

93年前的1928年2月16日，成都春寒料峭，一场惊骇世人的惨案突然发生，14个年轻的生命如苦雨凄风中坠落的片片杏花，远离春天而去。

风雨如晦 江河日下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大地上，列强环伺、军阀割据。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南北对峙，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上讨伐北洋军阀直系、奉系的三股势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24日，英、美等国军舰炮轰南京城，致使2000余国人死伤，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南京惨案”。

消息传到重庆，各界民众义愤填膺。3月31日，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重庆工农商学各界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四川军阀刘湘趁机暗中布置军队，意图迫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对大会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130余民众死亡、1000余人受伤的“三三一”惨案。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纠集各路军警、特务和帮派势力，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搜捕、袭击共产党员和工人，造成数百人死伤、千余人被捕。如此明目张胆的暴行激起了民众的怒火，各行业工人迅速组织罢工抗议，参与人数多达数十万。然而，蒋介石并没有理会汹涌的民意，反而倒行逆施掀起新一轮疯狂搜捕和屠杀，造成了更惨痛的伤亡。

经此一系列惨案和反革命事变，国民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武汉先后实行“清党”和“分共”，宁汉合流，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失败。

军阀割据 黑云压城

四川军阀派系林立，混战不断。各军阀在其驻防地区内征收赋税、委任官吏、扩充军队，并常为争夺地盘挑起战争，经过数百场大小战斗，逐步形成了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巨头。这些军阀巨头不仅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也在成都为祸经济、欺压工人、剥削人民，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1925年起，大小军阀先后纷纷设厂，铸造含银量低于规定的劣质银币以牟取暴利，到1927年秋冬，仅在成都和灌县就私设了13家造币厂。大量滥发劣币导致金融市场混乱，货币购买力骤减，工商业凋零，失业剧增，民众的生活愈发艰苦。

而劳动人民面对的不仅是猛涨的物价，还有资本家变本加厉的剥削。在纺织行业，资方掌握着用于计量长度结算工资的“朱尺”，比通行的标准尺长三厘米，以此盘剥原本就收入微薄的工人。在人力车行业，老板不仅擅自提高车租，还雇用打手将无力承担车租的退租工人打死，把人力车工人逼上绝路。

与此同时，教育事业也面临巨大的危机。当时，在成都的大中专学校中，只有国立成都大学（后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建为国立四川大学）的经费来源于“盐余”款外，其他学校全靠“肉税”收入作为开支。然而作为教育经费的“肉税”收入却被各地军阀层层盘剥、挪作军费，从中侵吞或拒绝按时调拨给各校，导致学校教员无力养家糊口，学校无法维持正常教学，教育事业岌岌可危。

逆流而上 奋起反抗

军阀拥兵擅权，资本家牟取暴利，各种剥削手段花样百出，致使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在成都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刻，中国共

产党逐步建立起大中专学校校内党团基层组织，发展进步社团，教育领导工人骨干，组织一系列斗争，反抗军阀和资本家的压榨，捍卫民众基本权益。

1928年1月4日，由成都学生联合会所属各校社团联合百余个社会各界团体，举行了反抗劣币大同盟第一次代表会议，组建起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大同盟，举行示威游行，向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位军长提出“捣毁铸币私厂、官价回收劣币、禁止良币出境”三项要求。然而当局却派出军警抓捕了反抗劣币大同盟的4名学生，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强烈愤慨，并组织起罢工、罢课、罢市联合行动，发表《反劣币被捕学生宣言》，声援被捕学生。迫于大同盟坚强斗争和社会各界强烈抗议的压力，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表示接受大同盟提出的三项要求，反抗劣币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党团的基层组织还深入工人当中，为工人开办夜课补习学校，为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维护工人的基本权益。1928年1月1日，中共川西特委发动成都人力车工人及鸡公车工人2.8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宣布罢工20天，要求惩办打死退租人力车工人的凶手，降低车租等。罢工得到华阳县农民协会和成都市政总工会各行业6万余工人的齐力声援，交通瘫痪加之罢工压力迫使当局拘捕了凶手，车行老板也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将车租降低20%。

大中专学校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几经波折。1927年11月24日，在党的领导下，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省立各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公推国立成都大学的李正恩、钱芳祥以及公立四川大学的龚堪慎等任组织工作。学联向省教育厅提出发给教职员一个半月工资以维持生活和确保教育经费独立的要求，却未获得答复。于是省立18所学校于11月28日起开展总罢课，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向各界群众揭露军阀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挑起内战的罪行。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12月3日，全市各界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各界后援会，发表宣言，坚定支持教育

经费独立运动。

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当局于12月5日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会议，会上学联代表提出参加教育经费收支机构和监察机构等要求，均被当局无情拒绝，学联代表愤而退会。会后，学联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找时任教育厅厅长万克明（曾任第二十八军秘书）理论。然而万克明态度蛮横，义愤填膺的学生遂押他游街示众，并勒令他自供罪状。游行队伍经过华兴街第二十八军军部时，万克明趁人不备逃入军部躲藏，学生拥进军部追踪，被军队扣留。当晚，学联组织两千余名学生前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局迫于形势，准予相关学校保释。

随后，省立学校校长团向教育厅提出集体辞职，寒假回家的学生将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精神带回各县，重庆、自贡、岳池等地的学校闻讯纷纷发表宣言，以示支持。经媒体传播，运动的声势很快蔓延到省外，湖北全省学生总会和上海日报社都通电声援成都教育界的维权行动。12月23日，学联发出《再次申请实际交还肉税书》，获得广泛支持。历时一个月的罢课和省内外各界的舆论压力，迫使军阀刘湘通电全川，呼吁各防区接受教育经费独立的要求，将全川肉税划拨作为教育经费，教育厅厅长万克明也被迫辞职。至此，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除了暂拨教职员的一部分工资外，教育经费实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在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中，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是骨干力量之一，引起了军阀的注意和记恨，为阻碍学生运动，军阀开始着手控制教育界，压制学潮。1928年1月，省教育厅撤换了省立一中校长唐世芳，委派军阀刘文辉的秘书杨廷铨出任校长，此举遭到学生的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杨廷铨到校任职。而杨廷铨自恃有军阀做后台，无视学生的反对，竟于1月14日在武装士兵的护卫下强行进入学校，夺取校印，任由士兵殴打学生，并开除了十余名反对他的学生代表。杨廷铨还让士兵进驻学校，禁止学生出入，强迫学生签名欢迎他，否则

就逐出学校。被迫离校的学生组成了离校团，在1月30日的《国民公报》上刊登了《省立第一中学被迫离校团启事》，声明该校“拒杨”运动的目的在于教育经费独立和学校自身利益，指控杨廷铨武装劫校。省立一中的“拒杨”运动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2月5日，在中共川西特委和中共成都市委的组织下，成都各校进步社团的数万名学生在支矶石公园集会，游行声援省立一中学生。

2月14日，省立一中因招考新生撤走了军队，百余名学生来校质问杨廷铨，要求其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并交出校印、离开学校。杨廷铨有恃无恐，态度蛮横，拒不接受学生要求，甚至辱骂学生。激愤中的学生与杨廷铨扭打起来，人多手杂遂误将其打死，慌乱的学生把他的尸体投入学校的枯井中之后便跑散了。

无端被捕 英勇就义

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一系列维护民生、争取权益的斗争触动了军阀的根本利益，成都的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早已摸清了成都地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社团领导者的信息，为大规模镇压做好了准备。学生在混乱之中打死杨廷铨，给军阀进行大规模杀戮制造了口实。

虽然中共川西特委听到杨廷铨被学生打死的消息后，立即预见到军阀将以此为由进行血腥镇压，并当即通知在历次斗争中抛头露面的运动骨干离开学校和住所隐蔽起来，可是一些师生没有意识到军阀斩草除根的险恶意图，认为与杨廷铨案无关即可安全无虞，轻视了敌我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最终惨遭不幸。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教务主任袁诗尧（一说袁诗堯）接到通知后，认为自己是教师，并未参加过学潮，没有隐蔽的必要。中共川西特委学委书记、四川省学联主席龚堪慎以及中共成都市委委员、成都市学联的主要负责人李正恩都认为自己是大学生，没有参与省立一中学生打死杨廷铨事件，也表示要坚守岗位，不准备撤离。

1928年2月16日，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此前曾在重庆参与策划“三三一”惨案）派出大批军警突袭各校，按照事先拟好的秘密黑名单，一下子逮捕了百余名师生。当日拂晓，军队就包围了国立成都大学，四处搜捕加入社会科学研究社（国立成都大学进步社团，其宗旨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民主革命）的学生。有同学见军警要抓人，劝李正恩不要出去，李正恩坚定地说：“不！社科社的都出去！”也有同学拉王道文找地方躲藏，王道文镇定道：“我没犯罪，怕什么，不出去，会让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同志遭难。”那位同学强行把他锁在室内，他却又翻窗出来。在紧张的气氛中，中共成都大学特支书记钱芳祥冷静地嘱咐“设法转告同志们，要镇静，不要怕，他们是抓不到什么的”，还鼓励同志们“砍头流血，铁窗风味，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胡景瑗甚至还幽默地学张澜校长略微口吃的南充口音：“这个叫、叫……没道理！走、走……走就走！走到、到……到哪里都可以！”

在省立第一师范校，共青团川西特委兼成都市委书记周尚明本已撤离，但他担心保管的党团文件遗失，又冒险返回学校检查，却不幸被捕。军警在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进行抓捕时，有同情者告诉张博诗有同学昨夜未归，让他应那位同学的名字，然而张博诗却只说不要紧，依然应了自己的名字。更令人遗憾的是，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的一位秘书因敬佩袁诗尧，于前一天特地冒险到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向他报信，等到深夜却仍然与他擦肩而过，未能挽救袁诗尧于水火。

中共川西特委获知各校师生被捕的情况后，立即设法营救。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曾任川北宣慰使，刘湘曾是他的警卫营副营长，素来对张澜敬重有加，于是特委赶紧请张澜致电在重庆的刘湘，并托请刘湘向刘文辉说情。随后张校长又亲自登门去找刘文辉，而刘文辉却托词不见。然而努力营救被捕师生的社会各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进行搜捕的当天下午，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竟然不经审讯，就将被捕的师生袁诗尧、周尚明、李正恩、龚堪慎、钱芳祥、王向忠、郭翼棠、张

博诗、王道文、胡景瑗、石邦渠（一说石邦渠）、陈选、白贞瑞、韩钟霖 14 人残忍杀害于下莲池，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一六”惨案。

被捕的师生面对军警表现十分英勇，纷纷怒骂质问，王道文为拒绝捆绑，与军警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直到被连捅 9 刀行动艰难，才最终被缚。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钱芳祥首先喊出“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随即“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师生们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从容就义。龚堪慎中弹后依然挺直身躯、怒视敌人，直到第三枪打中要害。袁诗尧身中 7 弹，倒在血泊中。王向忠至死怒目圆睁，紧握双拳，满腔义愤。

血腥的历史，令人不堪回眸，“二一六”惨案中牺牲的 14 位烈士，最年长者不过 30 出头，最年少者还不足 20，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风华正茂的生命戛然而止，蒸蒸日上的事业、学业毁于军阀残忍的枪下。

事后，当局还居心叵测地给烈士们罗织“罪状”，称据省立一中函，杨廷铨案系石犀社纠集成大社科社、师大导社、附中新青年革命团、法专共进社和省一师赤锋社所为。

惨案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国立成都大学张澜校长随即向当局提出辞职，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当局的阴谋：“办杨案必先严究该校之主凶，而后胁从之真伪乃分；清共党必以事实为证据，而后私人之诬陷方免。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成大临时学生会发布《国立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为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捕杀学生宣言》，全市各界群众在少城公园举行了“二一六”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抗议军阀屠杀教员、学生，要求当局保障人权。著名学者林山腴闻之也颇感震惊，痛惜地说：“杀的都是些娃娃，太不应该。”

张澜在教育界和政界名望颇高，成大师生纷纷致电当局要求张校长复职，加之军阀之间钩心斗角、暗流涌动，最终迫使刘文辉、邓锡侯不得不违心地挽留张校长。在各界的一致慰留之下，张澜终于在 3

月9日表示“勉允复职”，这不仅保护了成大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更阻碍了军阀控制学校的企图，避免了更大规模的血腥暴行。

英灵宛在 再聚成华

烈士们英勇就义后，各校组织人力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学校装殓，还拍照供师生们瞻仰、凭吊，各校学生莫不震惊悲痛。成大6位烈士的遗体由张澜校长派工友抬回停在皇城校区至公堂，以上等黑漆棺材装殓，先寄殡到外东的庙宇中，两个月后再下葬在武侯祠后的竹林中。安葬烈士的时候，有送葬的同学建议不要埋成一排，像是在陈尸示众，而要把6副棺木摆成圆周形，让烈士们头对头，就像围坐在一起开会一样。于是6位烈士就这样彼此相伴，围成一圈，就像生前一样团结一致，相互鼓励，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20世纪50年代，张博诗烈士的棺木也迁葬至此，安放在圆心之中，加入了同仁们的“会议”。而其他各位烈士的遗体或由学校就地安葬，或由家人运回家乡安葬。

1982年，为弘扬烈士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成都市人民政府建立了“二一六”革命烈士墓，供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凭吊、祭奠，墓址选定在今天成华区磨盘山公墓。空旷的陵区耸立着洁白高大的“‘二一六’革命烈士之墓”墓碑，一旁立有“二一六”烈士纪念碑，是成都市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二一六”惨案烈士们的英灵终于再聚首，无声地讲述着当年的英雄故事和辉煌的人生，他们果敢无畏地捍卫了广大民众生存和教育的权利，以生命铸就了这座不朽的丰碑，让梦想不灭，让理想永存。

百年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是烈士们用他们的青春年华、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于民族危难之时，逆流而上，力挽狂澜，激起民众奋发的觉悟和图强的意志。百年之后，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

中，我们应当继承英烈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与斗争，无愧今天的责任与使命，不负明天的梦想与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往直前。

让我们记住这些年轻的名字，致敬他们纯洁崇高的灵魂，为了我们共同的“中国梦”，砥砺前行，永远走在伟大中国生生不息的阳光大道上。

袁诗尧：1897年生，盐亭县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务主任，中共党员，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是“二一六”惨案烈士中唯一的一位教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回到家乡盐亭创办了国民师范学校和初级中学，后任职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组织新青年革命团，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周尚明：1908年生，成都人，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共青团川西特委兼成都市委书记，赤锋社领导成员。性情随和直爽，团结了不少群众靠近党、团组织，工作卓有成效。

李正恩：1906年生，宣汉县人，国立成都大学生物系学生，中共党员，先后任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和国立成都大学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成都市学联主要负责人。广泛收集进步书刊，发起组建了社会科学研究社，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同时还是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者。

龚堪慎：1906年生，宣汉县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后合并入公立四川大学），中共党员，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员，共进社领导成员。出身富裕家庭，却无纨绔习气，自幼品学兼优，同情贫苦百姓，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事业当中。

钱芳祥：1900年生，巴县人，国立成都大学中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国立成都大学党支部书记，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家境清寒，为人朴实，筹办工人夜校启蒙劳动人民，组织出版《野火》宣传革命思想。

王向忠：1908年生，高县人，国立成都大学文科预科学生，中共党员，中共国立成都大学特支宣教委员，社会科学研究社宣传部部

长，是“二一六”惨案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与王道文合写的《新陋室铭》广为流传：“人不在多，有旗则行。社不在大，有钱则成。斯是运动，唯吾得醒。油痕唇上滑，钞票手头清。谈笑无工农，往来尽豪绅。可以造密告、写黑名。无工作之累己，有官职之荣身。南昌总司令，西蜀向育仁。易某云：何惧之有！”

郭翼棠：1900年生，万源县人，私立志诚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中共党员，中共成都市委青委委员，锐社领导成员。安贫若素，关心民众疾苦，带领工农学习思想文化、开展维权斗争。

张博诗：1904年生，自贡市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体育科学生，中共党员，共青团川西特委兼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导社领导成员。成绩优异，体恤农民、工人，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宣传组织能力强，是斗争运动的先锋。

王道文：1901年生，渠县人，国立成都大学中文系学生，中共党员，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知识渊博，是同学们口中的“大学长”，文采斐然，以笔为枪抨击罪恶压迫。

胡景媛：1905年生，南充市人，国立成都大学生物系学生，中共党员，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性格幽默风趣，表演才能出众，以生动的宣传方式讽刺时局、揭露丑恶。

石邦渠：1902年生，酉阳县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共青团省一师支部书记，赤锋社领导成员。平日为人和气，斗争毫不妥协，为工人、学生运动不辞辛苦，坚定踏实投身革命事业。

陈选：1908年生，秀山县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共青团员，赤锋社成员。

白贞瑞：1905年生，黔江县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赤锋社成员。勤奋好学，在斗争最激烈之时决然加入革命，英勇无畏。

韩钟霖：1908年生，宜宾市人，国立成都大学文科预科学生，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疾恶如仇，不惧黑暗，毅然献身。

“稻草的阴谋”^①

——1937年凤凰山事件始末

/雷文景

凤凰山位于成都市区东北部白莲池街道，在成华驷马桥街向北约五里许。明代之前，这里是古人游艺习武之地，也曾是修道成仙的玄幻之山，前人曾在此留下过不少吊古怀幽的诗篇。自明代蜀王墓葬区选址此山后，凤凰山便沉寂下来。清代之后，更为民众墓地所占据，直到1931年，国民政府在此修建飞机场，人间烟火方重新弥漫。

1937年岁末，凤凰山发生了一起国民党构陷国立四川大学救亡师生的著名政治案件，史称“凤凰山事件”。翌年春，又发生了震动成都高校的“稻草案”。两案同出一事，可谓“连环案”，事发起因皆源于成都高校学生组队慰问修建飞机场的穷苦民工。案件发生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正式形成，政府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然而，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仍保有高度戒惕，进行政治挤压和迫害，并大力鼓

^①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四川大学史稿》第二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成都市档案馆编：《七七事变前后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史料选编》，1984年。

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党”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凤凰山事件”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

起因：救亡师生慰问机场民工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先后建设了 33 个空军基地，凤凰山机场为其中的扩建工程，当时从四川十余个县征调了 2.5 万余名民工参加。在落后的建设条件下，民工们完全没有现代化的工具，竹篮挑土，手拉肩扛，几乎是在最原始的劳作中修建现代化机场，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可是政府提供给民工们的伙食却极为粗糙，一日三餐皆为糙米饭（又称搥子饭），菜肴一般是青菜和白菜，一周可以打一顿牙祭——回锅肉，就算是民工们的饕餮大餐了。住宿更是非常简陋，不少工棚已经朽烂，夜晚形如露天宿营。时值岁末，冷风浸骨，地面潮湿，没有床垫，连代替床垫的稻草也不够，不少和衣而眠的民工因此病倒。

这一切，激起了高校师生的无限怜悯和关怀之情，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迅速展开了救助行动。1937 年 11 月 28 日，以川大学生为主，成都高校慰问机场民工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凤凰山机场陆续汇集，他们带去了民工们所需的各种日用慰问品，川大学生分两次送去了 3 万斤用作床垫的稻草，但早上 9 点就到达的学生却迟迟不能进入工地，机场的办事人员一再拖延时间，双方由此发生了言语冲突。直到中午 12 点，川大法学院教授、川大抗敌后援会执委黄宪章到达并与工地事务所交涉后，学生们才被允许进入工地现场。在工地上，他们演出了宣传抗日的街头活报剧和救亡歌曲，其间，随队而去的黄教授发表了两次通俗浅显却又激情澎湃的抗日演说。

下午 1 点过，慰问结束，学生们开始先后离开机场。眼见民工们的生活确如传言的艰难与悲苦，各校学生代表心绪难平。在川大抗敌后援会学生常委康乃尔率领下，当日下午，学生们又前往四川省政府

请愿，强烈要求政府提高民工待遇，改善民工生活。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接见了他们，但并不承认机场建设中存在民工待遇问题，双方言语不和以致冲撞，最后不欢而散。

回顾慰问民工的全过程，除在慰问之初以及学生与省府对话时产生了言语冲突，其间看不出有违反法律的“越轨之举”，但“凤凰山事件”的引线却就此埋下。

构陷：黄宪章教授被捕入狱

民工生活待遇后来是否改善，现有史料没有提供答案，倒是1937年传讯黄宪章和康乃尔的几封公函，写下了他们的“罪行”。公函称：“上月俭日，川大教授黄宪章及该校学生康乃尔等，率学生七十人，自称抗敌后援会救济机场工人委员会代表，赴成都凤凰山机场向工人宣传，悉含挑拨性质，以致民工逃去数千。”在蒋介石重庆行营电飭川康绥靖公署的电文中，此事件更为严重，被定性为“煽动宣传”“破坏国防重要工程”的罪名。

12月6日，黄宪章被捕入狱。

黄教授被捕消息一经传开，川大校园和成都文化界一片哗然。共产党人创办的《大声周刊》迅速做出回应，在文章中指出，黄教授不仅无罪，且宣传抗日有功，称赞他是“成都的章乃器”，并说拘捕事件是第二个“七君子事件”。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第二大队的学生率先行动，他们打听到拘捕地及时向黄教授通报内外情况，四川大学的同学每日分几批前往轮流慰问。

12月15日、16日，川大教员77人，川大参与机场慰问学生59人分别联名致函学校请求出面保释。校长张颐情知事态严重，接学生函后，当日即致电教育部。电文措辞有度，称赞黄教授“历年以来，勤慎奉职未逾轨范”，“慰劳民工确系成都各大中学校之抗敌会所共同组织”，“黄教授当时并无越轨之言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往四川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也密切观察着事态的动向。他在1937年12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谈到国民党党内各派对“左倾群众运动”的限制，还说到黄宪章的被捕情况，文中虽没有谈及营救工作，但张与四川军阀刘湘素有交情，他被派往四川即有此因素。据洪沛然回忆，黄被捕后，张与刘湘信任的代理省长邓汉祥有过疏通。

或许是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或许是中共地下党统战工作的成功，12月22日中午，四川大学秘书长孟寿椿代表学校将黄宪章保释出狱。不过，在1938年1月5日四川省政府的处理公函中，仍给救亡师生下了“紧箍咒”。文中写道：“综合各方查得情形观察，黄宪章煽惑民工不能积极证明，当日学生颇多，其中不无措辞不当之处，黄宪章居于领导地位，事先未善示机宜，以致发生误会，影响工程，亦难脱身事外。”

黄宪章返校后，到他家慰问的学生络绎不绝，这些“措辞不当”的进步学生，原打算集体到川康绥靖公署门前迎接的，“但为免除某方之猜忌”而未前往。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高压专制手段，让他们压抑着自己的激愤，采取了另外的斗争策略。

这一年除夕的前一天，学生们一吐胸中愤懑的机会来到，由200余名学生签名发起的“川大师生欢迎黄宪章先生大会”在文学院大礼堂举行。该会未见校方反对，组织有序，场面隆重。当满面红光、手拿礼帽、长衫飘逸的黄教授行至皇城大门，但见“校警立正，路人敬礼”，学生们高呼“欢迎黄宪章教授返校”“统一救亡战线万岁”“打倒挑拨离间的汉奸”……爆竹炸响，火花四溅，青春的歌喉霎时响起，嘹亮的抗战歌声穿透了皇城校园的几重旧门。

会后，学生们集资印行了《黄案始末记》以资纪念。

较量：国共之间的监控与反监控

就在黄教授被捕的当日，另一当事人康乃尔正在校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简称“民先队”）队部会议，晚上归校时，他径直走向学校礼堂，那里在举行一场他所参与的为抗战前线募捐的文艺晚会。未及走近，却见礼堂后面站立了一排荷枪实弹的警察，正思虑踌躇间，一位同学迅速将他拽到隐蔽之处，告诉他：“黄先生已被抓了，你为什么还跑回来？”并告知他所居住的学生宿舍留青园3号也布有警察。康乃尔迅疾从操场穿过法学院逃出学校。两周之后，待形势缓和才外出活动。不过，他的行为从此被监视着，几个月之后，一个拙劣的阴谋等待着他和他的同学王玉琳。

对救亡师生的构陷并非偶然。当时，国共之间虽然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丝毫没有松懈，他们感到了共产党人对专制统治的巨大威胁。陈立夫在上报蒋介石的报告中，否认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战的初衷与意图，认为中共的计划“甚毒”，“令人不寒而栗”。在陕西等地，对中共领导的学生团体活动进行严厉打压，甚至实行逮捕。

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大后方四川。早在1936年11月，四川省公安局查封了《力文》半月刊，称其所载言论“反对党治”“极为反动”“公然倡乱”。翌年末与1938年，也即“凤凰山事件”连环案前后，他们对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星芒周刊社、群力抗敌宣传社、大声周刊社等进步报刊和团体进行了严密管控。尤其对成都规模最大的学生救亡团体“民先队”的活动备感紧张。当局对“民先队”进行了详细侦察，其组织状况、活动情形、活动地点，警方都有所掌握。称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师生为“人民阵线”，还安插了学生特务在成都校内监视汇报，救亡组织的核心成员均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康乃尔及参加机场慰问的36名师生也登记在册，且注明了住址和绰号，便于适时逮

捕，其管控措施不可谓不严。

然而，国民党却未能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一二·九”运动和全面抗战的爆发，点燃了成都各界抗敌之火，成都高校师生组织的各类团体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转入后方借读或就读的学生党员或进步青年大量拥入成都，信仰共产主义或加入共产党的学生倍增，成为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生力军。仅1938年5月到10月，中共成都市委在成都发展的党员即有400余人，共计党员587人，增加了约五倍，康乃尔即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救亡学生代表人物。

康乃尔（1910—1980）原名康明弟，四川南充人，早年在嘉陵高中读书时即参加过反对四川军阀内战的活动。1935年秋，康乃尔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史地系，担任过学校“抗日救国会”负责人。1936年因参加暨南大学抗日救亡活动被逮捕，在法庭上与当局有过交锋，释放后被退学处理，于当年10月转投四川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业。

来蓉时，康乃尔随身带有一封进步救亡团体的秘密接洽信，收信人是川康绥靖公署一名叫徐庆坚的职员。徐庆坚是成都地下党的资深成员，早在1932年就读于华西协合大学时即为地下党员，曾担任过华大共青团支部书记。虽然康乃尔已参加过多次中共领导的救亡活动，但他还不是党员，通过徐庆坚，他接触了更多的进步青年，此番回川之行，无疑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

1937年10月，也即“凤凰山事件”发生前夕，在风景清幽的华西坝，经救亡学生介绍，他见到了一位神秘的“延安来的人”。此人即中共中央派往四川做高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几十年之后，康乃尔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华西坝草坪散步时的密谈：

“我以一种很崇拜的完全信赖党的心情听他对我说话，他向我谈抗战的形势，当时的任务是要防止国民党妥协投降，他完全是一个党的领导人对一个党员的口气，我感到很亲切，在政治上有了可信赖的依靠。”

翌日，张曙时托人给康乃尔一张小条子，上面只写有八个字：“任你做小组长。川指。”再过几日，宣布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且没说候补期。小组成员共四人，康为组长，张曙时也参加他们的党小组会议。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全省只有68名党员，分属六个系统，张曙时为一个系统。四川大学党组织有三个系统，其中也有张曙时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康乃尔刚一入党，就被任命为小组长，领导先他入党的同志，足可见张曙时对他能力的信任，也反映了张曙时历经革命风浪的犀利眼光。

张曙时没有看错人，康乃尔从十几岁就投身学生运动并担任过负责人，有不俗的组织能力，热情奔放，辩才无碍，还是街头抗日活报剧的演员。来蓉不久，即领头组建学生抗日团体，筹组了川大绥远抗战后援会，也是成都“民先队”的骨干成员，之后担任过多种职务，是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部部长、成都市学委书记、川康特委青委书记等。当时，他以成都学生代表的身份经常参加以政府名义组织的各类救亡活动，身份极其显眼，他在“地上与地下”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成为“凤凰山事件”的重要角色。

如今回溯“凤凰山事件”连环案，其实质是对成都中共力量的打击与消解，限制救亡学生运动的规模。在川大，集中反映在对“四川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领导权的斗争。该会是以政府及学校名义组建的，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学生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在第一届选举中占据了常委的大部分，敬佩共产党的黄宪章教授也被选为常委。作为学生代表，康乃尔是常委中产生的三个主任委员之一。

国民党官办的后援会却被共产党人掌握了实际领导权，这是当局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在黄宪章被捕之前，在当局授意下，一份《锄奸特刊》的油印刊物在校内鬼鬼祟祟地传播，对进步教授和学生进行“污化”。污蔑他们是领了苏联津贴的“吃了萝卜”人；又制造“桃色绯闻”，说黄与姓杨的女学生关系暧昧，是“黄杨之恋”，还给

某女学生取绰号“钢丝床”。在许多中间派同学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校方趁势改组，增强了官方的势力，“人民阵线”的进步学生被排挤。之后“稻草案”的发生，也正值第二届后援会再度选举之时。这一石二鸟的诡计既下流又阴险毒辣，校园内外，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监控与反监控、捕杀与反捕杀之间飞动着各式明枪暗箭。

阴谋：“稻草案”的拙劣表演

黄宪章出狱三个月之后，凤凰山连环案的第二案浮出水面，案件的另一位当事人王玉琳记得很清楚：

1938年3月23日下午，他与康乃尔被通知到校长办公室“谈话”。办公室坐着几位学校的重量级人物：校长、秘书长、学生指导委员会主任以及文学院和法学院院长。现场肃穆而威严。“主审”的是秘书长孟寿椿和学生指导委员会主任钟行素。

孟、钟问：根据学校“清账委员会”查明，你们慰问民工所购稻草有贪污舞弊，可有此事？面对突然袭击，二人愕然。不过他们年纪虽轻，却已有历练，更重要的是心怀坦荡，因为这纯粹是子虚乌有。二人虽未事先商量如何作答，但在转瞬间沉下心来，一致否认。

又问：学校爱护学生，不愿扩大事态，只要承认即不予追究。二人答，没有此事，何来承认？

又问：如果不承认，学校拿出证据不好收场，恐怕要上法庭。之前领教过法庭审问的康乃尔毫无惧色，朗声回答：忠良被冤坐牢，历史常有，但历史终会证明，忠良是忠良，秦桧是秦桧，我们不怕诬陷。

见二人硬如铁石，孟、钟转而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相信你们的为人，但你们需要离开学校躲避一阵，学校为你们保留学籍。二人再答：我们无所畏惧，绝不躲避！

话带机锋，一波三折，机警聪明的康、王二人业已识破诡计，一但离校极可能授人把柄，再宣布他们“畏罪潜逃”，唯一的办法是弄

清真相，正面回击。

不久，成都《复兴日报》刊出新闻，标题是《川大抗敌后援会竟有人舞弊——康乃尔难逃法网》。川大校园当日便贴出了“清账委员会”布告，公示他们的“舞弊行为”，还居心叵测贴出讽刺漫画，画中二人正吃谷草，名曰“牛吃谷草”。康、王拍马迎战，同样贴出告示澄清真相。双方大加讨伐，校园内火药味十足，中间派同学一时不明就里。

事情总有了断之时。大约一周之后，成都地方法院发出传票，双方对簿公堂。原告为川大“清账委员会”的学生陈某，他向法庭陈述，该会在清点账目时发现，被告在慰劳机场民工所购稻草时，实购二万斤，谎报三万斤，侵吞一万斤草价，计85元，且有卖草人两张签字画押的凭据。原告说得有鼻子有眼，康、王不觉露出鄙夷微笑。待检察官再问二人时，二人如实陈述，购稻草两次，共计三万斤，分两次付清，分文未少，也有证据在手，可供细查。

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遂传稻草商人彭世松父子上堂，法庭一时静谧，只听二人所说。父亲详述购草过程，力证康、王未贪分毫，而其子画押的证词，是被学校校警威逼所签，不能算数。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法官再问其子，其子又详述被逼经过。原告闻此，不觉大惊失色。

庭审之后，《成都快报》等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法庭消息，中共地下党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约半月之后，检察官巫德源签发了成都地方法院不起诉处分书，宣布“被告并无犯罪嫌疑，依刑事诉讼法第231条第10款，为不起诉处分”。

康、王在法庭上胜利的关键，在于稻草商人的翻供，而证人为何要翻供呢？原来，就在那天在校长办公室“谈话”之后，二人火速赶到离学校不远的彭老汉家打听情况，探知到彭老汉并不知情，诬告出自他那老实巴交却又糊里糊涂的儿子。彭是一位朴实的商人，对二人印象上佳，当即答应要去法院说明真相，并重新写了证明文书。

整个案件，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奸计，但这奸计设计得既下流又“太不专业”，演绎成了小丑表演，成为政治历史上的笑柄。不过，中共地下党并未轻视国民党的威胁，对手虽在“黄宪章案”和“稻草案”上连续失败，但他们同时篡夺了第二届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双方各有胜负。出于斗争策略，地下党决定暂不痛打落水狗，在康、王发表的《川大稻草案水落石出》的文章中，明确声明不对原告以诬蔑罪起诉，只是告诫对方：“自此以后，唯望能念及亡国之惨痛，激发天良，捐弃成见，共御强敌。”

这种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大多数同学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广泛的人心，不久之后便结出硕果。退出官办的“后援会”后，以“民先队”成员为骨干，他们另辟蹊径，成立了以川大文法学院为主的“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之后又成立了宣传二团，影响波及成都各大中学，教会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成立了宣传三团。一时间队伍浩大，成都的救亡运动呈现波澜壮阔之势。在中共地下党指导下，青年学子们在“御寇与革命”的历史张力中，挥洒着纯洁的、激情澎湃的青春热血。

尾声

1940年春，夜已深了，在华西坝新医院建筑工地，一个敏捷的身影在巡逻人员巡视的空当，迅速踏上阶梯，将一张油印宣传资料贴在医院大门上。天亮之后，一封“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同胞和四川同胞书”出现在人们眼前，落款为：“中国共产党成都行动委员会”。

“抢米事件”是继“稻草案”之后国民党在成都谋划的又一政治迫害事件。此时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国民党腾出手来，加剧了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中共四川高层领导罗世文、著名文化人车耀先先后被捕。阴霾密布，危机四伏。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令：积蓄力量，

隐蔽实力，避免损失，转移干部。密令很快传达到成都。

几天或十余天之后，一位“头戴深灰色博士帽，身穿灰色条纹浅呢长袍，脚蹬圆口元青贡呢便鞋，手提黑色小皮箱，鼻架茶色眼镜的商人模样的人”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车从城内出发，经过东门大桥，换了去龙泉驿的长途黄包车，车后面，始终跟随着一位骑单车的青年，他随时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商人模样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许多川大同学熟悉的那位“大块头，秃额顶，宽面庞”雄辩滔滔的康乃尔。他此番乔装打扮，是奉了地下党之令前往重庆隐蔽。那位骑单车的人是奉命护送他的地下党员。黄包车沿东大街向牛市口行进，再经沙河堡、保和场、大面铺一路向东，与杀机四伏的成都渐行渐远，并于当年转移到令许多人向往的红色圣地延安。从凤凰山机场慰问民工，到经保和场秘密撤退，康乃尔结束了他在蓉三年多的“地上与地下”的革命岁月。

成都也有“挺进报”^①

/廖云

读过《红岩》的人，都知道重庆有个《挺进报》。其实成都也曾有一张“挺进报”，这就不太为人所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挺进报》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国共谈判破裂以后，1947年2月，新华社和中共四川省委遭到查封，被迫撤回了延安，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一时间成渝地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听不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消息闭塞，谣言纷传，很多人苦闷焦虑，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出版地下机关报《挺进报》。地下党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刊印新华社电讯稿，及时传播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胜利的消息，极大鼓舞了潜伏在地下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都的“挺进报”也担负起了同样的工作。在先后担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成都工委副书记马识途的领导下，成都地下党采取了注重保护自己的“堑壕战术”，与国民党特务打起了“游击战”，一直没有被叛徒特务破获。它在四川盆地所起到的作用，一点都不比《挺进报》小。

^① 参考文献：马识途：《百岁拾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马识途：《在地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同学少年黄金岁月——华西协中校友回忆录》（内部资料）。

协高来了一位高才生

1946年9月，华西坝清幽静雅的协合高中学堂里，来了一位身材挺拔的年轻人。他就是刚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马识途，受党的派遣，手持张友渔的介绍信，到华西协合高中寻找职业掩护，以便开展地下工作。

接待马识途的是华西协高负责教务的加拿大人云从龙。云从龙看了张友渔的介绍信，猜出来马识途也是有身份的人，于是倍加热情，他知道马识途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希望担任英文教师，于是用英语交谈，也有考一考他的意思。先后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中央大学工学院和西南联大文学院的马识途一点都不怵，流利的口语很快赢得了云从龙的信任，当即获得了在协高担任两个班英语教学的职位。

张友渔，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1946年的公开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在党内是马识途的直接上级，在社会上是有名的新闻工作者。抗战胜利后，国府复原南京，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公开成立四川省委，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一一个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级领导机关，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张友渔继之。

华西协高，全称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始建于1908年，是美国、英国、加拿大三个国家五所教会创建的一所洋学堂。在华西坝，弟维小学（今红专西路小学）、高琦初中（后与华西协高合并为华大附中）、华西协高（后改名成都十三中、今华西中学）与华西大学（后与四川大学合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五卅运动和万县惨案开始，华西协高与华西大学广大师生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成都乃至四川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堡垒”，1937年成立了“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 年成立了华西协中党支部，群众基础很好，加之外籍教师思想开明，国民党特务不敢轻易到华西坝抓捕进步学生。马识途在这里谋得一个教师职位，对于其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是很好的掩护。

一个人的报纸

1947 年 2 月，在国统区公开树立的一面旗帜——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犹如被扣进了一口黑锅里。为了把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川康地区，中共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决定自己办一张油印小报。

为了保密，这份报纸只能一个人去办。这个人必须是一位全才，集收音、编辑、刻写、印刷、发行于一身。四川大学的河南籍地下党员王放，接受了这一份重大而危险、光荣而艰巨的工作。

第一个难题是收音。重庆的《挺进报》刊发的消息，主要来自辗转多地传来的新华社通讯稿。成都办的这份报纸，稿源来自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今天收听广播电台，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都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收音机，短波线圈都被剪掉了，所有的无线电器材，都受到特务的严格管制。即使是通过统战关系从国民党的成都市市长陈离那里借来的收音机，短波线圈也被剪掉了，照样收不到短波。这可怎么办呢？

组装，自己动手组装一台短波收音机。历史系女学生王放，毅然从川大借来一大堆组装无线电的书籍，连夜自学；通过各种渠道分散购买组装收音机的无线电器材，从无到有，一点点拼装。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过多少次失败的尝试，她和马识途这两个对无线电一窍不通的年轻人，居然鼓捣出了一部像模像样的简易短波收音机，终于，收音机里面传来微弱渺茫、时有时无的新华社的播音。今天的读者，可以感受一下在隧道里面收听交通台的那种感觉，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尽管如此，马识途与王放动手组装的这台短波收音机，还是

带给他们巨大的鼓舞。

但仅靠这台简易的收音机是不行的。为了组装一台正规的收音机，王放冒着暴露的危险，通过进步人士，去找国民党电台的技术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马识途在华西协中每周有12个课时，白天上班，晚上四处奔走从事革命工作，任务不可谓不繁重。可是每周三晚上，马识途坚持用自行车接送王放去学习。春日的华西坝，荡漾着年轻的革命者青春的气息。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王放终于掌握了无线电技术；通过那位国民党电台的技术人员，还高价购买到了无线电器材。终于，一台有模有样的短波收音机组装成功了，两个勇敢的年轻人欢呼着拥抱到一起。

从此，无论是繁星满天，还是秋雨淅沥，王放一个人沉浸在无线电波传来的延安喜讯里，不停地收录、编辑、刻写、油印，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到川康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鼓舞着坚持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

为了纪念这永不消逝的电波，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这份油印小报命名为《XNCR》，天亮以后，人们才知道，这是延安新华社短波电台的呼号。

在华西协中“游击”办报

这份报纸传播很广，华西坝的外籍教师也喜闻乐见。可是革命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早晨天亮，王放骑着自行车去分发通宵奋战油印出来的报纸，都会从容沉着地对马识途说一句话：“要是晚上我没有回来，你就收拾行李赶快转移吧。”

从内线传来消息，这份报纸很快被特务盯上了。成都工委研究，马上暂停《XNCR》报纸的印刷和发行。可是王放坚决不同意，提出了用“打游击”的方法来迷惑敌人：一是印刷用的纸张，使用花花绿绿的广告纸、彩纸；二是纸张裁成不同的开数，尽量显得很业余；三

是字体大小不一，印刷横竖不齐；四是将收听到的消息说成是香港、上海等地的外电；五是不再使用《XNCR》报头，署名为杜撰出来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学生社团，随时更换，让特务误以为是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学生印的传单，令特务们查不胜查，最后不了了之。聪明的王放用这些办法迷惑了敌人，淡化了敌人的注意。比起《挺进报》直接寄给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做法，王放不与敌人硬拼，保全了自己，保留了川西平原黎明前黑暗中的灯塔。

但危险依然无处不在。有一天两人正在印刷，发现窗外有敌人盯梢。天一亮，王放和马识途就提起印刷机转移。摆脱盯梢后，一时无处可去，就到了当时还未被捕叛变的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在新南门外的家中，然而遭到蒲华辅的驱逐：“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马识途解释说：“还有两个小时就印完了，印完马上走。”蒲华辅不容商量：“马上走，一分钟也不行。”马识途说：“东西放在我那里一两年了，你都没说危险；暂时放在你这里两个钟头，你就受不了。”两人提着油印机冒险而去，另找地方将报纸印完。心里很不是滋味，总觉得蒲华辅不对头。果然此人在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以后，于1949年初被捕叛变，此是后话。

无奈之下，印刷地点只有转移到马识途在华西协中的教师宿舍。华西协中是教会办的学校，马识途的学生中就有地下党员，1946年入学的华西协中35班学生刘光烈，就曾担任中共华西协中党支部书记。当然按照纪律，马识途不能与华西协中党支部发生横向的关系，可是华西协中、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进步师生联合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活动非常活跃，无形中反倒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报纸办到了外籍人士家中

办报的“根据地”转移到华西协中以后，很快遇到新的问题。华西协中教师宿舍不比私人宅邸，不能公开架设天线，只能用一根铜线

代替。王放试音，一点信号都没有。这个时期国共决战已经到了大转折的时期，怎么能够没有胜利的捷报呢？只有一个办法：到云从龙家去。

马识途拿着张友渔的介绍信到华西协中任教以后，与云从龙的交往日益密切。云从龙，加拿大人，既是华西大学的教授，又是华西协中的校董，当时还担任华西协中教务长。当时华西坝很多外籍人士，思想开明，反对专制。他大约知道马识途是有来头的人，但从不说破。云从龙有意将国民党特务的一些企图和行动透露给马识途，马识途也有意把《XNCR》送给他，口头翻译给他听给，假托是外面传来的消息：大家心照不宣，都为解放军不断打胜仗而高兴。总之，除了党的机密，两人几乎无话不谈。马识途第一次见到巴金的侄儿李致——当时协中的进步学生，就是在云从龙的家里。

云从龙的家，在华西协中操场边一座花园洋房里，清幽宁静。就今天的位置来说，在人民南路四段原四川省教育学院校址附近。他家里有一台豪华的落地收音机，音色悦耳，声音清晰。马识途告诉他最新的胜利的消息，云从龙很高兴，并且想知道更多的消息。马识途说收音机坏了，收听不到了，可不可以用你的收音机收听一下？云从龙欣然同意。他家的收音机，不仅灵敏度高，选择性也好，可以收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广播。王放打开收音机，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延安那个熟悉的女高音，原来十分嘈杂的电流声、干扰声全都没有了。双方约定，除了星期六、星期天，王放每天晚上去收听两个小时，对外就说是学习英语。就这样，胜利的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党员和群众手中，激发了大家的斗志，直到王放和马识途先后安全地撤离到香港。

在特务正在追查《XNCR》报的危急关头，云从龙毫不迟疑地承诺，是非同小可的，这令马识途很感动，永久不能忘记。两家的友好联系，并没有因为云从龙 20 世纪 50 年代回到加拿大而中断。

2008 年华西中学百年校庆，云从龙的儿子、孙子回到成都，回到华西坝，也回到了早已搬迁到八里小区的华西中学。

Chapter 3

第二章

贺炳炎上将

1913—1960

开国上将贺炳炎雕像

这里的每一位前辈，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用信念书写着动人的故事，而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与百年党史紧密相连。他们是百年英雄交响曲的精彩音符，他们是历史大叙事的华美篇章。长眠或战斗、生活在成华的这些前辈，已把嘹亮的时代回声永远镌刻在了成华的土地上。

红军赵子龙：独臂上将贺炳炎^①

/曹蓉

曾经山河破碎的大地上，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他一把菜刀孤身冲入敌群，虎胆勇夺阵地；他一只独臂大战日寇，令侵略者闻风丧胆；他征战南北，16处负伤，出生入死；他每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冲锋陷阵；他血洒长征路，断臂瓦屋塘，血战雁门关，统兵西南……为共和国立下赫赫奇功，用伤残之躯树起巍巍丰碑。

他被称为“红军赵子龙”“孤胆英雄”“独臂将军”。他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

他的名字叫贺炳炎。

自古英雄出少年

1913年2月5日，贺炳炎出身湖北松滋刘家场（也有说出生在湖北宜都市松木坪镇江家湾）一个深山沟里的穷苦雇农家庭。他乳名明

^① 参考文献：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成都军区为贺炳炎立的碑文；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纪录片《记录中国：独臂上将贺炳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贺炳炎生平介绍。

言，小名玄娃，学名从炎，后改名炳炎，取“大火冲天，浴火重生”之意。

贺炳炎一出生，面对的就是风雨飘摇的旧世界。外面兵荒马乱，家里上无片瓦遮头，下无立锥之地。同所有贫苦老百姓一样，贺家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

屋漏偏遭连夜雨。贺炳炎9岁那年，母亲不幸撒手人寰。小炳炎只得像大人一样到煤场挑煤，又跟随父亲贺学文做了小铁匠。为了生计，他还给地主家放过牛，学过裁缝、篾匠、打铁等多种手艺。

贺家在贫穷和饥饿中苦苦挣扎，贺炳炎和父亲常受人欺负，饱受屈辱，但是贺炳炎天生具有倔强的性格和反抗精神，经常和欺负他的人打架。当他看到当地的甲长、区长、团总、地主豪绅摊派苛捐杂税，强占妇女，暗杀人命，更是疾恶如仇。

“我若有了翻身的一天，打死你们这些坏东西。”贺炳炎在心里发誓。

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就像一粒种子，在贺炳炎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只等待时机发芽。

父亲怕他惹事，又见儿子天生喜欢舞刀弄剑，挥拳踢腿，便让他上武当山学道练武。贺炳炎投师余清道长门下，学习凌霄剑法。他天赋异禀，很快掌握了剑法要领。但他生性粗豪，觉得舞剑太柔，不过瘾，只有耍大刀才够威武雄壮。于是，他改学玄虚刀法。果然，他一把大刀使得虎虎生威，终练就了一身出神入化的好刀法。

少年的贺炳炎并不知道，他的武当功夫，竟在日后为国杀敌时派上了用场。也许这是命运为他的戎马生涯埋下的一个伏笔。

翻身的一天到来了。

1929年的春天，映山红漫山遍野盛开，贺龙率领部队在宜都、松滋一带活动。那一天，贺龙军长在柳林河畔向老百姓宣讲：“地主老财是我们的对头，泥巴腿子是我们的朋友，要想吃饱饭就跟着我们红军走。”

贺炳炎恨地主老财，想吃饱饭，要跟着贺龙走。于是，他跟随父亲贺学文报名参加红军。父亲顺利入伍了。然而，大家见贺炳炎年纪小，个子还没有枪杆高，没有要他。贺炳炎在地上号啕大哭，闹着要参军，死活不肯回去。

这时候，军长贺龙来了。了解了事情原委后，说：“我看是个机灵鬼，先提糍糊吧。”于是，贺炳炎扔下铁锤，擦掉眼泪，和父亲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这一年，贺炳炎 16 岁。

贺龙当年并没有想到，他留下来的一个“提糍糊”的少年，日后会成为他麾下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

贺炳炎被分配到宣传部，提糍糊桶子，刷宣传标语。然而，贺炳炎一心想打仗，很羡慕其他战士可以上前线冲锋陷阵。他没仗打就感到手痒，只好同战士们摔跤，拿木头大刀练刀法。他大刀在手，虎虎生风，常常把许多战士“练”得鼻青脸肿，跑到湘鄂西总指挥贺龙那里告状。贺龙又气又爱，拿烟斗敲打他的脑袋：“你这个家伙，越来越调皮了。”

就在入伍的这一年，1929 年 6 月，16 岁的贺炳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迅速成长。因他机灵胆大，又习过武，首长便把他从宣传部调到警卫班当班长。贺炳炎很高兴，他不再只是“提糍糊”的小战士，而是在向“战斗”靠近的警卫员。

转眼到了 1930 年 7 月，红二军团在湖北潜江县与敌军激战，久战不决。贺龙叫来贺炳炎，在他手上写了一个“贺”字，对他说：“贺炳炎，你去送一个命令，让红六师从敌人侧后上！”

贺炳炎立马赶往前线，向红六师师长段德昌传达了贺龙军长的作战计划命令。之后，红军部队大捷。

战斗结束后，大家发现贺炳炎没有回来。贺龙问：“那个传信的小鬼哪去了？”有人说：“这小鬼想打仗想疯了，八成跑到战斗部队去了。”

贺龙军长命令警卫赶快上战场找寻。

下午，贺炳炎回来了。军部首长和便衣队的同志们看到，他身后竟押了一群白军俘虏。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17岁的少年，没有打过仗，竟然一个人抓了47个敌军俘虏。

首长惊异地问：“谁抓的俘虏？”

只听身后有人大声道：“是我，贺炳炎。”

原来，贺炳炎给段师长送完命令后，磨蹭着不肯走。段师长问：“还有什么事吗？”贺炳炎挺直胸，大声道：“首长，我想留下来打仗！”段德昌看了他一眼，说：“胡闹，赶快回去。”请求被拒后，贺炳炎无奈，只好返回指挥所。

返回途中，贺炳炎顺手捡起敌人溃逃丢下的几个手榴弹。路上，正巧碰见几十名逃跑的敌人往芦苇荡钻。

他一手紧握着枪，一手拿着手榴弹，从一棵大树背后“嗖”地跳出来，大喝一声：“统统给我站住，缴枪不杀！”

他挡住了敌人的去路。

惊魂未定的败军吓了一大跳。反应过来的一位领头的军官发现，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竟是个少年，又见四周并没有红军，顿时轻蔑地冷笑，突然举枪准备射击。机警的贺炳炎眼疾手快，在敌人举枪射击的瞬间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对方被他一枪击毙。

几个逃兵趁乱逃跑，贺炳炎怒吼：“还想跑！”顺势扔出两枚手榴弹，“轰”的一声，炸得几个逃跑的白军血肉横飞。其余的几十名残兵吓得纷纷趴在地上举手投降，都被这位猛虎般的少年震住了。

贺炳炎让这伙投降的敌军站好，点了点数，47人。他犯难了，怎样把这些俘虏押回去，又不能让他们中途跑掉？就算赶一群羊也不容易啊，何况这么多的敌军俘虏。聪明的贺炳炎想出了两个绝招。

他大声命令：“统统给我把枪栓下了，裤腰带解了。”

下枪栓，解裤带，这两招真是绝。这群残兵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听候贺炳炎发落。一路上，一队人扛着枪，一队人抱着枪栓，每个

人一只手还提着裤子，就这样灰溜溜地跟在贺炳炎身后，而后就发生了贺炳炎押着 47 名俘虏回到指挥部的一幕。此事很快在全军传开了。

贺龙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留下来“提糍糊”的孩子，竟胆识过人，有勇有谋，还给他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糍糊桶子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贺大将军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贺炳炎为指挥部便衣队队长。

自古英雄出少年。17 岁的贺炳炎，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军旅传奇。

红军中的赵子龙

群雄争霸的三国时代，当阳长坂坡。一个身穿白色战袍的少年单枪匹马，穿过清晨杀机四伏的浓雾，冲开曹军重围，杀退众军将，拼死救下后主。曹操派人问：“军中战将可留下姓名？”少年应声道：“吾乃常山赵子龙也。”

从那以后，一身是胆的赵子龙追随刘备，成为少有的文武双全的蜀汉大将。

又过了许多年，赵子龙死在成都。

赵子龙的忠义和勇武，代表了不畏强暴、忠诚、勇敢的民族性格。这位单骑救主的少年，成为后世人们心中的偶像。

无独有偶，少年贺炳炎，凭借他的机智和勇敢，演绎了现代版的“红军赵子龙”，救了贺龙一命。

1930 年 12 月，红二军团指挥部在湖北松滋市杨林市集镇，遭到敌人十八个正规团和三个保安旅的进攻。贺炳炎带着便衣队护卫贺龙和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紧急突围。突然，从山上冲出一股庞大的敌人，黑压压一片朝贺龙这边拥来。此时贺龙带的人手很少，眼看就要陷入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贺炳炎忽然看到父亲贺学文牵着一匹骡子从后面过来了，眼前一

亮，大喊：“爹爹，快过来，快！”

贺学文赶着骡子到了儿子跟前。

贺炳炎挥起大刀，猛地朝骡子背上驮的麻袋砍下去。“哗啦啦”，只见白花花银圆滚落满地。大家都愣住了。

追上来的敌人什么都不顾地纷纷满地抢银圆。贺炳炎趁乱带领便衣队，掩护贺龙等首长们突出重围。等敌人回过神来时，贺龙部队已经没有了踪迹。

原来，贺炳炎事先知道麻袋里装的是银圆，那是父亲用骡子作掩护，转移军团的军费，没想到竟派上了用场。贺炳炎急中生智，化解了一场危机。一年前，父子从军留下美谈；一年后，父子智救贺龙，又演绎了一段传奇。

据后来军事专家解读，虽然杨树林战斗规模不大，但如果不是贺炳炎靠他的大智大勇，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可能军团的历史，乃至红二方面军的历史都会重写。

时光兜兜转转，仿佛冥冥之中早已安排注定，贺炳炎与武当山必然有不解之缘。

一年后，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1931年4月20日，贺炳炎随贺龙浴血转战，来到了武当山。徐道总将红三军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安排在武当山太子坡，帮助红三军护理伤病员。贺龙开辟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此刻，少年贺炳炎站在云霓里，环顾群峰巍峨，心潮澎湃。9岁那年，他上武当山习武。没有想到，8年后，当他再次登上武当山时，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工农红军战士。

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名山，武当武功是中国武术的一大名宗。玄武刀法更是武当山祖师张三丰独创的一门武功绝技。昔年贺炳炎上武当山习武，练的就是这一刀法。

一天，贺炳炎与几名战士正在练刀，一位老武师经过营地，贺炳

炎虚心向他请教刀法。老武师见他的玄虚刀法颇有功底，不在武当弟子之下，便传授他“展、抹、勾、剁、砍、劈”六字诀。在老道人的指点下，贺炳炎将武当内功和玄虚刀法精义融合，又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读书岁月是青春最美好的时光。而贺炳炎的青春却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战斗频繁而激烈。然而，让贺炳炎意外惊喜的是，从小没有读过书的他，在部队竟有了一次上学的机会。

参军的第四年，贺炳炎 19 岁。贺龙十分喜爱这个浑身是胆、有勇有谋的红小鬼，便对他说：“贺炳炎，你去军校培养一下吧。”

贺炳炎像所有第一次入学的孩子一样，高兴地上学了。不同的是，这所学校并不是普通的学校。它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学校设在洪湖，由黄埔军校的教官授课。

佃农出身的贺炳炎，以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刻苦学习，迅速掌握了步、炮、工、骑等兵种的军事知识和理论知识，这使他日后行军打仗如虎添翼。

军校受训期间，因为他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区队长。一天，贺炳炎和军校学员奉命参加陈沱口阻击战。那是在 1932 年 6 月，敌军趁我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突然偷袭我首脑机关所在地——湘鄂西中央分局。当时指挥部能够作战的部队很少，贺龙、任弼时等首长的安全受到威胁。情势危急，上级命令军校学员立即投入战斗，守住敌人进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咽喉陈沱口，阻击敌人进攻。

“我们没有枪怎么办啊？”军校学员焦急地说。

当时军校学员大多没有配枪，只有带队的队长和学校领导才有枪。没有枪，如何打仗？贺炳炎毫不犹豫把自己的配枪给学员，大声说：“所有学员，包括警卫员、司号员、运输员、炊事员全部参加战斗！”

此时，敌人正逼近陈沱口。贺炳炎沉着指挥，派出两支分队从敌人两翼迂回包抄，自己则冲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带着一支队伍从正面冲出。

他大吼一声：“大家跟我上！”

冲锋号从三面响起，一时杀声震天，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冲向敌人的阵地。

贺炳炎手握菜刀，带头向敌人杀过去。他将一把菜刀当武器，使出玄虚刀法，左砍右劈，以一种多变、迅猛的凌厉之势，所向披靡。

这场艰险的战斗，贺炳炎带领几乎手无寸铁的军校学员，以一当十的勇气，打退了两个团的敌军，分局机关和洪湖苏区百姓得以安全转移。

在红军历史上，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成为佳话。而跟随贺龙打仗的贺炳炎，一把菜刀名扬全军校。军校学员们无不崇拜他，称他为“贺小龙”。

六个月的军校受训结束，贺炳炎回到部队，被提升为骑兵连连长兼指导员。跨上战马的贺炳炎，英姿英发，不久又升任红三军军部直属手枪大队大队长，掌管“近卫军”。这是他一年里第二次提升。

1932年8月，为了打破国民党第四次疯狂“围剿”，红三军八师主动出击。然而，红军攻入荆州草市后，却遭到国民党的包围，钻进了敌人的笼子，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之中，贺炳炎一马当先，一面请示上级，一面率手枪大队从敌人背后攻上来，杀入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猝不及防的敌军慌了阵脚，被如雨的子弹打得死的死，伤的伤，纷纷丢盔弃甲而逃。

贺炳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使红八师顺利从城里撤退出去，还缴获了一批战马。

从城中撤出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司务长，贺炳炎一个人又单刀匹马掉头冲回去。而这时，敌人已经进城了。

贺炳炎飞马过街穿巷，一眼看见司务长，便风驰电掣般冲过去，一把将司务长搂在马背上，飞奔出城。敌人发现后追上来，贺炳炎在拦截的枪声中，横冲直闯，一面拿起大刀连毙数人。只见寒光闪闪，子弹与刀刃相碰叮当作响，血色四溅。此时的贺炳炎，仿佛是胯下赤

兔追风马、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

贺炳炎带 100 人救了贺龙一个师，受到总部嘉奖。从此，“红军赵子龙”的称号名震一时。

这一年，他 19 岁。

孤胆英雄

贺炳炎不久又被任命为襄北独立团团长。然而，这个团长并不好当。那是 1933 年的某一天，贺龙交给贺炳炎一个任务，将 3000 多洪湖群众安全转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当时只带领 200 多人的贺炳炎，面对敌人十万大军的包围，要转移三四千群众，谈何容易。

贺龙相信贺炳炎总有办法。

每到局势危急，或遇到最大的难题，贺龙总会第一个想到贺炳炎，而贺炳炎从没有让贺龙失望。

接到任务，贺炳炎带着独立团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边打仗，一边掩护群众。转移过程中，他一面依靠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工农红军，壮大队伍，一面夺取敌人的粮食，解决吃饭问题。19 岁的小团长，带着 200 多人的游击队，终于将群众转移安置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

三个月后，当贺炳炎归队时，他的独立团从原来的 200 多人，竟扩大到 1800 多人。这在红军发展史上，堪称一个奇迹。

由于贺炳炎在战场上多次立功，连连受到提升。1934 年 10 月，贺龙任命贺炳炎为黔东独立师师长，组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他又带着独立师重创来犯敌军，在当地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立了大功。这一年，他才 21 岁。

另一场惊险的战斗，贺炳炎再一次名扬全军。

1935 年春，湖南庸县后坪之战。红军被敌人炮火压制，突击队

两次强攻，终因敌方火力太猛而没有攻下。总指挥贺龙急了，亲自点将：“贺炳炎上！拿下制高点！”

贺炳炎早已摩拳擦掌，只等这一声“贺炳炎上”。他一跃而起，挥舞大刀，只身冲向敌阵。他瞪着一双杀得血红的双眼，左砍右劈，如下山的猛虎。霎时，他的玄虚刀法大显神威，刀光闪烁处，敌人随之倒下。

眼看就要占领制高点，贺炳炎却不幸被子弹击中，顿时鲜血染满了衣袖。可是贺炳炎忍着剧痛，捡起敌人丢弃的两挺机关枪和一些手榴弹，向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猛烈开火。

硝烟滚滚，火光冲天。爆炸声、枪声、敌人鬼哭狼嚎声，充斥在战场。血红的晚霞布满了天空，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

“就算老子跟敌人同归于尽，也要拿下制高点！”他抱着坚定的信念。正是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贺炳炎不顾自己身上中弹，只身奋勇杀敌，突破敌军阵地，终于阻止了敌人的反扑，为红军主力重新组织力量反攻赢得了时间。

这一仗，他在广大指战员中被誉为“孤胆英雄”。

独臂刀王

1935年11月，贺炳炎担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率部参加长征。他担任红五师师长后，又面临一场恶仗、硬仗。长征途中，当贺炳炎率部突破湖南中西部地区后，敌人突然重兵压来，并在瓦屋塘乡和绥宁黄土矿乡交界处的坳口，布置了许多机枪。

如果不能打开瓦屋通道，部队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贺龙下令：“贺炳炎上！攻下瓦屋塘！”

“大家跟我上！杀！”贺炳炎亲率红五师15团从几处分兵上山，攻取制高点。

贺炳炎挥舞大刀冲在队伍最前面。枪林弹雨中，那把闪着青光的

大刀，大开大合，朝敌人头上砍去。顷刻间，连续数名敌人做了他刀下亡魂。战士们跟着贺炳炎奋勇杀敌。红五师 15 团，一举拿下了瓦屋塘东山。

就在这时，贺炳炎感到手臂一阵发麻。原来，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臂。他忍痛朝敌人冲去，不料，没走几步便昏厥在地。战友们赶紧用担架把他抬下山去。

黄土坑临时战地医院，贺炳炎躺在一间木屋里。由于血流不止，他几度昏迷。医生发现他的右臂血肉模糊，骨头粉碎，只剩下几根筋和皮肉相连。伤情极其严重，必须截肢。此时部队开始转移撤退，医疗设备也随军转移。

贺龙听闻爱将重伤，飞马返回，问当时曾救治过无数战将的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能不能不锯掉手臂？”

“不能。”贺彪神情凝重。

苏醒过来的贺炳炎大叫：“不要锯掉我的膀子！我要打仗！”

说完，他又昏迷过去。每当他醒来，又继续喊叫。

但如果不动手术，贺炳炎连命都保不住。

“你不是还有一只胳膊吗？你一定行！还能打仗！”贺龙对贺炳炎说。

在贺龙的劝说和鼓励下，贺炳炎终于同意截肢。而此时，敌人大军压境，部队必须全部转移，情势危急。

贺龙下令：“部队再坚持打三个小时，保证贺炳炎动手术的时间。”

没有麻药，也没有手术刀。军医贺彪只好找来一把当地百姓锯木头的旧锯子，熬了一锅盐水消毒。

他担心贺炳炎忍受不住剧痛，犹豫着。

“直接锯吧。我是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痛吗？”从昏迷中醒来的贺炳炎对军医说，“麻烦给我嘴里塞一条毛巾，把我绑在木板上就行了。”

几位护士用麻绳将贺炳炎绑缚在木板上。贺彪又用毛巾裹着一支

铅笔，让他咬着。

“能忍住吗？”

贺炳炎咬着毛巾，用那双坚定的眼睛望着贺彪，点点头。

手术开始，贺彪拿着这把代替手术刀的锯子给贺炳炎锯骨头。只听“吱吱嘎嘎”锯骨声，贺炳炎的手臂被锯子慢慢地锯掉。

在不施麻醉的情况下，用一把锯子锯着胳膊，那是怎样的剧痛和煎熬？那种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挫骨之痛，谁能够忍受？

贺炳炎紧咬着毛巾，里面的铅笔被咬碎了，嘴唇也咬破了，鲜血直淌。他用左手死命地抓起身下临时当手术床的木板，豆大的汗珠顺着苍白如纸的脸滑落，却没有喊一声。

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不忍看下去，禁不住悄悄落泪。

贺龙也在外面走来走去，忧心如焚。

两个多小时过去，手术终于做完了。贺炳炎承受住了超过生命极限的考验，熬过了犹如一个世纪的最痛苦、最艰难的漫长时刻。

守在门外的贺龙急忙进屋探望。贺炳炎望着贺龙，第一句话就问：“我还能打仗吗？”

贺龙眼含热泪，紧紧握住贺炳炎的左手：“有我贺龙在，你就能打仗！”

军医贺彪看到，贺炳炎嘴里塞的毛巾被他咬烂了，铅笔也咬成了碎末。“关云长刮骨疗毒不过如此，贺将军乃神将也！”他钦佩地赞叹。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虽然早已深入人心，但那毕竟是一个虚构的“演义”。而贺炳炎不用麻药锯掉胳膊，却是真实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事，其痛苦程度胜过关云长刮骨疗毒数倍！只有22岁的贺炳炎，用钢铁般的意志，又一次完成了自己的英雄壮举。

贺龙把贺炳炎被锯下来的碎骨包好，装进自己的口袋，带在身上，这一带就是许多年。他常把贺炳炎的那把碎骨四处给人看，激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

共产党员的骨头是钢铁做的。这种“特殊的钢铁”，名叫“意

志”。这是经过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经过无数炮火和枪林弹雨的洗礼，经过多少次出生入死的考验，才淬炼成钢，炼成一块“硬骨头”。

此后，贺炳炎以一只独臂，驰骋战场。他成为贺龙的得力战将，被称为“独臂将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他16次身负重伤，立下又一个又一个战功。

1952年到1955年，贺炳炎先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42岁的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0年，贺炳炎病逝于成都，终年47岁。

结语

历史的车轮碾过纷飞的战火，硝烟已逝。苍翠的松柏掩映下，成都磨盘山公墓一派肃穆而祥和。

青山埋忠骨，热血照千秋。贺炳炎上将长眠于成华区磨盘山。那块庄严的墓碑上，铭刻着将军一生征战沙场的卓越功勋。碑文的最后写道：

贺炳炎同志参加革命，三十一年如一日，一贯对党无限忠诚，他是中国人民的忠贞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战员。党和人民为了表彰他的历史功绩，于一九五五年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朱向离将军血洒龙潭寺^①

/林元亨

—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从石板滩仁和场到龙潭寺隆兴场，是十八里八的路程，龙潭寺再往东北方向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省城成都。

“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一行 19 人的解放军队伍全副武装，带着机枪和冲锋枪、手榴弹，一早从石板滩出发的时候，他们个个斗志昂扬，心想紧赶慢赶，花个大半天时间，就能走到成都。到成都吃碗赖汤圆、钟水饺、荷包蛋，这是战士们的小小心愿与奢望。

为了路上安全，他们是等天大亮了才离开石板滩的。

1950 年 2 月 5 日，农历腊月十九，虽然头天已经立春，但成都平原的天，依然是冬天常见的一片灰蒙蒙的底色。从西江河飘来的风，吹到石板滩的时候，已经明显地感觉得到有一丝春天的气息了。坝子上，坡坡上，房前屋后，勤劳的东山人，已经早早地种满了海椒、油菜和豌豆。

^① 参考文献：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

这一支队伍，大多数是北方人，所以也并不觉得此时有多冷。再有 11 天就是春节了，这是他们要在成都过的第一个新年。

二

1949 年 11 月，二野与一野十八兵团协同作战，由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统一指挥，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对成都地区扎好了口袋。胡宗南手下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12 月 9 日，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联名通电起义。27 日，成都宣告解放。30 日，贺龙率领一野十八兵团的 60 军进入成都，在 30 万群众夹道欢迎中，从北门外驷马桥出发，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入城仪式。《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祝成都解放》。

那一天，60 军 178 师 533 团宣传队长李蔚和团作战参谋张金宝，因为同样身高 1.78 米而被选为护旗手。张金宝高举国旗，李蔚高举军旗，跟着前面高举领袖画像的大卡车和将领们乘坐的吉普车，自豪地走在仪仗队的最前面。入城的大军里，还有 178 师的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在入川之前，有两位山西老乡战士不想来，他还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现在，他们以胜利之师终于走进了“天府之国”。

成都解放了！

入城式一共持续了 4 个小时。直到黄昏，整个城市还在沸腾之中，获得解放的欣喜溢于言表。那一天，朱向离仰望着一轮皎洁的月亮，那是和太原东山罕山一样的月亮。

今天匆匆回成都的 19 人的队伍，带队的首长就是朱向离。

国民党起义部队三兵团朱鼎卿司令部，从赵镇集结到指定的位置石板滩接受改编。朱向离因担任整训和改编这支部队的总军代表，来到石板滩已经有不少时间了。

1949 年 10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保加利亚建交。1950 年 1 月，中央军委在全军遴选派驻国外的第一批军事武官时，朱向离被选

中赴任保加利亚驻外武官。时间紧急，接到调令的他，立即把工作移交给了同来的两位战友，179师535团副政委郭铁和178师533团副团长陈青林。

“一路保重，到保加利亚好好干！”两位战友送出门时，叮嘱又叮咛，执手恋恋不舍。

此次回到成都，办完手续，朱向离就将直上北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挑战的外交事业，正等待着他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

三

要过年了，“东山五场”的老百姓都开始准备年货。但今天一路上，却显得异常冷清。

民国时，华阳县第九区隆兴镇，下辖龙潭寺隆兴场、石板滩仁和场、门坎坡同兴场，1942年，华阳县还曾经在院山寺一带新成立过隆和乡。据1934年版的《华阳县志》记载，隆兴场有2.2万人，仁和场有1.3万人。

仁和场是逢一、四、七场期，同兴场是四、七、十场期，隆兴场是二、五、八场期。也就是说，昨天，龙潭寺隆兴场刚刚逢过场，而明天，则是门坎坡同兴场赶场天。石板滩的仁和场，做情报出身的朱向离，空闲的时候曾经在地下党同志的带领下，穿着便服去赶过一回，真的好热闹！而热闹中自然也十分复杂，土匪、特务、俗称“烂滚龙”的地痞恶霸、袍哥、乡绅、商人小贩、国民党起义士兵等，都混杂当地老百姓中，可谓波涛暗涌。

据地下党同志介绍，“东山五场”，是石板滩仁和场、洛带甄子场、西河西河场、龙潭寺隆兴场、清泉廖家场。沙河以东的“东山”也并不是什么大山，傅崇矩《成都通览》就说：“成都系平阳大坝，并无大山，东路之山起于五十里简州之龙泉驿……近城一带之凤凰山、东乡之东山，皆黄土小坡。实非山也。”有意思的是，据说各场

的人，都爱说自己是“东山五场”之首。然而，这一带乡民几乎都自称是客家人，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对于外地人甚至成都人来说，他们都说的是听不懂的土广东话。

在石板滩，除了地图，朱向离最爱翻看的是一本民国版的《华阳县志》，对这个“天府之国”，对这个第九区隆兴镇，他饶有兴趣。作为一个有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以四海为家的革命战士，他热爱自己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那次，在入川前的秦岭北麓，老战友都爱国来看他，他正在和两个战士谈心，最后把他们说哭了。都爱国很好奇，问他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的。他说，只是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为了抗日，为了打倒阎锡山，为了山西人民的解放，有多少四川的同志把鲜血浇筑在我们山西土地上？那么现在，轮到我们山西子弟去解放四川的人民时，应该怎么办？逃跑了，对得起在山西流血牺牲的四川革命前辈吗？”

不知道这次回成都，朱向离所带的队伍里，是否有那两名可爱的战士？

四

天阴得快要下雨的样子。

朱向离是山西平遥人，他这次所带的一个加强班的战士，也大多是山西籍。辘重营耿祥亮和朱向离是平遥老乡，杨孝德是阳城县人，译家绪是沁水县人，通讯营李英是洪洞县人，西北行政干校的何自美、张卓民和李全文来自安邑县，杨茹青和孙自友分别来自万荣县、荣河县，饲养班长韩会昌和李等金，老家都是昔阳县。饲养班还有李尚全、郭元禄，分别来自山东乳山和陕西白河，炊事员尚学礼和李克秀，一个是河南汝南人，一个是河北霸县人。另外，还有苗大水、陕武兴、冯贵芸，今天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

天上很快就下起了毛毛雨。这支英姿飒爽的队伍没有停留。一路过石板坡、黄庄、天宫庙，一口气走出了十三四里，很快就到了十里

店蔡家坡、清水塘一带。前方，就是院山坡院山寺。

院山寺，在隆兴场东北，创建无考。清咸丰癸丑（1853）年重修。民国时期，曾经一度用于龙潭寺兴办义学。院山寺所处的院山坡，也是石板滩到龙潭寺的要隘，林深树茂，一看就是用兵之地。朱向离吩咐大家警惕，最好快速通过。

不过，翻过了院山寺，再走五六里，就到隆兴场了。来的时候曾经经过隆兴场，那天正是逢场，赶场的热闹与喧哗，场上的卤鸭子和小贩刚刚炸出的糖油果子，都给这一群入川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刻一个上了年纪的乡民，背着一捆干柴上了坡。

突然，“砰”的一声，从院山坡传来枪响。这支 19 人的队伍前进的行程从此在院山寺北的蔡家坡戛然而止……

从此，他们的血与肉，家与梦，灵与魂，都永远留在了这里。他们牺牲倒下的血肉之躯，和他们一弹未发的钢枪，将筑成一座英勇而刚烈的“院山坡殉国烈士纪念碑”。

五

今天，站在院山坡烈士陵园，在英雄的牺牲之地，远望日新月异的东山和龙潭寺，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这一支队伍，都经历了什么，从上午到下午，直至他们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直至他们把拥抱新中国的姿势，镶嵌进这一片冬去春来遍地锦绣的天府大地。

7日凌晨，60军参谋长邓仕俊亲率担任成都警备任务的178师532团、533团（一说180师540团）去救援。在院山坡，找了很久，才找到了朱向离和战士们的遗体。他们有的被砍掉手脚，有的被挖眼，有的被烧死，有的牙都全被打掉了。朱向离牺牲前，还被土匪、特务残忍地挖眼割舌，他身上的枪眼和伤口竟有24处之多，几乎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当年参加过救援的60军老兵马云鹏后来回忆说：“当看到那种壮烈的场景，每一个人都哭了……我们最后是用手指刨

土，混着血和泪，在朱向离等同志战斗并牺牲的龙潭寺，用染满了烈士鲜血的泥土，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朱向离将军牺牲时还不满39岁，大部分战士，也才20出头的年纪。

虽然子弹上膛，枪栓拉响，但为了不误伤被土匪裹挟的群众，朱向离命令不许开枪。他指着从四面八方渐渐围上来的人群，对战士们说：“那里面只有极少数人是反动分子，绝大多数是不明就里的群众，是被他们裹挟和欺骗的老百姓，我们解放军是来解放和保护老百姓的，不能无故地伤害他们！”他命令队伍分成两队，分头突围。一队战士退入一户民房，残忍的匪徒点燃了房子，战士们始终没有响一枪，熊熊火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朱向离率领的另一队也在一处院子被包围，他挺身而出，劝说土匪……

一份后来西南军区编印的题为《土匪残害人民之罪行一部》的档案材料，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我一七九（误，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误，离）同志，二月六（误，五）日率一个班由石板滩回成都，至龙潭寺遭匪袭击被俘，眼睛被挖掉，耳朵舌头被割掉，心肝被掏出，惨死于匪之毒手。当我军进剿后，复于该处掘出工作人员尸体七十一具，惨不忍睹。”

消息很快传到部队，李蔚记得，大家怒火冲天，都想给战友们报仇。闻听朱向离牺牲，山西籍战友刘润兰、牛广义小两口潸然泪下。入川前，他们刚刚结婚，证婚人就是亲爱的首长却又像大哥一样的朱向离。第二天，擦干泪的夫妇二人主动请缨，踏上了川西剿匪的征程。

六

朱向离留下的照片上，是一个眉清目秀，目光坚毅——书生一样的将军，这是朱向离给很多人的印象。

虽然工作没有交集，但60军178师533团宣传队长李蔚会经常看到朱向离，对这名高高瘦瘦的首长，印象深刻：“非常温文尔雅，

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

1948年初临汾战役开始时，前进到翼城的时候，徐向前召见老太岳军区八纵队敌工部长朱向离汇报临汾城内的敌情、社情，列席的十八兵团情报参谋都爱国第一次认识朱向离。“他高高瘦瘦的，温文尔雅。”这也是都爱国对朱向离的第一印象。汇报时，朱向离对情报了如指掌，临汾城的历史沿革、街道宽窄、城墙厚度，工事防御、火力配备、部队派系、守敌分布、将领嗜好，都谈得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如数家珍。对于徐向前的问题，他也是对答如流，无一不知。第一次见面就让都爱国暗自佩服。

朱向离，又名朱指南，曾用化名彭琳、张文成。1911年9月6日生于山西平遥北营村。其父朱存正，老同盟会员，曾任平遥县水利局局长。四弟朱荣南和小妹朱坚（原名朱淑云）都投身革命。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朱向离带着朱坚到五台山参加抗日工作。1942年5月，时任偏城县妇救会主席的朱坚，在反扫荡中，不幸与日寇遭遇，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高小期间，受族兄朱宝善、亲戚冀云程及平遥县第一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任行健的影响，朱向离开始向往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后，朱向离参加宣传队，下乡演讲、募捐。1932年冬，在太原参加学潮时遭到通缉。1933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五台县筹建新县委时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8年，朱向离到延安抗大学习后，被派到山西祁县、太谷一带做外线秘密情报工作，并成功打入临汾的伪“大汉义军”司令部，与“司令”陈涛（化名陈焕章，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建立了由陈赓、薄一波直接领导的临汾情报站。朱向离任情报站党支部书记，陈涛任站长。工作站成员还有刘子安、赵铭、袁之平、马殿俊（化名穆彬）等中共地下党员。

朱向离化名张文成，公开身份是日军69师团晋南棉织厂营业主任、经理。为了工作，陈赓还让朱向离的女儿朱烨丽，陈涛的妹妹刘

乡和父亲也一同进城，以家庭的假象迷惑敌人。后来，为了解除潜伏同志的后顾之忧，陈赓又把朱向离的一双儿女接到延安，就读十八集团军子弟校。每到周末，陈赓还总是把这两个孩子接到延安的家，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爸爸”。

1943年10月，临汾情报站向军区提供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有关情况，对韩略村伏击战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歼敌军官100余名，仅3人脱逃，打乱了日军扫荡部署，受到党中央和太岳军区党委的专电嘉奖。电视剧《亮剑》就曾经表现了这精彩一幕，而朱向离所负责的临汾情报站，则伏于历史的幽暗处，并不为大众所知晓。即使是《亮剑》，也只是描述说这是一场“李云龙”所打的经典遭遇战。

七

悲伤的雨，随着零星的枪声，都一起停了。半夜，一轮皎洁的月亮挂在东山上。

都爱国记得，太原战役中，在攻打东山四大要塞时，他去拜访朱向离。送他出来时，明月高悬东山的罕山之巅，朱向离突然感叹：“月亮多么好啊！”今夜，龙潭寺的东山，依然是一轮皓月当空。仿佛故乡的明月。而事业未成的英雄，怎能瞑目！

从一份《警司袁子钦政委就龙潭寺、石板滩叛乱事件发表谈话》的档案材料可知：“龙潭寺黄德兴妻被徐银生强占，黄恐被徐谋害，遂搬到成都北关居住。三号夜晚，邬杰、徐银生等到北关把和黄德兴同宅的高云打死，黄亦被打伤，因装死而得幸免。四号，黄德兴母亲向我北关警备部队报告，因这是人命案件，该部即派一个班到徐银生家捉拿主犯，因徐银生外出，遂将其亲戚李银荣带回，反革命分子邬杰、徐银生等闻讯后，即率数十人前来抢劫，由于该班事前有准备，被打退，故未被抢去。五号，有我军战士骑三匹牲口回家，经过该村时，被打死一人，三匹牲口全被抢去。另我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在石板滩

起义部队工作，因公率一个班回成都，经过龙潭寺时被其杀害。”

“邬杰”在都爱国的回忆文章里，写作“巫杰”，正是该匪首将朱向离折磨致死。3月7日，龙潭寺发生第二次叛乱，都爱国亲自带一个侦察班配合清剿部队，参加平叛战斗，终于活捉了巫杰。并于抓捕后的第二天，在龙潭寺召开了公审大会。178师532团政委郭省吾讲话。都爱国宣布判决书，他特意命令侦察员李双亭使用巫杰杀害朱向离的柯尔特手枪，对其执行了死刑。

不过，关于凶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是王（汪）荣芳。参加过川西剿匪的老兵裴田夫说：“龙潭寺叛乱打死了我们负责改造国民党原三兵团的朱向离同志，那个枪手叫王荣芳，抓获后，我们在龙潭寺开了七千人的大会公审，枪毙了他。”《成都市金牛区志（1960—1990）》也描述亲手将朱向离杀害的是匪特汪荣芳，并说巫杰于2月8日被打死在同仁村五六组内的和尚岭，但没有述及汪荣芳的下落。联想到当时匪情不明，特务也常常改头换面，王（汪）荣芳和邬（巫）杰或为同一人。

穷凶极恶的匪特反动分子“反共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巫杰股匪，在“挺进军东山纵队司令”李干才（材）等军统特务的幕后指挥下，以“川西反共救国军六纵队”等名义发动了“龙潭寺暴乱”。而解放军则以朱向离等同志被杀害为信号，打响了川西乃至西南剿匪、平叛的第一枪。

1950年到1953年川西剿匪期间，朱向离成为解放军牺牲的军职最高的指挥员。

八

1950年春，温江专区为在川西剿匪平叛中殉难的朱向离等革命烈士和正义人士，在和盛建立起了一座“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正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朱向离将军暨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背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温江专区人民政府工作同志暨正义人士殉难烈士纪念碑”。这是成都平原唯一的一座剿匪纪念碑，铭记着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川西剿匪。

1956年，追随第十八兵团入川的原红二军团医疗队，正式改编为成都军区总医院（今西部战区总医院），迁址天回镇。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上将做出决定：为更好地保护朱向离烈士的遗骨，将其从龙潭寺迁葬天回镇成都军区总医院背后，立碑纪念。

1967年，金牛区建院山坡烈士陵园，陵园共安葬了除朱向离烈士外的18位烈士遗骨。1969年1月立“院山坡殉国烈士纪念碑”。

1978年，朱向离烈士墓在徐向前元帅亲自过问下，由成都军区修成水泥墓地。

1998年6月10日，“院山坡殉国烈士墓”被成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0年3月27日，成华区委、区政府重修院山坡烈士陵园，并专门将朱向离烈士遗骨迁移至院山坡，永远与他当年一同殉国的战友在一起。

朱向离将军牺牲时，其女婿，即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军中三支笔”之一的百岁将军彭勃，时任60军179师537团副团长。迁墓时，由于朱烨丽、彭勃夫妇年岁已高，因此由其子彭伟川代表父母，参加了整个仪式。那一夜，月亮多好多圆啊！在南京鼓楼区颐和路的一个红色小院里，朱烨丽老人终于可以在灯下，铺开一张稿纸，用颤抖的钢笔写下《悼念我的爸爸朱向离》，那是一封她和弟弟一生都在书写的信。

百战沙场铸忠魂

——记老红军谢荣德

/刘云奇

2017年8月，成都猛追湾双林路348号院一楼的一户仅60余平方米的老房子内，101岁的谢荣德老人摸了摸趴在旧沙发上的小黑狗，缓缓地点燃了一支烟，再次回忆起了淮海战役里的这场双堆集之战：“惨啊！太惨了！十几公里的战场上，每隔几公尺一个坑坑，每隔几公尺一个坑坑，里面全是尸体……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的同志太多了，他们才是最伟大的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说到这里，老人潸然泪下。

.....

1948年11月，淮北，双堆集。

在这个宽约1公里、长约3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里，黄维兵团已被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团团围住。据中央指示，这一次务必要全歼黄维兵团。夜里，上级向谢荣德发出指令，让其带领一个团约900人的兵力在双堆集外围设置阻击线，阻止敌方外围部队增援。

谢荣德立即整编兵力并迅速到达了指令地点。据情报显示，敌方由此处增援的部队约为一至两个团，即2000人左右的兵力。因双堆集为丘陵地区，谢荣德立即指挥部队率先抢占了有利地形，并迅速挖

好战壕，建起了防御工事，只等敌军到来。

11月的淮北，朔风凛冽，天空中乌云密布，恰似诗中所写“黑云压城”般压抑。这还仅仅是下午时分，天色就晦暗得如夜幕将至。32岁的谢荣德身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他将腰间紧扎的皮带又束紧了一扣，仿佛这样会暖和一点。为避免暴露我方的踪迹，谢荣德早就向全团发出了指令：“所有人必须严守阵地，不得懈怠，为免暴露，所有人不得生火取暖，不得埋锅造饭，不得高声喧哗！”于是，即使有900余人埋伏在这一线的丘陵中，却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

此时的谢荣德正细细擦拭着手中的子弹，并一发一发轻轻推入手枪的弹夹。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指挥战斗了，从长征一路走来，谢荣德早已是身经百战——

1932年年底，年仅16岁的谢荣德便在老家巴中加入了红四方面军。

1935年，他随军强渡嘉陵江、攻打剑门关，抵达了懋功。其后，又随红30军南下攻打成都和雅安，在雅安名山百丈关战役中，因遭国民党川军“围剿”，所在部队伤亡过半。艰难突围后，谢荣德随部队再次过草地北上，一路经道孚、炉霍、甘孜，辗转往甘肃会宁进发。

在甘肃一个名为德森的小地方，谢荣德所在部队再次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突围战中，谢荣德被打穿大腿。凝结的血浆将其大腿和棉裤死死黏在了一起，最后不得不剪开整条裤子才能扒开厚厚的血壳，进而对伤口进行处理。

1936年11月，躺在担架上的谢荣德被编入西路军的收容队，准备随军强渡黄河。不料西路军渡河时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阻击，两万渡河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皆因谢荣德所在的收容队被编在最后渡河，前方受阻，收容队取消了渡河计划，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谢荣德随原部队被整编到国民革命军八路军129师386旅，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1940年，谢荣德随军

参加了百团大战。抗战期间，谢荣德又多次负伤，其中胃部和后腰上有被日军刺刀捅伤的疤痕，大腿里也还有一直未取出的弹片。

1945年抗战结束后，谢荣德所在的129师386旅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10月下旬，为歼灭豫西各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谢荣德所在的陈谢兵团发起了伏牛山东麓战役。在此次战役中，谢荣德再一次身负重伤，在担架上躺了几个月。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谢荣德被编入4纵10旅，旅长周希汉。

从以往战场上被敌军“围剿”，到如今围剿敌军，谢荣德心里的熊熊烈火早已被点燃。这一次，他默默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打出军威，狠狠消灭敌人，为曾经死去的战友们复仇。

从布置好战场算起，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三天以来，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是不见踪影。此时，天色将晚，带队守在半山腰的谢荣德不敢有丝毫松懈。他十分清楚夜的危险——当夜幕降临时，划破黑夜的火光绝不会是点燃的烟头，而只会是子弹激发时的火花。

浓密的乌云遮挡了月色，今晚的夜，伸手不见五指。这是敌人进攻的最佳时机，谢荣德令前方各暗哨务必打起十二分精神，无论有无军情，都必须定时派人到指挥点汇报。

深夜，远处的枪声仍稀稀拉拉地响着。突然，其中一声枪响让谢荣德迅速绷紧了神经——这枪声传来的方向并不是身后被围的黄维兵团，而是预计中敌方增援部队到来的方向！

“团长，枪声从那边来的。”谢荣德身边的通讯员指着不远处，“是不是前面发现敌军了？”

啪！……啪！……啪！又是零星的几声枪响！

“嗯……应该是敌军打前站的在侦察地形。”谢荣德在心中仔细辨认着这几声枪响，很明显，这几声枪响的节奏不符合今天和前方暗哨约定好的暗号。

“通知所有人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没有我的命令，哪个都不准开枪！”谢荣德命令。

“好!”通讯员转身而去,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一夜,枕戈待旦,不知不觉,天已蒙蒙亮了。

“团长,你快去睡一会儿嘛。”通讯员说。

“今天怕是睡不成咯!”谢荣德笑了笑。

“你是说今天敌人可能要来?但他们昨天晚上只是派了一小队人来探了下地形,应该没那么快哦?”通讯员一边说着,一边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

“你懂啥子?以前我们每一次突围成功,哪次不是出其不意?越觉得不可能,敌人进攻的可能性越大!”

谢荣德从上衣包里掏出一块硬得硌牙的烙饼,艰难地嚼起来。他抬头看了看天,只见细微的碎雪夹着雨滴,淅淅沥沥地从天空中落了下来。这雨夹雪远比鹅毛大雪来得可恶,鹅毛大雪一下,人只是刚开始感觉到冷,一旦冷麻木了,反而不冷了,况且鹅毛大雪还有利于我军的隐蔽;但雨夹雪不同,一旦潮湿的雪水浸湿了棉衣,人就会一直感觉被无数的钢针扎着,永无休止地疼。

雪水浸入大地,地面被深秋的寒风一吹即成了冻土,坚硬如铁。

“有情况!”通讯员轻呼一声,侧耳细听,隐约听到远处的天空中有嗡嗡声传来。

“是空袭!快通知所有人注意隐蔽!”谢荣德立即反应过来,他拿起望远镜,搜索远处的天空。不多时,谢荣德便在望远镜中看见了敌军的美式B-24、B-25轰炸机——1、2、3、4……谢荣德已来不及再数,他大声喊道:“快隐蔽!飞机轰炸!隐蔽!”

身边的士兵们迅速跑进战壕中卧倒——在这个时期,解放军没有空军力量,根本不可能派战机去空中阻拦敌机,而地面上也没有任何防空掩体,唯一的保命办法便是迅速就近找地面凹陷处卧倒,然后自求多福。

不多时,敌机已飞到了近处的上空。尖利的投弹声划破苍穹,片刻,第一声如巨雷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地面响起,紧接着,无数声

巨响迅速向谢荣德所在的方向袭来，突然，谢荣德前方 40 米左右的一片土地被炸得冲天而起，他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伴随着轰炸，敌机同时展开了机枪扫射。敌机 12.7 毫米口径机枪的子弹威力巨大，会直接打断人的四肢，打烂人的内脏，或打爆人的整个头颅。此时，啪啪地拍打在谢荣德背上的东西有碎土，有弹片，也有战友们碎裂的血肉。

空袭之后，炮击紧随其后。敌军的美制 150 毫米和 155 毫米榴弹炮对谢荣德所在阵地进行了过饱和轰炸。一轮轰炸之后，原本坚硬如铁的地面被炸出了一层深可及膝的絮状浮土，土里都是战士们的碎肉和血浆，捧起一把土轻轻一握，就成了一个充满硝烟味和血腥味的“血球”。

就在这样的炼狱中，谢荣德带兵坚守了整整 11 天。在这场战斗中，他居然一直没有受伤。他清醒地经历着一轮轮空袭与炮击，清醒地看着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看着敌军 B-24、B-25 轰炸机挂载的 500 磅航空炸弹在地面上炸出一个个直径约 10 米，深 3—4 米的巨坑，看着不远处的小山坡被炸为平地。

……

“老爷子到现在还经常做噩梦，这个是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长子谢伟说，“和平年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在那样的战场上是根本退不下来的！等 11 天以后，他们被后续部队换防下来的时候统计人数，整个团原本 900 人左右的兵力，最后连马夫带伙夫总共剩下了不到 40 人！你想死了好多人！老爷子当时都以为自己要被枪毙了，后来才听说之前的情报有误，敌军的增援部队不算空军，仅地面部队就有整整一个旅——四个团的兵力，其中还有一个炮兵团！”

淮海战役后围歼黄维兵团的这场战斗如此惨烈，谢荣德竟毫发未损，而在伏牛山东麓战役中，谢荣德所在部队被胡宗南部包围，突围时，谢荣德却受重伤休克。是时，司令员秦基伟、政治部主任刘华清、副参谋长张显扬都误以为谢荣德牺牲了。不料，谢荣德是被三野

的收容队收治了。伤愈后，谢荣德被暂时编入中原野战军，随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并占领南京。之后，谢荣德再次回归二野，编入 15 军 45 师，军长秦基伟，师长方文举。于是，谢荣德随军南下，一路打到福建南平，又随部队折向云南。

20 世纪 50 年代初，谢荣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奔赴朝鲜战场。正当部队在丹东集结时，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谢荣德随部队按计划撤回。

其后，谢荣德被分配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军区第七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分配至云南边防军区，并于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奉命勘定中缅边境国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谢荣德作为勘界工作组技术组成员，沿着中缅边界 1000 多公里的国境线一步步地丈量着，他一边做记录，一边画图、拍照，从而将国境线上的山川地貌都记录在案并交给了中央。情报兵出身的谢荣德一生都爱看地图，即便百岁高龄，他仍可以根据地图上的标注清晰地说明当地的地形地貌。

1965 年，因谢荣德爱人罹患重度心脏病，谢荣德向部队提出了转业申请。转业安置时，四川省交通厅考虑到谢荣德的级别，本欲安排其到省公路局担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但由于当时公路局正在修建成都至攀枝花的公路，若谢荣德赴任，则一定无法回成都照顾爱人，因此，谢荣德表示不在乎级别待遇，只要到成都工作即可。于是，1965 年 3 月 5 日，谢荣德“高职低就”，被安排到了位于猛追湾的四川省柴油汽车修配厂任副厂长。该厂当年仅为科级单位，当时上级领导的本意是让谢荣德先暂去赴任，等日后另行调动，不料谢荣德到厂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之后，谢荣德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1982 年，谢荣德正式从柴油汽车修配厂离休。

“老爷子从来都说：‘争啥子嘛?! 我们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人了——那么多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了的人，他们啥子级别，啥子待遇?’”谢伟说着，点起一支烟，“老爷子节约得很，买烟都舍不得买

好烟，原来买烟，自己尽买些啥子五牛啊，甲秀啊，最多也就是买红梅，后来我和我弟弟就偷偷把他买的烟拿去送人，然后换成红塔山、牡丹、中华给他抽。

“老爷子从来不讲究吃，有啥子吃啥子，但是在穿方面他有个怪癖，那就是从来不穿钻洞洞的衣服。啥子棉毛衫、毛衣，但凡是没有拉链或者扣子的衣服统统不穿。到冬天，老爷子就穿个衬衣，外面穿系扣子的开衫毛衣，再外面再穿大衣或者羽绒服。他还有个习惯，就是要束腰带。我们给他买那种长款的羽绒服，他还是拿个皮带束到外头，我们说他：‘你那样好丑哦！’他就说：‘你们懂啥子嘛！腰带扎起才热和！’……后来我们也就不说了，我们晓得，这是他当了一辈子军人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咯。”谢伟笑着说道。

2019年，103岁高龄的谢荣德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华西医院，同年12月，谢荣德爱人因病去世。谢荣德出院回家后没见到老伴，便问儿子谢伟。谢伟只得谎称老妈还在住院。谢荣德返家三月有余，一直没见到老伴，其后又因肺部感染再次入院。

“他肯定意识到老妈已经走了。”谢伟说，“他好聪明的人嘛！打了一辈子仗，这些鬼话骗得了他？只不过已经那么大了，生生死死也看多了，所以也只有刻意回避这些问题。”谢伟说罢，微微叹了一口气，又点燃一支烟。

2020年9月11日，静谧的成都北郊殡仪馆，一场小型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现场只有几十人参加了此次告别仪式。除四川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等部分领导参加了本次告别仪式外，只有两个儿子及儿媳妇，两个孙子及孙媳妇一直守在谢荣德的遗体边。

谢荣德的遗体安详地躺在小厅中央，身着一件翻领深色夹克，头戴黑色呢帽，胸前覆党旗，上罩透明亚克力棺盖。

据谢伟说，谢老生前也曾谈及其后事：“老爷子曾经说：‘到时给

我裹个烂席子，哪死哪埋就是。’我们做儿女的能理解，因为从小就听他摆龙门阵——他在战场上见了那么多死人，能‘马革裹尸还’的都算好的了，那些用烂席子一裹就埋了的，那些裹都没裹，埋都没埋，最后（尸体）被野狗叼来吃了的，多的是！所以他一直把生死看得很淡，把后事看得很轻。”

如今，巴中川陕红军烈士陵园方面已为谢荣德夫妇确定好了墓地的具体位置。在这座全国最大的烈士陵园中，安葬着近万名红军将士的忠骨，想来，谢荣德和老伴安睡在此，必不会孤单。

天宝的故事

/王跃 泽里扎西

红军来了

每年清明人们都要来到成都北郊磨盘山，这里不仅有开国上将贺炳炎的墓地，也有党的八大中央候补委员，九、十、十一大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的墓地。

天宝，原名桑吉悦希，曾相继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康定藏族自治州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阿坝藏族自治州主席、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1955年9月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1969年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二政委；1980年年底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天宝墓前的碑石上刻着“物华天宝”四个大字，“天宝”这个名字来自毛泽东主席。

天宝家曾同我家同住一院子，院子里的孩子都亲切地叫天宝为天伯伯。我们那个院子地处顺城街，民国时曾是一处大公馆，1949年后被乔瑜（四川已故著名作家）的父亲、曾任十八军后勤部长的乔伯伯买下做了西藏军区的后方招待所，我们这些十八军的后代得以在这里居住。这里是典型的川西公馆的格局，花园假山，有两株参天的大银

杏树，每年要结出许多的果实，是我们孩提时代的乐园，后又在招待所的原址上修建了今天的珠峰宾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小战士，生病在家疗养，每天晚饭后就同天伯伯一起散步，沿着顺城街走到体育场，一路无话不谈，一老一少十分投缘。他十分奇怪我们小小的一个院子，也没有几家人，居然有两个后生要当作家！一个是乔瑜，一个就是我。我们的父母都是军人，却生养出热衷于当文人的子弟。本文关于天伯伯的许多往事，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散步中得来的。

1935 年，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部一路北上，在懋功的达维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 1 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有 8 万多人。7 月初，大小金川流域及“四土”（即四个土司统治）地区均为红军攻占。“红军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军中的许多女兵站在道路两旁唱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
干部战士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
打倒军阀反动派，人民才能得安宁。

我们红军多勇敢，勇敢勇敢向前走，
为来为去为穷人，为了穷人大翻身。

农奴娃子桑吉悦希和沙纳（又名沙拉、木亚咕咕·古古拉拉）在马尔康县周山区党坝乡山梁上放牧。两道山梁中间隔着一道峡谷，桑吉悦希在山梁的这一面，沙纳在山梁的对面，两人放开喉咙吼出一些粗犷的山歌，甚至大声说话，彼此能够听见却不能相聚，从谷底的平坝骑马上山要走一天才能有一个来回。桑吉悦希看见山梁上不时有一

些马帮来往，马帮用盐茶、布匹换走山里的草药、山货和皮毛，道路两侧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那时到灌县（今都江堰市）去也不容易，山道崎岖，要走十天半月，除了骑马，大多是靠双腿。马帮说：

“红军来了！朱毛来了！”

桑吉悦希弄不清“朱毛”是什么人，是一个人还是好多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很怕“朱毛”，逃进了深山老林，甚至逃往灌县、成都。大户人家收拾了金银细软，丢下家里的帮工、用人跑得无影无踪。这时桑吉悦希的父亲正在山上打猎，母亲在田里劳作，两个弟弟四下里玩耍。桑吉悦希怀着惊奇的心情走回家去，看见有钱人正在运走粮食和牲畜。土司头人的家丁四下里散布：

“快逃吧，上山去，要打仗了！朱毛来了。”

沙纳家在对面山梁上的尕兰村，那里的土地十分贫瘠，躬耕一年收获甚微。地里种着青稞，也种一些蚕豆。他们村里也来了马帮，沙纳并不知道这些马帮和货郎子是红军的侦察员。马帮告诉沙纳，红军为穷人办事。沙纳木木的，十分不解。沙纳和桑吉悦希年龄都不大，他们甚至没有走出过这道山梁。

果真，不久红军就走村进寨，个个穿得很破烂，但纪律严明。还有身穿灰色军装，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帽子正中有一颗红星，在太阳的映照下很耀眼。士兵们扛的是马枪，很新，背上插着一把大刀，威风凛凛，十分神气，令人羡慕。沙纳左看看，右看看，两位红军女兵自称大姐，心慈面善，一个姓陈，另一个称王大姐，关键是两位大姐还打着绑腿，让沙纳很奇怪。这一次意外的邂逅，改变了桑吉悦希和沙纳的人生轨迹。特别是邵式萍（金川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省长）四下里讲话：“民族要平等，要团结……”邵式萍很有水平，用的是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给桑吉悦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红军四处宣传他们的政策，《红军十大约法》《共产党、红军主张》等文件布告，明确宣布“消灭贼娃子邓锡侯，取消一切捐税款

子，不拉夫，不抽丁，开仓分粮，增加工钱，改良待遇，人民自己武装自己，人民自己组织政府，买卖自由，公买公卖，人民自己信教自由。”

桑吉悦希怀着好奇的心情跟着红军四下里活动。红军没收了有钱人的东西分给穷人。桑吉悦希十分激动，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红军说到做到，还真的这么干了！红军敲锣打鼓招收新兵，称为“扩红”。桑吉悦希站在山梁的这一面对站在山梁那一面的沙纳喊话：

“去啵？”

“要去！”

两人从各自的山梁上走下来到达坝子上，他俩唱着歌，喊着号子，好不快活，他们参加了红军。时年桑吉悦希 18 岁，沙纳与他年龄相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孜州州长，再后来成为桑吉悦希的亲家，这是后话不表）。

你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宝贝

桑吉悦希 1935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军藏族独立师青年部长，红军博巴独立师党代表，1936 年到达陕北，任中央党校校党总支委员等职。

关于“天宝”这个名字的由来有很多说法，我曾问过天伯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36 年中共中央党校在陕北定边县开办了少数民族班，廖志高出任班主任，天宝是学员班长。1937 年党校从定边县迁往延安，成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第七班，天宝任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及学校党总支委员。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经常来讲课，帮学员复习功课。天宝声音高亢，那是在老家阿坝山梁上练就的一副好嗓子，人年轻，爱唱爱跳，会跳锅庄，也会唱弦子。毛主席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回答在阿坝马尔康的党坝，名字叫桑吉悦希。毛主席笑起来，说他天真活泼，物华天宝。

“真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宝贝。”

桑吉悦希听后红了脸，很不好意思。天宝！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就叫起来了。

所见所闻

天宝 1994 年离休，这之前他一直在四川和西藏担任领导职务。

离休后的天伯伯很喜欢种花，他家门口多了一盆两盆花，我们这些后生都爱去围观，还帮忙浇水，因太过积极，水浇多了把花都浇死了。天伯伯乐呵呵的，并不责怪我们。如今回忆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备感亲切。

1980 年天宝出国访问。他参加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团，由邓颖超任团长，他是副团长。他这一生出访并不多，一次是出访尼泊尔，另一次是 1985 年率登山代表团出访日本。此外，仅去过法国、朝鲜和美国。相比之下，他跑遍了西藏和四川所有的县。与他同时代的领导干部中，只有曾任西藏军区政委的任荣跑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任荣为此还少了几个脚指头。

天宝清楚地记得，1949 年时，毛主席对他讲，你回去对群众讲清楚，他们杀了牛支持我们，支援了红军，解放后我们要帮助他们发展人口，发展生产。天宝一直记得毛主席的话，发誓要把家乡建设好。

访问法国时，天宝颇为感慨，法国人实行轮耕制，田地耕种一年就要休耕。绿化也很好，到处都是青山绿水。法国人很讲究，招待十分周到，旅馆和宴会都安排得十分周到，但场面很小，注重的是精致。20 世纪 80 年代之初，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访问者对法国的一切还很新奇。但法国同中国相比，毕竟是一个小国，从面积到人口都无法相提并论。他发现，与四川省面积相当的法国，在繁华的表面背后其实也有另一种生活。老头儿老太太们牵着狗在大街上行走，报纸是专门替狗大小便准备的。这些老人很孤独，大多离群索

居，有些人死在公寓里也无人知道。

多年之后我和天伯伯一起散步，听他讲这些见闻，他仍感慨良多。

闲不住的人

离休后的天宝仍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职务退了，但革命精神、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养成的革命热情一直伴随他终身。闲不住的人，即使已离开了领导岗位，有时还忙得不可开交。到处走走看看，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深入基层，特别是到民族地区从事调查，关心和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搞好经济文化建设。当年从大山里跟着红军走出来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这就是不忘初心。尤其是对他的家乡阿坝州马尔康寄予了深情。一个老人，非常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关心“老龄问题”，支持“希望工程”，筹建朱德、刘伯承纪念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人们还常常看见这样一幕：他每年总要找几个家乡人，用最纯正、地道的马尔康党坝方言，事无巨细地给他讲一讲家乡的情况，有多少只羊，山上的雨水多不多，草长得好不好，等等。家乡人说着家乡话，他津津有味地听着，出来了几十年，家乡话听起来还是那么亲切，让他百听不厌。每到这时，他的情绪总是很好，兴致勃勃，他忘不了生他养他，送他北上的那块土地，那里有他的根。他记得当年正是站在党坝的山梁上同站在对面山梁上的沙纳喊话，他们一齐参加了红军，从这里走向了延安，走向了胜利！

李劫人与他的共产党朋友^①

/张义奇

—

春日的阳光洒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地形渐渐上升的磨盘山上一片寂静肃穆。与其说这是山，毋宁说这是一个大坡，是龙泉山余脉横亘在成都平原上的一道坎儿。

磨盘山有个著名的公墓，被称为成都的“八宝山”。

拾级而上，道边残存的野菊星星点点，正迎风绽放，为这庄严的墓地增添了几分跃动的生机。离清明节尚有些许时日，上坟凭吊的人并不多，仅有三三两两的人们缓缓而来，直奔已故亲友的墓前，但见献花、鞠躬、敬酒、递烟。仪式无声而短暂，然后人们便下山去了，墓地再次笼罩在死寂之中。

我是来寻访李劫人先生的。在我的感觉中，他似乎并非已经作古的逝者，而是这山上的住户。

此次登磨盘山距上一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至今清楚记得是1971年刚上初一时，老师带学生到郊外野炊，地点便是这磨盘山。当

^① 参考文献：《李劫人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周永珍：《留法纪事：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年山上没有这么多墓，因不知李劫人是谁，即使见过他的墓也没有留下印象。唯独对贺炳炎上将之墓记忆深刻，不仅因为这是磨盘山顶上最大的墓，而且听老师讲了贺将军的战斗故事和逸闻趣事。

在贺炳炎上将之墓和“二一六”烈士之墓的下方墓碑林立，一行行，一排排，鳞次栉比，仿佛排列整齐的古战阵。长眠其中的有老红军、老八路、老知识分子，有外省人，也有本地人。生前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自都有辉煌人生；死后回归宇宙尘土，化为大地的绿叶鲜花。

终于在林立的墓碑中找到了李劫人。

这是一方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的文字清楚地写着李劫人生前的职务是成都市副市长，立碑者则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环顾周围，其他逝者的墓碑都是由亲属所立，比如不远处李劫人的老朋友张秀熟的碑就是由其子女所立。张秀熟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生前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行政级别比李劫人高，去世后并未享受到以公家名义立碑的“待遇”。由此也可以看出，共产党给予李劫人这位著名作家的殊荣。

有趣的是，李劫人在青年时代就发誓终身不为官，不料，到晚年却做了共产党的官，而且故去后在墓碑上还保留着他的职务。

李劫人生于1891年，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在江西的衙门里曾亲眼见过清末官场的腐朽。后来他历经四川保路运动，清廷灭亡，满怀新的希望进入民国。1915年，他跟随舅父相继在泸县、雅安做了两年的第三科（即教育科）科长。李劫人满心以为民国社会已彻底变了样，却在短短的两年中，惊讶地发现，民国官场的种种黑暗弊端与前清并无两样：“一切依然照旧，不过是换了一种新名词，其实官还是官，幕友还是幕友，绅粮还是绅粮……只不过把知县改成了司令。”这与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说的真是如出一辙：“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是改称了什么……带兵的还是原先的老把总。”

民国换汤不换药的社会现实和两年的小吏经历，使李劫人彻底断

了出仕的念头。中国的读书人自古秉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李劫人发誓从此不再为官，终其整个民国期间，他再没有踏入官场半步，尽管他有多次做官的机会。

然而，数十年之后，当共产党接管了政权，李劫人却欣然接受了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的任命，担任了成都市第二副市长，并且直到1962年逝世。子女对父亲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深为不解，李劫人却说：“这有啥不理解的？清朝时候的官，我见过；民国时候的官，我也见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哪！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原来，李劫人是认同了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才一改自己的人生誓言，做了共产党的官。

李劫人之所以“自食其言”，是与他长期与共产党人为友分不开的，他正是从这些共产党朋友的言行中获得了新的认知，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二

李劫人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最早要追溯到“五四”时期，尤其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

1919年6月，王光祈、李大钊、周太玄等人在北京筹备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李劫人被推选为筹备处临时编译部编译员，而临时编译部的主任即为李大钊；同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编辑部主任为李大钊，李劫人则是第二组月刊编辑；同时，李劫人又担任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书记。少年中国学会是被蔡元培誉为“最有希望”的思想文化团体，汇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赵世炎等许多共产主义者。李劫人与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或引为同志，或是好友，与他们在思想情感上自然亲切而深受影响。

李劫人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早有神交。他1919年7月在成都

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会刊《星期日》，就曾转载过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毛泽东的《论民众的大联合》。李劫人与毛泽东正式见面是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期间，在渝的原少年中国学会朋友提出要集体宴请毛泽东，而毛泽东则坚持要自己做东。于是在宴会上，李劫人见到了这位神交已久且大名鼎鼎的共产党领袖。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精神交往，李劫人并无拘束，特别向毛泽东询问了“二五减租”的情况，并且还开玩笑地问道，红军过茅台镇时是否如传闻所说用茅台酒洗脚。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很认真地回答了李劫人的问题。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李劫人与共产主义者有了直接交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巴黎和会”如期在凡尔赛宫举行。号称“欧洲之都”的巴黎，不仅成为西方列强分赃的乐园，也成为20世纪各种思想汇集交流的中心，吸引着各国青年的目光。一时间，埃菲尔铁塔下、塞纳河畔，更多的是在各个工厂、学校、图书馆，都能看到东方青年人的面孔。这些东方青年多数是来自中国的勤工俭学生。到1920年年底，留法的中国学生已达两千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求学寻找真理的。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便是这些勤工俭学生中突出的一群人，李劫人正是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尤其向警予、徐特立等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还提到他们的名字，并且误认为当年是与他们同船抵达马赛。其实，他们是分批抵法的，徐特立是第七批，乘坐“博尔多斯号”邮轮，于1919年11月12日便抵达马赛；李劫人则是第十一批，乘坐“斯芬克斯号”于1920年1月14日到达；而向警予则比李劫人还晚半个月，她是第十二批，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1月28日才到达。

早期共产党人中，李劫人与赵世炎最谈得拢，他们是在少年中国

学会巴黎分会的活动中认识的。赵世炎是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革命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深受陈独秀、李大钊影响，早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后，坚持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学习，很有吃苦精神。李劫人之与赵世炎情投意合，一则因为赵世炎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是由邓中夏介绍入会的；二则因为赵世炎的哥哥赵国兴是李劫人中学时期丙班同学，二人的名字中的“家祥”（李劫人原名李家祥）、“国兴”正好可以作一副对联。因为这些缘故，李劫人与赵世炎两人关系极为亲密。特别是赵世炎吃苦耐劳的勤工俭学精神和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敏锐性、积极性以及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使李劫人深受感动：“他是白昼做工，夜里读书，法文的社会主义书籍读得不少，并且读得精细。所以一连三个星期的晤谈，总不外于政治、经济，尤其谈得多的就是当时正在受内外夹攻的苏联情况。我们对苏联情况的真相，知道得并不多，法国报纸除了《人道报》一家外，报道苏联的情况，大都是含有恶意的，何况那时法国政府还派了一员大将帮着波兰的反动政府，在向苏联作战哩！不过，我们几个都盲目地、诚心诚意地，全相信苏联的大革命是必然成功，而欧美亚各帝国主义干涉者必要失败。”

与赵世炎的畅谈交流，使李劫人对社会主义，尤其对苏联的十月革命有了初步的了解。列宁去世后，李劫人立即在1924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三号发表了《列宁在巴黎》一文表达纪念。讲述了列宁在巴黎的革命活动片段，以及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称赞列宁：“无论如何，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位世界的伟人！”李劫人在留学期间，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于革命者，他是满怀崇敬的。

1928年，朋友从上海带来一个噩耗，身在成都的李劫人才知道赵世炎已经在1927年被杨虎杀害了。这令他感到十分悲伤，想起他们在巴黎短暂而愉快的交往，他深为当代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青年而沮丧。又过了许多年，当赵世炎等先烈为之奋斗的新政权建立时，1951年，李劫人终于可以公开在《川西日报》上缅怀这位逝去的共产

党朋友了。他在《记先烈赵世炎》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说，他很感激两位先烈（另一位是刘愿庵烈士）：“我确实因了他两位的无形影响，使我愈益明确坚定了我这二十几年来的行动方向。”

三

留法回国之后，李劫人曾在成都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他的周围一直有共产党人活动。他们有的是他的同事、朋友，还有的是他的学生。1928年，成都发生了著名的“二一六”惨案，反动军阀枪杀了袁诗尧、钱芳祥、李正恩等十四名师生，遇害者中就有八人是共产党员。此事让李劫人悲愤至极，他不仅坚决支持张澜校长辞职声讨军阀罪行，而且自己也写杂文、写小说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大小军阀的丑恶嘴脸。直到九年之后，李劫人与张秀熟会面，他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血案，敲着桌子愤然长呼：“血债总有一天要清算！”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沦陷区的作家、艺术家流寓后方。1938年3月，由国共两党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作为大后方抗战基地，成都也于1939年1月成立了抗敌文协分会。从筹备委员到历届常务理事，都有共产党人担任。如沙汀、邓均吾、何其芳、周文、陈翔鹤、洪钟等，都是文协成都分会中地下党的领导力量。在分会成立之初，总会原指定的只有五位筹备委员，后又特别增加了李劫人、谢文炳两人。可见共产党对李劫人历来重视。李劫人以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巨大的文学成就，赢得了文艺家们的尊敬。他不仅当选为历届理事会的理事，而且被视为文协成都分会的一面旗帜。

这是李劫人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并肩战斗。

为了文协成都分会的生存发展，李劫人非但无偿提供办公场所，还通过他任董事长的嘉乐纸厂不断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分会成立之初，当局曾有很少一点拨款，可随着物价飞涨，所谓的拨款，仅够领

款人来回的交通费。分会机关刊物《笔阵》，若没有李劫人为后盾，遑论办刊数年？除此之外，李劫人还对流寓川内的贫困文人施以援手，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员作家，如张天翼、陈翔鹤等都接受过李劫人的经济援助。陈翔鹤之子陈开第曾动情地说，是李劫人的慷慨解囊，才使我们全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共产党人尊重李劫人，而李劫人也自觉按共产党的原则办事。《笔阵》编辑请示李劫人办刊方向，李劫人明确说：“跟着延安走，没有错。事事看《新华日报》的号召，照着办。”有一次，有人撰文讽刺沙汀的小说是“死鱼的鳞甲”，李劫人对这种恶意批评十分气恼，要求反击，但听说作者是团结对象，也就无话可说。

文协后期，作家们的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多亏李劫人的睿智才化险为夷。到抗战胜利后，地下党员时时有被捕的危险，李劫人的家“菱窠”和嘉乐纸厂就成了避难所。1947年，成都“六一”大逮捕，洪钟上了黑名单，逃到“菱窠”躲了好几天，直到李劫人打听风声已过，才让他离开。《华西晚报》总编辑、左翼剧联成员赵铭彝为躲避大逮捕，带着他小儿子在“菱窠”住了十多天，直到在川东找到工作方悄然离蓉。李劫人明知掩护共产党要遭殃，依然对避难的朋友热情接纳。

1947年，陈翔鹤上了特务黑名单后，李劫人先将其安排住在家中，风头刚过不久，又遭遇成渝两地大逮捕，陈翔鹤再次成追捕对象。陈翔鹤赶到东大街崇德里嘉乐公司办公室求救。适逢李劫人因公去了重庆。公司秘书谢扬青便让陈翔鹤去乐山嘉乐纸厂暂避，同时用隐语致信李劫人。李劫人见信后即发电报通知厂方，任命陈翔鹤为驻厂秘书兼总务主任。陈翔鹤在乐山一直隐藏到1949年底才返回成都。

李劫人与共产党合作，彻底激怒了国民党特务，他的儿子被追捕，女儿也被抓进狱中，其家也连遭搜查。但这并没有吓倒李劫人，反倒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自抗战以后，李劫人就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相互信赖，相濡以

沫地度过了艰难的岁月。1950年3月12日，《川西日报》在《成都文协成立大会小记》一文中盛赞李劫人：“这位少年中国学会的老战士，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先辈，在反动派几十年来的压迫之下，没有放弃过文学岗位。近年来，由于他特别不满美蒋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窒息民族工业和文化诸种罪行，便一步一步地向人民阵营来了。”

1949年社会鼎革，共产党没有忘记李劫人这位有巨大文学成就的老作家，他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更是竭力动员他出来为新政府服务。发誓终身不进官场的李劫人竟在晚年进入了官场，直到去世。

李劫人为官，是他数十年来与共产党人交往的结果。因为他在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了时代前进的力量。

他愿意与他们一道进步。

上甘岭英雄的平凡生活

/傅厚蓉

这篇文章要讲述的，是生活在成华区的一位志愿军战斗英雄尹玉龙的故事。

电影《上甘岭》是几代观众都看过的经典影视作品，人们无不为那惨烈的战争场面震撼，无不为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志愿军战士们的勇敢而自豪。电影中的女卫生员的原型，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之一，他的名字叫尹玉龙。

尹玉龙出生于1935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他还不满16岁，正在四川叙永读初中。当他看到参军动员以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并如愿以偿被录取。不久，尹玉龙就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5师133团1营3连，当了一名卫生员。在接受了简单的医疗护理培训后，他便跟随部队从四川北上，于1951年3月29日晚跨过鸭绿江，随即参加了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尹玉龙是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and 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的战友。在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尹玉龙参加过5次战役、经历了40多次战斗，击毙了38个美国兵；先后从战场上救出了83位负伤的战友，并且从被敌机炸塌的房屋里救出了13位朝鲜老乡。他曾经3次负重伤，他的肩、腰和右腿都中过敌人的枪弹，身上的枪伤造成了他终身的痛

苦。在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中，尹玉龙所在连队 140 多人绝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只有 7 名幸存者，他是其中之一。

战役结束后，尹玉龙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授予上甘岭战役一等功臣称号，还被 15 军党委授予“模范团员”，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和军功章。

尹玉龙在上甘岭经历的惨烈战斗，已经无法详知。但从作家周明生《沉浮东方》里的一段描述，我们可以想象：上甘岭战役双方殊死争夺的 597.9 和 537.7 高地，是战略要地五圣山的前哨阵地，总共只有 3.7 平方公里，却遭到“联合国军”190 余万发炮弹和 5000 余枚炸弹的狂轰滥炸，土石被炸松 1 至 2 米。战前，美军原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 5 天时间，伤亡 200 人的代价拿下上甘岭。然而，战役却从 1952 年 10 月 14 日打到 11 月 25 日，持续了 43 天之久。在这弹丸之地，双方先后投入了近 11 万大军，19 个步兵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投入兵力 6 万人，志愿军投入兵力近 5 万人。整个战役经历了争夺表面阵地、坚持坑道斗争、实施决定性反击等三个阶段，双方在狭窄的山地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拉锯战，其间火力之猛烈，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堪称古今中外战争史罕见。

10 月 29 日深夜，志愿军进行了一次大反攻，浴血奋战了 14 个昼夜的 3 连，拼命往外打。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躲在暗处的敌人一枪打穿了尹玉龙的小腿。战斗结束，他才知道，全连 143 个人最后只剩 7 个人。

战役终于结束，志愿军在枪林弹雨里过了 3 年以后，终于回到祖国。尹玉龙所在的 15 军改为空降兵部队，他被送到武汉高级步兵学校读书，毕业后，任防化连指导员。

1957 年 7 月中旬，尹玉龙所在的部队在山东青岛执行国防施工任务，他和战友们受到了前来视察工地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0 年 10 月 25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0 周年，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和夫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在酒会上，尹玉龙被战友怂

愿向朱德委员长敬酒。朱德乐呵呵地说：“你是个英雄嘛，要继续前进！”随后看见周总理，周总理也说：“我记得你是上甘岭英雄！”

这两次受到领导人的接见，尹玉龙觉得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决心以后要为人民更加认真地工作。

1960年，25岁的尹玉龙回泸州老家探亲。经过熟人介绍，认识了20岁的王慧国，王慧国此时在泸州师范专科学校读二年级。她听说尹玉龙是军官、战斗英雄，还是共产党员，人非常可靠，就答应见上一面，结果两人一见钟情。他们第一次的约会地点是在泸州电影院，当天放的是什么电影，多年后王慧国完全不记得了，因为尹玉龙太吸引人了，人长得高大魁梧、非常帅气，穿着一身戎装，更是英姿挺拔，她的整个心思都在旁边这个人身上了，哪里有心看电影。可是一个月的假期很快过去，两人只接触了两次，就匆匆分别了。但是相互的思念却是很长。尹玉龙回到部队以后，很快给王慧国写来了求爱信，信里的内容热情似火，情真意切，向她说明了对她的喜爱和思念。之后两人鸿雁传书，感情渐浓。

第二年，尹玉龙特意把假期安排在王慧国的暑假里。尹玉龙带着一大包食品——一筒筒军用罐头和他自己熬好的猪油到泸州去见王慧国，当时正是困难年月，很多人都处在饥饿难熬的日子里，尹玉龙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珍贵食品送给王慧国，令王慧国非常感动，心里更加跟尹玉龙贴近了。这个假期，对王慧国来说，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富裕的假期。

尹玉龙虽然初中肄业，但是上过军校，很有生活情调，他们的爱情甜蜜而且浪漫。两人一起看了当时的流行电影《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等。特别是《上甘岭》，每次看到那惨烈的战争场面，尹玉龙就泪流满面，他给王慧国讲他们在战场上的经历，使王慧国对身边的这个男人更加爱慕了。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过得很甜蜜，以后的时光都是书信往来，寄托相互思念。三年后，尹玉龙和王慧国结婚了，开始了一生的厮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尹玉龙在武汉黄陂部队营区附近“支左”。王慧国的娘家土改时有30亩土地，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即使她本人是师范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才生，此时也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的打压，甚至攻击她的大字报都贴到了泸州大街上。王慧国想不通，就写信向军营的丈夫诉苦。尹玉龙就写信安慰鼓励她，却不料攻击王慧国的人不仅私拆了尹玉龙的回信，而且还以组织的名义发函到部队，举报尹玉龙丧失阶级立场。尹玉龙因此被部队关了一个月的禁闭。后来被了解尹玉龙从军经历的军首长发现，他才被放出来。

此事之后，王慧国不再想当教师，想去尹玉龙的部队随军，这一个愿望，直到1970年调动解冻以后，她才如愿以偿，来到离丈夫尹玉龙“支左”的地方最近的一家商店上班。也正因为王慧国的家庭成分问题，尹玉龙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他在武汉空军后勤部某团军需股任股长，这个副营级职务，一直干到转业。

1978年，44岁的尹玉龙从部队转业到省电力局下属的国营豆坝电厂任电厂劳动服务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慧国也跟随他转业到豆坝电厂。豆坝电厂在四川宜宾的大山里，地处金沙江上的老山沟，地方偏僻，医疗条件太差，很不利于满身是伤的尹玉龙治病。每到雨季或者是天气有点不好，尹玉龙身上的伤都非常痛。王慧国心疼丈夫，就斗胆给四川省委副书记黄启瓌写信，希望组织照顾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志愿军英雄。省委领导看到后，才知道还有个宝贝在大山里，就出面给有关部门联系。直到1984年，省电力局才把他调到成都热电厂，这时尹玉龙还不满50岁。到成都热电厂，尹玉龙被任命为子弟校党支部协理员。在子弟校工作期间，尹玉龙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校的职工，一来就开始打扫办公室及其周边环境，考勤、检查早读情况，忙个没完。人们尊称他为“老英雄”，可是除了作传统报告外，他开会都喜欢坐在群众席上，老师们赠给他一个“不管部长”的雅号，但职工之间有意见、教师和家长闹矛盾之类的事情却常常由他出面处理。

老英雄很平易近人、为人谦和，让人感到特别温暖。学校组织教职工郊游，他总要带上一些家乡特产请大家品尝。尹玉龙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单位要给他分配新房子，他却不要，说的是分配给年轻有为的人住吧，尹玉龙的想法是：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比，我已经好了很多很多，有命有家还有孩子，亲眼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茁壮成长和革命建设。

尹玉龙是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先进人物，经常去中小学、大学、部队、工厂、机关作革命传统报告，在北京、南京、武汉、西安、重庆等城市作过多场报告，听众甚多。他总是婉言谢绝主办单位给他的报酬，一再表示自己是尽义务的忠诚的爱国主义宣传员。

1998年长江爆发大洪水，尹玉龙得知他当年所在的武汉空降兵部队正在荆江大堤上防洪抢险时，当即写了一封慰问信，并把当月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400元寄到了部队，让战友们很受感动。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给家乡的希望小学捐款，为灾区人民捐钱捐物。其实，直到2009年，他每月的退休金还不足2000元。

尹玉龙在外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英雄，在家里是一个称职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买菜、做饭、拖地、洗衣等家务事都抢着做。但是年老后尹玉龙的枪伤后遗症经常发作，一发轻则直不起腰，重则卧床不起。他落下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晚年几乎失去记忆。王慧国精心护理他，每天坚持让他服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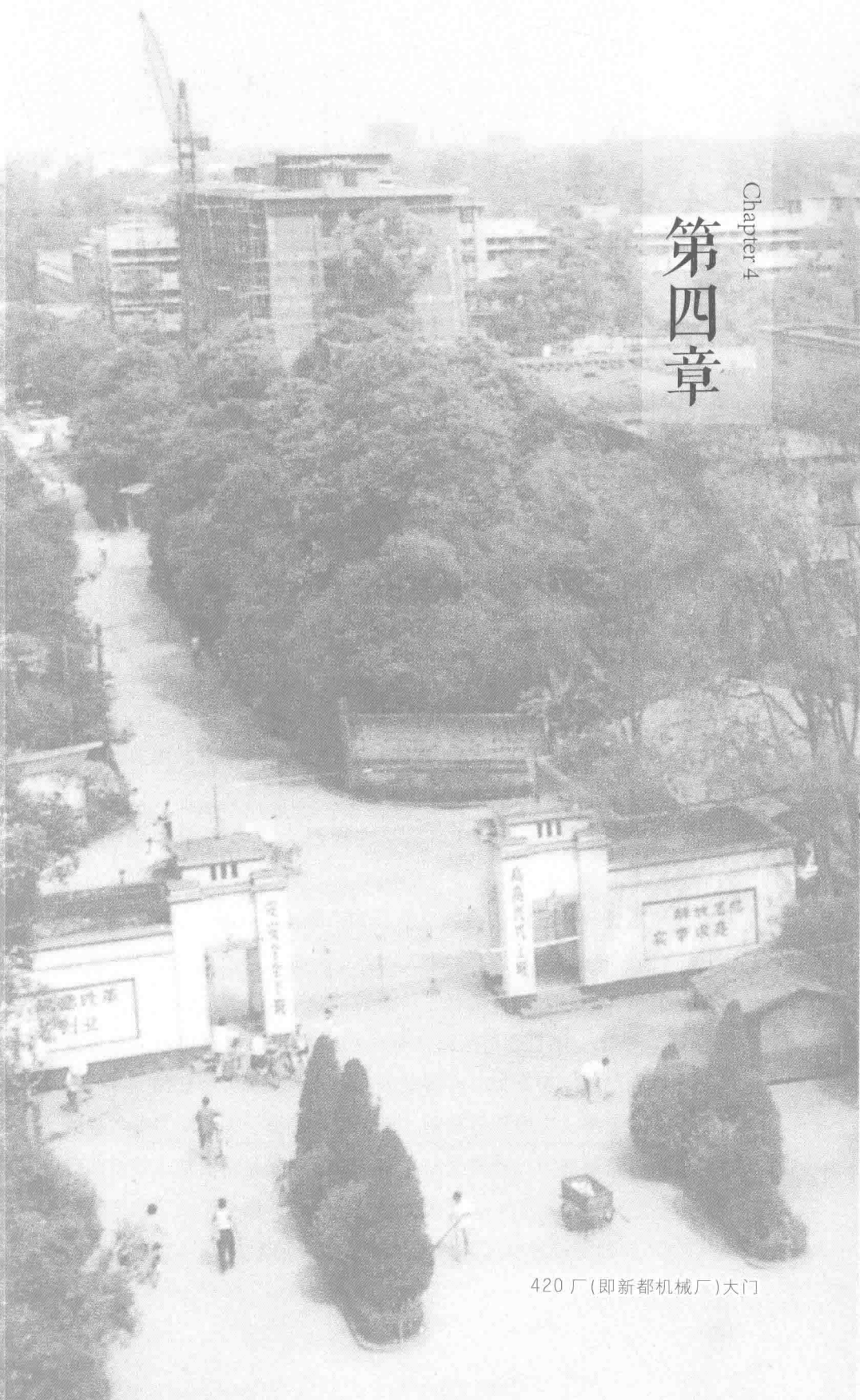
2009年的一天，尹玉龙的心脏病发作，抢救不及，在热电厂职工医院逝世，享年75岁。

尹玉龙在战场上是英雄，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是模范。在工厂工作期间，他先后被评为优秀政工干部、工厂好干部、川南电业管理局宣传积极分子、水电部西南电管局精神文明积极分子、成都热电厂优秀共产党员。退休13年，连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先进党小组长。1989又被电力部评为优秀干部，1995年被评为四川省电力

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几十年来，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给解放军、机关、工矿、学校等单位进行革命传统报告 700 余场，听众达 60 余万人。2004 年 11 月荣获“成都市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称号。2007 年还参加了四川省关工委“五老”宣讲团。尹玉龙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活动家。

Chapter 4

第四章



420 厂(即新都机械厂)大门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东郊工业建设的火红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共织军工梦。青春岁月，马达轰鸣，机床飞旋，满腔激情开启新局。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书写了东郊工业建设的宏伟华章。

420：军工千里大转移

/曹树清

继 1954 年 3 月 31 日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发出第 10 号命令：由老工业基地沈阳的国营第 111 厂负责包建 410 厂之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大型国防工厂要建在内地，以保证安全要求。1958 年 11 月 3 日，航空工业管理局做出决定，仍以 111 厂为主，支援建设中国第二座喷气式歼击机发动机厂——国营 420 厂（原新都机械厂）。

“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

1958 年 10 月，二机部在南昌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口头通知 111 厂负责包建 420 厂。会议结束后，111 厂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绕道成都察看了新厂厂址，了解筹备工作情况，回沈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分厂转移的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根据“成套支援”转厂的方针、原则，多次召开党委会，就支援 420 厂建设的组织领导、分厂原则进行充分酝酿讨论，做出了五规定，确定了 420 厂的党政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崔光炜，副书记仇锦堂，厂长杨诚，总工程师柳毅，副厂长李立德、郭永顺、孙光远等。

按规定，111 厂应向 420 厂输送生产工人（包括辅助工人）、技职

人员、学徒工及生活福利服务人员共 3841 人。各种大型、中型设备及标准机床设备 400 多台，还有各种试验仪器、非标设备、工装检测工具等。要求全部转移人员及设备物资，从 1959 年元月开始，分三批，三个月内完成转移到位。

1958 年 12 月 3 日，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国营 111 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进行了支援新厂和建立试制厂重大意义的教育、动员，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支援内地建设。广大干部和职工通过大会、小会的动员，弄清了支援新厂的重要意义，克服“三怕”（怕吃苦、怕离家远、怕生活不习惯），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庭通、亲友通）。全厂很快出现了积极争交申请报告，志愿到祖国大西南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高潮。此时，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111 厂却一派热火朝天，到处洋溢着“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的豪情壮志。广大职工心中激荡着“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誓言。

然而，毕竟到 420 厂去的职工多数是东北土生土长的，有浓厚的乡土眷恋之情，与不愿随迁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亲朋好友，感情上也一时难以割舍。想着一旦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支援内地，到西南安家，就意味着要在祖国大西南战斗一辈子，乃至繁衍后代……一系列后顾之忧在内迁职工脑海中跳荡，各种思想和情绪在激烈交锋。

家有老人的担心过惯了北方生活，睡惯了北方火炕，到成都后水土不服；有的人固守“破家值万贯”的观念，焦虑用惯了的盆盆罐罐如何带走；孩子们问，滑冰用的耙犁那边能不能用？总之，人们即将远离世居的热土，思绪万千，疑虑重重。但是，这些老兵工们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防事业，最终放弃了个人的利益而服从了国家的大局。

最早行动的木工车间，提出了“迁厂人人总动员，一个不掉走在前，转移生产一起上，建设新厂做贡献”的战斗口号，坚决做到“三

先”，即“先动员、先转移、先投产”。

当时反反复复的思想动员工作，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成员，职工回家积极做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属的工作。木工李呈祥迁往成都时，父母死活不让走，甚至要儿子丢掉工作也不去成都，李呈祥耐心说服父母及家庭成员，按时离沈到岗。还有一位老职工，妻子身体不好，担心到成都后水土不服，不愿走。这位老同志耐心做工作，终于让还生着病的妻子同他一起转移到了成都。李秀智同志转移时已59岁了，转移前他在花园街刚盖了两间房子，家里养了很多猪，并有其他家产，当组织动员时，他二话没说，表示“虽然我快退休了，组织上需要我，我无条件服从，在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的建设多做贡献”。老工人滚烫的心真令人感佩不已。他要求首批到成都，在420厂再立新功，虽然他到岗时年已六旬，仍人老心红，处处起模范作用，不分昼夜、不分工序和年轻人比着干，传为工厂一段佳话。

在高涨的热情下，佟富臣、李秀智、李呈祥、陈国清、刘明亮等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房屋和家具以低价出卖，或送给了亲属，把自己养的猪、鸡、鸭等牲畜全部处理完。刘明亮同志看见转移名单上有他的名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两间住房处理了，向党支部表示：“我房子已经卖了，什么时候叫我走，我马上奔赴内地。”又说，“我不怕成都热，再热没有我心热。”许多职工表示：“我们卖房子不是把心卖散了，而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心更实了。”有的职工说：“我们卖家产，离故乡，参加内地建设是彻底的革命行动！”还有的说：“暂时抛弃小家利益，开赴创业征途，为航空事业奋斗，是无比光荣的。”

111厂广大职工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下，打消了各种顾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纷纷用大字报、小字报和书面申请等形式向党表决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厂很快出现了丈夫说服妻子、妻子动员丈夫、儿女说服老人、老人支持儿女的动人场景。

千里大转移

回忆几十年前的分厂大转移，许多老人一提起便眉飞色舞，心情激荡，自豪不已……

1959年1月9日，国营420厂正式成立并启用印章。与此同时，沈阳111厂在俱乐部召开热烈的欢送会，拉开了转移的序幕。

从东北沈阳搬迁到成都，那么多机床物资、设备器械，那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那么短的时间，那么长的行程，在20世纪50年代交通还很落后的条件下，情况极其复杂，任务非常艰巨。

周密详尽的组织工作在厂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转移指挥部”，李立德任总指挥，李广才、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李负责设备、物资转移；黄负责人员转移）。并从各科、车间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专门机构，实施人员转移的周密措施。

针对小孩上学、临时病号和生产需要暂时留人等情况，党委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成立“留守工作组”，处理部分职工不能如期离沈的遗留问题。留守组工作人员有于长恩、王家凡、朱广义、黄志家等人，由厂工会副主席汪志富负责。当时安排上车订票、物资托运都由张贺春、韩长杰负责。

在成都终点站成立接待安置组。先期到达成都的党委负责同志极其重视这项工作，安排了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先遣人员李学文、李成修、汪波等同志完成社情调查后，按党委要求会同先期到蓉的运输科张凤力、马如林，行政科林均寿，教育科宋爱光，保育科于莲英等组成厂接待工作班子，废寝忘食地迎接安置来蓉职工，工作分外辛苦。

沈阳是转移始发站。当时在指挥部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张连生，负责联系送站订票的是张贺春，因种种原因，经常发生退票改座情况，他都全力以赴满足要求，他还同时负责货运车皮联系工作，忙了这头

忙那头，日夜不停，星期天更忙。在指挥部工作的还有李书奎、詹玉泉、铁坤池、韩长杰等同志，他们在各科室、车间领导支持下组织队伍，办理手续，发放差旅费、订票、送站、收发行李，并负责和北京联络站联系，根据成都传来的住房分配情况安排转移人员，始发站工作繁忙、辛苦，自不待言。

这样，以沈阳指挥部为龙头，成都终点站为龙尾，一前一后，中间设立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接待中转站，环环相扣，规模宏大的分厂转移工作忙而不乱，涌现了许许多多好人好事，他们勇于自我牺牲，夜以继日，辛苦备尝，为工厂前期创业做出了贡献。

从东北沈阳到西南成都，横跨七省市，陆路行程 2889 公里，水路航行 3521.5 公里，加上成渝段行程，共 4422 公里，经过大半国土，分厂转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陆路，从沈阳经北京到郑州，然后经陇海线到宝鸡抵达成都。

第二条路线是水路，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改乘海轮到上海，逆长江而上抵重庆，再改乘火车到成都。

第三条路线是从沈阳乘火车经北京到郑州，从郑州南下到武汉，再乘江轮到重庆，转成渝线到成都。

以上三条通道各有利弊，运行过程中大多采用前两条线路。

人员转移在实际操作中，无论走陆路或水路，都得到了中央、部、省市各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北京联络站的工作量最大，工作很出色。这个联络站以吴增瑞任组长，房学泮、杨景宇、彭国良、姜馨、刘绍舟等先后在联络站工作。他们昼夜接待，安排住宿，办理订票、换乘等手续。夜间便和沈阳、成都联络，对临时发生的变故，如有人生病、家属和小孩走失，铁路塌方引起停运等意外，事无巨细，不分日夜地解决。北京联络站的同志们工作热情很高，有时一天接待几十户家属一百余人，有一次有八十多人到北京换乘，临时找不到交通工具，联络站人员便帮大家背行李，带领老老小小队伍走了十多

里，把他们一直送到住处。

全体联络站人员，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从接待安置到吃住供应，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不等不靠不埋怨，积极主动满足中转职工要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他们自己的家属却时常不得不托付别人照顾，或让其自行随队伍到成都。

对北京联络站的工作，厂党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为便利周转，银行开了专户，厂领导每次到北京，都要到联络站看望工作人员。已故厂长杨诚有一次到北京，在部队拿到几张剧票，自己不看，派人送给联络站同志看。有一次，24户家属80多人到达北京，他们考虑招待所离火车站有7.5公里路程，又有老人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和步行都有困难，便到四局请求派客车支援，因缺少司机，王局长便步行上班，要司机早上8时准时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人，大家才安全及时被送到招待所。

种种转移中的轶事，难以尽书。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59年1月，成都新厂急需生产准备人员到岗，刻不容缓。111厂党委便立即着手实施转移计划。首批转移人员（工具及毛料系统人员）500多人由沈出发前，忽然传来宝成线塌方的消息，转移受阻。而当时家家户户连锅盆碗盏都已装箱托运走了，怎么办？面对新情况，党委当机立断，指示指挥部“旱路不通走水路”。

于是，立即派人赴大连，在有关单位领导支持下，顺利包租了一艘海轮，全船员工在船长、政委带领下，对住处、伙食都做了专门安排。船上设施好，有大餐厅、休息厅，还可以看电影，大家情绪很高。谁知船一驶离港口，不久就见风浪，宽阔无垠的大海鼓动着胸脯，欢腾的波浪蒙着白雾，在向所有第一次坐海船的人们问好！

经过三摇两晃，船上的人们晕的晕、躺的躺、吐的吐，孩子们叽

叽喳喳，大人自顾不暇，既新鲜，又难受，到后来竟然晃得鱼肉无味，平时喜爱的白米饭端起又放下，这可难坏了总领队徐立祥、谭振庆和随队医生，更忙坏了船长、政委和船员。

关于这次转移，马桂群同志写了一篇回忆，记录了他的随队经历，让我们一同去追思一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情景吧：

得到宝成线塌方的消息，我们工具系统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到达指定岗位，组织上决定我们由水路入川，发给每人路途生活补助费，其他费用全由组织包干。1月19日下午4点过，转移人员全部登上了海轮“民主十二号”，一切都让人感到新鲜，加上船上供应特别好，沈阳大连的糕点都是粗粮细作，而船上食品都是细粮，大家争相购买，广播里不断发出“保证供应，请大家不要拥挤”的声音。

晚上八九点钟，起锚开航。漫长的海上航行开始了，初时大家有说有笑，多数人没坐过船，海风一吹，船又颠簸摇晃，人都好像飘起来了，不少人呕吐起来，有的吐入痰盂中，来不及的便吐在甲板上了。呕吐好像还会传染，有的人见别人在吐，自己也禁不住“哇”了起来。住通舱的尽量缩小自己的地盘，生怕弄脏别人的东西。由于行程中大家既困又乏，一时疏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心成同志才几个月大的小孩睡梦中被压死。大家都很悲痛，在船上召开了临时支委会进行妥善处理，要求大家以此为戒，相互关照，注意途中安全。

第二天黎明，船仍在大海中航行，湛蓝的海水一望无边，浩瀚的天空连着海水，海轮像大海中一片漂浮的树叶，在鼓浪的海上一会儿落入低谷，一会儿浮出海面。

21日晚，“民主十二号”抵达上海，两天两夜航行中，我们得到船上员工无微不至的关照。8点左右，我们从吴淞口上岸，只见两岸灯光通明，船只如织，波光粼粼，下船时人声鼎沸，码

头的夜景使人难忘。上海接待站的张连康、林渭海等同志早已在码头迎接，从物资供应到人员休息均已安排停当。记得码头上供应了大量的糕点，大家对面包最感兴趣，多的有人买了几十个。

尽管不少人下决心不坐船了，但他们未曾料到，“才下海船，又登江轮”，他们又将逆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直奔重庆，开始新的江上航行。

船至南京，停靠码头两个多小时，大家纷纷上岸观览古城风貌，马路上全是我们的人，好不热闹。1月24日晨8时，船抵武汉，忽使人想起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暗思幸好没有安排我们上岸观赏名胜古迹，不然定会惹出许多乡愁来。

经过数天数夜航行，记不清是30号还是31号，工具系统首批转移职工及其家属580名人员终于抵达重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那天中午，工具科科长邹化教、厂接待组李学文、林继振从成都远道赶来迎接，他乡相见，无比亲切。大队人马下船后稍事休息，便集体步行到重庆火车站，进入事先联系好的三节车厢。次日我们到达“八千里路”西进的终点站——心中向往已久的成都。美丽的蓉城张开双臂，欢迎远方建设者的到来。

65 年的光荣与梦想

/曾灵 阎筱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1952 年，毛泽东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路线，“一化”即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党中央决定把重工业建设作为重点，制定了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发展战略。工业化的推进，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是“以迅速地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为主”。随着 1956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一五”计划的即将收官，在工业化的推进进程中，对能源资源矿产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专门的地质勘探院校提上日程。

1956 年，在李四光、何长工等部委领导的推动下，（主要为了研究西南复杂地形的）全国第三所地质院校开始筹建，这就是如今成都理工大学的前身——成都地质勘探学院。

紧。建设紧，招生紧。用“紧”来形容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建校之初，再贴切不过。1956 年秋，来自西南、华中、华东等地的 1551 名学生来到成都。少年意气风发，等待着他们的是再难重复的历史——他们将在这里求学，也将在这里建校；既是亲历，也是亲力，更是倾力。

1956 年 10 月 15 日，成都地质勘探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著名地质

学家、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发来贺电：“祝你们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体魄健全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先进地质科学素养的地质人才，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泰斗的殷殷期盼，溢于言表。

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师生并没有辜负李四光的期望。

据首批学生易惠芳回忆，当时许多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即使院党委副书记周道也不例外。学生宿舍由木质地板铺设而成，容易漏水。易惠芳用水拖洗地板，住在一楼的周道家就遭了殃，直到周道爱人找上门来提醒，易惠芳才知道原来楼下住的居然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想起当年的事，易惠芳有些忍俊不禁。

在艰苦的工作学习之余，师生总会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学校基本建设、绿化劳动；校园内随处可见不声不响修桥补路的人。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下了一个断言：“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那时，为这个目标干事创业的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师生，正日夜在劳动中健全体魄，在建设学校中培养思想觉悟，在学习中锻炼地质科学素养，在科学探索中贡献专业力量。

在国家迫切的工业化建设要求之下，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在建校之初专业设置指向明确，三个系四个专业——地质测量与找矿系（下设地质测量及找矿、金属与非金属地质及勘探两个专业）、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设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及勘探系（设石油与天然气地质与勘探专业），几乎所有专业都围绕着一个词——找矿。

^① 毛胜：《毛泽东论新中国制度建设》，《学习时报》，2019年12月9日。

与其他西南地区专业的探矿机构不同，成都地质勘探学院不只要在探矿方面的科学研究做出成果，更要为时代与社会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地质勘探人才。

基于建校目的与专业需求，在 1956 年 10 月开学前，一大批怀揣着地质理想与育人热情的教师从全国各地来到十里店，为成都地质勘探学院的地质科研与教育事业开创基业。

调任的教师队伍以重庆大学地质系全体成员为主，辅以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铁路、部队等十几个单位调来的老师。在这批教师中，不仅有大批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青年教师，还有一批为“开发矿业”做过贡献的老教授和骨干，堪称“梦之队”。

李承三是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和冰川地貌学大师；被誉为“攀钢之父”的常隆庆发现了世界著名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和宝鼎煤矿；师承李四光先生的刘祖彝，是我国“宁乡式铁矿”发现者……他们既是地质工作者的先驱，又都为地质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多年以后，理工大学的教师们谈论起这些开校元勋，还常常说“大理工血统高贵”。特别是从那时生成的“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奋进精神，多年以后依然作为理工精神激励着代代学子。

1959 年的冬末，一行人穿梭在山野之间，时不时停下俯身对路边岩石进行观察，在手中册上勾画并配文字加以描述。这是成都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勘探学院 1958 年更名为成都地质学院）的考察队，由院内的学生与教师组成，领队的就是时任学院教务长、教授的著名地质学家李承三。正因这次勘查，李承三与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同为学院教授的常隆庆共同主持编制了四川第一幅 1:100 万的大地构造图，详细划分厘定了四川地区的大地构造单元，为接下来的四川大地构造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我国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先驱，1960 年 3 月，李承三受李四光邀请前往北京，在由国家科委地质矿产组领导的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上，李承三被委任为西南区负责人。

时年夏季，李承三就带领吴燕生、李永昭、卢登仕三位教师，对四川龙门山南段东坡及山前带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科考工作，一考察就是3个月。而在这样大范围高强度的科考工作下，李承三“所到之处、视区所及”，都留下了精心绘制的冰川遗迹地质素描图，共计近百幅。段万倜形容其“整个第四纪时期的时空变化都跃然纸上”。^①

这次科考直接推动了李承三关于我国西部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也给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是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史上的新进展。

“攀钢之父”常隆庆作为在中国地质和四川矿产地质等领域做出大量开创性研究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在成都地质勘探学院任职教授后，一直潜心于地质教育事业，在教学一线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中国地质”“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等多门专业课程，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地质学》中专教材；在金属矿床学方面造诣颇深的李唐泌教授，由他编写的《矿床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国内地质院校的基本教材；西南地区地质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刘祖彝在献身金矿勘查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之中，先后编写《普通地质学》《煤矿地质学》等作为学生讲义，其1962年撰写的《西南区金矿》，详细分析了西南地区的金矿工业类型、成矿规律及成矿控制因素和矿床富集规律并指出了找矿方向，兼具理论和实际意义。

在学校运行的第九年，作为调任成都的带队老师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的金景福教授率队“南下”来到成都地质学院，出任成都地质学院“三系”系主任。

“三系”是一个很特别的系。1956年，金景福研究生毕业时，正值我国启动原子能计划研制原子弹之时，国家为了尽快培养出一批铀矿资源探采的技术人才，以最快的速度探明我国的铀矿资源，确保原

① 段万倜：《缅怀李承三先生对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的贡献》，《成都理工学院学报》，1998年4月。

子弹研制的需要，决定在原北京地质学院组建放射性物探系，为了对外保密，取名为“三系”。金景福留校，成为“三系”的“开创者”之一，同年出任第三教研室主任、讲师。^①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金景福针对我国铀矿床成矿理论、成矿规律、成矿预测、找矿勘探方面的若干问题展开科学研究，并取得大量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和理论已成为铀矿研究领域的经典，而他本人也是放射性矿床地质勘探的专家。他奔走于各个矿山之间，为许多矿区找出了“怪病”的症结所在，甚至使濒临死亡的矿区复生。

值得一提的是，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在中南海接见了相关的科技骨干，金景福教授作为“三系”的代表受到接见。

作为我国放射性矿床地质勘探专业及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的重要创始人，金景福为该学科专业的发展树起了第一块丰碑，直至在全国率先建立硕士点、博士点。

在科学研究之余，他还经常应邀赴铀矿山、铀矿地质队、铀矿工程兵部队讲学，现场解决生产实际中遇到的科学技术问题，深受同行敬重。为了唤醒沉睡于我国中生代陆相盆地达 1 亿年的铀矿藏，金景福迈开双脚，匆匆疾行，往来于华夏大地的万水千山。全国除台湾和西藏以外，凡是重要的产铀矿区，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留下了他坚实的脚印。

1998 年，金景福由于成果卓著，荣获我国地学界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进入“七五”计划（1986—1990），受到改革开放、产业结构调

^① 王伍良：《我校原“三系”系主任金景福教授荣登“中国铀业功勋榜”》，成都理工大学新闻网，2021 年 4 月 29 日。

整的影响，能源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国家计委能源局发布的《“七五”的能源形势》指出，“要加强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同时也要“加强天然气（包括煤成气）的科研和地质勘探工作，寻求其形成的机理和分布、运移的规律，增加其地质储量”。

油气资源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发展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成都地质学院紧跟国家发展需求步伐，在油气学科建设上为人先而行。

成都地质勘探学院成立不久，1958年，历任重庆大学副教授、采矿系主任，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探矿系副主任的罗蛰潭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这里任教，成为理工大学的专业奠基人之一。

入校初始，正值大庆油田开发初期，罗蛰潭就和学院老师用注水开发的思路，解决了大庆油田的稳产高产问题，在提高油田产量的同时也提高了采收率；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克拉玛依油田稠油开发难度大、采收率低的问题，罗蛰潭研究提出了火烧油层以提高地层温度降低稠油黏度强化开采的思路，开创了我国稠油火驱强化开采之路；70年代末，他探索从微观研究油层的物理性质，开创了油层物理研究方向，开始油藏异常高压研究，提出了用异常高压预测油气分布的研究思路。

多年以后，罗蛰潭的女儿罗润田也在理工大学退休，她回忆起父亲在克拉玛依油田时，他的父亲罗筱元病危，向来孝顺的父亲却无法赶回。罗润田理解父亲的风骨和初心，“他坚守着一名科研人员的职责与使命”。

而作为学院教授与领导，罗蛰潭更是为学院发展鞠躬尽瘁。1989年，成都地质学院与西南石油学院联合申请“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的关键时刻，罗蛰潭教授一行深夜驱车，在赴南充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他和同事强忍着巨大的伤痛坚持工作直到申报书完成，为学校 and 西南石油学院争得“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出了大力。成都理工大学最终成为当时拥有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少数部属高校之一。

如今，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仍是理工大学的金字招牌之一。在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曾任成都地质学院院长的张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成都理工大学制定了要让“石油地质”和“工程地质”两个学科评上重点学科的目标。这为理工大学作为一所省部级高校，日后却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这个目标，大家下足了功夫。重点学科评审第二轮要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来认定。那时张倬元胆囊出了些问题，刚做完手术。评议组体恤张倬元身体状况，加之成都理工大学在第一轮全国专家函评名次中也位列前茅，建议张倬元不用亲自到场。但张倬元作为地质采矿石油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坚持这种事必须参与，最后是带着吊瓶，被人抬上飞机去参加会议的。当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以高分通过后，他才放心地回到学校。

1988 年退休后，张倬元继续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就是理工大学第二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经过申请报表、答辩、验收，终于在 2010 年 12 月通过科技部验收。在当时，一个非“211”“985”大学同时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少见。发展至今，事实也证明张倬元当年的远见与卓识。

1992 年，由张倬元、孔德坊、王士天参与的“高坝坝基岩稳定性评价及可利用岩体质量的研究”作为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荣获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成都地质学院第一次获此殊荣。2005 年，张倬元的学生，现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担任第一负责人的项目“中国西南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斩获了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成都理工学院收获的第一个独立完成的一等奖项目。

1993 年，成都地质学院更名为“成都理工学院”，基于“八五”

攻关计划中，能源结构调整与促进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发展的要求，开展了一系列油气与有色金属勘探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有效地指导了四川盆地天然气的勘查与开发，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油气勘探开发研究中形成的“排水找气”，被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列为“八五”期间重大进展之一，直接经济效益可达亿元以上；先后完成了20项与固体矿产勘查有关的科研项目，从中收获了一系列新发展、新认识。

进入新世纪，2001年成都理工学院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理工大在地质矿藏勘探方面持续发力。

从2005年到2019年（即“十五”计划到“十三五”计划），以黄润秋为代表的理工科研人，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秉承“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理工精神，在科研之路上勇攀高峰：2005年，黄润秋带领团队独立完成“中国西南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荣获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十年磨一剑，2014年，黄润秋、张倬元、王士天等又凭“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评价与防治”（独立完成）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十年捧回两项大奖，黄润秋、许强、范宣梅等新生代地质人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完成时代与国家发展带来的光荣与使命。

2011年，“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总项目荣获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该项目攻克了国际地学界关注的青藏高原地质演化与成矿过程等众多难题，对完善国家矿产资源战略格局有着重大意义。

该项目时间跨度之长，让成都理工大学资源勘查工程系教授郎兴海记忆犹新。2003年，还是学生的郎兴海跟随总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唐菊兰来到位于西藏腹部冈底斯成矿带的雄村，在这里，他们发现了金铜矿存在的可能性，并在西藏天圆矿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下进行勘探。

从 2005 年 2 月勘探钻孔开始，到 2006 年 8 月分析出雄村铜金矿床的地质特征，18 个月，3.2 万公里有余的覆盖直径，108 个钻探，13618.03 米的钻孔深度，换来了我国最大的岛弧型斑岩铜金矿床的探明：这不仅揭示了岛弧型斑岩铜金矿床的成矿机制，创新了区域成矿理论，更开拓了区域找矿新思路和新方向。同时，在矿产外先前圈定的 5 个找矿靶区内，两大三小铜金矿床又相继被发现。最终累计探获铜 336 万吨、金 406 吨和银 1385 吨，预计潜在经济价值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

如此的勘探成果为藏中地区国家级铜铅锌钼铁资源接替基地建设奠定了重要资源保障，直接服务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也对西藏自治区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个获得阶段性成果的科研项目背后总是有无数的科研人为之竭尽心血。当年该总项目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殊荣之后，国土资源部于次年又进一步表彰了做出贡献的优秀个人。在基础理论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成都理工大学伊海生教授、刘登忠教授等人也在其中。

以“藏北狼”伊海生教授为代表的成理团队，是成都理工大学在藏北地区石油勘探的活招牌。2016 年，伊海生团队受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中心委托，开展了对伦坡拉盆地附近尼玛盆地的石油地质调查任务。路边的一块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伊海生在这块石头上发现了油气显示。于是团队以这一地点的油气层为端点，向东连续追踪，发现在赛布错盆地，地面见有长度 55 公里的油气显示带，这是西藏高原继伦坡拉盆地之后发现的另外一个具有重要勘探潜力的含油气盆地，在雪域高原之上找到了“消失的油田”，破解了 20 年找油疑团。

伊海生介绍，西藏找油的定位是国家油气的战略储备，是“摸清家底”，助力国家长远的油气资源计划，这就是他们扎根藏北的使命。

研究一直在持续。以侯明才为代表的教授团队，依托成理承担的中海油重大攻关项目“渤海海域潜山石油地质特征、典型油气藏成藏机理与有利勘探区带预测”等多个大型课题，促进了渤海油田渤中

19-6 大型凝析气田的成功发现，并有力支撑了渤海湾盆地深层大型凝析气田勘探理论的形成。气田发现的意义重大，当即就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列为天然气保供重大项目，并于当年获得国务院授予的 2019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成都理工大学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取得的勘探成绩之一。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成都理工大学走过的第 65 个年头。从“一五”计划收官建校到如今“十四五”规划大幕初启；从初始在工业化浪潮下探明急需矿产资源任务，到现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可持续能源的目标；从扎实夯实西南地质地形理论基础，到现今领跑探矿研究理论与技术……65 年的探路潜行，成都理工大学的勘探史就像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侧写，写下了初心和使命，写下了发展和进步，写下了光荣与梦想。写不尽的，是前人在十里店的艰苦创业、先辈在山野间的研究开拓，只待今人与后辈续写研学传奇。

“火炬号”，中国第一辆双层公共汽车

/张建军

成都城市公交史上第一辆双层公共汽车名叫“火炬号”，它不仅
是成都制造的第一辆双层公共汽车，也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辆双层公共
汽车。制造时间是 1958 年，制造厂家便是位于成华区二号桥猛追湾
的成都市交通局汽车修理厂。一年前，这个厂还在外西花牌坊，属成
都市公用局的汽车修理厂，因市政府机构职能调整，把该厂划归成都
市交通局。当时全国众多大城市纷纷派员来学习交流。

1958 年初，国内的一本《汽车和公路》杂志介绍了国外双层公共
汽车，就是这本杂志，点燃了成都市公用局汽车修理厂造双层公共汽
车的梦想。几个月后，该厂划归成都市交通局，厂名和领导机关变更
了，但厂里职工们制造双层公共汽车的梦想却一点都没变。

1958 年 9 月，成都市交通局同意组建制造双层公共汽车的专门队
伍，任命该局技术员付定忠为现场指挥，汽修厂技术员李坤为技术组
组长，组建了双层公共汽车设计制造小组。付定忠、李坤等人首先选
定双层公共汽车的底盘基架，一辆自编号 703 的 T-234 大道奇公共汽
车被选入。双层公共汽车制造时选用了大量 5 号槽钢，并反扣于汽车
底盘架，以支撑车厢，上层车厢第一立柱与下层车厢第二立柱相互连
接，使上层略后缩部分，其外形设计酷似航天飞机头部，极具超前设

计感。该车下层内高 1.65 米，设计座位 30 个，上层内高 1.55 米，设计座位 40 个，总载客量为 90 人。当这辆双层公共汽车驶出车间时，时任成都市交通局局长的曹惠文欣然为其题写了车名——“火炬号”。

“火炬号”的牌照号为 7 * 10396，自编号为 703，投入线路营运后，立刻引爆蓉城，市民们纷纷为其取名，有的叫“洋楼公共汽车”，有的叫“会飞的洋房子”等，并争相乘坐，居高临下，观赏市景。由于双层公共汽车车体自重大，市民乘车观光人数甚多且无法有效控制，“火炬号”运行 1 个月便出现左右横梁下弯，车厢下沉，悬挂部件变形，转向机械操作沉重的情况，回厂整修已势在必行。

“火炬号”的整修工程分三项进行：一是改进车架欠合理的结构，矫正和更换变形部件，并在车架横梁下部加铸三角形钢构材料，以解决上体车厢的下沉；二是将上层车厢横钢梁校直，改原来的反扣安装为竖直立形安装，并创造性地在槽钢内镶嵌经盐水煮制的青冈木，大幅度增加横梁的强度和韧性；三是在车辆底盘悬挂部分增加弹簧钢板数量，转向系统重新维修和调制。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整车重新喷漆上光，面容一新的“火炬号”就这样重新出现于蓉城街头。

其后，一本成都公共汽车公司的内刊记录了技术组组长李坤的一段回忆：“当时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白天黑夜连轴转，既没有奖金也没有加班费，但同志们热情高、干劲足，常常加夜班，肚子饿了，自己掏钱买几块豆腐干、几粒花生米，喝二两老白干，啃一个干馒头充饥，稍稍休息又继续工作。然而，谁也没有怨言，大家是一心扑在这辆双层公共汽车上。”

李坤一席话，说出的是成都人的一种精神，一种敢于创新、善于创造的精神。后来，成都没有再制造第二辆“火炬号”，不是车辆制造技术问题，而是成都的老街道限制了双层公共汽车的高大车体，运行中时有安全隐患。

1994 年 12 月 28 日，时隔 35 年之后，成都将再次制造双层公共

汽车。这天有个三方签字协议生效，协议方分别是成都客车厂、香港新美景工程有限公司和成都公交总公司。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四川省汽车工业办公室、成都市政府办公厅、成都市建委、成都市公用局等。根据协议，三方共投资 50 万美元，引进先进技术，在成都客车厂制造“成都牌”双层公共汽车。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曾经位于二号桥猛追湾的成都市交通局汽修厂，早已是一家年产客车数千辆的知名企业，并于 1994 年迁址崔家店路 17 号，更名为成都客车厂。

1995 年，从成都客车厂大门出来的“成都牌”双层公共汽车不负众望，一辆接一辆出现于成都的大街，高大的车体以及远远就能望见的车身广告，呈现着成都公共汽车的繁荣景象。

2005 年 9 月，成都客车厂改制为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牌改名为“蜀都”牌，又制造了中国第一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控 CNG 双层敞篷观光型公共汽车。该车型为 CDK6110CASG，装载后置上柴 SC6114 压缩天然气发动机，装配 CNG 气瓶，车身总长 11.10 米，总宽 2.55 米，总高 3.83 米，红色与黄色相间涂装，并迅速成为城市公交、旅游行业的首选用车。

2006 年 9 月，成都公交集团为配合成都市创建全国最佳旅游城市，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形象，及时拟定出开行旅游观光线路运营方案，采购了该款车 5 辆，开行了成都市第一条 901 路双层敞篷车观光专线，该线更是成为中国第一条绿色观光旅游线路。线路正式开行于 2006 年 11 月 8 日，起讫点由新南门旅游集散中心至金沙遗址，途经春熙路、盐市口、武侯祠、通惠门、青羊宫、送仙桥、杜甫草堂等站点。当天上午 10 时 37 分开线仪式后，发出了第一班车，两名讲解员即时为游客介绍沿途风景名胜、历史掌故、民风民情等，让乘客在乘车观光的过程中，以全新视觉感悟着成都这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的独特魅力。901 路双层敞篷车旅游专线的开行，除了迅速兴奋着外地和外国旅客，更兴奋了成都本地的婚庆市场，约租敞篷双层车做婚

庆彩车成为时尚。

2006年9月，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又推出搭载上柴压缩天然气发动机的CDK6110CAS双层客车，以及CDK6116SCA1S双层观光客车，装配液化天然气LNG气瓶，该两款车均属“蜀都”品牌双层C系客车，试验样车有4辆，依据《实施汽车强制性项目检验和定型试验规程的规范性要求》、QC/T257-1998《压缩天然气汽车定型试验规程》、GB/T13043-91《客车定型试验规程》的规定，进行主要技术参数测量、基本性能试验、安全环保检测及常规路可靠性行驶试验。两辆样车装载CA6SF2-23N天然气发动机，可靠性行驶里程1.45万公里，其中山路4500公里，坏路3500公里，高速路4000公里，一般公路2500公里。两辆样车装载T6114ZLQ3B天然气发动机，不换发动机跑1.2万公里，其中山路4500公里，坏路3500公里，高速路4000公里。由此可见，该系客车的安全可靠性。

2018年，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再次发力，研发推出了“蜀都”CDK6110CSBEV低入口纯电动双层客车，车身总长10.80米，总宽2.55米，总高4.18米，设计载客86人，车身为全承载式高强度钢管骨架，底盘为空气悬架，整车阴极电泳图。

该车具有三个特殊性：一是为成都第一辆纯电动双层观光客车，装载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模式为慢充快补。二是独特的熊猫造型，具有城市观光车型的差异化设计，并取得了5个专利授权，即：熊猫和古典造型的外观专利，全景透明顶棚发明专利，双通道侧置式空调通道发明专利，整体式乘客服务设施箱体实用新型专利，车内照明及装饰用长条形灯具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三是智能化车辆研发最为集中：有驱动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CAN总线、松芝冷暖点空调、全液晶数字显示屏、前风窗电动除霜、电除霜倒车镜、低速低压报警系统、乘客门未关闭限制起步、电控破玻器、视屏监控、行驶记录仪、车载视听，以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车道偏离预警、车距检测、正面碰撞预警等功能；还有服务智能化的360度全景环视系统等设备设

施，座椅前方设置平板电脑带耳机，平板电脑中存放旅游线路信息、解说导览、相关旅游、休闲娱乐视频音频等；该车还具有智能程度化高的特点，以及配有后台实时监控系统的调度、管理、数据分析能力；手机 APP、定制公交等功能特点。它迅速成为公共交通、观光旅游行业的首选用车。

公司董事长王荣坤在接受采访时说，成华区是我公司的福地，近 20 年来，我司与时俱进共研发客车 30 余款，制造客车近 3 万辆，“蜀都”牌客车在印度及海南三亚经历了严酷的高温考验，在俄罗斯及新疆经历了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验证；既能在平原上飞奔，也能在坡度为 45 度的山路上行驶，还能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上驰骋；既能在城市道路上运行，也能在乡村道路上行进，“蜀都”牌客车能全天候、广地域内使用。“蜀都”客车品牌质量和知名度在建设部系统位于全国第四名。仅在 2002 至 2006 年，成都公交线路购车就超过 1 万辆，其余远销全国各地，还有部分客车出口到欧洲、南美洲、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国外市场。公司还先后获得国家、省、市产品或企业奖杯奖状 160 件，先后获得四川省著名商标、大中型工业企业 500 强、四川省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四川省百强企业、四川名牌产品称号，并获增程式电混合动力城市客车科技进步奖。

成华区是双层公共汽车“火炬号”的摇篮，更是成都公交车的福地。

成都东站进行曲^①

/刘宝库

一次改名，一度易址，在 70 年岁月流逝中，有近 15 万公里运营线路和 6000 多个客货运火车站的中国铁路上，尤其是特等客运站，经过这样重大变化，依然没有改变其枢纽性质和在全国铁路中重要地位的车站，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一定是少之又少。这个火车站就是成都东站。

这个站名，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如同气势恢宏的交响乐曲谱总名目，琴弦般的钢轨，夜以继日地按照曲谱奏响一曲曲雄壮的铁路发展乐章。

1952 年 7 月 1 日，位于成都市八里庄成都站货运室和运转室的铁道线路上，行驶了第一列货物列车。蒸汽机车鸣响高亢有力振奋人心的汽笛，尖利的汽笛声在深邃的历史天空中回荡，到 1961 年 4 月 1 日戛然定格。就在这一天，《全国铁路营业站示意图》上，出现一个新的站名：成都东站。它昂首阔步挺进全国铁路站段序列，成为西南地区重要货运站和编组站。

然而，在 2007 年 4 月 18 日这天，随成都北编组站正式开通，老

① 参考文献：《成都铁路局运输技术资料》（内部资料）。

成都东站终于成为市民心中一个时代的记忆！

记忆可以接续，也可以更为辉煌！

沙河堡崛起新东站

翻开 20 世纪 80 年代的成都市区地图，可以看见一条铁路从成都站延伸出来，经过老成都东站后，与老成渝铁路分开，掉头南下，直至成都南站，呈半圆状将成都市区包围起来，中间有一个四等小站——沙河堡火车站。这个小站自 1960 年开业以来，仅办理列车通过、交会、避让及少量客货运业务。

这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小站，一块沉寂太久的土地。

2008 年 12 月 29 日，沙河堡火车站沸腾了，彩旗飘飘，气氛热烈，群情振奋。这里即将举行成都东客站建设开工奠基典礼，人们都在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刻。那天天气格外冷，善于抢占最佳拍照位置的各路媒体记者，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露天多待一会儿，都会冻得瑟瑟发抖。

就在铲下第一锹奠基土时，现场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就从这一刻起，成都市、四川省，乃至整个大西南的铁路交通版图都将因成都东客站的重现并崛起，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如果以 1961 年作为成都东站分离成都站的历史节点，到成都东客站新建崛起，历史的列车刚刚运行 50 年。猛然一看，令人产生又回到原点的感觉。然而，此站非彼站，与已经消失的那个成都东站不但隶属关系不同，更是同名不同质，既不编解货物列车，也不开展货运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日常旅客运输，以动车始发到达为主，兼有少量普速列车。日常旅客运输硬、软件在整个西南，当时绝对是最为现代化的，可以说是集当时铁路科技之大成。

成都东客站占地面积 86.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

站场规模为14台26线，设计高峰小时旅客发送量为2.4万人次。是中国主要铁路枢纽之一，是中西部最大的铁路客运站之一，是集铁路、轨道、客运、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上下车旅客不用出站即可完成火车、地铁、公交相互间的换乘。

成都东客站客运车间主任王容是第一批进入成都东客站的工作人员，据她回忆，东站刚落成时，站房各种建筑和装饰材料还散发着浓烈气味，车站四周虽偶有高大楼房在建，但少有行人车辆，也没有什么商家，就连吃饭都成问题。

“都市荒岛！我望着高大雄伟的站房，再看看周围的荒凉，脑海突然涌现这样一个词。”她笑着说。

无论在大都市，还是铁路沿线，凡是新开站，条件都是比较差的，首批进入的铁路职工就是拓荒者。在这座即将开门迎客的现代化火车站里，任何一点细微之处都容不得马虎，就连标识标牌的完善，哪个位置最为醒目，都要充分考虑到。

运转信号楼和综合控制室是整个日常运输生产最为要害之处，但也是当时环境最为恶劣之处。因为它们都设置在楼层间的夹层，相对密闭，空气流通不畅，加之各种建筑和内饰材料气味还未挥发干净，在里面待上一天确实够受的。

“一天下来，被熏得头昏脑涨，脑瓜仁都疼！那些日子，尽吃泡面，把几辈子的泡面都吃完了。现在只要闻到泡面味道，就要打嗝！”王容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还在一个劲儿地甩脑袋，似乎到现在头还在疼。

她抬起头来，凝望着不远处矗立在蓝天白云下的九天楼；而成都东客站则用另一种方式回望历史。

三星堆，古蜀文明遗迹，有着许多未解之谜，吸引无数的历史学家纷至沓来，进行探索，也让无数的中外游客蜂拥而至，领略中华古蜀文明的风采。

成都东客站的站房建筑设计，充分吸收了三星堆文明元素，沉稳

大气，尤其是站房四角仿青铜面具巨大夸张变形的眼睛，似乎要穿透历史烟云，凝视东西广场旅客来去匆匆。让人越是走近，越能感受到那样的古朴厚重，越能感受到古文明的魅力。

三星堆文明之谜未解，中国铁路正在这里创造新的历史！

行文至此，忽闻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火爆出圈，惊艳世界！

站房青铜面具眼睛似受到这个消息鼓舞，显得更为深邃灵动，更加深情地看着不远处的九天楼。

这是历史的对视。

凤舞九天通四方

2011年5月8日，无论对于成都东客站，还是中国铁路，抑或是成都市和四川省，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成都东客站投入运营，开始发挥西南铁路旅客运输枢纽作用。

只要打开成都局集团公司铁路示意图，就会发现，西南两省一市的铁路像只凤凰，正欲振翅北飞。成都东站恰似这只凤凰的头部，而一条条铁路线，如同展开的长长绚丽尾羽，朝各方飘逸辐射。北接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西成高速铁路；南接成渝高速铁路、成贵铁路。成都东站主要办理北京、上海、武汉、兰州、西安、重庆、贵阳、昆明等方向、成绵乐城际动车始发终到以及成都环线、南北、东南动车通过业务。

这是真正的凤舞九天。从成都东客站出发，1小时可到重庆，2小时可到贵阳，4小时可到兰州、西安，6小时可到广州、北京，8小时可到上海、沈阳，形成成都至中东部地区的8小时交通圈。成都东客站的建成提升了成都铁路枢纽在中国铁路网中的地位，使四川铁路更加深入地融入国家快速铁路网，对于四川省加快建成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7年4月25日至28日，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提出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这个时间节点距成都东客站开通运营已经过去了6年。

对于经济形势发展的预判和未来发展战略，各级规划者的目光往往是惊人地一致。铁路战略布局提前实施和成都东站的开通投入运营，与成都市发展战略规划不谋而合。

“东进”战略付诸实施，节奏之快，令人咋舌。截至2019年，“东进”区域开工和储备的重大项目已近500个，目前仍在扩大和加速。成都东客站以它优越的地理位置、现代化的设施、强大的旅客运输能力，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

开通初期，成都东客站每日开行列车8对，日均发送旅客3000人次。10年间，随着绵成乐客运专线、成渝高铁、西成高铁、成贵高铁的开通运营，成都东客站的列车日开行对数已增加至248对，日均发送旅客达14.6万人次。如此庞大的旅客发送量，意味着成都东客站的辐射面更宽，影响面更广。

铁路总是不断给人创造惊喜。

如此之大的旅客发送量，东客站必须加速旅客有序流动速度。他们通过采取增加进站通道，增设、改进验证、安检设备和动态调增安检人员等措施，提升验证能力54%、安检能力135%，旅客高峰期平均进站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减少至3分钟。

成都东客站列车密集到达、旅客集中出站现象比较突出，该站对旅客出站通道进行清理，优化出站流线，新增出站检票闸机40台，全面释放旅客出站能力，实现单趟列车的整体出站能力提升200%，高峰期旅客过闸排队人数由40人减少至12人。

成都东客站每天换乘的旅客多达2万多人次，该站调整旅客便捷换乘方案，将原来的通过检票口楼梯反向到候车区换乘，改为通过出站通道在出站层集中换乘，有效地避免了客流对流，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提高了换乘效率。

为加快旅客流动速度，成都东客站与地铁公司建立安检信任机

制，旅客从成都东客站出站后不用安检就可直接转乘地铁。该站还努力争取增设自动扶梯，方便旅客在各种交通方式间换乘，并协调地方提升南北匝道汽车通行能力，打通了旅客出行的“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扩能提质措施，在面对客流高峰时，该站更加从容不迫。2019 年国庆期间，成都东客站连续 4 天发送旅客超过车站 20 万人次的设计能力，10 月 1 日更创下发送旅客 25 万人次历史新高，峰高不显浪的态势却更加凸显。

快！是人们对现今铁路最大的感受。许多经常从成都东客站上下车的旅客，感受更为深刻。进站快，上车快，下车旅客分流快，出站快，为了再快一些，成都东客站不得不时时升级各种设施的配置与功能。

开通运营之初，无人自动售票技术刚处于萌芽状态，售票还是以窗口人工操作为主。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迅速在旅客方便的地点设置自动售票机。随着旅客发送量的增长需求，继续不断增设自动售票机，在 2017 和 2018 年达到数量峰值，全站在不同地点共设置了 300 余台，极大地方便了旅客出行，与动车二三百公里的时速更加匹配。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是一首老歌中的两句歌词。由于技术更新，这两年成都东客站又在加快速度拆除这些曾经极大方便了旅客的自动售票设备，现在仅存 100 余台，它们今后的命运如何，尚不可知。

从零开始，到达高峰，又陆续减少，最后趋于零，看似简单的循环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铁路的高速发展。

“现在网络技术发展太快了，快得都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现在实行了电子客票，凭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上车，更加便捷与快速，纸质车票的作用越来越小，离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到时候，我们的售票员可能就要失业了！”成都东客站客货科科长史超用玩笑口吻说，但话语里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日益增长的旅客运量也考验着东客站员工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而突发事件处理不当，就会给日常运输造成混乱，进而产生无法预见的后果和负面影响。

2019年12月18日，笔者公干乘坐动车由贵阳返蓉，车到重庆就再也不动了。后来才从手机上看到新闻，就在8时14分，内江市资中县发生5.2级地震，成渝高铁、成贵高铁、成渝铁路、内六铁路沿线及部分车站均有不同震感，多趟动车和普通列车有不同程度晚点。资中地震是对成都东客站应对能力的一次检验，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无论什么样的突发事件，成都东客站都会从容应对，化解危机。

“那天上午，成渝、成贵方向基本没有动车到达，也开不出去。14时以后，动车到达突然密集起来。哪个方向来的列车，停靠哪个站台，都是有规定的，这个不能乱，只要乱一趟，整个车站立刻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如何让接车能力得到高效发挥，是考验我们运转职工能否科学合理高效使用线路，客运职工能否快速分流旅客，组织快速有序出站的能力。从午后一直到晚上，我的双眼一直紧盯监控屏幕，手拿对讲机把嗓子都喊哑了。”成都东客站应急指挥中心白舸回忆当时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

暖心的“天府大客厅”

开通运营之初，由于开行列车不多，旅客也不多，整个站区相对清静。气势宏伟古朴的站房，宽阔整洁的广场，成为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地，同时引起影楼的注意，纷纷来此拍摄商业用图片。

这个现象启发了铁路方面，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开创具有铁路特色的文化？

2013年春运的一天，一群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姑娘，穿着大衣，拉着统一的拉杆箱，来到车站东广场，她们中的一人下达口令，

姑娘们立刻脱去身上穿的大衣，里面是动车乘务员冬季水红色裙装，给冬季灰蒙蒙的色调平添一抹亮色。音乐骤响，她们跳起欢快舞蹈，舞姿充满青春活力，犹如跃动的火苗。广场上的旅客开始还没注意，当他们反应过来，刚把情绪调动起来，想继续看下面的舞蹈时，音乐戛然而止，这些姑娘又像来时一样悄然散去，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

“硬是高铁呢，这些女娃儿跳得快，散得也快，比动车还快！”有人觉得刚看出点名堂，就结束了，没过瘾。

“你晓得啥子哟，这个叫‘快闪’，流行几年了！这些女娃儿也‘快’到位了，‘闪’到位了！”有旅客接嘴。

广场上的气氛立刻热烈起来，旅客们感到有几分遗憾。恰恰是这样的遗憾，给枯燥的旅途生活增添几分乐趣。

成都东客站是许多市民心中的“天府迎客厅”，迎客厅必须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方能不负这块有着厚重历史人文积淀的土地。他们颇有创意地在专门区域墙上，辟出以铁路文化为主题的“诗意长廊”和“车窗外的世界”专题摄影，给人流汹汹，却十分安静的候车大厅增添了文化气息。

乘火车不再是单纯的坐车旅行，而是以文化享受开场的旅途。

一路摸索走来，越往前走，他们越发感到仅有快餐文化和纯文化是不足的，还要将这样的文化深化延伸，深深嵌入日常工作，使之成为“铁路客运组织文化”“铁路客运暖心服务文化”，这样才能丰满铁路运输文化。

朝这方面努力是有基础的，能力强大和功能完善的硬件设施给这种努力提供了可能。

“游佳服务岗”是成都东客站著名的服务品牌。当年，挖掘机在成都东客站建设工地上开挖第一铲土的时候，这个服务品牌已在经常乘坐火车的旅客心中夯实了不可撼动的基础。“真心、贴心、暖心”对待旅客，是这个品牌的强大支撑。

2021年3月的一天夜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坐在已略显空

荡的候车大厅长椅上，头软软地耷拉在胸前，人事不省，很长时间都不动一下。

游佳服务岗的客运值班员李倩、杨官秀见状，忙过去看个究竟。无论是轻轻呼唤，还是轻拍肩膀，女孩就是没反应。她俩闻到女孩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气，明白了，这个女孩喝醉了，而且是深度醉酒。

不能让她这样坐在大厅里。她俩提着女孩的双肩包，架着她来到自己的宿舍，让她睡到自己的床上。第二天，女孩酒醒了，得知昨晚的经历后，非常感谢两个姐姐的照顾。李倩、杨官秀陪她去买了一张当天最早一趟去重庆的火车票，送她上了动车。

动车轻盈地在轨道上滑动，转瞬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3月15日，这个女孩又在成都东客站候车大厅里出现，找到李倩、杨官秀，送上一面锦旗，上有“列车奔驰瞬间万里江山，服务贴心温暖乘客心尖”，落款为“热心市民小侯敬赠”。锦旗上这两句话对仗不甚工整，“尖”字疑为“间”，但这并不要紧，关键是通过这面锦旗，可以感受到这位小侯姑娘发自肺腑的感激。

为东大门把好防疫关

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这是农历猪年的最后几个小时，只要零点钟声敲响，就进入农历鼠年的新年。

此时正是万家团圆、欢乐祥和，共度新年的时间，但这个春节与往年大不同，因新冠疫情在中华大地肆虐，就在此前一天，即1月23日10时，武汉市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封城了。

这个消息让远离武汉的成都空气中流动着不安。成都东客站立刻进入抗击疫情战时状态，各级干部都下沉一线进行值守，尽管这个晚上的旅客较平常要少许多，又顶着疫情威胁，只有为数不多的旅客零星地进出站。

当时任劳人科长的皮柯被安排到出站口值守。23时18分，由汉

口来的 D2263 次列车终到成都东站。下车旅客很少。

“老师，我很难受，呼吸困难，能帮我找医生吗？”

一名男子走到皮柯面前费力地大声喘息着说。

皮柯见这位男子脸色通红，明显在发高烧。此时他对新冠患者的病情仅知道高热，呼吸困难。他看了一下男子的火车票，是在麻城上的车，心里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整个湖北都是疫情重点地区。

成都东客站是成都抗击疫情的大门，成华区保和社区、成都局集团公司疾控所都派有医生值守，坚决不让疫情在四川、在成都市蔓延。他们立刻围过来，给这位旅客做了必要的检查后，把他送上救护车，蓝光警报灯旋转，鸣响刺耳的警报，朝着医院呼啸而去。

皮柯望着救护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今晚最后一趟动车。

“马上就要敲响新年钟声了。咱们到广场上照张相吧，纪念这个难忘的夜晚。”皮柯还未意识到事情的危险，对一起值守的几个同事提议说。

他们几个站在空寂无人的东广场，背对站房，面对西面的塔子山公园九天楼，在镜头前比出 V 字手势，庆祝猪年平安过去，迎来充满希望的鼠年。新年钟声响了，手机快门发出轻微的快门声响，几个面带笑容的人像定格。

第二天一大早，皮柯正准备下班，手机突然响了，是成华区疾控所打来的，通知说昨晚那位旅客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皮柯需要居家隔离。

“接到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是亦喜亦忧，喜的是这位患者没有从自己值守的岗位漏过，为成都市堵住一个感染源。忧的是我万一被传染，万万不能再传染给家人！”他回忆说。

他马上给妻子打电话，要她准备好 14 天的食物和不易腐烂的蔬菜后，立刻回岳母家，不要回来。

居家隔离期满后，有同事问他隔离的感觉。

“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刚进家门那一刻，望着空荡荡的家，突然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觉。隔离在家，不能出门，还是挺难受的。几天后习惯了，每天翻翻手机，看看电视也就过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枯燥的。”皮柯回答说。

值得欣慰的是，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成都东客站在旅客中发现5名确诊感染者，为成都市的疫情防控消除了极大隐患。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变化，成都东客站按照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复工复产需求，积极做好复工返岗专列开行，开行到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复工返岗专列数十列，帮助数万名复工人员顺利返程。

由于抗击疫情表现突出，成都东客站荣获国铁集团和四川省“防控疫情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成都东站是一支英雄的乐曲。从1952年7月1日起至2007年4月18日的59年间，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的钢铁车轮在琴弦般的钢轨上，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在历史深处回荡！

成都东客站是一支悠远的乐曲。从2011年5月8日起至今的10年间，动车轻盈地滑过钢轨，弹拨出节奏明快的轻音乐，优美的旋律一直在成都市上空缭绕！

成都东站无论是过去的货运站，还是今天的客运站，都是一支不会曲终的交响乐。成都东站乃至中国铁路人，在五线谱般的线路上，将不断创作，谱写出一曲曲气势宏大、高潮迭起的乐章，在中华大地上永远奏响！

成都机车车辆厂：一路风雨一路歌

/唐澜芯

1917年，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为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播下了星星之火。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在中国近代史上，铁路工人始终以忠诚的政治品格、赤诚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活跃在追求民族独立、寻求人民解放、谋求国家富强的第一线；铁路事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曲折发展，更是与党的领导、国家的需要密不可分，与城市的建设、民生的保障息息相关。

为铁路而来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为配合成渝铁路的运输，铁道部选址成都二仙桥地区建设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机车车辆工厂，也是全国铁路工业系统第一个转产内燃机车检修的机车车辆工厂，更是全国铁路工业系统第一个荣获国家质量管理金奖的机车车辆工厂……六十余年间，上万台各种类型的机车、机电和配件在这里被修复、养护、

制造，它们中的一部分至今依然行驶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火车鸣响了城市经济崛起的汽笛，也带来了 90 万铁路职工及家属陆续安家城北，创造了“铁半城”的数十年风光。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对铁路交通的需求迫在眉睫。作为成都东郊工业建设的先行者，成都机车车辆厂一边努力完成任务，一边不断引进人才。

1962 年，厂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他叫黄文亮，出生于江西，抗战胜利后跟随父母来到四川郫县定居。1957 年，黄文亮考上了西安交大机械制造专业，那一年，全国招收了 10.6 万名大学生，相比前后几年，是录取人数最少的一届。毕业时，他受在铁路工作的父亲的影响，主动申请到成都机车厂工作。从这一年开始，到 1998 年退休，黄文亮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长为带领机车厂从修理机车到生产机车、荣获两次国家质量奖的领军人物。以一生，终一事，黄文亮与千千万万的机车厂人一起，陪伴成都机车车辆厂走过了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也亲身参与、主导了多次关键性的技术革命，更见证了成都工业从蹒跚起步到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

从无到有 自力更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许多领域依赖苏联的技术支持。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如同当时许多苏联援建的工厂一样，成都机车车辆厂也经历了这样蜕变新生的过程。在黄文亮记忆里，就有这样一件事。

那是 1963 年，机车厂以修理蒸汽机车为主要业务。有一天，加工蒸汽机车轮子的机床忽然坏了。这套机床是从苏联买来的，而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机床断了货。这套机床是修理机车的关键设备，全厂都随之停工、停产。没有图纸，无从求教，厂里的工程师也束手无策。

当时，黄文亮刚转正不久，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他琢磨

这跟自己所学的机械专业有关系，便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仔细研究机床后，他发现损坏的只是涡轮的涡轮杆，便打算重新设计制造一个。但是，当时他手里只有一把计算尺，根本不能精准地计算出所需的数据。设计图不够精确，做出来就有误差。这怎么办？

这天，正在黄文亮冥思苦想的时候，一个同事激动地冲了进来：“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黄文亮跟去一看——嚯！竟然是从库房里找到的一台手摇计算机！

手摇计算机在当时十分稀少，专门配备给科研人员使用。黄文亮如获至宝，捧着这台计算机，不眠不休地算了三天，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终于设计出了图纸，用锋钢做成的成品比原件只强不差，这才解了全厂的燃眉之急。

1965年，大连机车车辆厂开始批量生产ND型内燃机车。成都机车车辆厂也开始为修理内燃机车做转产准备。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必要支持外，黄文亮等作为直接参加研制的人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困难，跨越了一个个从无到有的“不可能”。成都机车车辆厂在1968年结束了蒸汽机车的修理历史，正式转产修理东风型内燃机，成为全国第一个转修内燃机车的工厂。

回忆起那段时光，黄文亮依然觉得百感交集。那时条件艰苦，物资、技术、知识、资金都十分匮乏，为了准备转产所需的新设备，不得不到当时发展更快的哈尔滨、太原等城市的工厂去偷师，回来后再苦苦摸索；充斥着高温、粉尘、噪声的工作环境更是难耐。但人们的工作热情却始终高涨，常常夜以继日地奋斗，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炼出第一炉钢水，填补了成都市工业战线上铸钢生产的空白；

摸索着试制工建型、蓉建型蒸汽机车，补充了地方铁路运输动力的不足；

与五冶等兄弟单位相互支援，生产组装的216翻转机，用于生产

无缝钢管，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

自主生产内燃机所用的缸套，没有苏联进口的高级材料，就从本地取材，采用来自攀钢的钒钛，不仅降低了成本，性能也更好……

几乎每一个任务的顺利完成，都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尽管如同脱层皮似的痛苦，却也带来了蜕变的新生。一次次地突破，成都机车车辆厂逐渐摆脱了对苏联的技术依赖，为成都乃至全国的工业化发展，夯实了独立自主的基础。

从修到产 勇于创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黄文亮作为机车厂的骨干，随副厂长李武庭到北京，由当时铁道部工业总公司副局长曲波带头，与日本住友公司进行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希望能从日本拉一条内燃车轴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到机车厂。为了这场谈判，我方几乎不眠不休，白天殚精竭虑地谈，晚上深思熟虑地拟方案。可惜的是，这次合作最终未能达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以此为契机，整个国家的重心都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对机车厂而言，这次北京之行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看到了世界先进技术的水平，也看清了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20世纪80年代，机车厂的生产工作蒸蒸日上，年度修理机车基本达到200台，获得了全国、省、市的多项荣誉。然而，只有修理的能力，没有生产的能力，始终制约着机车厂的发展。

1986年，工厂主动出击，揽下了增加我国干线主车型——东风4型内燃机车生产的重任。作为中国首次设计研制的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东风4型从研制到成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经过了大量设计改进和试验研究后才成功。那时成都机车车辆厂只是个修理厂，既

没有图纸，也没有必需的设备，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储备和人才资源，如何能做出来？

负责这个项目的黄文亮也发愁。他去总公司的时候，当时的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质疑：“小黄啊，这个话不是吹的，你拿得出来吗？”

拿得出来吗？黄文亮也不好说，但他铁了心要搞电机，向工厂领导立下军令状：“一年内生产不出来，扣我三个月工资，就地免职。”有了厂里支持，黄文亮鼓足干劲，到各个工厂去求援、去偷师，看看别人怎么做的，用的什么设备，自己有的就用，没有的就模仿着造，再不行，工人们钻在机壳里加工，一点一点地琢磨。

铁道部属的兄弟单位也给予了他不少帮助。长春客车厂厂长跟黄文亮关系不错，放他进车间：“支援你一台设备，你自己看，你自己挑！”黄文亮毫不客气地选了一台大立车。这是用来加工机壳的关键设备，运回来装好以后，顿时如虎添翼。株洲电力机车厂，是当时中国电力机车的主要研制生产基地，也支援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设备、工具，替换掉工人们自制的“土设备”。

10个月后，成都机车车辆厂竟真的把东风4型机车的配套产品——410kW牵引电动机和3000kW牵引发电机生产出来了！紧接着，设计、出样机、通过部级鉴定……成都机车车辆厂没有食言，年末，一台新组装的内燃机车就展示在世人眼前。成都机车车辆厂成为当时全国唯一有电机生产能力的修理厂，大踏步走上了“以修为主、修造兼营”的新里程。

我国的铁路发展势头迅猛，内燃机车尚在发展，电力机车已经迎头赶上。早在1958年，我国就开始了对第一代电力机车的研发，因最初在毛泽东故乡，即韶山地区附近的株洲联合湘潭电机厂研制生产的，故名“韶山”。攻克了电机，黄文亮再接再厉，与大同厂、株洲研究所三家联手，共同研究开发“韶山7”电力机车。

开发“韶山7”，不仅是成都机车厂更高的工作追求，更是西南地区运输的迫切需要。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弯道多，火车提不起速度。

要提速，就需要机车的转向更灵活。控制火车转弯的配件叫转向架，“韶山6”采用8根车轴，一个转向架4根，轴间距宽，只适合跑直道。在“韶山7”的设计中，黄文亮采用6根轴，减少了轴间距，转弯更快，更能适应山路崎岖的西南地形。

“韶山7”生产出来以后，三家厂一起到北京铁道部的环形线去试车，目标是拉动1万吨的标准运载量。黄文亮站在机头，紧张得手心冒汗。这次试验，拉的是山西的煤，黑色的煤块不断增加，火车依然很轻松，到1万吨时，车辆与车辆之间链接的车钩已经承受不住了，而机车的拉力还剩2000吨。这次试验，“韶山7”大获全胜，获得了铁道部的奖项，而“韶山7”所使用的由成都机车车辆厂生产的800kW牵引电机，更是获得了铁道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屡次获奖 先进管理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活生产逐步恢复，机车厂党委书记周炳习带领全厂职工苦干实干，创造了一个个优秀的业绩。1979年，国务院对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的118个先进企业进行表彰，成都机车车辆厂也光荣地名列其上。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出席了颁奖仪式，时任该厂党委书记的任道良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奖章。这次荣誉大大地激发了机车厂全体职工的工作热情。

时间进入80年代，计算机开始兴起，这让时任总工程师的黄文亮眼前一亮。他看准了这个新生事物的前景，坚持要在厂里推行计算机管理。当时，人们普遍对计算机抱有畏惧心理，也不愿意改变既有的工作方式，对他的想法，有的嗤之以鼻，有的极力反对，甚至“不给钱、不给人、不给地”，看他“拿着一堆垃圾，能搞出什么名堂！”

在一片反对声中，黄文亮也不禁产生了动摇，自己也不是学这个的，真能搞出来吗？搞出来了，又真的有用吗？他心里也没底。就在

这时，当时的四川省计算机研究所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个工程师的眼光和魄力十分赞赏，专门给他提供了机器和技术指导，鼓励他一定要把计算机管理搞出来。

研究所的支持及时且关键，给予了黄文亮莫大的信心。而机车厂里也并非全是反对声，一些领导对此表示了肯定，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更是身体力行地参与这个项目。其中，三个从北京铁道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这个项目的主力成员。

这三个大学生都住在男员工单身宿舍，正好是一个屋，黄文亮就以此为基地，把研究所支援的机器放在这里，之前从未正式学习过计算机原理的几个人，一边摸索一边干，屡败屡战，即使艰苦也乐在其中。

黄文亮把整个系统分为前方和后方，又在几个重点的车间如电机、翻砂、机车等车间建立了计算机站，根据厂里每个车间的具体需求和具体情况，把生产的各个环节编成了一套系统。等拿到厂里一运行，计算机管理的优越性顿时体现了出来——以库房管理为例，一个库房的最大量、最小量，不同月份的储备量、进出量、存量，一目了然。与生产车间管理系统联合起来一看，什么时候该由哪个库房提供什么原料，什么时候该组织加工什么产品，清清楚楚。

这下，厂里都震动了。这套简单明了的新系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对人力、物力都有明显的节约，大家都抢着要用。没有配备到的车间还不干了，催着黄文亮尽快把系统扩大到整个生产环节。计算机管理成了香饽饽，不仅迅速被人们接受，还获得了当年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当时，放眼全国铁路系统，这么搞的也没几个，黄文亮成了备受瞩目的焦点，他在当年西安铁道部工业总公司组织的厂长学习班上，给 23 个厂矿的厂长传授经验。

计算机管理的显著成效让黄文亮和整个机车厂都尝到了甜头，原来提高生产效率，并非只能在车间里用力，对管理的优化也能带来巨大的效益。于是黄文亮再接再厉，开始搞网络化生产。他按统筹管理

的思路，把所有车间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统统汇拢编制成一个系统化的网络图，哪里有缺漏、哪里不完善、哪里有重叠、哪里需要补充，立刻就能从全局角度进行调度、调整。

理清楚环节只是第一步，当时的厂长赵芝勤从中发现了关键。赵芝勤，1957年从武汉江岸厂区调到成都机车车辆厂工作，从此再未离开。检查员出身的赵芝勤对质量的要求格外严格，他与副厂长李武亭借助新的计算机管理系统，给生产检修的每个环节设置了质量标准以及检查制度，这下便触及了质量管理的核心所在，日本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曾到厂参观指导，看到这套管理体系，也竖起了大拇指。当时，全国都在抓质量，而机车厂是质量监管最严格的企业之一，凭着这套体系，成都机车车辆厂一举拿下1984年国家质量管理奖，是铁道部第一家、也是当年唯一一家获奖企业。

我国自1979年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以来，先后设立了两项有关质量方面的奖励，即国家质量奖与国家质量管理奖。其中国家质量管理奖设立于1982年，是为了鼓励企业按照质量管理理论，更加深入地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建立健全有效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而设立，是当时我国质量管理方面的最高荣誉。

攀上顶峰，不进则退。随着计算机管理的逐渐完善，黄文亮又独创了“逆向追踪法”。他将生产的各个工序落实到人，做好记录，即使东西出了厂，一旦发现问题，追根溯源，就能找到具体负责的人，从而及时进行补救，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逆向追踪法”让产品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也巩固了第一次获奖的成果，帮助机车厂于1989年再次获得了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几十万家企业，86家榜上有名，仅9家企业二度获奖，铁道部和四川省，仅成都机车车辆厂享此殊荣！

走向新时代

2017年8月31日，在成都机车车辆厂的厂房里，一场简单而深情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最后一台检修机车在厂区领导、职工以及退休老员工的面前，缓缓下线。走过多年风风雨雨的老厂区至此正式落下帷幕。

进入新世纪的成都，城市规划早已扩展到三环以外，位于二环外的机车厂逐渐被拥挤的城市建筑所包围，同时，老旧的建筑、落后的配套也阻碍了城市和工厂发展。为配合规划，机车厂实施退城入园，整体搬迁到了新都石板滩，进行结构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老厂区曾经的荣光犹在，而时代浪潮的推进也为每一个人做出了通往未来的正确选择。骄傲与伤感交织着，奏响了一曲时代前行的伟大赞歌。

迈入新里程的机车厂开始了产业转型，进入城轨制造新领域，主营中国铁路客车检修、城轨地铁车辆研制生产与高级检修等。第一辆“成都造”铝合金A型地铁车辆（成都地铁7号线）、全国最长地铁线路列车（成都地铁6号线）、国内首创时速140公里8A编组市域车（成都地铁18号线）等陆续亮相，一辆辆走在世界技术前沿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并将促成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帮助成都搭建起眺望世界、沟通全球的桥梁。

绵延的铁轨铺就出时代巨变的轨迹，悠长的汽笛拉响了民族振兴的强音。曾经，成都机车车辆厂在六十余年间，修竣出厂了10716台机车，为中国铁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今，更先进、更高效的机车承载着无数人的情怀与梦想，正迎着新时代的万千气象，行驶在充满希望的铁道线上。

Chapter 5

第五章



红楼(原成都量具刃具厂量具车间)

在成都这块热土上，留有老红军、老八路、艺术家、企业家们闪光的足迹。每一个足迹，都是一部传奇……他们历尽磨难，却殊途同归，或用慷慨赴死的革命历程，或以传承薪火的艺术生命，或以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诉说着一个共同而坚定的命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永恒跟随！

一生甘为人民的牛

——成量厂杨亭秀的传奇人生

/杨传球

翻开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厂史，有一幅照片便会出现在人们面前：1958年3月5日下午，毛主席来到成量厂视察，而陪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个干部就是当时的厂长杨亭秀。他一路陪着毛主席，边走边向主席汇报工厂的情况。随行的记者不失时机地抓拍下杨亭秀与毛主席在一起的场景。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报纸刊出后，成了成量厂一张标志性的照片。至今有些成量厂老职工还珍藏着这张照片，一提起这件事，他们还感到非常自豪。

杨亭秀是成量厂的第一任厂长，深受职工信赖和尊敬。他带领职工艰苦创业、勤俭建厂，曾受到中央多次表扬，也一度受到过误解和处分。他是一头拓荒牛，在东郊的一片荒地上矗起了曾令成都人骄傲的“苏式尖顶塔”；他是一头老黄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耕耘，吃苦耐劳、奋斗不止；他又是一头孺子牛，在党和人民面前总是谦虚谨慎，不管受到什么误解、多少委屈，他都能坦然面对、从无怨言。

杨亭秀原名王世仁，1918年出生于山西代县东马村。1936年冬，随着日寇对华侵略步伐加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年仅18岁的杨亭秀加入抗日组织“牺盟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杨亭秀考入了山西第五师范学校，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山西，学校被迫停课，杨亭秀在枪炮声中逃出代县。在逃亡路上，他经一位革命青年介绍，考入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这所大学在当时全国爱国青年中很有影响，不少教师都是共产党员。杨亭秀在这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誓言。

1938年从“民大”毕业后，杨亭秀被安排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事革命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他隐去真名王世仁，化名杨亭秀，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在抗战中，杨亭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给予了日伪军队沉重的打击，让日伪闻风丧胆，当地便有了“西有郭子明，东有杨亭秀”的说法。日寇汉奸对杨亭秀、郭子明恨之入骨，公开悬赏3000大洋购买两人人头。1944年初，杨亭秀任代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次年，27岁的杨亭秀被任命为代县县长。抗战胜利后，他又领导全县人民投入了解放战争。1949年12月，杨亭秀跟随解放军第18兵团南下四川，后被任命为金堂县首任县委书记。

1952年，毛主席提出把优秀地方干部输送到工业战线上去。杨亭秀从金堂县调任205厂任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正在他满怀热情投入工厂建设中时，205厂突然宣布下马停建。

1953年5月，杨亭秀被安排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任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在那段时间里，他虚心向苏联专家、干部工人学习请教，逐渐由一个工业上的门外汉，变成了一个懂行的企业领导干部。1956年，中央决定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调派杨亭秀回川负责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筹建工作，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成都量具刃具厂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当时工业建设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上马、下马是常有的事。已经有了一次205厂下马经历的杨亭秀，为了避免成量厂再次遭遇下马的命运，一开始就从各个环节上抢时间抢进度，他相信只有“煮熟的鸭子”才飞不了。

如果按照常规程序，光设计工厂的图纸也得一年多。为了抢时

间，他提出利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现成的图纸，在成都“克隆”一个同样的新厂。但上级设计部门不同意。杨亭秀于心不甘，逐级请示，一直请示到一机部设计总局，他的意见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杨亭秀竟然找到了一机部苏联专家组组长那里去申诉他的设想方案。苏联专家最终同意了杨亭秀的意见，认为重复使用设计图纸，可以大大加快建设速度，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终于，一机部也同意了杨亭秀的意见。

图纸的问题一解决，开工时间就大大提前，2月23日筹建组挂牌，5月3日新工厂就破土动工了。到1956年年底，成量厂先后建设了工具、机修、模盒、刃具等车间和中材库房等，并且工具、机修车间已经开工生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下令成都量具刃具厂缓建，并将投资削减一半。杨亭秀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按照计划，一半投资仅够用于宿舍、培训、工资等项开支，生产根本无法保证。杨亭秀怎么割舍得下建了一半的工厂？到手的“鸭子”绝不能让它飞了！杨亭秀思索再三，决定调整基建计划，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全力以赴保生产建设的思路，将建宿舍的钱节省出来搞厂房大楼的继续建设，购置试生产必要的机器设备。

干部工人支持他的决策，党团员带头参加义务劳动，自己动手建设非生产设施，盖起了一排排草房，解决了宿舍、小学、幼儿园、俱乐部、医院、食堂、办公等非生产用房问题。杨亭秀则带头把办公室和住宿搬到草房里，一住就是13年。就这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杨亭秀顶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在投资削减一半的情况下，将一个国家重点大型骨干企业初步建成了。

1957年3月，朱德副主席来成量厂视察，到设在草房里的厂部办公室，听取了杨亭秀汇报工作。面对一排办公用草房，朱老总不住点头，首先就对杨亭秀勤俭办厂、不讲排场的做法给予了称赞。朱老总说，你们厂的做法符合党中央、毛主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符合党的群众路线。接着又就厂子的管理问题听取意见。杨亭秀说，我们用的都是苏联制定的管理办法。朱老总说，苏联搞的是一长制，我们要搞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集体总比个人强嘛。对于这些指示，杨亭秀一辈子也没有忘。之后，朱老总又书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成量厂的经验。

4月10日，《人民日报》以《勤俭建厂的一个范例》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成量厂成了全国勤俭建厂的先进典型。

1958年春天，毛主席来到成量厂视察，那一张陪同毛主席视察的照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给杨亭秀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荣誉是动力也是压力，杨亭秀和厂党委一班人再接再厉，不敢有半点松懈，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工业的一系列文件、讲话、指示精神，创造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可行的好经验，产品产量逐年成倍增长。到1960年，成都量具刃具厂已经新建了14个卫星厂，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联合企业，还大力支援了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累计完成的上缴利润可再建5个同类型的工厂，产值为设计能力的10倍。

更可贵的是，杨亭秀带出了一支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无私奉献、敢打硬仗的职工队伍。这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为题发表文章，向全国推广成量厂的经验。接着在中央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成量厂颁发了红旗；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一个多、快、好、省的工厂》纪录片在全国上映。

面对党中央的表彰和鼓励，杨亭秀正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厂发展之时，他的命运突然发生逆转。1962年以后，某些领导错误地把中央下放给成量厂的各项经营自主权，硬说成是他犯了“分散主义”错误，并上纲为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之后，工作组陆续进厂，撤去了杨亭秀党委书记的职务，停止了他的工作，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到他的头上，批判调门也越来越高。他手下的一批厂级领导及大批中

层干部被当作所谓的“杨家将”换下或调走，杨亭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完全“靠边站”。“文化大革命”期间，杨亭秀更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造反派关进了小黑屋。

困苦厄难之中，杨亭秀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党组织终究会还自己一个清白。被造反派关小黑屋那18个月中，眼看着工厂停工、生产受到影响，他心疼啊！蒙冤受屈身体遭罪他不怕，他怕的是时光一天天逝去，自己一身的劲没有地方用！他只盼望能早点出去，为党为国再干上几年！

1974年，杨亭秀终获“解放”，被中共四川省委指名调到四川东方红机械厂任党委书记。杨亭秀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东方红机械厂是一个重点军工企业，还没有完全建成，就被“造反派”闹瘫痪了。此时杨亭秀虽然“解放”了，但头上的“帽子”并没有摘去，处分还依然背着，手脚上还束缚着无形的绳索。看到人民的事业正遭受损失，杨亭秀并没有因为背有处分而畏首畏尾，他拿出了当年建成量厂的拼命劲头，大抓劳动纪律、生产管理和设备安装工程，终于在年底完成了基建任务，1975年就开始了试生产，向国家上缴利润。1976年，东方红机械厂正式全面投产，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杨亭秀因此受到省、部领导的表扬。

多年来，杨亭秀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庭里里外外，全靠老伴一人操持，老伴跟着他吃苦受罪，没有一句怨言。1977年，劳累一生的老伴终于病倒了。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的杨亭秀，向一机部打了请调报告，请求调回北方工作，以便照顾生病的老伴。

部里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请调报告。孰料刚刚回到家里，一纸工作调令，却让他照顾老伴的愿望再次落空。

当时，一机部的企业陕西汽车制造厂正处于半瘫痪状态，部里一直想整顿该厂，只是苦于没有得力的干部愿意去而搁置了下来。这次杨亭秀一到陕西，部长的目光立刻盯住了他。部长找他谈话时，杨亭

秀虽然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说不去，但他却一句推口话都没有说就答应了。杨亭秀向来都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在党需要时，他怎么会退缩？

年逾花甲的杨亭秀又打起背包，毅然到位于山沟里的陕西汽车制造厂赴任。

这次，杨秀亭是以陕西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兼陕西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到厂里工作的。他一进厂就进行调查研究，很快弄明白了问题的症结——这个厂的技术骨干和部分中层干部都是从北京调来的老职工，他们来时未带户口和家属，已经 10 年没有回过家了，无心工作，一心只盼望着结束两地分居调回北京，怎么能安心工作？

北京同志的苦衷，上面也不是不知道，但是汽车总局和省机械厅都不敢做主放他们回京，怕这些干部和技术骨干走后，影响生产。其实他们不走，也已经影响了生产！

杨亭秀认为，要把生产搞上去，首先要从解决这部分同志的实际困难着手才行。杨秀亭提出的解决方案经党委研究讨论，达成共识，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一经郑重宣布，立即得到热烈回应：“只要把今年的生产搞上去，培养好工厂的接班人，明年我就放你们全部回去。”杨亭秀的这句话，说在了北京籍职工的心坎上，让他们有了盼头和奔头，在努力工作和培养生产骨干上，焕发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当年就完成了生产和基建任务，还为该厂培养了一大批生产技术接班人。1979 年，杨亭秀兑现了承诺，北京的 289 名同志陆续调走，解决了长久两地分居的难题，而陕西汽车制造厂也彻底翻身，向国家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就这样，杨秀亭在复出后，又奇迹般地救活了两个国有大厂，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1979 年 12 月，身在陕西的杨亭秀，收到了中共成都市委的平反通知书，撤销了 1962 年以来强加给他的一切处分，同时也恢复了他当年带领职工为成量厂争创的“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在蒙受了 17

年的不白之冤后，他捧着这份迟到的平反通知书，只是平静地一笑。虽然这个平反通知对他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17年来，他时刻谨记入党誓词，理想信念，从没有因为蒙冤受难而有丝毫动摇。

1983年，65岁的杨亭秀从副厅长的岗位上离休。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他正厅级政治待遇和副省级生活待遇。但老人家一生不懂享受，更不会摆什么“高干”架子，平时就喜欢跟老百姓在一起，帮老百姓做些事情，甚至还经常去学校的集体宿舍，替学生们打扫厕所。有人看到后就劝他休息，他却仍然坚持不懈。

在敬佩他的老百姓眼中，杨亭秀就是一头牛，吃的是“草”，贡献的是“奶”。只要生命没有结束，不到最后一滴“奶”流尽，他不会休息。

2014年12月31日，96岁的杨亭秀走完了他光荣而曲折的一生，终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回，他真的休息了……

红军厂长赵一

/徐小强 袁慧玲 李乐欣

历经苦难 参加红军

赵一是前成都机车厂厂长，一位历经长征的老红军。

赵一尚在襁褓中，母亲就去世了，当长工的父亲把赵一缚在背上，带着他下地干活，无论何时何地，父亲那瘦削的脊背上，都伏着瘦小的赵一。

4岁那年，地里劳累一天的父亲收工回到家里，一坐下去便再没有起来。年幼的赵一不知道爸爸已经死去，饿得哇哇哭，推着喊着爸爸做饭给他吃。邻居们闻声赶来，发现人已经死了，才相帮着把赵一父亲安葬了。

父母亲都没有了，赵一的两个哥哥被族人收养。赵一长期被绑在背上，加之营养不良，4岁了，连路都还走不稳，没有一个人愿意收养这“没用”的孩子。没想到赵一的生命是如此倔强，无人收留的他，一件破袄一个破碗，独自流浪乞讨，居然活了下来！

稍大，他被一家饭店的老板收留，在店里帮忙打杂。本以为可以摆脱风餐露宿、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可饭店老板贪图钱财，转手将他卖到一户地主家中做长工。

赵一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同伴被安排看守蚕房。蚕房很大，老鼠猖獗，需要几个人各负其责才能避免老鼠祸害蚕宝宝。正是贪睡的年纪，几个同伴商量着轮流睡觉，轮流看守蚕房。赵一说：“不行啊，这么大的蚕房，一个人怎么守得过来？”但几个同伴不听他的，安排好轮班，就各自去睡大觉了。赵一运气不好，刚好就在他轮值看守的时候，老鼠袭击了蚕房，将蚕房搅了个天翻地覆，一季的蚕丝收成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思忖着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东家的损失，赵一吓得连夜逃跑。这一跑，就跑到了仪陇县。

不久，红军长征路过仪陇县，赵一迎来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找到了他的两个当红军的哥哥，并且参加了红军！

赵一曾隐约听说，自己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所以红军一到仪陇县，赵一就跑去寻找哥哥，没想到还真的在红军队伍中把两个哥哥给找到了，大哥还当了红军的营长。可是两位哥哥马上就要跟随部队出发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亲人，赵一无论如何不想再一人孤零零地四处流浪了。他央求哥哥们带上他，跟随红军去长征。

长征是多么艰苦啊，弟弟14岁不到，年龄太小，怎么能和成人一样行军打仗呢？哥哥们说，还是等几年再说吧。赵一哭着说，只要有亲人在一起，再苦再累他也不怕！兄长最终还是没同意带赵一走。

队伍开拔了，赵一倔强地默默跟在队伍后面，顽强而固执地走了两天。赵一的哥哥向组织报告了弟弟的情况，获得组织的批准，赵一就此参加了红军，安排在大哥的营部，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通信兵。

在一个名叫鹰哥嘴的地方，红军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赵一的大哥带领的部队，在掩护大部队渡江中全营覆没。大哥在生死关头，将一封联系中央红军的信件，交给了当通信兵的弟弟。赵一流着眼泪对哥哥保证：“我现在是红军了，请哥哥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赵一不负大哥的嘱托，机灵地把信件送到了中央红军。完成任务

后，赵一被编入了中央警卫连，成为一名警卫员，跟随在红军领导身边，渐渐地成长起来，历经长征、平型关战役、山西游击战……在革命道路上，赵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最终成为工业战线上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

办农场 自力更生克时艰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赵一调任直属于铁道部的成都机车厂（以下简称机车厂）副厂长，主要负责管理工人的生活。

赵一初到成都机车厂任职，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个家庭，平均每人每天只有七两米。“为了让肚子好受一点，家家顿顿都是煮稀饭，米少只好多加水，煮出来清汤寡水的，加之缺乏蔬菜副食，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据赵一女儿赵幼兵回忆，在那段极为艰难的日子里，父亲自己虽然也吃不饱，但是眼瞅着数以千计的工人吃不饱饭甚至浮肿病故，心急如焚！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工人们饿着肚子，怎么搞生产啊！作为负责管理工人生活的副厂长，赵一日思夜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样才能让工人吃饱饭。

机车厂地处城郊，占地面积大，在厂区与工人宿舍之间，还有一部分空地。焦头烂额之际，赵一的岳母注意到了这点，并提议道：“厂里那么多空地，干吗不种点吃的？”

岳母的话令赵一豁然开朗。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才能完成生产任务。何不办个农场？说干就干，赵一与厂领导商议后，立马把农场办了起来。机车厂家属职工齐上阵，踊跃参加农场生产，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来农场种粮食搞养殖；不上班的家属全天候泡在地里；年迈的爷爷奶奶也前来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甚至小学生们的体育课也改成了劳动课。为了办好农场，赵一还邀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家属来当农场顾问。

农场大丰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职工定量不足、副食蔬菜匮乏的问题，工人们吃饱了饭还吃上了肉，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就这样，机车厂不仅按时完成了规定的生产任务，还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作为农场建设的发起人与领导，1963年，赵一被评为全国劳模。

心系群众 一枝一叶总关情

赵一热爱工作，热爱工厂，对厂里的工人更是呵护有加，每一位普通工人的疾苦，都牵挂着他的心。

厂里一名八级车工，因工作失误导致生产出现问题，最终由于自身心理压力过大，患上了精神病。车工家全家七口老少，都依赖他的工资过活。患病后，车工辞了工作进了精神病院，全家顿时没有了收入来源，更要命的是，车工没有了机车厂在职员工身份，一家老小就不能继续住职工家属宿舍了！

这是我们昔日的工友啊，工厂怎么能够眼看着他一家人没钱吃饭，流离失所！赵一爱他的工人，同时也是党性很强很讲原则的人，他觉得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政策上寻找依据，才能够给予这名工人及其家属长久的帮助。为了寻找政策的支持，赵一从医院到公检法系统，四处奔走，最终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为这名车工争取到了病假全休、按照原工资的60%领取病假工资的待遇，他一家老小也就有资格继续住职工家属宿舍了。

爱人者，人恒爱之。赵一对车工一家的雪中送炭，令车工一家铭记于心。“文化大革命”中，赵一被诬陷为“走资派”，身陷囹圄时，车工一家想方设法帮助赵一，和许多老工人一起，尽可能地为赵一提供保护，以此来回报赵一的恩情。

女儿赵幼兵回忆道：“父亲与工人们的关系很好，他们既是工作中的好同事，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工人们都很信任我父亲，不管大事小事，总会找他嘀咕商议，小孩犯了错误，父母会将孩子带到父亲

面前，请他批评教育；子女结婚，也会请父亲去当证婚人……”

赵一已经去世多年，多年来，每逢清明节，他的墓碑前都铺满了鲜花。这些鲜花，都是当年的老工人及其子女送的。虽然与老厂长生死两隔，但老厂长仍然活在他们心中。他们每逢清明都要去墓地缅怀追思赵一，不仅仅因为他曾尽其所能地给予过他们真诚的帮助，更是对他一辈子践行共产党员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坚持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信念的由衷敬仰。

尊重人才 攻克难关

由战场到工厂，由军人到工厂管理者，赵一从来就是勇往直前，不懂就学，从不退缩。

初到机车厂时，赵一工业方面的管理经验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作为成都市“龙头企业”的机车厂的厂长，赵一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沉下心来，就如何管理工厂搞好生产，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听取意见，最终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20世纪60年代，赵一借各大工厂贯彻学习《鞍钢宪法》的东风，借鉴其中“两参一改三结合”中组织老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模式，在工厂成立了“老工人智囊团”，重视发挥老工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高超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生产上的难题。女儿赵幼兵深有感慨地说：“父亲懂得尊重知识技术，尊重老工人，经常念叨老工人是工厂的宝贝，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有效利用资源，管理好工厂，都离不开老工人的支持和参与！”

20世纪70年代，机车厂的生产任务从每年150台追加到每年250台，可原先的工人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支援三线建设去了外地，工人人数从原本的4000多下降到2000多。工人数目不足，专业技术人员缺口大，生产任务怎么完成？生产质量如何达标？

赵一召集老工人智囊团一起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据赵幼兵回

忆：“那时候，父亲工作的那间小偏房常常是整晚都烟雾腾腾的，父亲和老工人智囊团，经常一讨论就是一个通宵。”经过与老工人智囊团商讨，赵一拍板决定，回调部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回机车厂支援生产：“这些援建三线建设的工人，对于厂里的生产过程十分熟悉，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掌握着关键技术，能够高效地帮助机车厂完成生产任务。”

把援建的人员往回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赵一不厌其烦地往劳动局和人事局跑，不知疲倦地陈述回调援建工人的必要性，最终获得了批准。赵一整合回调的工人，成立了二分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追加的生产任务。

捐资修楼 老红军就是老红军

光阴似箭，转眼赵一就到了退休的年龄。1978年，中央军委特拨了一笔款项，给各地区的老红军盖红军楼。工作人员带着图纸，多次前来找赵一商量给他盖楼的事宜，可每次都被赵一婉言谢绝。赵一说：“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几年，专门给我盖房这不是浪费嘛！我住现在这个房子挺好的，何必为我一人劳民伤财呢！”

工作人员说，这可是中央军委拨的款啊，别的红军楼都已经盖起来了，赵厂长你高风亮节，但也得让我们给上级领导一个交代啊！

机车厂远离市区，文化生活单调。一想到工厂连个图书室都没有，赵一有主意了——对，就用建红军楼的钱，给工厂修一个文化楼！一定要有图书室！没有图书室，年轻人的学习怎么办？

上级领导批准了赵一的想法，消息传开，自开工到竣工，没有任何人号召，整个机车厂的工人都自发地来到开工现场，义务参与文化楼修建工程，一分钱都不要。工人义务参加基建，文化楼的人工成本全省下来了，原本只够建三层楼的特批款项，硬是给修出来一栋四层的大楼。

文化楼修起了，图书室建起来了，里面总是坐满了阅读学习的人。除了图书室，文化楼还开设了各种兴趣协会，在一层，还专门设置了供退休老工人休闲娱乐的棋牌室。

文化楼建设期间，赵一的双腿已经瘫痪，只能靠轮椅出行。哪怕是生病从医院出来，赵一的第一站必定是文化楼。在施工现场，赵一关心的问题太多太多：设计、构图、如何更合理划分房间功能，乃至工地上工人们休没休息好，有没有水喝……

时至今日，这座饱含赵一期望和心血的文化楼，已更名为二仙桥街道文化活动中心，静默地伫立着，于无声中，滋养和丰富着当地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

赵幼兵说，父亲的品质，一句话是概括不了的。用老工人们的话来说，那就是——老红军就是老红军！

老八路的人文情怀^①

/张义奇

—

1974年春天，719厂（原新兴仪器厂）发生了一起震动成都东郊的大事件——为了保住一个普通工人被冲床切断的四根手指头，719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裴亚东在12小时之内，居然为一名普通工人的断指再植，申请到了专机飞上海！

一时间，这起工伤事故成了各厂区的谈论热点，但是人们谈论的并非事故本身，而是事发后，工厂领导对伤者所采取的极高规格超乎想象的处置措施，人们无不庆幸这个受伤的青年工人真是碰上了好时代。

事情是这样的：4月24日这天上午，719厂二号车间青年工人肖大安正在操作63吨双行程引申冲床，一个人忽然来找肖大安“摆龙门阵”。那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什么岗位责任、安全操作之类的制度早被破坏殆尽，工作期间串岗聊天的事随时都有，不料这次惹出了大祸。正在全神贯注给冲模上料的肖大安，听到人喊，猛然回头，竟忘了收回送料的右手，刹那间，飞快的冲头齐杵杵切下了他四根指头。

^① 参考文献：《裴亚东革命回忆录》（内部资料）。

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了在场的工友，短暂慌神之后，工友赶紧收拾起被切下的断指，伤者也捂着手向工厂医务室飞跑。医生做了简单包扎，立即联系工人医院（即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请求支援。很快，一辆救护车就呼啸入厂，将伤者迅速转到工人医院治疗。

车间领导很快把肖大安受伤的消息报告了厂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裴亚东。裴亚东询问情况后，也立即赶到医院慰问肖大安，同时请求医生尽量保住肖大安的手指。

此刻，在工人医院外科手术室内，医生被肖大安的伤情惊呆了：食指断了两节，中指和无名指全断了，小指断了一节。如此严重的伤情，如何治疗，医生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手术室外，裴亚东和车间负责人在走廊上来回踱步，焦急等待手术结果。

工人医院领导也赶来了，在和医生简短商议后，向工厂领导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将伤指进行缝合处理，伤口很快就可以愈合，但同时意味着伤者从此就失去了四根指头，右手便残疾了。二是进行断指再植。但是断指再植，成都的医院当时都尚未掌握此技术，必须立即将伤者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才有希望救治。

听到“残废”二字，裴亚东感觉神经像触电一样瞬间颤抖起来，战争年代左腿受伤致残那种痛彻骨髓痛彻心扉的感觉，顿时向他袭来。恍惚间，他看见青年时代的自己在“皖南事变”后，被120师敌工部派到中共晋绥三分区地委敌工站工作，时常往来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在敌伪扫荡中，穿梭盘旋，健步如飞；又看见自己因为敌伪军扫荡摔断了左腿，躺在担架上四处转移得不到救治……

1942年腊月初八这天，23岁的青年敌工干部裴亚东，孤身一人深入到阳曲一区河口敌据点工作，不料在返回游击区途中，经过一个村庄时，突然遭到一阵猛烈的袭击。裴亚东一边掏枪还击一边撤退。不幸，就在跳下一个土崖时，摔断了左腿骨。情急之中又身处孤立无援之境，裴亚东心想这次完了，遂忍着剧痛，赶紧将随身携带的文

件、银圆、伪钞以及通讯员回家时留下的马枪都妥善埋藏，自己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由于是晚上，加之天寒地冻，崖上搜索的人没有任何发现，便撤走了。天亮以后，裴亚东被老乡救回村里，正准备请郎中来接骨，又遭遇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扫荡。老乡只得把他抬回游击区。游击区只有一个医护兵，没有医生，勉强找到一个乡村郎中来治疗，结果腿骨却被接坏，从此左腿就瘸了！虽然说左腿是因抗战致残的，在很多人眼中标志着荣誉和功劳，但是裴亚东恨死了左腿带给他的残疾和伤痛，瘸腿从青年时代开始，至今让他痛苦不堪！

深受残疾之痛的裴亚东，懂得伤残对一个青年人意味着什么，他岂能眼睁睁看到一个青年工人的手指就此毁掉？一位八路军老战士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此刻绽放出了异彩——我的伤残是因为战争年代环境艰难所致；如今是和平年代，医疗条件那么好，绝不能让一个工人成为残废！他还那么年轻，失去手指将来怎么生活？

“送上海！”裴亚东几乎没有多想，当即做出了决定：为了保住肖大安的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决定！在那个坐飞机尚讲究一定行政级别，而且还要单位出具证明才能买到机票的年代，为一个受伤的青年工人包一架专机，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许多老工人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裴亚东立即驱车赶到四川省国防工办汇报，又亲自分别向省委书记谢正荣和省革委负责人请示，由省委与西南航空局协商，最后由民航总局批准，同意立即派出专机。

这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办妥，伤者当晚就被送到上海，为手术的成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肖大安的手指终于保住了！这是一个创伤治疗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不仅仅是现代的医学技术，更有裴亚东这位老八路的人文情怀。没有这位到任 719 厂不久的企业领导的果断决定，上海医院再高超的医学技术，也挽救不了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手！

719 厂专机送伤员的事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整个东郊，在社会上

引起很大轰动，不仅《成都日报》发表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配乐专题报道，而且还被改编成题为《情深似海》的连环画，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全国发行，成为那个年代一段温馨的记忆。

肖大安的故事，不仅在社会上感动了许多人，也给 719 厂的干部职工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让大家对这位刚来不久的裴厂长有了新的认识。不知不觉中，人们把这份来自工厂领导的人文关怀，转化成了积极的生产热情，已经连续两年未完成生产任务且处于亏损的工厂，竟在 1975 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这不能不说是那个年代的奇迹。

二

裴亚东是 1973 年由长春 228 厂调来成都 719 厂的。

裴亚东个子中等偏高，身体微胖，头顶毛发稀疏，额头发亮，胖胖的国字脸透露出干练的神情。在厂区的车间、科室以及宿舍区的小路上，职工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身着中山装，手提一黑色皮包的中年人，拖着一条残疾的腿蹒跚而行。大家印象中的裴厂长，脸上总是爬满严肃，这大概是 70 年代中后期，面对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时代许多领导干部特有的表情吧！但在裴亚东严肃的表情后面，仍然能看到一位长者的仁厚。

由于裴亚东身体有显著的残疾，左腿弯曲，走路一瘸一拐，刚来厂时，老老少少都在背地里说厂里来了跛子厂长。此话虽说不上贬义，却也多少有些不恭。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裴亚东的瘸腿是抗战留下的创伤，是一位革命者光荣的人生记录。

然而，自从“包机”之后，人们对裴亚东肃然起敬，背地里很少再听到有人称他“裴跛子”，而多以职务尊称。工厂职工对他们的领导在情感上有了显著的变化。

其实，裴亚东在 228 厂就深受职工们爱戴拥护，和职工关系十分融洽。他在 228 厂生活了 10 年，真正有职权的工作只有两年，多数时间都在“劳动改造”，但就在这两年时间里，他不仅让已经停建 3 年的工厂迅速恢复了活力，而且很快生产出我国第一台航空照相机，解决了空军装备的一大难题；同时还生产出坦克观察镜、坦克驾驶指挥镜、水陆坦克潜望镜、高射机枪瞄准镜等一批军工产品。裴亚东在努力搞活 228 厂生产的同时，也非常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他常常走进普通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困难疾苦，对职工们面临的交通、住房、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总是千方百计予以解决。当他调离 228 厂要去成都时，许多职工自发来欢送他，老工人们饱含热泪拉着厂长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这就是民意，是人民群众对于他们爱戴的老干部所表达的淳朴的感情！

来到 719 厂后，裴亚东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除了组织军品生产、开发民用产品，解决职工的困难总是他心中的挂牵。譬如，719 厂职工农村家属医药费问题，困难职工经济补贴，职工子女教育、就业、职工住房保障、文化娱乐等诸多问题，都在他的主持下陆续得到解决。

包车送一个普通工人去上海治疗工伤，已经够让人感动了，然而包车之外，最让 719 厂职工感动的是，肖大安在上海住院治疗的日子里，裴亚东不仅到肖家探望、安慰肖母，而且还亲笔写信，鼓励肖大安要坚定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裴亚东出差去上海开会，还专门抽时间去医院探望肖大安，使这个身心遭受严重创伤的青年工人受到了极大鼓舞，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组织和上级领导的温暖关怀。

肖大安伤愈回厂后，为照顾他的身体，裴亚东又指示工厂有关部门调整肖大安的工作，并在工厂宿舍区给他分配了住房。

裴亚东对普通职工的关怀不是作秀，而是出自一个领导干部和仁厚长者的人文情愫。唯其如此，他才会为了抢救一个青年工人的手指，毫不犹豫地申请专机。

三

裴亚东 1919 年 10 月出身于晋西北兴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中学时期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在红军东征期间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又参加西盟会，进入随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在此期间，又考入抗大高级军事队。

裴亚东的理想是抗大高级军事队毕业后去军队带兵打仗，没料到却被指名抽调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受训，结业后被分配到 120 师敌工部当干事。敌工部的工作就是整天和敌伪人员打交道，生命时常受到威胁，但裴亚东总能凭着自己的机敏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期间，他曾两次在战斗中成功地争取了日本兵，使他们都成了反战人士，甚至有的人后来还成了日本共产党的干部。

在游击区摔断腿骨后，裴亚东被调离了敌工部。之后，他拄了几年的双拐杖，1944 年整风运动结束后，因腿残疾转业到晋绥边区行署做民政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尚未丢掉拐杖的裴亚东再次被部队召回，成为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任处长的军法处下属拘留所审判员。1948 年 9 月，裴亚东再次奉命调往晋绥军区（后改为西北军区）兵工部四厂任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协理员，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军工生涯，也见证了中国当代军工的发展与壮大。

1950 年，裴亚东转业到地方工作，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人事处副处长，1953 年由西北局调入苏联援建中国的 156 项目之一的 784 厂任筹备主任，之后又转任 785 厂筹备主任。784 厂就是几经辗转后最终落户成都的锦江电机厂，人称 107 信箱。

1955 年，已经不在军队工作的裴亚东，荣获国家颁发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裴亚东在相继筹建 784、785 两个工厂后，被调往哈尔滨 674 厂

任副厂长。到1957年，国家为培养军工企业领导干部，专门抽调一批人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裴亚东被保送到北京工业学院学习了五年导弹专业，毕业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导弹局地对地导弹处处长。

1964年，裴亚东奉调到长春228厂任厂长，在这里工作10年，虽然只有两年真正发挥作用，但就在这短短的两年中，裴亚东领导的228厂，为国家的军工建设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2016年出版的《吉林省志·人物志》一书，收入了“裴亚东”词条。据编者的说明，能够进入该书的均是在吉林省有重要影响和有规定级别各类人物。此时，裴亚东已经作古10多年，而且他生命的最后20年并不属于长春，而属于成都东郊。但他曾经的光荣，却被历史牢牢记住了。

1973年，裴亚东来到成都，在719厂相继担任了10余年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在此期间，裴亚东领导工厂干部职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努力保证军品生产，同时积极开发民品，使工厂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渐渐走出来，而且得到了一定发展。

198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裴亚东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各级领导班子“四化”的要求而离职休养。但裴亚东离而不休，不仅继续为工厂发展献计建言，并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新产品开发寻求出路。

裴亚东十分重视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常接受一些学校邀请，去为学生做革命传统报告，还不辞辛苦撰写回忆录，以自己数十年的人生经历讲述中国当代历史的巨大变迁。

离休后，裴亚东还积极为民代言，从1987年开始，他就连续两届当选为成都市东城区人大代表，以后又连续当选成华区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表，裴亚东向政府先后提出了数十条建议，这些议案涉及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百姓生活等诸多方面，多数都被政府采纳，为成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7年，裴亚东因病去世。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老八路、老军工，带着战争的创伤和一生的荣光去了天堂，而他为一名普通工人断指再植申请专机的故事，却长久地在成都老东郊人口中传诵。

我们的郭老头

——784 厂第一任厂长郭克

/杨传球

一参加工作进厂就听说了郭克厂长的大名，知道他是个性格豪爽的老革命，就很想见到他。入厂教育时本来他要给我们讲话，却因为突然出差没能来。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一个雨天的上班路上。那天，雨虽然下得很大，但上班的人依然跟平时一样多。当时，公交车很少，到厂北路只有一趟 6 路车，天天挤得几乎爆肚。我打着伞，一边走，一边避让着身边的自行车。忽然就听到有人喊：“郭老头！下那么大的雨，怎么不坐汽车？”我循声望去，就看见一个微胖的身影，披着军用雨衣，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一边吱嘎吱嘎地顶着风雨拼命蹬车，一边用北方口音大声说：“少说废话，加油！”说着就蹬过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郭老头就是我们的厂长郭克。

郭克是由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的 784 厂（原锦江电机厂）第一任厂长，河北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做过武工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曾在“二野”陈再道将军手下任过参谋长，南下入川后任内江行署专员。战火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豪放的性格，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浓重的河北口音里带有几分霸气，透出特有的军人气质。由于平时爱跟工人聊天开玩笑，工人们都爱喊他“郭老头”，其实他当时只有四十多岁。

1953年，成都东郊工业建设拉开序幕，郭克继任784厂筹备组主任，他与筹备组的同志一见面，便用略带神秘的口吻介绍了784厂的性质和重要性，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终身都献给784厂，为新中国的军工事业而奋斗。

从1954年开始，784厂进入基建阶段，建设任务异常繁忙，郭克与筹备班子常常忙得连轴转。那时，筹备组虽设在招待所里，但他平时办公、吃住大都在工地，天天跟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有时候忙起来，晚上就睡在工棚，夜里有什么情况，他一轱辘就翻起来，披上件衣服就赶往现场进行处理。他完全把建设工地当成了自己的阵地，把盖厂房当成了打仗，对生产建设的那份热情，下属们常爱用“亡命”来加以形容。当时厂房建设机械化程度还不高，很多工作都得靠人力。为了加快进度，他带领全体筹备人员，每周都要参加一两天义务劳动。他身先士卒，带头挑土、搬砖。当时郭克已经不年轻了，搬砖、挑土这些重体力活干一天还是很累的。筹备组的同志就劝他，你年纪大了，重活你就不要干了！他却说，别废话，不过就流点汗嘛，要是打仗还得流血呢！

随着建设进度的加快，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机床设备开始陆续进厂，郭克更是忙得不可开交。1957年夏天，一台由苏联制造的大型冲床运抵成都东站，当时直达工厂的专用铁路线还没有修通，机床只能由工厂派车提运。该冲床重约20吨，搬运这样的大件，在今天看来是小菜一碟，但当时在成都却找不到一辆能承运它的重型卡车，要想移动它真的很难。面对这样的难题，有人唉声叹气，有人提出到外地去租重型卡车。郭克果断地说，少说废话！一个铁疙瘩还能拦住我们的路？他一发话，大家都抖起了精神，纷纷出主意、想办法，终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用垫木、滚筒将机床垫起来，然后用手动绞车一段段拉动。从八里庄火车站到784厂，距离虽然只有几公里，但公路是碎石路面，凹凸不平，白天还有那么多汽车通过，很影响速度，每天只能移动一两百米，起码得用半个多月才能将机床拉回来。有人

又犹豫起来。郭克一挥手说，别议论了，就这么干！接着就亲自指挥，每天出动100多人，顶着烈日酷暑干。为了少影响交通，夜晚更是不休息，三班倒轮番作战，连续拖了十几天，硬是把这个庞然大物一寸一寸地拽进了工厂。

随着784厂筹建工作的推进，被派往重庆、南京等老厂学习的工人和技术员，陆续学成回厂，从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也分配到厂，更有一批高级技术人员从苏联学成归来，工厂的职工越来越多，技术力量一天天壮大。为了给国家早日做出贡献，郭克提出了“边建设、边试制、边生产”的方针，利用已建成的厂房和现有设备，积极开展试制工作，既能锻炼队伍，熟悉设备，积累经验，又可为下一步正式开工做好充分的准备。

正在这时，碰上1957年上半年国家压缩基建投资，784厂一度面临下马缓建的命运。郭克心里万分焦急，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方设法避免下马。这个从战场走出来的老战士深知，只有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的部队才能在战场赢得生存，要想不被淘汰，自己就必须做出成绩。于是，他立即进行动员，组织已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利用已到位的100多台机床设备先干起来，建起临时试制车间和工具车间，因陋就简地开始了试制练兵。经过努力，到1958年4月，竟然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装配出第一部B43测高雷达正式样机，次年通过了国家鉴定。当受聘指导这个产品的苏联专家彼得洛夫于1958年12月来到784厂时，已经无事可做，一个多月后就提前回国了。同时，工厂还试制成功了401型二级电子管收音机，参加了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颇受好评。苏联土建专家索特尼夫回国时，郭克代表工厂将一台401型收音机送给他，他非常喜欢，对收音机连连称赞。

正因为有了这些成绩，784厂不仅没有下马，还受到了部里表扬。在国家继续投资支持下，1958年12月4日，784厂正式建成投产，当时职工4000多人，被定为甲级保密单位。郭克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厂长。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1960年，在784厂工作的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当时，我们的雷达生产刚刚起步，很多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面对这一大堆难题，郭克冷冷地说，没有洋师傅，不是也弄出了B43机？我还不相信，离了这些大鼻子就造不出雷达了！

就在这时，美蒋高空侦察机频繁袭扰我西部腹地，刺探军事情报，部队急需引导雷达。而此前从苏联引进并准备仿制的引导雷达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进，研制出更先进的引导雷达。四机部王铮部长把郭克叫到北京，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一生只习惯于说“保证完成任务”的郭克，照例没有二话。他接受任务回厂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和部署。技术部门提出改进方案后，郭克对他们说，你们大胆试验，我给你们创造条件、当好后勤，成功了给你们记功，失败了我来承担责任！紧接着，就任命副总工程师李兆芳牵头组建了研制、攻关班子，并亲自晋京汇报情况，得到了四机部王铮部长、总参张爱萍副总长的支持。国务院、总参谋部又联合发文，将老双流机场部分使用权划拨给工厂，建起了双流天线测试场。郭克随之调派人力，在老双流机场内建起了100多米高的天线测试塔，为后来一系列新型雷达的研制创造了必要的测试条件。除此之外，他还派出技术人员到新津机场、凤凰山机场、太平寺机场做了大量试验，取得一组组天线波瓣数据。最终，王铮部长批准了工厂的设计方案，并决定分两步走，研制生产S40和S41雷达。

在我国利用苏联萨姆2地空导弹击落美式U-2型高空侦察机之前，1959年中央就决定研制自己的地空导弹“红旗2”。地空导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784厂承担了其中遥测遥控系统的研制任务，这是地空导弹的指挥中枢，决定着导弹的精准度。当时这是绝密任务，代号B48，从设计到生产处于全封闭状态。为了保证任务按时顺利完成，郭克亲自选定领导班子、选配技术人员，从多方面保证了“红旗2”相关产品的合格交付。1962年，国产“红旗2”首次击落美

式 U-2 高空侦察机，784 厂生产的红旗遥测遥控系统以及测高雷达、引导雷达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立了大功。当部里发来机密通报，郭克高兴得不得了，但又得保密，他就下令食堂杀猪给职工每人一份红烧肉。当时生活很艰苦，难得吃一顿肉，职工吃了肉还不知为什么。有人就问他，郭老头，不过年不过节咋个请吃肉？他只笑哈哈说，请你吃肉你就吃，哪有那么多废话！过了好久，有人才听说那顿红烧肉跟打 U-2 飞机有关。

郭克虽然是行伍出身，不懂技术，但他十分尊重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老同志都知道，他手下有“四大金刚”：设计所所长袁根培、工艺科科长张大鲁、总装车间主任蒋荃、生产计划科科长沈义宏，这四个人是郭克进行重大决策的主要参谋，遇到重要事情需要研究，他都会找到他们，听取意见，反复研究，再召开厂务会议进行最后拍板。除了依靠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他对技术工人也十分重视，把高级技术工人个个都看作宝贝。他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全厂各车间五级以上技工的名字。厂里唯一的八级钳工万德胜，以及七级钳工李宝如、高级吊装工王来顺等更是他的“心尖尖”，开全厂职工大会时，常常请他们坐主席台，大会小会号召青年工人向他们学习。这些技术骨干谁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会过问，谁生病了他一定要亲自看望。由于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都尊重他、信任他，总是跟他讲真话。

1960 年，784 厂位于建设路的宿舍区基本建成，职工生活有了较大改变，但工厂与宿舍区之间距离六七里，每天早上上班就像部队拉练一样，总是急星火火。当时，很多职工连自行车都没有，只能靠步行；一部分职工虽有自行车，路却是坑坑洼洼骑车很吃力。那时，建设路还是一条碎石路，周边在建的工程又多，卡车时刻来回在土道上穿梭，把路压得凹凸不平，车一开过便扬起漫天灰沙；而一遇到连天下雨，路面便泥浆淤滞，积水横流。职工上班，雨天两脚泥，晴天一身灰。郭克也跟大家一样，骑着一辆周身都响的旧自行车，一边跟同

路的职工聊天，一边吱嘎吱嘎地蹬车前行。当时 784 厂是地市级单位，上级给厂领导配了一辆深蓝色的“奔驰”和一辆灰色的“华沙”轿车。他是 12 级高干，是可以坐车上下班的。但除非因公或者接送专家和重要宾客，他天天坚持与职工一起骑自行车上下班，直到他离开工厂也从没有坐过一次轿车上下班。由于他的带头作用，其他厂领导上下班也全都走路、骑自行车，没有一个坐轿车的。他的作风一直影响了后面三届厂领导班子。

会带兵的将军都爱兵。郭克知道，职工的体质直接影响生产力。工厂开工不久，国家就连续三年遭遇困难，粮食定量降低、肉蛋吃不上，而工厂的科研生产和试制任务又重，职工经常加班加点，长此以往，身体是会拖垮的。怎么样既可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又不违反国家政策法令？郭克想方设法，派人到专县与地方政府联系，办养猪场、奶牛场、养鱼场，利用工厂空闲地块种蔬菜，尽量保证职工吃饱，每月能吃上几次荤腥。对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科研技术人员配发牛奶鸡蛋，保障了职工的健康。但是郭克对自己却很苛刻，上级配给高干的牛奶鸡蛋等营养品，他经常分送给技术骨干和老工人。人家不收，他就以组织名义强迫人家收下。

为了提高职工体质，活跃职工业余生活，让职工下班后能打打篮球，宿舍区建成不久，郭克就提出要建一个篮球场。为了节省经费，他带领党团员和机关干部利用下班时间义务劳动，硬是用炭渣炭灰铺设场地，白手起家平出了一个大坝子，然后矗立起两副篮球架，又在篮球场搭起两个木架，装了几个大灯泡，建成了简易灯光球场。有了灯光球场，职工下班后就可以打球了，车间之间也开始了篮球友谊赛。郭克只要有空，晚上便会来到球场，跟职工一起玩。

郭克虽然在工作上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但工作之外，跟职工十分随便。郭克爱下棋，常常利用午饭休息时间，与人“杀上一盘”。他棋臭瘾大，屡战屡败，却从不服输，偶尔赢一盘，便高兴得眉飞色舞，掏出烟来见人一支，不一会儿，一包烟就没有了。就因为跟职工

亲切随便，所以有些工人就喊他郭老头，他也全不当回事。其实，也只有工人才爱喊他郭老头，干部一般是不喊的。中层干部对郭克既尊敬也有点怕，因为他对中层以上干部要求特别严，批评起干部来常常不留情面。有一次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他老婆因为车间的一些事情迟到了几分钟，被他劈头盖脸当场训得下不了台。这事后来一直在职工中流传，事后有工人跟他开玩笑，郭老头，晚上回家老婆罚你跪搓衣板没有？

经过几年的努力，784厂已经形成了以测高雷达、引导雷达和“红旗2”三大军品和气象雷达等民品的研发生产能力，郭克正在筹划更上一个台阶时，1966年，他奉调离开了亲手创建的工厂、亲手带出的队伍，担任四机部广元081基地主任，1975年调任四川省电子工业厅厅长，之后又担任四川省计经委副主任。

1981年，郭克去世。转眼间，他已经与我们分别几十年了，但今天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那样生动、亲切。老同志一摆起他来，一口一个“郭老头”，说到他输棋时的可笑样，还会哈哈一笑；而提到他的作风、人品来，便会肃然起敬；谈到他对工厂的贡献，更是由衷佩服，哪一幢厂房、哪一部雷达上没有留下他的心血？

建设路与几十年前相比，变化天翻地覆，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但我每天踏上建设路，脑际间还是会浮现出当年行人如织、自行车如潮的上班景象，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第一次在暴雨中看到郭克的情景，仿佛隐约听到他正在大声喊：“少说废话，加油！”

其实，郭克的一生都在风雨中前行，早年迎着鬼子的炮火参加革命，中年后迎着困难创业，脚下再多的坡坡坎坎也挡不住他，只知道一个劲“加油蹬车”。

这就是我们的郭老头！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

——记成电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吴立人

/杨红

六十多年前的沙河，河面开阔，河水清澈，河畔新栽下的梧桐，嫩叶在清风中摇摆，环绕四周的是一片片整齐的稻田，三五民居散落其间，一派安静闲适的田园风光。谁曾想，几年间，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将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

六十多年前，一个中等身材、英气勃勃的中年男人，站在这片土地上，用他略带保定口音的普通话，铿锵有力地告诉大家：要将成电办成万人大学，拥有千部机床，将沙河变成成电的内陆河。他，就是成电的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吴立人。

吴立人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前参加地下党，抗战时期担任过冀中九分区地委书记兼九分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抗战后担任过保定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冀中平原的一位抗日先驱，领导冀中群众创造了地道战、白洋淀水上游击战。原九分区和白洋淀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他在战争时期的英勇。据说李英儒的著名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同名电影中的主角、地下党领导人杨晓冬，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在抗战初期，他还协助新中国首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创办过河北抗战学院，为抗战输送了

一批革命干部。正是这次办学经历，使吴立人与高校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将他与成电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5年5月，为了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将当时国内理工科实力最强的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华南工学院的电讯系调出，在成都组建我国第一所无线电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同年11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局局长吴立人被任命为新建学院的筹委会主任。

刚刚开始筹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址还是一片农田，要求却已经下达：必须在1956年秋季招收新生，按时开学！

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分散在上海、南京、广州三地的三个系的师生、物资、图书、设备迁往几千里之外的成都，在一片农田上建立一所新的大学，谈何容易！

吴立人毅然接下军令状，担起了这副千钧重担。一到任，他就马不停蹄地带队到三个学院开展调研，从学校的设备、图书资料到教师 and 学生的思想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有针对性地展开大规模的宣传，鼓励师生“为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工业学校贡献力量”。

那时的通信、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学院筹委会在北京，直到1956年6月，才从北京搬迁到成都。筹委会委员多为三校领导，各有业务在身，分散三地。身为筹委会主任，吴立人为开展工作不得不经常奔波于京、宁、沪、穗四地，为新学校的早日落成，反复与三校的专家教授们商议筹划。

之前的办学经历，让吴立人深谙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要想办好一所大学，就得尊重知识分子，发挥专业老师们的积极作用，虚心向老师们请教，请他们为建院建言献策。以此为指导思想，吴立人搭建了以教师为主体的筹备组工作班子，委托童凯老师负责筹建新院图书馆，吴桓基老师负责新院主楼实验室电气线路的设计安装工作，吴敬寰老师负责新院招生工作，毛钧业老师负责

在上海采购新院仪器设备工作，林劲先老师负责筹备新院的教学工作，刘树杞老师负责筹划聘请苏联专家工作，陈尚勤老师负责交通大学的迁校工作，张志浩老师负责三校搬迁及新院总务工作……

大家在吴立人的统筹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合作，共同努力，保证了学校搬迁、主楼建设、校舍配套、仪器设备采购、苏联专家聘请、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招生等各方面的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那是何等的高效啊！1955年开始筹建，1956年1月选定校址，4月11日主楼破土动工，8月，一艘3000吨的大轮船，已经载着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的师生和家属、仪器设备、图书向成都开拔了！轮船逆流而上，经武汉、宜昌到重庆后弃船换车，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来到成都，来到绿树成荫的沙河畔——吴立人激情挥臂、宣告将要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办成一座万人大学的那块土地上。

1956年9月17日，学校如期开学，新入学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子们，在还未装上楼梯栏杆和座椅的电讯工程学院主楼，迎来了他们新学期的第一堂课。

依靠教师的力量，学院筹建任务得以在短时期内顺利完成，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如期招生如期开学，这更加坚定了吴立人依靠知识分子办学的决心。毋庸讳言，吴立人对人才的重视和大胆使用，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据他儿子吴淳回忆，在学校创办之初，吴立人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为学校找来从国外回来的一批电子方面的专家。在成电的筹建过程中，吴立人亲自到各知名教授家中做思想动员工作。据同为筹备组成员的林劲先先生回忆，当时交大有一位叫刘侃的教授，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在吴立人的感召下，坚决报名来成都参加学校的筹建，并带动了一大批青年教师来到成都工作。

每当有教师从上海、广州、南京到达成都，吴立人都会亲自去车站迎接，他说：“这些专家学者都是了不起的，他们放弃了繁华大都市优越的生活和比成都高的工资待遇，举家搬迁来成都参加新学校的

建设，奉献学识，我们理所当然要关心和照顾好他们。”

早在成电筹建初期，吴立人在写给电讯专家黄亦衡、周玉坤的信中就提出：“新校的情况是任务重底子弱，将来一定要动员全体教师来办校，使每个人都参加工作，让每个人做其所擅长的工作，以求全面发展提高。”

在学院首届开学典礼上，吴立人更是旗帜鲜明地对学校管理干部提出要求，强调要“全面细致地贯彻为教学服务的精神”，响亮地提出，为教师做好服务，服务教师，就是服务教学！

吴立人对人才的重视，使得建院初期的成电汇聚了一批电讯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包括多位我国电讯技术和教育界的前辈和知名人士如张熙、陈湖、周玉坤、童凯、陈茂康、许德纪、龚绍熊、吴敬寰、唐翰青、黄亦衡等，为学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立人对师生的关心和爱护，给老一辈成电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没齿难忘。张志浩老师在其回忆文章中称吴立人为“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他说吴立人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有一次，童凯老师不慎手指受伤，本打算步行去医院，吴立人知道后，立即派学校唯一的吉普车送他去。多年以后童老先生仍对此事念念不忘。

一位成电的女教师到东北某温泉疗养风湿病，因临时汇款不到，找到吴立人请他接济一下以渡难关。彼时吴立人已调离成电，对于这位素未谋面女教师的求助，却慷慨解囊，一出手就是 180 元！要知道，当时一位助教的月工资才 53 元。

“反右”运动中，吴立人坚决反对将那么多的学生和教授定为“右派”。工作组说：“他们不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你连香花、毒草都分不清，你就是右派！”吴立人没有屈从，坚持自己的意见，保住了一批学生和教师，却没能保住自己，工作组准备将吴立人划为“右派”。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由于周总理不同意把这位抗战前就入党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定为“右派”，吴立人才侥幸被改定为“严重右

倾”，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由七级降到八级。

1959年，吴立人被悄然调离成电。

1979年9月17日，吴立人因病逝世。

在成都首届开学典礼上，吴立人曾激情洋溢地宣告：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办成我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流的无线电大学！

历经六十余年成电人的努力，吴立人当初的设想，已经成了现实！由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到大名鼎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与国内著名高校并驾齐驱，全国许多有志于尖端电子科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以考进成电为荣。

建党百年之际，回望成电建校历史，吴立人为成电的创建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历历在目，其崇尚科学、尊师重教的办学宗旨，早已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目前，这所大学正秉承“求真、大气大为”的精神，迈步在电子信息尖端学科的前沿。

吴立人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入党宣誓 72 载

——红光综合厂原厂长高富许的革命生涯

/钱玉趾 刘婷乐

14岁就参加革命的抗日老兵高富许，离休前曾担任773厂（原红光电子管厂）厂长。从1944年在山西临南县参军，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副厅级干部光荣离休，高富许最终在成都东郊这块热土上，完成了一个由穷孩子到工业干部的蝶变。建党100周年之际，92岁的高富许，回忆起一生的革命经历，不禁感慨万分——773厂在国防工业战线上创下了前无古人的骄人业绩，作为773厂的建设者，能为国防工业一线倾心力，那是他一辈子的荣幸！

高富许1929年11月出生在山西省离石县大西局村一户穷人家里，8岁就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干农活，一双鞋后跟都磨没的烂鞋子，用麻绳捆在脚板上，扛起扁担，挑粪给地里送肥。沉重的粪筐压得他走路打偏偏，他歪歪扭扭高一脚低一脚，咬牙和父兄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高富许的家乡离石县紧邻陕西的吴堡和绥德，而绥德西南不远处，就是革命圣地延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八路军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根据地。得此天时地利，少年高富许得以在1944年2月参军，

小小年纪，便成为中共临南县游击大队的一名勤务员和通讯员，开始为消灭日寇、保卫国家而奋斗。

1945年3月，高富许调入《抗战日报》印刷厂工作，之后担任铸字制版部主任。《抗战日报》是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报名为毛泽东主席题写。该报的三大任务是：“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团结到底、坚持晋西北的建设。”贺龙司令员曾说：“一个强有力的报纸，与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同等重要，《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全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

由于敌人的封锁扫荡，抗日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住窑洞，吃黑豆乃至战火中烧焦的粮食。粮食紧缺，一人一天的定量只有0.625斤（旧秤10两）。日本鬼子进攻时，还要拿枪作战、转移、搬迁。游击抗日作战，游击抗日办报，《抗战日报》的任务很重，还经常出“号外”，月排100多万字，印纸21万张。为了确保报纸正常出版，高富许吃住都在印刷厂里，晚上睡在地板上，有时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缺乏纸张、油墨，高富许千方百计自制、找替代，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高富许被评为“晋绥边区乙级劳动英雄”，边区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状、奖品，表彰他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革命的道路上，高富许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于是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盼望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48年5月1日，党支部批准了高富许的入党申请。面对鲜红的党旗，高富许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自那以后，高富许时刻铭记自己的誓言，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9年9月，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并继续向中南、西南、西北胜利进军。高富许随军入川，先在川西日报社、四川日报社工作。在报社工作期间，党和政府为了提高工农兵干部的文化水平，对他们进行了专门培养。工作上兢兢业业表现出色的高富许，被组织

上送去重庆大学附高理工科学习4年，改革开放后，高富许又进入四川国际科技与经济管理学院厂长经理高等函授班学习，取得了结业证书。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掀起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大批南下干部被派往工业战线。1956年，高富许调入788厂，任党委办公室秘书。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富有开拓精神，在党员的教育培训、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做得尤为出色，788厂党委因此被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评为先进单位，高富许被评为先进个人。

788厂是军工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探照灯，用于高射炮照明，射击进犯敌机。其照明高程为9000米。由于航空技术发展很快，飞机已能飞至万米以上，于是，788厂停建，并入773厂。773厂即红光电子管厂，是隶属于电子部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雷达指示管、摄像管、显像管等电子束管，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电子高科技专业企业。高富许和788厂的干部工人一起，转到了773厂后，初期在厂党委办事机构工作。后来，为充实生产第一线的骨干力量，他被派往四号玻璃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

玻璃车间的主要工序是玻璃熔炼、产品压制。熔炉有1500℃的高温，用5吨或27吨压机压制显像管等管型的玻璃外壳，属于高温重体力劳动，生产环境恶劣，工作特别辛苦。这是啃硬骨头的车间，车间干部也必须有啃硬骨头的气魄与能耐。高富许一头扎入生产一线，在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广大工人技术员奋力拼搏，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773厂按照苏联专家设计的厂房已经建好，但是，苏联的机器设备却没有安装，玻璃系统的三个大厂房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再加上国民经济出现了困难，粮食严重缺乏，有许多人病倒，失去了工作热情和干劲。高富许和大家一样，也面临着粮食定量低、食物匮乏的困扰，但他仍然鼓足劲头，带领全车间职工，将三个大厂房周围的6000平方米的建后空地上的废砖、水

泥块等建筑垃圾清除，开荒种地，栽上南瓜、红苕、莲花白等杂粮蔬菜，获得高产。这一方面增加了副食，改善了职工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一方面也促进了基建、生产的有效发展，获得了全厂职工的赞扬。

“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恢复生产，占地 40 多万平方米的工厂，满目都是脏乱差，亟待解决。工厂新的领导班子任命高富许为行政科长，来啃脏乱差这块硬骨头。高富许没有辜负厂领导的重托，上任后，迅速制定了“工厂绿化美化规划”，经过艰苦努力，一举改变了长期脏乱差的面貌。高富许担任行政科长期间，773 厂两次被评为成都市环境优美工厂，一次被评为电子工业部清洁工厂，一次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工厂。由于为工厂赢得了极大的荣誉，高富许个人也因此被评为成都市绿化先进工作者。

不久，高富许任红光综合厂厂长（兼书记），又创造出了优良的业绩，该厂多次被成都市税务局评为“交税先进单位”。最后，高富许以副厅级干部光荣离休。

2008 年，在 773 厂建厂 50 周年前夕，高富许筹划、发动了 30 名玻璃系统（分厂）的员工撰写回忆录《奋斗的岁月》，书籍篇首收录了 16 页珍贵的彩色照片，其中有江泽民、李鹏、王震视察 773 厂的照片。773 厂原总工程师，后任陕西彩色显像总厂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祖垠，四川省四机局（电子厅）副局长（副厅长）牛季良，成都市电子仪表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孙毅方等欣然命笔，为此书作序。书中收入了高富许撰写的《从 773 厂玻璃系统艰苦创业到兴旺发达的回眸》。此文特别写到了苏联撕毁合同、企图扼杀这所军工企业的岁月，773 厂职工积极响应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克服困难，终于生产出多种合格产品，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艰苦历程。改革开放之后，红光厂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创造了新的辉煌，累计总产值达 8.4 亿元，利税过 3.1 亿元，创汇 4000 万美元，进入全国电子百强企业，荣获国家级金马奖，李铁锤厂长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等光荣史实，此书也做了忠实的记叙。

这本书在组稿与审校过程中，高富许亲力亲为，操劳奔波，最后还自掏口袋，拿出相当多的资金出版。这是一部军工企业的回忆录、创业史，出版后获得高度肯定和广泛的赞扬。

2014年，85岁的高富许激情地写下了《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一文，表达了自己不忘初心继续革命、保持革命晚节的情怀：“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克己奉公、艰苦奋斗、勇于担当。”此文在《蓉城金秋》公开发表。

2021年春光明媚的一个午后，笔者来到成华区原红光厂住宅区高富许家采访，聆听这位92岁的老人讲山西，讲抗战，讲入党宣誓，讲南下入川，讲军工企业艰苦发展……讲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喜庆年份，高富许向笔者重温了他72年前前的入党宣誓，并且深情地为我们吟诵了他发表在《蓉城金秋》上的一首诗：“深化改革动太空，神州处处醉春风。西部发展宏图，华夏子孙壮志雄。反腐肃贪时政稳，盛世耄耋颂党功。同心共创辉煌业，锦绣山河舞彩虹。”

面对白发红颜、精神矍铄的抗日老兵，聆听老党员铿锵有力的言辞，笔者心中不禁生出由衷的感动与敬仰。

要入就入共产党

——记川剧艺术家晓艇

/刘云奇

寒暑更迭，年复一年。从1959年到2021年，大半个世纪以来，东风路北一巷3号院内每天的锣鼓声和念唱声仍绵延不息……这里，是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所在地。院内，已届83岁高龄的一代川剧名家晓艇正手握茶杯，笑盈盈地坐在排练场的一角。一整个上午，他逐字逐句地讲解，一招一式地示范，反复地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将一本本川剧传统经典剧目，传授给后辈的演员。

时光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刚刚荣获“第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川剧小生晓艇一举红遍了大江南北。此时，有朋友想推荐晓艇加入民主党派，而晓艇的回答却异常干脆：“我要入就入共产党！”

怀抱坚定信念，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晓艇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晓艇！”名为“大家”的茶楼内，坐在窗边的晓艇缓缓点燃一支香烟，聊起了往事……

受难遇恩

1938年，在成都中莲池街的一户贫苦家庭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靠拉人力车供养一家生计的父亲找到饱学之士，为这个婴儿取名为“文华章”，以此寄希望于他能“以文出采，著就华章”。但因家中太过贫穷，文华章读了一年的私塾，父亲便再也没钱供他继续读书了。他家紧邻当时的华瀛大戏台，文华章辍学在家无事可干，便经常混进戏院去看戏。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幼年文华章痴迷上了戏剧，经常带着一群邻里小孩儿“扮戏”玩耍，他教大家将葱根蒜苗粘做胡须，有模有样地学起大人唱戏来。

姐夫见文华章喜欢唱戏，想到他这样在家既读不上书，也吃不饱饭，便把文华章带到了邛崃，让他跟着戏班子学唱川剧。年仅8岁的文华章进了戏班子如鱼得水，毫不怯场。到戏班的第三天，他便拉着大人的衣角上台，出演了《三尽忠》里的太子。虽然没有台词，但其有模有样的台风和乖巧的扮相，大获众人称赞，川剧名角王登福将文华章收作弟子。

拜了师的小文华章，一边帮师傅照看着烟摊，帮师娘带着孩子，一边学戏演戏。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也还算安稳。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终会学有所成，不料因为一句台词，文华章刚开始的学艺生活被砸得粉碎。

那是1948年冬月的一个夜场，戏班在新繁时钟茶铺的戏台上演出《打锅上堂》。戏开场有个“逆子不孝殴打父亲，父亲举木杖追逆子打至闹市”的情节。当晚，坐在台下看戏的恰是一帮国民党兵。在演至“父骂逆子”一段时，师傅王登福脱口说了句戏词——“你打老子嘛！谨防老子送你去当兵！”此话一出，台下的一帮国民党兵顿时勃然大怒。“好哇！戏娃子些骂我们当兵的是不孝子！打他龟儿子的！”士兵大闹戏院，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一路打到后台，吓得

躲在后台观音菩萨塑像后的王登福瑟瑟发抖。剧团管事万般无奈，只好把年仅10岁的文华章拖到一帮打红了眼的士兵面前，让其代师傅给众人磕头作揖赔罪。

“求兵大爷们恕罪！求兵大爷们饶命！”跪在地上的文华章痛哭流泪，一遍遍地磕头告饶，直至深夜，士兵们才悻悻而归。

士兵走后，师傅王登福心惊胆战地从菩萨像身后爬了下来。他满面沧桑地看着柔弱的文华章，长叹一声，沉重地说道：“娃娃，我现在不能教你了，你回成都去吧。这根矛子（花枪）你带着，算是留个纪念……”

10岁的文华章依依不舍地拜别了师傅，手握师傅赠送的花枪，连夜从新繁走路往成都赶。说来也巧，行至黎明时分，离驷马桥不远处，文华章又碰见了一支准备入城的军队。士兵见文华章手握花枪独自赶路，打趣地招呼道：“小鬼！要不要来当兵？”小文华章惊魂未定，只得怯生生地答道：“我不来，我还要回家去照顾妈老汉。”士兵们大笑，便邀其随军同行。一路上，士兵们对其照顾有加，做好了饭，便把热腾腾的粉条、豆腐端给文华章吃，这让文华章大受感动。后来，在和士兵们的聊天中方才得知，这支队伍的名字叫“人民解放军”！

“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天黑的时候，国民党败兵砸戏园子，走到天亮，解放军就进城了！那尊泥菩萨保护不了我师傅，但解放军却保护了我这个娃娃！要不是照顾妈老汉，我当时真的好想去当解放军啊！”回忆起这段往事，83岁的晓艇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学艺新生

回家后，文华章跟母亲端着盘子四处卖叮叮糖为生。成都解放后，川剧名家竹碗秋在锦江盐市口成立了蜀乐川剧团，因文华章天生“戏才”，而剧团中亦需“娃娃生”这一行当，于是，扮相乖巧的文华

章便进入了竹畹秋剧团，跟着剧团学习演出。

蜀育川剧团里名角荟萃——陈书舫、王国仁、谢文新、竹畹秋、薛少林、崔亚鸥等名角济济一堂，10岁出头的文华章趁此良机，拜川剧小丑名家王国仁为师，继续学习川剧。

王国仁对文华章甚是喜爱，常常提携其上台演出。那时，川剧大师陈书舫的高徒筱舫已小有名气，而筱舫的戏正需一个年龄相仿的男童配演，文华章便顺理成章地被选作筱舫的搭档。就这样，一对小搭档在戏台上越演越纯熟，越演越精彩，令众多观众喜爱不已。写戏牌的老先生为了给这对小搭档扬名，便参考“筱舫”一名，将“文华章”改名为“筱艇”。而后，因筱艇甚爱“黎明破晓”之意，便又将“筱艇”改作了“晓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成都文联将蜀乐川剧团、国民川剧团、永乐川剧团及悦来剧团合而为一，组编为大众戏院，这便是如今锦江剧场的前身。彼时，晓艇和筱舫、竞艳等人一起进入儿童组，一边学戏，一边学习文化。

20世纪50年代初，晓艇家中仍十分贫困。为养活父母，晓艇常去戏院食堂买大锅饭剩下的锅巴，拿回家给父母煮稀饭吃。

195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晓艇的生活突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接上级通知，他和筱舫等人将在团长陈书舫的带领下，赴朝鲜进行慰问演出！

一行人从成都出发，坐火车到武汉，见到了赴朝慰问演出团团长闫红艳。闫红艳当即给每个演员发了500元作为补助，这在当时可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年方15的晓艇拿到钱后，激动得都尿了裤子。

随团坐飞机去到朝鲜，在慰问志愿军三兵团时，晓艇和筱舫演出的《小放牛》等剧目，深受志愿军的欢迎。三兵团司令员吴忠是四川苍溪人，喜欢川剧，尤其喜爱这几个唱川剧的小演员，不仅经常把好吃的分给他们，慰问团回国时，还送了他们一人一套志愿军服装。

回国后，晓艇被调往重庆，这让他拜得了第三个师傅——曾荣

华。曾荣华是川剧小生名家，他不仅教晓艇唱戏，也教其敬业为人之理，这让晓艇受益匪浅。晓艇说，他的川剧艺术可谓“修行在成都，得道在重庆”。老师傅常说学戏不易：“学好了是戏饭，学不好是气饭。”为吃上“戏饭”，晓艇在重庆时“一天到黑都在背戏学戏，废寝忘食，不知疲倦”。

晓艇说：“解放前，唱戏的艺人地位低下，被贬为下九流，经常受地痞流氓的欺负，解放后，艺人成为堂堂正正的演员，受到尊重，川剧更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政府为川剧建立了正规的剧团、剧场，还让我们这些娃娃系统学习艺术，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可以说，我晓艇在川剧表演上能够有所成就，都和党的教育培养分不开！”

名震京城

“文化大革命”期间，晓艇由于一直在《智取威虎山》中饰演杨子荣，在《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等角色而活跃于舞台之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文化艺术百舸争流，不断推陈出新。成都市川剧院借此东风，创新编排了新派川剧《红梅赠君家》。《红梅赠君家》系川剧高腔，取材于传统剧目《红梅记》，讲述宋代贾似道府中歌姬李慧娘无辜被杀，死不忘情，化作厉鬼，救出书生裴禹，戏弄奸臣贾似道的故事。

该剧在传统的川剧唱腔中，创新引进了现代管弦乐，尝试运用现代和声，采用男声、女声、混声帮腔和齐唱等艺术形式，以增强剧目的表现力。试验演出后，在川剧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也属正常。但当时一位领导的一句话“歌不像歌、舞不像舞，应当受到处理”，却让川剧团的编剧、演员乃至音乐舞美们，顿时陷入了惶恐不安。

无奈之下，川剧团立即派人将《红梅赠君家》的录像连夜送到北京，找到当时中国剧协的负责人，并邀请一众京剧名家，对该剧目加

以审核。孰料因祸得福，该剧得到了中国剧协的大力支持，晓艇因此被推荐到北京进行专场演出。

晓艇在北京专场的第一场，共演出了《铁龙山》《逼侄赴科》《踏伞》和《金山寺》等四个剧目。头两个剧目演完，照例有短时间的中场休息。此时，刚看完《逼侄赴科》的卓琳在休息室对众人称赞道：“晓艇这个娃娃演戏啊，进步好大哦！”听闻此言，著名剧作家徐菜立即跑到后台给晓艇报喜。当时晓艇正在后台洗脸，徐菜“啪”地拍了下晓艇的后背，大笑道：“你娃娃要红了！”

第二天，由徐菜执笔的一篇《让观众着魔的川剧晓艇》便发表在了《戏剧报》上，川剧晓艇，瞬间名震京城。随后在北京长安戏院的演出，观众场场爆满，几百人的大剧场座无虚席。

好事成双，不久后，中国评剧院院长将一本《戏剧与电影》杂志邮寄给了晓艇，在杂志内页的第一页上，赫然写着“祝贺你获得梅花奖”！

“国家对川剧艺术好重视哦！当时我和编剧唐思敏、摄影师小徐一起去北京领奖，颁奖那天，是习仲勋和薄一波亲自给我颁的奖！拿奖以后，国家又派正在北影厂录制《芙蓉花仙》的新都川剧院给我配戏，让我给众多领导人再演一场川剧！”晓艇自豪地笑着，接着说道，“艺术也好，名利也好，我这一生所有的收获，都是党给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晓艇！”

如今，83岁的晓艇仍不遗余力地言传身教，向新一代的青年演员们传授川剧艺术。晓艇说：“我爱好不多，会的也不多，一辈子就是热爱川剧。我这一生，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传承川剧艺术，我唯有传承和发扬川剧这门艺术，才能够报答党和政府多年来对我的培养。”

Chapter 6

第六章

振 兴 中 华



原国光电子管厂大门

成华共产党人的脉搏总能紧随时
代一起跳动。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慧、
果敢、魄力和闯劲，站在改革开放的
前哨，勇立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的潮
头，披荆斩棘，树立丰碑，成为后来
成华人破浪前行的航标灯。

“蛋壳”里的智慧灵光

——刷新全国纪录的原成都热电厂冷却塔建设

/冯荣光

冷却塔高 105 米，这是一个体形庞大的双曲线特殊薄壳构筑物。它屹立于沙河边成都热电厂，美妙的曲线身段勾勒出它雄伟高拔的塔体，一缕轻盈的乳白云雾在塔顶上悠悠地飘浮着，像天上的白云融入蓝天丽日之中。曾经，它是成都东郊工业一道亮丽的风景；曾经，它是成都现代化工业形象的“标识”之一。2007 年，双曲线冷却塔在成都“东郊工业结构调整”决策中被炸掉拆除，随着烟尘的弥漫，渐渐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往事并不如烟，关于双曲线冷却塔的故事，至今深藏于建设者心中。当我走近当年这些建设者之时，那些故事仍然震撼着我的心灵。

“巨无霸”酷似大“蛋壳”

1988 年 2 月 26 日，为解成都严重缺电的“燃眉之急”，成都热电厂 20 万千瓦扩建工程在鞭炮和锣鼓声中破土动工。这是 20 世纪末，四川省和成都市排名第一号“重中之重”的工程，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成都市最大的一项能源工程。万众瞩目，如大旱之望云霓。

105 米双曲线冷却塔是成都热电厂扩建工程三大项目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初，成都热电厂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的一座火力发电厂，工厂建在沙河边，有源源不断的水供给蒸汽锅炉，锅炉中的蒸汽除了发电，还有许多富余的热气，这些热气通过四通八达的热力管道给东郊许多工厂供热。所以，它是既发电又供热的“热电”厂。1980 年，成都热电厂已拥有 5 台发电机组，总发电量为 12.5 万千瓦。由于每台机组发电仅为 2.5 万千瓦，当年建厂和后来扩容时，都没有建造冷却塔。

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减少排放污染，现代大型火力发电厂都要建造一个循环冷却水系统，这就是冷却塔。建双曲线冷却塔，是大型火电厂建设中关键性项目之一，也是“标配”。

我们看到的冷却塔冒出来的白色气雾，有时候像揭开锅盖的蒸笼，雾气升腾，云烟直上云天；有时候像透明的轻纱飘飘缈缈，云舒风卷，让人感受到诗意的浪漫。

很多市民都误认为冷却塔是一个大烟囱，其实它和烟囱不是一回事。冷却塔不排烟，它主要功能是散热，释放塔中的水蒸气。

冷却塔体量都非常高大，为什么都要采用双曲线，而不采用直筒形呢？这是因为双曲线冷却塔下部空间都非常阔大且四面通风，冷空气更容易进入。由于塔内上下的空气压差，空气从塔底进入，从塔顶流出。腰部中间细，气流由宽变窄产生空气向上流动效应，就会加快速度，更容易散热。冷却塔采取双曲线最大的优点，从结构上说，就是极大地增强塔体的稳定性和抗变形能力，比直壁结构更科学、更安全可靠。因此，大型火电厂采用的多为双曲线循环水自然通风冷却塔，它是一种超高超大的薄壳型特殊构筑物。

成都热电厂 20 万千瓦扩建工程要安装一台 20 万千瓦大功率发电机组，它的用水量非常大，必须建造冷却塔，构成配套完整的火力发电供水循环系统。

成都热电厂双曲线冷却塔，全称叫“双曲线逆流式自然通风冷却

塔”，包括底部、筒壁、塔顶三部分。底部“人字柱”以下是一个直径 110 米的圆形蓄水池和地下管沟，将滴淋下来的水集中在这里，再送往汽轮发电机凝结器（换热装置），完成高温热水转换为冷水的循环过程。冷却塔内部设置配水槽、淋水装置。淋水装置是使水蒸发散热的主要设备，淋水面积达 4500 平方米。运行时，水从配水槽向下流到多层淋水板，快速将水降温。空气从塔底侧面进入，与水充分接触后带着热量向上排出。冷却过程以散热为主。这是双曲线冷却塔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筒壁中间的喉径 70 米，是筒体最窄的地方，像人的咽喉，主要是加速气流的上升速度，起到“穿堂风”的效果。塔顶口径约 90 米，曲线从中部逐渐展开直到塔顶，塔体内积聚的水蒸气便从这里散发出去。

它是一个庞大的圆筒形喇叭状，底部周长 300 多米，腰部周长 200 多米，塔顶上口周长也接近 300 米。但是它的壁厚只有 0.4 米，很薄，而且淋水装置以上全是空的，为了散热，中间是没有任何支撑的。

这是成都地区建造的第一个超级“巨无霸”，对承建工程施工的省建三公司来说，极具挑战性。第一次承建这种特大型构筑物，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进度要求紧，质量要求高，公司采用传统施工技术和方法根本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机具。

“冷却塔就是一个大‘蛋壳’！”原华西集团总工程师车凡殷用非技术性术语，将成都热电厂双曲线冷却塔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当年，车凡殷是省建三公司总工程师，是公司派驻成都热电厂项目经理部的技术总负责人，参与了成都热电厂 20 万千瓦扩建工程整个过程。现年 83 岁的车凡殷仍有很强的记忆力，对冷却塔施工每个环节都记忆犹新。

自行车辐条的启示

1989年2月，双曲线冷却塔“三通一平”基础施工完成后，主体施工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施工中一道非常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车凡殷，如果不能解决这道难题，就会直接影响电厂扩建工程整个进度。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车凡殷一直冥思苦想着破解难题的最佳方案。

是什么难题这么棘手呢？

车凡殷自1961年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到省建三公司，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已有27个年头了，什么技术难题没有遇到过，现场什么苦他没有吃过？而今天，面对冷却塔施工这个新课题，确实有些犯难了。

冷却塔这个特殊构筑物，省建三公司以前没有干过，没有这方面成熟的技术经验可供借鉴，而时间分分秒秒地在催人。

如果按照冷却塔常规施工方法的要求，就得塔体外搭设多孔井架。什么是多孔井架呢？它是由9个独立井架按3个一排并列组合成的一个联体9孔井架。它的特点是体量大，站得稳，常规施工都采用它。然而，在热电厂扩建工程现场这一套根本行不通。

国内新建一台2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厂，需征地300亩。国务院要求：不新征土地，用最快速度在老厂扩建20万千瓦工程项目。换句话说，20万千瓦扩建工程是要在老厂区里面“见缝插针”，硬“挤”进去的项目。场地狭窄不说，厂区有很多高压线、输电铁塔、热力管道、车间厂房等，仿佛置身在精致的瓷器店，这些“瓷”一个都碰不得。为了保证老厂正常生产发电，所有这些设备、设施都不能拆迁，现场施工条件是相当苛刻的。

多孔井架高度是120米，按照施工规范必须扯揽风绳，而四周都是高压线、铁塔，不允许扯揽风绳。没有提升设备，建筑材料怎么送上去？

如果打破常规，采用中心塔吊怎么样呢？问题又来了。

塔吊立在冷却塔中心，没有附着，它的自由高度最多容许 30 米。超出这个高度，必须要有附着加以稳固，否则，塔吊的自身稳定性就无法保证。

120 米约 40 层楼高的塔吊怎么固定？这是个问题。中心塔吊距塔体腰部曲线点最短距离是 30 米，要有 30 多米的钢桁架去支撑它，而冷却塔的壁厚只有 0.4 米，就是个“蛋壳”，而且是个空“蛋壳”，它怎么承受得起钢桁架的重量？再说，30 米的大跨度，钢桁架用什么来支撑？这仅是塔体喉部的距离，那么上部和下部更宽的距离呢？显然，采用钢桁架附着方式在现场也行不通！

车凡殷在动脑筋，他带领的技术团队都在动脑筋，一个个“点子”出来，又一个个否定。夜以继日的基础施工眼看就要完成，时间逼人啊，也等不得了！每个技术人员心情都是沉甸甸的。

“那时，我是总工，只有我来拿办法。东想西想，脑壳都抠烂了……”车凡殷如是说，仿佛还沉浸在当年的情景。

某天，车凡殷从热电厂工地准备去西南建筑设计院。他从车棚推自行车出门，正要蹬车上路时，突然，他停了下来，两眼直直地看着自行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灵光在瞬间像火花一样闪现，他的思绪豁然开朗。他转动着自行车轮，车轴与车圈之间是用钢丝连接起来的，车圈就是个薄壳，它受压不行，但钢丝很细，受拉。辐条将车圈拉着，与中心车轴形成一个整体，车圈不仅抗压，能够承受人体和搭载物的重量，而且能保持车圈不变形，这启示太妙了！根据这个原理，如果在冷却塔中心安装塔吊，四面用钢丝绳拉紧，就能保证塔机的稳定和安全。中心塔吊好比车轴，冷却塔圆圈好比车圈，钢丝绳好比辐条，稳固性、安全性都有了。

想到这里，车凡殷如释重负，心情一下激动起来，但很快又冷静下来。多年的施工经验告诉他，采用“非常规施工”，不仅要想得到，更要做得好。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但绝不是蛮干，而是要科

学论证，精心设计施工方案。

他进一步考虑到几个关键性技术措施，一是钢丝绳预筋力到底是多少？绷紧了，预筋力大了，壳壁承受不起；钢丝绳软了，起不到稳定塔吊的作用。第二，隔多远距离布一层？隔远了，塔机变形大；隔近了，施工很不方便，影响进度。第三，塔臂超出了冷却塔筒壁的长度，塔机最后如何安全拆除？

这好比战场，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有人形象地比喻这是“刀口上舔血”“高空上走钢丝”，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

风险和压力，都考验着车凡殷和项目经理部的承受力、意志、智慧和责任感。

车凡殷带领技术团队大胆采用中心塔吊钢丝绳拉扯，选定了12个点。用12根钢丝绳附着在筒壁12个点上，将塔机这个中心“轴”拉扯住，与筒壁形成整体。同时，运用力学模型对塔吊900多根杆件逐一进行受力计算，确保杆件在安全操作许可的应力范围内。钢丝绳每一层的分布间距也计算好了，完全符合安全施工要求。

“这个计算量非常大，20世纪80年末，只有西南建筑设计院有大型计算机，用网架程序和悬索程序，大家在西南设计院的计算机上进行了反复计算，得出了比较合理的数据。就这样，计算这些数据，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车凡殷感叹道。

冷却塔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难点，它是个大“蛋壳”，钢丝绳在“蛋壳”固定端上能承受多大的拉力？如果超出，薄壁就会拉出个大洞，会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经西南建筑设计院计算出来的数据，薄壳上那个点的力，可以承受3吨的拉力。

有了可靠的受力数据，为了确保100%的安全与稳妥，车凡殷和项目经理部又在技术上进一步采取“保险措施”，就是将绳端拉力的“点”变成一个“面”。12个点上，用钢筋网加密，变成一个平方的面。面积增大了，它的应力就小了。又将12个“面”与筒体连成一个环，浇筑成一道0.4米厚、0.8米宽的钢筋混凝土圈梁，构成一道

坚固的安全保险环。

这道保险环非常成功，凝聚了车凡殷和项目经理、项目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心血。施工中，中心塔吊不断升高，由于有钢丝绳的稳固，加了这道保险环，塔机始终稳妥，进度、质量、安全都得到了切实的“三保证”。

经过反复论证，施工方案最终决定采用中心塔吊施工、爬模和自行设计、制作折臂式塔吊，这个“非常规施工方案”得到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现中国华西集团）的批准。

成都热电厂冷却塔中心塔吊施工因为打破常规施工，引起了国家能源部能源研究院的重视。在冷却塔施工接近顶部的时候，能源部研究院派出专家，带上摄制组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全程录像。能源部专家十分感慨：“这是我们想了几年没有敢做的事，你们把它做成了。”惊讶之余更充满了赞赏。

车凡殷充满自信地回答说：“科学上必须要有敢于冒险的精神，但我们不是蛮干。第一，我们是通过了仔细、认真的科学论证和计算的，做到胸有成竹。第二，我们采取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措施，还有质量安全保险措施，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冷却塔是省建三公司首次承建的项目，是不能出任何事故的。出了事故，拖延了工期，不能按期并网发电，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为了美丽的曲线

冷却塔像巨人一样矗立于沙河畔，乍一看，它又像一个巨型喇叭，优美的双曲线衬托出它雄伟挺拔的身姿，显示出工业构筑物特有的美感。

如果在绘画者笔下，哪怕是初学者，要画出若干条曲线，不为难事。但是，要将曲线展现在百米高的特大构筑物上，绝不是绘画那么容易。

“难啊，难度相当大！”高玉璋是省建三公司热电厂经理部主厂房工区施工负责人，他在接受我采访时感叹道，“冷却塔与210米烟囱施工工艺不一样，烟囱是滑模，面积小，施工工艺比较成熟。冷却塔是爬模，面积大，关键一点是冷却塔筒体曲线的变化。从下到中是由大变小，从中到顶再由小变大。那时是省建三公司首次采用的新工艺，项目部没有这方面的施工经验，确实很难……”

在冷却塔底部环形基础人字柱吊装完，浇筑一道圈梁后，上面的筒壁施工就要采用爬模工艺。爬模主要由导轨、提升架、平台、脚手架及模板等组成。爬模是附在冷却塔筒体上的，形成一个周长200—300米的环形操作平台，随着进度不断往上爬升。工人在上面操作，安装模板、浇筑混凝土、拆模后往上翻模。中心塔吊将模板、钢筋等材料吊运到这个平台上。爬模的特点是高空、环形、狭窄和不断爬升，工人操作受到很大的空间限制。

1989年5月，冷却塔底部环形基础、人字柱及环形圈梁整个基础施工完成，开始进行双曲冷却塔混凝土筒壁浇筑，爬模施工就从这里开始。爬模的关键点是总体提升非常难，难在它要收，又要放，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

提升爬模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采用手动葫芦吊，环绕筒壁一周，安了上百个葫芦吊。每个葫芦吊都由人工操作，操作程序十分严格。按照爬模的施工工艺要求，一板只能浇筑0.8米混凝土。这板浇了，等到刚度满足了，再往上翻模。爬模在一段一段往上“爬”的过程中，要精确计算出模板增减的数量，曲线往上收的时候要减少，曲线往上放的时候要增加，同时，操作平台构件也在随之增加。操作程序非常烦琐、复杂，绝不容许操作时粗枝大叶，忽视每一个环节。

冷却塔筒壁施工升至42米高度，进入喉部关键环节，这是筒体曲线收、放的一个关键控制节点，测量控制节点的准确度尤其重要。每次爬模提升前，现场测量技术员就要进行测量。测量组技术人员非常辛苦，在悬空的高架上顶着烈日，扛着测量仪，爬上爬下，在狭窄

的工地上进行定位测量，测量标准要求很高，必须测准。如果测量不准，误差大了，模板安装不到位，出现质量问题，就会造成返工，延误工期。对这些关键程序的检查，项目经理现场督察，可以说是铁面无情，一个环节也不放松。

此时，正是火热的7月，成都平原气候变幻无常，高温、大风、暴雨轮番上阵。为了确保10月底冷却塔施工按计划封顶，项目部制定了科学的施工组织措施，采用交叉流水作业，昼夜施工，大大缩短混凝土浇筑的循环时间，由过去3—4天浇筑一板混凝土缩短到2—2.5天，尽管现场施工条件非常艰苦，项目部却没有延误一天工期。大家付出了很多，吃住都在工地，甚至大半年时间都顾不上回家看看。高玉璋感慨道：“现场等于在打仗，我们随时要应付工地上发生的问题。关键时刻，你要分分秒秒守在现场，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10月，金风送爽。从基础到封顶，用了8个月时间，双曲线冷却塔顺利建成。

冷却塔土建施工完成后，中心塔吊要退场拆除。在冷却塔确定使用中心塔吊后，塔机拆除在“非常规施工”中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在项目技术负责人周自强的主持下开展科技攻关，制定出安全可行的拆塔方案：将伸出端部20.21米的塔臂，设计为三节臂架，通过采用高空辅助装置，分三次将三节臂架拆除，可以顺利通过冷却塔喉部的最小半径，完成塔机的全部退场。省建三公司锦城建筑机械厂根据这个方案设计，将臂长45米的QTZ60自升式塔机20.21米端部制作为可以折弯的塔臂，以满足塔机落塔时需要。采用高空折臂技术，这是省建三公司在全国建筑行业中的首创，这项技术不仅满足了塔机垂直运输与浇注混凝土施工的水平运输，而且非常漂亮、安全、平稳地完成了退场的拆塔任务。

车凡殷总结道：“冷却塔创造了三个全国第一：一是塔机的软附着，二是塔机空中折臂，三是筒壁爬模施工。”

这场攻坚战硬仗打下来了，在全国同类国产 20 万千瓦机组施工过程中，省建三公司创造了土建施工工期最短、工程造价最低、质量最好的业绩，而且为四川建筑业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载入四川建筑业史册。

他们是伟大的建设者，“伟大”二字当之无愧！

沙河在静静流淌，带走了岁月，带走了风云。双曲线冷却塔像一座光明之塔，傲然屹立在东郊，就这样默默地挺拔。高大的身躯勾勒出少女般优雅的曲线，不惧狂风雷电，不畏暴雨寒雪。在世纪之交，解了成都的“燃眉之急”，它点亮了东郊，点亮了大成都，把光明带给了城乡千家万户。

1992 年 8 月，成都热电厂 20 万千瓦扩建工程荣获“国家能源部火电优质工程奖”。同年，由省建三公司编制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艺及操作规程》获得该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4 年，在北京国际土木工程学术交流大会上，省建三公司向大会提供了双曲线冷却塔施工工艺文字材料并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受到与会者好评和重视。

四川建筑工人创造的成都热电厂 20 万千瓦扩建工程施工奇迹，曾给我们无比的自信和力量。它是成都工业文明时代的优秀作品，是东郊工业永远不老的神话之一。

105 米双曲线冷却塔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随着“东调”的推进，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我回望沙河澄碧透明的蓝天，当我回望杉板桥鳞次栉比的高楼，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我决心用文字，为成都热电厂 20 万千瓦扩建工程建设者立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沙河桥头的秘密改制^①

/周明生

沙河建设大桥的桥头东南侧，是车水马龙的建设路一号，这里原先是亚光电工厂的厂区。在 21 世纪初实施东郊工业结构调整时，亚光厂已将工厂的土地通过政府拍卖，以每亩 715 万元的高价，卖给了万科房地产公司。这地方现在已变成了高档的住宅小区，名叫“万科·金域蓝湾”。林立的高楼群下，美丽的绿化带很有品位。一走进小区，眼前就是花团锦簇围拥的小桥，小桥以东，有一片铺着木纹地板的宽大平台，平台上立着一把绛红的大遮阳伞，伞旁是造型讲究的木质桌椅，这里的景物因此有了诗意，给人以岁月静好的惬意感觉。

如果不是“老东郊”，来这里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有过一家大型电子企业——亚光电工厂（代号 970 厂、7 号信箱），它是当时大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是从南京内迁过来组建的。在历史老人的记忆里，这个厂一度非常辉煌，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研制生产微波半导体器件及电路的骨干企业，屡屡为我国的人造卫星、运载火箭、氢弹等多个重大军事装备和科研项目进行配套生产；2003 年 10 月 15 日以后陆续向太空发射的“神舟”号系列航天飞船，乃至国

^① 参考文献：《亚光四十年》（内部资料）；采访亚光党委副书记田康经。

庆大阅兵时隆隆驶过的新型坦克，都有该厂提供的电子元器件。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当全国各地老工业基地的生产规模和企业效益急剧下滑之时，成都东郊工业区也陷入了困境。东郊所有军工企业都“趴下”了，主要原因就是军转民，部属企业全部下放，突然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又赶上百万大裁军。军品锐减，转到搞民品，一时很难适应，甚至手足无措。亚光也搞过电视机、收音机，效益最好的是安保工程。上面叫企业改制，当时就摸索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承包制、分厂制，改来改去，不见多大的成效。1998年改制的前三年，亚光进入了连续三年亏损的恶性循环期，累计亏损1500多万元。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怎么办？亚光的出路何在？

沉舟侧畔千帆过

1998年，正当厂里的几个负责人被弄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其中一句话是搞股份合作制。这个新提法引发了几个人的兴趣。经请教经济专家，这才弄明白，所谓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的有机结合，跟股份制迥然不同，劳动合作是基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行民主管理；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几个人受到启发，顿感精神一振，感觉这是使企业脱困的好办法，决定抓住这个机遇。一有空，他们就凑在一起热烈讨论。厂长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们要做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几个人连连点头称是。此后的某天，厂里的几个负责人参加市上的中央全会精神的学习传达会，就利用开会的间隙，找到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朱永明，表达了想改制的初衷。手下企业的这种快速反应，令朱永明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市委分管副书记汇报，得到了首肯。亚光厂很快就进入制定股份合作制方案的阶段。但市委领导要求厂里一定要保密。

搞股份合作制，必然触动产权和国企身份这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要改变所有制身份，这对于早已习惯由国家包干生老病死的军工国企职工来说，是最致命的。一个正师级的大型国有企业，一个从前由国务院直接下达厂长任命书的军工厂，忽然要搞股份合作制，厂里的舆论立刻炸开了锅。一拨拨工人冲进工厂办公大楼，找厂长讨说法。激进者言论激烈，工厂动荡不安，为国家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慷慨激昂，指责这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厂里的老干部拍着桌子大吼，这是对他们辛勤干了一辈子的工作成果的否定。

然而，厂里的几个负责人都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只是冷静地跟职工们宣讲改制。他们说，请大家理解。实际上，股份合作制一搞，谁上谁下，就要由股东手里的选票说了算。搞技术出身的厂党委副书记田康经，以独立研制成功一种新型晶体管而获得部队 50 万只订单闻名于电子工业部。当年，他在市上的一次发言颇能代表当时亚光厂的几个负责人的心思。他充满自信地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企业搞好，如果改制以后股东们认为我不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在企业里找到适合我的岗位。如果大家认为我还行，我就再干。”正是这种爱厂爱岗的责任心，正是这种不掺杂任何私心的改制决心，终于使亚光凤凰涅槃，从困境中再次崛起。

亚光厂搞股份合作制，首当其冲的是对所有现任厂级领导的冲击，一夜之间，几个厂级领导全部自动下台，等待全体 2000 多职工的重新选举。这个关口可不是人人都能过的。对厂级领导实行海选，并未指定候选人，而是由全厂下属的各个单位自己提名，结果形成了一个包括所有现任厂级领导和中层干部以及职工代表的几十个人的初选名单，名单上的少数人名，许多人都感到陌生。几个现任厂级领导都郑重其事地在这个名单上签了字表示认可。厂长还说，这份名单值得好好保存，它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海选”，选民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想选谁就可以选谁，但只有选票过半者，才能成为未来股份公司领导层的候选人。只有得票最高的

前六名，才有资格进入最后一次六进五的差额选举。

这真是民主，是东郊工业区的空前创举。几个叱咤风云的现任厂级领导忽然都成了前任，成了普通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很难说其中没有人手里不捏了一把汗。选举结果，三个前任（包括党委书记和副厂长）落选了。遗憾的是，新班子中原来安排的总工程师也落选了。这对于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经过动员，又把总工程师补选上去。德高望重的田康经被选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将履行监督总经理和所有经理是否执行董事会决议的新职责。选民们想通过他们信任的田康经，来监督几个年轻的公司高管，足见他在工人中享有的威望。

亚光实行海选而改制成功，股东们摩拳擦掌，对工厂的前景充满信心。新的股份合作公司名叫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的军工股是小头，由占了大头的职工股控股。这在成都市是第一家，市上打招呼：秘而不宣。所以媒体不见报道。股份公司当然要发行股票。为了让新当选的高管更好地履行职责并承担风险，规定高管必须按自己的职务购买相当数额的股票。

当时，全公司有92%的职工买了股票，但还有8%的人未买。没买的人，或者是早就准备跳槽的人；或者是相当“精明”的人，认为工厂的亏损不可逆转；或者是刚分来的大学生拿不出钱来。好些积极买股票的职工都说，只要企业在，他们就有希望。有个职工为了支持工厂，甚至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都拿来买了股票，让新上任的高管们好生感动。由于有政策扶持，改制的当年就扭亏为盈，此后，效益愈来愈好。这得益于严格的管理。国投公司（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专门从深圳请了一家专业审计公司，每半年对公司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包括谁喝酒后上班，哪个工序有几个人上班吹过牛，审议报告都有记载，毫不徇私。

分红分得叫人眼红

当时作为监事会主席的田康经被指定买了2万股，每股原始股金5元，当年掏出10万元买股票，对于拿工资吃饭的他来说，压力很大。但为了亚光，新上任的公司高管们都一咬牙把分到名下的份额买了。但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两年，就连本带利地赚回来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分红，股票买得多的人，简直乐坏了。俗话说：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秤。亚光改制成功的事，说的不宣传，其实消息还是走漏了，对门的国光（776厂、6号信箱）和宏明（715厂、82信箱）都要求照亚光这样改制，他们后来也改成功了。

亚光改制时，厂区占用的土地已经作价，作为股份卖给了职工。“东调”时，通过政府拍卖，获得了数亿元地价。亚光变得财大气粗，趁机修新厂房，将设备更新换代。亚光公司是被成都市列入第二批次搬迁的企业，是“东调”搬迁企业中的盈利企业。2003年11月5日，公司正式进驻东虹工业园。2007年，亚光公司又在高新西区实施“东调”二期工程，购买了55亩土地，建设亚光微波设备生产基地。“东调”为公司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亚光电子的股份由军工股、职工股和深华新三大部分构成。军工这部分是属于国家的，不能划给职工，其代表就是市政府直属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占20%的股份。职工股占60%多。亚光还引进了一家名叫深圳华新的上市股份公司，它是直接抱现金来入股的。深华新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搞的公司，职工都是四川人。资本运作的结果，亚光电子的效益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亚光股东分红分得叫人眼红。

新亚光的喜和悲

亚光电子由国投公司的人出任董事长，国投的高管是市政府聘请的能人，既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也有在沿海办公司的经验，对市场经济非常熟悉，对亚光也有很大的启发和提高。亚光电子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分配制度，这在成都市的企业里可能是首家。公司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运作，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以此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典型的例子，公司的一个技术员，当时是公司下属的某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副总。2000年时，30多岁的他开发了一个保密的军品新器件，部队3年的订货销售收入就达1亿，公司按总收入的3%给他发了奖金，在全厂引起了震动，很多员工公开表示不服气。公司的三个领导把此事向省委和市委领导汇报，得到了充分肯定。那天汇报时，坐在他们身后有好些记者。记者们好奇地问：“给了那个技术人员多少奖金，3万吗？”亚光的领导微笑着摇摇头。记者又问：“那是30万？”他们仍然微笑着摇摇头。记者明白了，惊诧地瞪圆了眼睛，不敢再往下问了。

发奖金这件事，公司对所有员工都是公开的：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搞出了新产品，并且效益好，公司一视同仁奖励你；如果谁不服气，你来搞。这份军品新器件订单来之不易，南京55所和石家庄13所都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新产品，这订单是通过与两个所公平竞争的结果。这个新产品很受欢迎，公司发出多少，部队收多少，并且马上付款。这件事大大激发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有的人上班上到大年三十的中午，大年初一歇一天，初二一早又在办公室出现了。

改制以后，公司大量提拔了3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中层干部，现在的他们受到激励，有干劲、有冲劲、有创造力。原来有个研究所的所长是个能人好人，但干了多年以后，变得故步自封了。公司免了他的职，启用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人任所长，该所立刻生机焕发，全

所几乎全是 30 多岁的年轻人，所内又分成几个小组，相互展开竞争。新所长对公司监事会主席田康经说：“老书记，我们要以销售收入 50% 的速度增长。”这个所真是好样的，过了两三年，销售收入上亿。他们也照样获得了奖励。

消息传开，眼看亚光年轻人的收入都很高，一些外面的科技人员就想跳槽过来，有的人以高工自居，要求高待遇。但亚光不问学历，不搞论资排辈，无论你职称有多高，只能先发一两千的基本生活费，等你搞出产品才能论功行赏。亚光公司给渴望干事业的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改制以后的公司，除了激励机制，还有淘汰机制。有一个中层干部，在精简机构以后，原来的科室已经没有了他的岗位，他只能当清洁工打扫卫生，在人背后痛哭失声，但又不想失业，为了生存，还是得慢慢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个分厂厂长，因为完不成合同约定的销售收入，虽然与公司总经理的关系很好，但他知道老总会挥泪斩马谡，于是自己主动选择了离职。正是这种貌似残酷的淘汰，才保证了公司的活力。

到了 2005 年，公司的销售收入已达 20 多亿元，但职工人数却只有 1000 多。2004 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亚光考察劳工关系，来的 5 个成员分别代表澳大利亚等 5 个国家。他们对亚光的评价是，该公司跟其他的公司完全不一样，很有活力，思想很解放，高管们很有团队精神。

亚光人都发了

令人大喜过望的是，2007 年，中国航空工业公司收购了成都国投的股份，并且全部收购了职工的个人股。算下来，当初花 5 元钱买的股票，后来的回报是 60 多元。以田康经为例，当初他买了 2 万股，全部套现以后，他买了房子，钱还没用完。亚光公司的职工大多还是

住在建设路上，得力于公司改制带来的实惠，许多职工都搬出老宿舍，买了新房。亚光的工人多少都有几十万，尤其是原来住二环路得到“惠民工程”拆迁补贴的，现在都富裕了。厂长 2000 年调走时，对公司的几个领导大发感慨，说他这辈子非常幸运，非常庆幸能和改制选出的另外 4 个人一起共事，几个人从来都是相互补台，相互支持。

千年沙河水滚滚东流，见证了亚光秘密改制的大获成功，流淌着永不褪色的东郊记忆。

国光的中流砥柱^①

/周明生

建设路2号的东头，耸立着零售业的巨头伊藤洋华堂的商贸大楼，通过横跨二环路的天桥，顾客可以直接走进伊藤洋华堂华丽的二楼卖场。这里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一派城市中心的繁华景象。在东郊工业结构调整以前，这里是国光电子管厂区的一部分，曾经矗立着一幢巍峨的国光大厦。国光有个一直搞技术工作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成香，于1992年提拔为工厂党委书记以后，一口气连干了18年，超期服役到66岁，才获准退休。他经历了新旧两种体制的摩擦冲突，经历了裁军100万以后工厂所遭遇的困境，经历了国光工人改变所有制关系的痛苦过程。若不是他有着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有一颗热爱工厂和工人的红心，从而迸发出来的睿智，是不可能带领国光冲出重围，再创辉煌的。

月光触发的灵感

王成香是江苏镇江人，1966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光电子管厂（代号776厂），他学的专业是微波器件，1984年被任命为厂长

① 参考文献：成华区政协编《激情岁月》；采访国光党委书记王成香。

助理，不久改任党委副书记。1992年初，在搞厂长负责制的关键头，当时上级的意图是叫他党委书记和厂长一肩挑，但他偏偏不愿意，直接提拔了一个下属任厂长。他的党委书记一直当到2000年工厂改制时，国资委控股，他这时差一年就该退休了，却让他出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2004年想退，没获批准。直到他66岁时，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这种超期服役，在成都东郊绝无仅有。

1991年，国光花800多万元在工厂的大门口建成了8000多平方米的国光大厦，初衷是搞成吸引大学生进厂的鸳鸯宿舍楼，但一直没钱搞生活设施的配套。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他明确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步子要再迈大一点。”此时，王成香作为东郊巨头之一，刚刚走马上任。

邓小平南方谈话让王成香受到激励，他兴奋得夜不成寐。是夜，月光如水。王成香加完夜班走出国光的大门，默默地伫立在建设路的街边。夜深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稀少，他抬头仰望巍然矗立的国光大厦。大厦尚未投入使用，楼里没有一丝灯光。他想，大厦处在闹市的十字街头，其商业价值不言而喻，如果做鸳鸯宿舍楼真是可惜了。他这几天一直都在动这幢大厦的脑子。怎么样才能让这幢大厦的商业价值最大化呢？想着想着，他突然灵光闪现：办证券交易所！当时成都的股票交易市场方兴未艾，股民们踊跃冲浪，却又缺乏交易场所。接着，他的脑海里仿佛有两个人在争论着：这幢大厦不就是绝妙的交易场地吗？但国光并非股份制企业啊！这有何难？来个“曲线救国”不就得了。

王成香说干就干，非常冷静地选择了业绩爆好的国泰证券。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办证券交易所。王成香主动提出场地、资金、人员全部由国光承担，国泰以20%的干股分红。国泰当然求之不得。将其定名为“国泰证券建设路经营部”，国光虽未冠名，但招牌的最前面却赫然打着国光的商标，让人一看便知是国光的“自留地”。合同一签，双方立马到深圳采购回电脑等必备设施，很快就开业了。

联办证券交易所这件事，国光开班子会时发生了争论。反对者出于对王成香的爱护，替他担忧，怕他踩红线犯错误，而失去“掌门人”的位置。对中国金融市场一直有研究的王成香却胸有成竹，他想，既然邓小平可以支持首都钢铁公司涉足金融业，那么国光当然就可以效仿。他为了宽慰大家的心，拍着胸脯说，出了问题由他这个党委书记一人负责。还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工厂大门口搞证券交易弊多利少。王成香力排众议，决心激流勇进，坚持要干。

因为此时的王成香已经没有退路了。最近一两年，是国光经营最惨淡的时期，负债率高达 97% 以上，连发工资都困难；贷款还不了，银行不仅截留货款，而且还罚息。当时，中国工商银行建设路代办处的人在逼债时出言不逊，曾经羞辱国光的厂长，说他那么年纪的人说话不算数。厂长一筹莫展，事后竟说，要惩罚一个人，就让他来当厂长好了。

现在，王成香洞若观火，决心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这个证券交易所占了国光大厦的一、二层楼，分大户室和小户室，最初只有 1000 多平方米，1994 年 10 月正式开张，股民们争先恐后赶来炒股，人满为患，生意火爆到难以想象，于是赶紧扩大到 2000 多平方米。当时的炒股，不是上网，不是电话委托，也不是银联转账，而是必须抱现金或带支票到现场交易。为了解决办交易所开办资金的缺口，王成香又说动中国银行，在交易所隔壁开了一家储蓄所，先从该储蓄所借出一笔需付息的资金救急，并承诺了未来的储蓄额度，但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全由国光派出。这样一来，不仅大大方便了股民，每日的储蓄金额叫人大喜过望，而且国光急需的流动资金也圆满解决。

这个交易所盛极一时，12 个贵宾厅塞满了客户，5 个大显示屏前挤满了情绪激昂的散户，每日进出的资金数以亿计。这个股票交易所火爆了 4 年之久，国光分红比例是 80%，到底每年分红分了多少？王成香只说：“给你举个例子，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的坐骑是桑塔

纳，交易所经理的坐骑是大奔驰。”一副顾左右而言他的架势。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国内企业不允许办证券交易所了。正在国外考察的王成香接到厂长的越洋电话后，匆匆赶回公司。由国光、国泰和银监会三方一起处理善后事宜。退出证券交易所的国光，不仅分到奔驰和桑塔纳轿车各一辆，国光派到交易所的20多名工作人员全部归国泰，开办时国光的所有投资按原价返还，而且还有将近600万元的当年盈利的分红。利用对方想在原址继续开办交易所的心理，一口吃成大胖子的王成香并不满足，还趁机敲起了“竹杠”，提出年租金350万元，预付5年作为补偿。岂料对方也满口答应，真是周瑜打黄盖啊！

前脚拿了这两笔钱，王成香后脚就叫人在八里小区，以每亩40万元的价格征了28亩土地，建国光新宿舍区，一举解决了工厂的大学生结婚住宿问题，共400多对，包括刚领证结婚的新人都分到了新房。这些单元房的售价为750元/平方米，并且办好了产权。大学生如果要退一室一厅的老房，住80平方米以上的新房，所退旧房由工厂以700元/平方米的价格回购。这些年房价只升不降，其增值的幅度不言而喻。临街宿舍的底楼，王成香叫建了门市营业房，又另建了800平方米的茶楼，如今，这些房子全都被超市、健身房、棋牌室、茶坊等租赁了。

距工厂较远的八里小区一带当时还比较荒凉。王成香在外地出差，新区建房的员工登记却受到抵制。厂长打电话向他求救。他回答，不急，等他回来，保管一个星期内炒热。他一回公司，先召开党委会、董事会统一思想。紧接着，召开中干会宣布了三条意见：一、原拟建的领导干部楼不在老宿舍区建，而是建在新区；二、原住在老宿舍区的，可以退旧房，要新房，老房子按每平方米700元由工厂回购；三、他王成香首先带头报名，搬到新区。人们都知道，他女儿是清华毕业的博士生，从美国麻省留学归来，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女婿也是清华博士，在西门子公司中国研究院任副院长。他女儿女婿定居

北京，他王成香完全不必来凑这个热闹，现在为了炒热新区，他不惜带头“蹚雷”。不是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吗？关键时刻，让王成香这个车头这么一带，新区真的几天就炒热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难领略王成香的铁腕行事风格。

王成香说不是我不能干，而是体制上规定了国企的动作。即便如此，他仍然在国光最困难的时候，尽量抓住了一些稍纵即逝的机遇，比如：国光居然在先锋公司和交通银行分别持有两三百万元的原始股，那都是他利用员工对他的信赖，于当年向职工集资而买的股票。

厂长拂袖而去

也许有人会问，王成香既然那么优秀，上级怎么不提拔他呢？

其实，在国光极其困难的时候，王成香有的是机遇顺水推舟，脱离“苦海”。早在1988年他还是国光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上级就打起了他的主意，调他任成都市工交工委书记，组织部门也找他谈了话，本来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却遭遇国光全体厂级干部的强烈反对。上级不得已收回了成命。1995年，上级又决定调他任成都市电子仪表局局长。对于王书记，国光的员工们是崇敬有加，爱之深，则留之切。他们明白如果这回不搞点儿大动作，王书记真的会被抢走。全体厂级干部坐上面包车，一起去市委请愿。在表达挽留意愿时，一个个情绪激动，一再重申：王书记绝不能调走！如果真要调走，他们集体辞职，国光没希望了！王成香的同事们居然两次掐断了他的“升官”良机。王成香听说后，不仅不生气，反而极为感动，就在全厂中干会上慷慨表态说：“我王成香绝不脱离工厂，我与国光同生死，共命运！”所有人情不自禁地起立，向老书记致敬，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对于国光人来说，1992年发生了好几件值得铭记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王书记居然跟由他建议提拔的厂长拍桌子了。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电子部给国光下拨 1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磁控管（微波炉的核心部件）的生产线。王成香利用带队到美国洽谈进出口业务的机会，做了个调研，发现即便花上三五千万元，也建不成这个生产线。回厂以后，他就明确表示反对。但已决定要上调的厂长却主张上马。此时，企业已进入厂长负责制的历史时期。王成香说，厂长负责制应当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之上。他见私下里无法说服厂长，就下令召集全厂所有中干和高级工程师开会。会上，由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分别进行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的论证发言后，全体与会人员进行同意或反对的书面表态，结果，68%的人表示反对。可是厂长仍要坚持一条道走到黑。王成香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如果迁就厂长，国光就会陷入深渊。他只好抛出了撒手锏，决定召开厂务会来进行最后的决策，并且要求厂党委会成员全部列席。最后，磁控管生产线就撂下了。

不久，王成香得到了一条经济情报：上海广电局的电真空管厂和南京 772 厂都想上磁控管生产线。他赶紧飞到上海，约请两家进行磋商，决定三家都不单干，而是发挥优势，联合成立扬子江公司。新公司在浦东买了一块地，与日本松下公司合作，成立了上海松下公司，建了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微波炉、磁控管等。而国光就以部里拨的 1000 万元入股投资。如今，该公司每年生产磁控管 1200 万支、微波炉 800 万台。国光年年分红，早就收回了最初投入的股金。

Chapter 7

第七章



天府熊猫塔，目前为中国西部第一高塔

“东调”，是成都市在 21 世纪伊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长袖善舞抒心意，实现了“腾笼换鸟”的华丽转身。转眼间，惊鸿一瞥，成华展现出新时代崭新气象：沙河岸，柳浪闻莺；东山旁，崛起高铁新城；斧头山，熊猫家园屡立外交新功。

东调北改：成华的瑰丽转身^①

/龙德璚

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有其珍贵而难忘的记忆。

“东调”和“北改”，就是成都市永远不能忘记的珍贵记忆。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回望“东调”和“北改”，任时光流逝，这两件撬动东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事件，如双星闪耀，见证着东郊的艰难蝶变、华丽转身……

“东调”：东郊再次辉煌的必由之路

成都东郊，一个响亮的名字！成都工业时代的标志。

成都东郊崛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于 80 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工业比重一度占到全市 GDP 的 48.6%，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 65%，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超过 60%。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国各地老工业基地逐渐陷入困境。历经数十年发展的成都东郊工业区，也无可避免地步入厂房破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经营艰难、职工生活困苦的境地。至 2000 年，东郊

^① 参考文献：《成华史话》，新华出版社，2015 年。

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 GDP 中的比重下降到 20% 以下，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 70% 以上，亏损近 6000 万元。大批企业举步维艰，一些企业破产。

这一时期，东郊工业区在成都城市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已经从建设初期的城郊地带，变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工业企业过度集中，使东郊城区“三废”现象突出，热岛效应明显，城市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厂房破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企业经营，影响了工业发展；同时，因企业布局凌乱，土地利用率低，城市功能难以完善，城市承载能力明显跟不上时代需求。

于是“东调”来了，带着东郊老工业区人们的渴望与期盼。

从 1999 年市经委按照市政府部署，对东郊工业区进行调研，到 2000 年 12 月，市经委《关于成都市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建议》正式出炉；从 2002 年 1 月，成华区成立东郊工业结构领导小组，到 2009 年 1 月 5 日成华区召开惠民工程第三期第一批新片区启动暨入户宣传签约工作培训大会，“东调”10 年，成都市以大气魄大手笔，启动了对老工业基地多个工业区的结构调整，基本上实现了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群众受益等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效益。

“东调”10 年，充满艰辛，充满智慧。成都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利用东郊土地的级差地租，对企业实施搬迁改造，通过招商引资与联合重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改造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手段，实施企业发展壮大目标；通过沙河整治、“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的策略，对企业搬迁后的土地实施综合整治开发，以改善东郊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总体思路，贯穿整个“东调”。《人民日报》《中国经营报》《四川日报》等主流媒体都纷纷跟进，追踪报道，发文赞扬说：成都“东调”最大的成功，源于不以政府营利为目的的土地运作，所得资金全部用于企业搬迁改造，既提升了成都工业发展的能级，也为大面积城市重塑赢得了空间。

企业在“东调”中重生 城市焕发青春

成发集团作为东郊企业的巨无霸，搬迁改造前历史包袱沉重，设备和技术落后，体制机制缺乏活力，连年亏损，负债累累，最艰难时期，企业员工每人每月仅有 200 元生活费。是“东调”，让成发集团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2001 年 6 月，成发集团启动“东调”筹备工作，利用“腾笼换鸟”政策，通过土地置换，获得了新厂区建设和技术更新所急需的资金，到 2005 年即扭亏为盈！当年 2 月，在亚特兰大召开的全球供应商大会上，成发集团的产品获得 2004 年度全球最佳质量奖，成为首次获得该类奖项的中国供应商。

2005 年，成发集团各项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工业总产值达到 8.56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18.6%，销售收入 8.59 亿元，同比增长 17.2%，工业增加值 2.07 亿元，同比增长 35.2%，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同比增长 32.77%，当年利润总额达到 147 万元，一举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企业在岗职工人均收入较上年增长 25.64%。

企业，在“东调”中获得重生，一度污染严重的城市，也在“东调”中恢复活力，焕发青春。

成都市结合“东调”工程，在 8 年内投入资金 200 多亿元，进行了沙河整治、市政设施配套、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低洼棚户改造和中小街道整治、五路一桥及畅通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东半城曾经落后的面貌，渐渐被现代化的色彩覆盖。城市向东向南发展的战略构架，因此成熟起来。

“东调”后，年节约能源 105.19 万吨，回收工业废渣 970 万吨，减少水污染物排放 1335.6 亿吨，烟尘 1975 吨，二氧化硫 1882 吨，排污总量减少 45% 以上。截至 2006 年，全市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2003 年下降 11.3%。搬迁腾出的 4000 多亩土地，相继建成公

园、公共绿地、城市道路、商业设施和各类住宅，其中东郊市政公园及绿化用地就达到9万平方米，水体面积达到12.4万平方米，再现了湖天一色的美景，为城市带来巨大的改变。

“东调”让前锋职工拥有了两套住房

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东调”搬迁的第一家企业，也是利用土地级差，解决资金难题且取得成功的第一家企业。

前锋最初计划售卖的老厂区的50多亩土地，按照基价收购全额返还的方式，在市政府协调下，与市国土局签订了土地协议。收购合约只对土地进行评估，由银行按评估价格的一定比例，先拿出一笔钱作为专项贷款给企业。2003年1月16日，市土地储备中心对这块拆迁平整后的土地进行拍卖，深圳万科以每亩176万元的价格竞买成功，前锋搬迁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得到了解决。

这种政府先拿钱给企业用的举措，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此后东郊的搬迁中，被广泛运用。此举让前锋的搬迁时间提前了至少一年。

搬迁改造前，前锋集团公司亏损严重，职工收入低，住房拥挤，筒子楼的通走廊，一层一个公共厕所，居家生活极不方便。搬迁改造后，前锋职工因为“东调”而拥有了两套住房——公司鼓励员工在新厂所在的高新西区附近购房，对有意购买新房的职工，一次性补贴交通费1.5万元，双职工一次性可获3万元补贴。公司还以集体购买的方式与开发商洽谈，使新房售价每平方米降低至1300元。一户双职工购买一套80多平方米的住房，加上天然气安装等各种费用，首付款也就3万元，15年的按揭月供仅500多元，再把市区的房屋出租，租金就足以承担按揭款。

新房就在新厂房对面，绿化面积占了整个小区一半左右，超市、幼儿园、游泳池、网球场等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骑自行车上班只

需要 8 分钟，这在以前想也不敢想。职工们通过这种方式，花很少的钱，就轻松拥有了两套住房，他们高兴地说，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资本运作。

“北改”优城 “北乱”变安居

此后，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成华区启动“北改”。

“北改”优城，改善北城群众的居住生活环境成为首要目标。“北改”以民众安居为着力点，投入 99.23 亿元。推进青龙鹭苑、绿水青龙、东林小区等 17 个安居项目，建成 280 万平方米安置房，让更多低洼棚户区的群众彻底改善了生活质量，实现了安居梦想。

为了彻底改变多年形成的“北乱”现象，围绕社会管理创新，成华区整合街道、社区、驻区单位等基层党组织，推行社区网络化管理服务模式，建立全域社区全域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整合巡警、交警、综治巡逻员、治安积极分子的力量，优化警力布局，加大社会治安管理力度，街面见警率、街灯率大幅提升，群众安全感明显加强，成华区也获得了全省维护社会治安先进区的称号。

成华区还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创建为契机，开创先自治后整治的新型治理模型，治理老旧居民院落 400 多个，自治组织组建率达到 100%。

与此同时，成华区还建成驷马桥西片区配套幼儿园等公建配套项目 93 个，启动学校建设项目 31 个，在龙潭寺街道辖区引进了全区第一家三甲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龙潭院区。

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功能配套和居住品质的显著提升，带动了整个北城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生态改善商业发展 老东郊旧貌换新颜

成华区水网密布，地处成都市中心城区上风上水，府河、沙河、东风渠三条主干河流穿过全区；大熊猫生态园、北郊风景区等优势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成华区据此制定了“一区三廊多园多点”网络状的生态发展规划，将生态资源适度集中在重要出入城通道、骨干道路、重要河道两侧，建成了新成华大道、熊猫大道生态廊道、东风渠生态带景观工程、沙河健康绿道工程等，集景观绿化、生态休憩、旅游休闲、文化商贸、生态居住功能于一体。目前，以东风渠为载体的山水田园城市滨水生态走廊，成为成华区对外展示的城市之窗；生态环境最佳、品牌影响最广的北湖熊猫国际旅游休闲区，彰显其国际化旅游项目的魅力……

随着生态的改善，商业功能的不断健全，万科、首创等知名地产商开始抢滩成华区，金色家园、东方明珠等一批由品牌地产商开发的楼盘，成为地产经济井喷的强大助力；随着驷马桥、多宝寺、东方新城等新型住宅区的逐渐形成，成华的土地上市速度加快，商品房开发量得以快速递增。仅以 2005 年的统计数据为例，成华区土地年上市量达到了 2844 亩，商品房开发量达到了 516 万平方米，分别是“东调”实施前的 11 倍和 9 倍。

房地产经济的快速拉高，又对建筑装修、商贸物流、信息服务等产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写字楼、酒店、宾馆及特色化商业街区、文旅项目随之逐步演化出来。

利用原红光电子管厂旧址打造的极具个性的文化产业基地东郊记忆，就是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杰作，这个以音乐产业为龙头，传媒产业并行的文化创意园，拥有配套齐全的中小型演艺会展设施，每年在此举办的文化活动达到 800 场次，成为成都时尚文化的一面旗帜。

东郊记忆占地 218 亩，由厂房改造的老建筑 14 万平方米，兼具商务办公、演出展出、音乐培训、文化餐饮等七大主题功能。其别具一格的创意风格，受到成都市民追捧，更以其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被批准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入选中国文化旅游新地标，先后斩获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基地、国家 4A 级旅游区、中国西部商业地产最具投资价值商业街区。

屹立在东郊猛追湾河畔的天府熊猫塔是世界第七高塔，是成华区打造的首个地标性项目。塔高 339 米，占地 55 亩，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集影视制作、影视文化、传播、娱乐、观光旅游、餐饮等业态为一体，更以媲美上海东方明珠的雄姿，吸引八方宾客来朝，于提升成都美誉度的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区域的经济收入。

经济产业更新 新城东生机勃勃

根据“北改”需要，成华区制定了重点发展石油电力、机电制造、节能环保、家居建材、商务服务等产业研究总部的业态规划，鼓励企业到成华区设立行政总部、结算总部、研发总部、营销总部；谋划了“一城三轴三区”的总部经济空间布局，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法国索迪斯集团，在龙潭总部经济城设立西南营销中心；与中国铁路物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5 年内投资额将不少于 20 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了对二仙桥 404 亩成片土地整理项目，这是成都市北改工程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整理项目，该整理项目在这块土地上规划了 20 万平方米的商业楼宇，38 万平方米的住宅，占地 4 万平方米的大型市政公园，市政道路、小学、幼儿园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中铁公司在完成了二仙桥成片土地整理项目后，对八里庄粮食批发市场、驷马桥果品批发市场、不锈钢市场、川美塑料市场、钢材市场、102 仓库、仓储物流中心、512 建材市场、青龙家居建材市场等 17 个点位分别进行了搬迁和提档升级，现代服务业、新兴房地产业

等，成为成华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电子商业、金融服务业、会展业、都市型生态旅游业等新兴产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而精心打造的教育培训、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配套服务业，则成为区域经济的有益补充。

据不完全统计，“北改”中，成华区累计实施项目 725 个，完成投资 1421 亿元，整理土地 1.6 万亩，拆迁建筑面积 533 万平方米。全区实施基础建设项目 193 个，公建配套项目 151 个，整治老旧院落 697 个，启动棚户区改造项目 70 个。成都东客站综合交通枢纽，成渝高铁、成绵乐客专建成投用。同步整治区间道路 31 条，开通社区巴士线路 25 条。

2017 年，成华区经济总量连续跨越 300 亿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1 万美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连续 5 年位居五城区首位；截至 2020 年，全区工业投资累计达 150 亿元以上，技改投资累计超过 1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位居中心城区前列，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工程服务业年均增长 10% 以上。以东客站为核心的枢纽经济聚焦区，已经汇集产业化项目 16 个，总投资超过 260 亿元！

回首曾经的老东郊，区域资源单一，环境单一，商贸和商务更是难以称之为产业，以前这里只有工厂和工厂生活区，即便有一些零星商业网点，业态也十分低级，仅仅为方便东郊企业职工日常生活所需。历经“东调”“北改”，包括老东郊和曾经相对滞后的城北，皆已构成城市中心重要区域！四通八达的道路、整洁干净的老院落、高楼鳞次栉比的时尚购物休闲街区，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历经“东调”和“北改”，今天的成华大地，已然呈现一派生机勃勃，色彩缤纷的景象。

斧头山的熊猫外交

/雷文景

神奇的动物大熊猫，是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民都喜爱的“超级萌宝”，在被发现后的150余年中，仿佛有着“核聚变”效应，渗入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众多领域，从遗世独立的“竹林隐士”变为了滚滚红尘的超级明星。大熊猫不仅是全球生态保护的“旗舰动物”，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亲善大使”。现当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熊猫为中国打开国门、拥抱世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熊猫之都”成都市的成华区斧头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在30年间，向13个国家和地区输送了几十只大熊猫。那些被现代科技催生的萌宝们，成了连接世界人民友谊的“外交使节”。成华区的斧头山，也成为众多外国元首、政要的向往之地。

出使德国的成华“萌宝”

2017年7月5日，来自成都市成华区斧头山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庆亮相德国柏林动物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了熊猫馆开馆仪式并登台致辞，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时对一个生物体表示出的最高礼遇和关爱，让全世界再度聚焦中国国宝大熊猫。

德国动物园与熊猫的缘分最初即和成都相关。

1979年4月，四川宝兴县硃磬藏乡的农人救护熊猫一只，这只后来取名宝宝的熊猫在成都动物园一直生活到1980年11月4日，这一天，它和来自四川天全县的妹妹天天领受了重大使命，即将去往德国。1980年的深秋，熊猫降临德意志土地，受到了国宾式最高规格的待遇，一条红地毯牵引着它们走向新居——西柏林动物园新建的熊猫馆。这座造价70万马克的豪华别墅由两间卧室、餐厅兼室内休息室、专用厨房、游泳池及室外活动室构建而成。这对宝贝享尽了“人间荣华”，受到施密特总理的“接见”，更受到全德国人的追捧。施密特在开馆剪彩仪式中幽默地说：“过去，熊是柏林城的象征，今后应该以熊猫为象征。”

1984年2月，宝宝的伴侣天天突患重病，柏林动物园的6名高级兽医抢救了24小时无力回天，德国举国哀悼，并为此发行纪念币，正面铸天天像，售价89马克，首日1000枚被抢购一空。2012年8月22日，柏林动物园熊猫馆突然静了下来，有人悄悄地在宝宝居所前放下一朵橙黄色的玫瑰，饲养员在“喂食时间表”的栏目中写下了几行德文：“11时30分，今日无；15时，取消。”一位小朋友指着空荡荡的兽舍问妈妈：“为什么里面没有熊猫？”妈妈黯然回答：“它太老了，死了。”宝宝享年34岁，创造了海外熊猫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宝宝的去世成为重大新闻，一张宝宝吃德国传统扭花面包的照片提醒着人们，这只属于德国的熊猫宝宝只能保存在怀念中了，大熊猫何时才能再来德国？

几年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几次访华中都向中国提出了合作繁育熊猫的事情，这位不喜欢养宠物的女总理虽然在访问成都期间只是被成都的美食所吸引，没有去参观近在咫尺的成都熊猫基地，可她知道大熊猫在德国人心中的地位。2015年，中德初步敲定了租借熊猫的事情，两年之后，中国方面与柏林动物园向外界宣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德国柏林动物园签署了中德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合

同期为 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发布了信息，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德国并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熊猫馆开馆仪式。

在成都斧头山，成都熊猫基地主任张志和在欢送仪式上郑重介绍两位“熊猫大使”的简历：

大熊猫娇庆，谱系号 769，2010 年 7 月 15 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爸爸科比，妈妈娇子。性格外向、活泼、喜欢运动、打滚、调皮，是一个圆圆脸的帅小伙。大熊猫梦梦，雌性，谱系号 868，2013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爸爸勇勇，妈妈二丫头。圆脸，嘴筒子短，性格温顺，是个大姐姐，喜欢卖萌，喜欢照相，很有镜头感。

大熊猫尚未启程，旋风已经刮起。柏林动物园官方网站的“熊猫博客”被连续刷屏。柏林动物园园长已经先后来成都三次，为它们办理出国手续，饲养员克里斯蒂安与一位保健医生也先期来到成都熟悉情况。

6 月 24 日下午 3 点，柏林勃兰登机场终于迎来了德国的珍贵客人——梦梦和娇庆。在这之前，这个机场一直处于长期建设之中，德国人由此戏称，机场何时投入运营是本世纪最大的谜，现在，这个谜底终于揭晓，它的第一次竟然给了一对大熊猫。

熊猫来了，乘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专机来了，下降滑行之时，驾驶员在机窗外挂出了中国和德国的国旗，一辆消防车靠近飞机，高压水泵制造出晶光般流泻的水门，这是航空界的特别礼节，据说上一次出现在德国机场是在 3 年前，他们引以为傲的德国足球队取得了世界冠军之时，这一次，德国人给予了熊猫礼赞。

为迎接大熊猫的到来，柏林动物园早已准备妥当，新建的熊猫园在原来的熊猫馆基础上扩建，花费 1000 万欧元，占地 5500 平方米。红色基调的中式牌楼、围栏营造着东方情调。1 万平方米的熊猫活动

场所也竭力模仿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特点。流动的小沟渠，攀爬的梯架等一应俱全。还配置了自动感应灯系统，温控系统等调控设施。准备好了10种竹子，分别从本国和荷兰购入。为了两个宝贝逐步适应新环境，成都基地也准备了1000公斤竹子和10公斤苹果、2公斤窝头随专机运送，德方准备的副食则是燕麦片和特制的面包。

超级豪华的居所，全方位无微不至的照护，大熊猫从被发现以来的大多数时候都得到人类的最高待遇。但与往昔不同的是，人类对大熊猫的娱乐是拯救生态失衡的延伸，人们不仅要在大熊猫身上寻求快乐，更要通过大熊猫找到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联系。今天展示在世界各地的大熊猫全部是圈养种族的后代，没有一只大熊猫是来自高山丛林的“原创”，它们都是人类缔造的“作品”，柏林动物园接力成都熊猫基地的任务，承担了研究、繁育的重任。

钟爱大熊猫的西班牙王后

2007年6月29日，西班牙王后索菲亚来到中国成都，出席了中国和西班牙熊猫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一派喜庆氛围中，王后在成华区斧头山探视了即将去西班牙的一对大熊猫“情侣”——调皮的冰星和文静的花嘴巴。她知道，西班牙人在失去可爱的大熊猫竹琳后，又将续写新一轮的大熊猫情缘。

早在1978年6月，索菲亚随丈夫卡洛斯国王访问中国，在“熊猫外交”的和谐氛围中，满心欢喜地得到了中国的国礼——大熊猫强强和绍绍。索菲亚不会忘记，熊猫来到西班牙4年之后，一个秋日之夜，国王在酣睡中被一个好消息惊醒。马德里动物园在第一时间报告说，大熊猫绍绍分娩了，而且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夫妻俩高兴坏了，虽然之后只有一只幼仔存活下来，但意义仍然非凡，因为它是在欧洲运用人工授精技术出生并存活的首只圈养熊猫。

高兴之余，西班牙人为这个小宝贝组织了全国征集名字的活动，

一个诗意的名字——竹琳诞生了，从此竹琳陪伴了许许多多西班牙人的美好童年。1996年，正值妙龄之年的竹琳香消玉殒，西班牙人悲伤不已，为其塑像纪念，索菲亚王后怀着惆怅的心情参加了塑像揭幕仪式。后来，竹琳与先它而去的妈妈绍绍的遗体标本珍藏于西班牙国家自然博物馆，仍然吸引着许多人前往瞻仰。但标本和雕塑满足不了大熊猫粉丝，皇室与民众都在渴望着再次在动物园中看到活蹦乱跳的大熊猫。

2007年9月7日，冰星和花嘴巴终于从成都启程前往西班牙。那一天，它们的中国奶爸奶妈们一大早即来到基地送行，随行的工作人员李明喜目睹了大熊猫离开成都的整个过程。警车开道，汽车缓行着向机场行进，围观的成都市民们看见车身贴着的巨大的熊猫画像，品味着其中的生态意义以及国际意义。

与成都的惜别不同，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一派迎新气氛，准备工作早已安排妥当。冰星和花嘴巴各有一个豪华单间，空调、加湿器等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还安装有8个闭路监控器以便实施24小时全天候监控。室内活动场所也模拟了成都熊猫基地的设施，好让两个宝贝不至于乡愁不解。主食竹除本国所产，也在法国、葡萄牙等国联系到了竹源。

北京时间9月8日21时，西班牙时间15时，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从上海转机飞向西班牙的波音747专机飞临马德里巴拉哈国际机场。只见万里无云，烈日当空，人们注目着飞机缓缓停稳，鲜艳的橘红色机身似在渲染着人们期盼熊猫的火热情怀。80余家西班牙媒体早已恭候在此，机场的国宾候机大厅张贴了大量熊猫宣传画，上书“大熊猫重返马德里”。为满足大家一睹熊猫的愿望，工作人员揭开了装运箱的遮光布，顷刻间，记者的长枪短炮迅速迎上前去，可是傲娇的熊猫却不给面子，它们俯卧在箱子里面，背光的光线让记者们遗憾不已。

当日，两位动物明星入住新居。据中方随行人员说，冰星是位不

诞生的主，它走出笼门的姿态优雅自如，瞧见地上有一只苹果，便毫不客气地抓起就啃。而花嘴巴却羞涩多了，面对这么多金发碧眼的老外，它蛰伏在笼子里半天不肯走出去，直到园内彻底安静下来，这位千金小姐方才款款而出。

在动物园度过了17天的“实习生活”之后，9月19日，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式正式举行。现场粉丝云集，其中的“高级别粉丝”当然是索菲亚王后，是她在成都亲自面试了熊猫，现在她又代表西班牙迎接宝贝的到来并揭幕。在见于报道的新闻中，索菲亚是欧洲皇室中与熊猫亲近最多的王后，她的每一次露面也照例成为西班牙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0年11月5日，王后又来看望大熊猫，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探望它们了。今非昔比，花嘴巴“已为人母”，它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先前羞涩的它早已适应异乡生活。王后伸出双臂将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拥在怀里，它们顺从而乖巧，萌萌的黑眼睛与王后对视着，王后拿起奶瓶给幼仔喂奶，这一温馨画面被摄影记者所捕捉，“王后哺婴图”迅疾传遍欧洲和全世界。花嘴巴生下的那对双胞胎，一只取名叫德德，另一只叫阿宝。阿宝被西班牙拉蒙影业公司认养，因为电影《功夫熊猫》西班牙版中的主角叫阿宝，它便随了此名。

2013年，按照合作繁育合同，阿宝和德德返回中国。就在它们回国那年，它们的妈妈花嘴巴又生下了一个叫星宝的弟弟。前些年，星宝也回到了成都。2016年8月30日，能干的花嘴巴再添一喜，生下了一只雌性幼仔，人们又在网上发起征名活动，对之前的大熊猫竹琳难以忘怀的西班牙人，最终选择了竹莉娜这个有着纪念意义的名字。

竹莉娜的命名仪式在“2017西班牙成都周”的活动期间举行，懵懂的大熊猫又一次引来大使、官员和20多家大型媒体的注目。毫无疑问，成都人沾了红得发紫的大熊猫的光，成都元素在“成都周”惹人注目；而西班牙人又借了成都的光，正是成都缔造的“优质熊猫”给他们带来不断的喜悦。一年之后，原本与成都熊猫基地签订的10

年合同将延续 5 年，在续签仪式上，索菲亚王后又一次来到现场。

王后爱熊猫，大众慕时尚。据西班牙马德里大区主席辛福恩斯特女士介绍，截至 2016 年，到马德里动物园观赏大熊猫的旅客已经超过了 1100 万人次，这个数字占西班牙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世界名流“朝拜”斧头山

环顾世界，很少有人能够逃脱“熊猫的诱惑”，在熊猫的光环中，总会叠映出名人的身影：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怀抱熊猫玩偶的灿烂笑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亲近熊猫玩具的柔情，还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总理史蒂芬·哈珀、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熊猫的温柔合影……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30 余年的历史，奔向斧头山“朝拜”熊猫的世界政要、名流巨贾也大有人在，他们甘愿让熊猫萌化他们叱咤风云的强悍内心。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向来以不苟言笑而著称，但他在访问中国的匆匆行程中，熊猫竟占有了重要地位。2006 年 1 月，当他在成都将一只名叫晶晶的幼仔拥入怀中，那小家伙似乎是故意要逗一逗这位政治家，冷不丁在他脸上印上了一个香吻，“佐立克之笑”迅速传遍世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幽默调侃他，说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府制定者，老道的外交家……他能有勇气卷起袖管，甚至偶然要拥抱一下熊猫”。

没有人统计过全世界拥抱过熊猫的人有多少，以今天日益规范的熊猫圈养和展示规章，那一定是极少数人。2011 年，当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夫人切丽看到熊猫，她只是遗憾没有带她 11 岁的儿子来成都。捷克总统克劳斯夫妇将熊猫搂入怀中时，已经没有更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热爱，只是不停念叨：“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参观留言簿记录了名流们对大熊猫的深情：

“这真是最神奇和可爱的动物，这是我所看见过的最可爱的动物，

我深深地被它们吸引。”这是加拿大总理夫人发出的赞美。

“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神奇的大熊猫宝宝，它们是世界名副其实的珍贵的礼物。”这是坦桑尼亚总理的墨迹。

北马其顿共和国前总统伊万诺夫言道：“此次成都大熊猫基地之行不仅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国宝大熊猫的魅力，更让我感受到成都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惊喜、赞叹、终于见到熊猫真身不可抗拒的魅力！全世界不同肤色的名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相同的意思，让地球所有的生物都逊色一筹了。

中国的传统友邦巴基斯坦没有得到过被赠送中国国礼熊猫的殊荣，但是他们的总统和总理夫人都来成都观赏过熊猫。前总统穆沙拉夫是在2006年2月23日16时40分进入熊猫基地的，他和夫人亲近了之前给予佐立克香吻的熊猫晶晶，这一次晶晶没有给出它的亲吻，可也让总统夫妇心满意足了。这位总统说：“我终于知道了大熊猫有多可爱。”前总理阿齐兹没有去看熊猫，但他的夫人却兴致勃勃前往斧头山，这位美丽的夫人身着蓝色包边的卡其色长袍，脚穿一双软底轻便鞋，这双鞋是她特意穿的，因为她怕脚步声惊动了熟睡中的熊猫宝宝。当她来到产房时，一只叫小丫头的宝宝正在梦乡，小丫头是妈妈怀孕5个月产下的，夫人好奇得不行，连问：“为什么不是10个月呢？”想来她是把熊猫产期等同于人类了。在幼仔活动场地，当夫人向着游人们挥手致意时，一只熊猫竟然也抬起它的前掌轻轻摆动了几下，随即又害羞似的蒙住自己的右眼，熊猫这个著名的动作几十年前曾经逗乐过英国皇室的贵宾，现在又惹得总理夫人不忍离去。

中国成都，美食的天堂，熊猫的故乡，匆匆而来的旅行者可以用胃留住川菜的味道，可是大熊猫——“带不走的只有你”。2014年3月24日，成都熊猫基地主任张志和启开一封寄自美国的来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张博士：

我想感谢这次中国之行中您的善意与友好。从我的团队获悉，正因您的巨大努力，我在成都熊猫基地的参观非常顺利圆满。我再次为您付出的时间和辛劳表示感谢。很高兴能与自己的母亲、女儿分享这次经历，这将是我毕生难忘的旅程。

再次感谢，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米歇尔·奥巴马 敬上

百余字的简短的信札却三次表达了感谢之情，看来白宫的前女主人的确被熊猫拨动了心弦。

米歇尔是2013年12月1日10点来到成都“熊猫的乐园”的，除了她的丈夫，这一家四口都沉浸在大熊猫带来的欢乐之中，她向全程陪同的张志和博士不断提问：熊猫生下来多重？它们一天能吃多少竹子？它们跑多快？张志和不断地给她进行熊猫科普。在“大熊猫幼儿园”，她的两个女儿直看得目不转睛。在“幼儿园”旁边，居住着在美国出生的美兰，一家人特地去看望了曾经的“美国熊猫”，她们还兴致勃勃地撑起长长的竹竿给熊猫喂食苹果，客串了一次训练熊猫肌肉能力的驯养员。“我不能连熊猫都没看就离开中国”，这是她在博客中表达过的，这位熊猫粉丝在成都终于得偿所愿。

据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白宫的不少高官都是大熊猫粉丝。“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都曾和家人一起，前来看望过大熊猫”。米歇尔曾在白宫官网的旅游日志中谈到中国与美国之间曾经发生过的“熊猫外交”，也将自己的成都“熊猫之行”提升到外交意义上，她说：“即使像中美这样饱含差异性的复杂大国，小礼节也能代表重大意义。”她的评说不无道理，虽然中国早已停止了大熊猫的“国礼”馈赠，但租借与合作科研的形式却仍然包含了对合作国的礼遇成分。

2015年9月25日，彭丽媛随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值旅

美熊猫美香刚生下了一只宝宝，彭丽媛专程前去探望，中美两国的第一夫人一同站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熊猫馆前，并共同替宝宝取了“贝贝”的芳名。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散发出的纯真气质穿越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仿佛安徒生的童话纯洁着人类的心灵。

来自安徒生故乡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于 2014 年访问中国，表达了这个童话国度热爱童话般熊猫的愿望。两年之后，中国与丹麦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协议。又过一年，当时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来到成都熊猫基地，探望被选中的两位“熊猫大使”：毛笋与和兴（后来由星二代替）。当熊猫印入他的眼眸，他大声地用刚学的四川话招呼，“毛笋——毛笋”“和兴——和兴”，俨然与熊猫已经是老朋友。在成都之行中，目睹了成都熊猫基地所取得的成绩，拉斯穆森深深感谢中国对保护熊猫所做的努力，让这么稀罕的动物免遭灭绝之灾。他还在多个场合不断地告诉中国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

如他所言，丹麦人重视大熊猫的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大熊猫尚未启程，丹麦的熊猫馆已在建设当中，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北欧小国，又一个超级豪华的熊猫别墅出现在人们眼前。熊猫馆占地面积 2450 平方米，内部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案分为“阴”“阳”两部分。总耗资数额庞大，约合人民币 1.5 亿元，由十几家丹麦企业与基金会共同赞助。2017 年 11 月 1 日，拉斯穆森首相带着他在成都的承诺，出席了熊猫馆奠基仪式，两年之后，童话国度终于迎来了来自遥远东方童话般的动物——成都大熊猫毛笋与星二。

巍巍天府熊猫塔

/冯荣光

成华区猛追湾，府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优雅地画出成都市区一道美丽的曲线。“款款春风澹澹云，柳枝低作翠楼裙。”抬望眼，天府熊猫塔高耸入云，气贯九天。若乘坐高速观光电梯，一瞬间便将你带入“此景只有天上有”的梦幻境界。

西部第一塔

天府熊猫塔原名四川电视塔，高 339 米。2006 年在全球电视塔排名中，居世界第七、中国第四、西部第一。如今，它仍然享有“中国西部第一塔”的美名。塔基 4 根巨大的斜支撑柱，从正面看，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川”字，寓意“四川”。上下两座塔楼，上面的塔楼是赭红色的四川盖碗茶，四个手指高高地托着，在天空中颇为耀眼。

因塔高 339 米，成都人便习惯叫它“339”，形象、顺口又好记。“盖碗茶”塔楼内是 8000 平方米的商务及文化区域，204 米为“339 餐厅”，208 米为室内观光层，213 米为 360 度全景观光透空玻璃的“339 旋转餐厅”，218 米为室外观光平台。站在顶层塔楼，极目远眺，西岭千秋雪尽收眼底。游人还可环绕一圈，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俯瞰

成都两江环抱，览尽天府之都的美丽风光。

1983年4月，四川电视塔开始筹备，5月底初步确定选址方案，四川省广电厅在广电部、空军成都指挥所、成都军区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成都市建委、成都市规划院的支持和帮助下，对四川电视塔初步定点方案进行全面论证，圆满解决了净空保护和环境协调等问题。1984年1月19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四川电视塔的定点方案，确定在猛追湾府河边建设。

然而，四川电视塔建设工程却“好事多磨”，历经15年之久。

1992年12月，猛追湾锣鼓喧天，电视塔建设开工典礼隆重举行。然而，鞭炮烟花散尽，锣鼓声音消逝仅过去半年，就因资金严重短缺，工程停工。1994年，川塔发展总公司成立，引进本土民营资本，至1998年上半年，才重新开工，沉寂了6年的猛追湾又沸腾起来。

担纲川塔建设的是四川省某著名建工集团所属的十三公司。该公司特别擅长修建电视塔，是集团旗下特种工程建设的一支劲旅。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公司先后修建了245米的西安电视塔、318米的南京电视塔。西安电视塔荣获四川省“天府杯”优质工程奖、陕西省优质工程奖。十三公司的科研成果《南京电视塔高耸构筑成套施工工艺》《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艺及操作规程》《西安电视塔电动升模(DS)工艺》分别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成果斐然。

从开工始，十三公司就面临着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高、难、悬、险的严峻挑战。

施工遇到的第一道难题是四根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斜撑，基础开挖的面积很大。这四根斜撑是电视塔巨大的“脚掌”，专业术语叫“大跨度箱型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撑”，整个电视塔全靠它来支撑，因此，它是施工中的重点之重点。再就是对高塔垂直度的控制，那么高的构筑物在施工技术上要求非常严格，绝不能超出《混凝土电视塔施工技术规程》允许的偏差。超出《规程》要求，歪了、偏了都属于严重质量事故。

以共产党员、总工程师鄢仲军为首的川塔项目部科研课题组，拿出了他们的科研成果《四川电视塔施工工艺研究》，经四川省科技厅鉴定委员会鉴定，该研究成果针对超高构筑物高、难、悬、险复杂的特点，通过对大跨度箱型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撑等施工工艺进行深入研究，优选并创新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施工工艺，保证了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的四川电视塔工程的质量及施工安全。工程主体中心垂直度偏差 14 毫米，塔体总高度偏差 72 毫米，均低于《混凝土电视塔施工技术规范》允许的偏差，电视塔主体外棱角线顺直清晰。也就是说，电视塔施工工艺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工程质量达标。

2001 年 2 月，工程施工进展至 173.5 米，也就是塔柱托到“盖碗茶”底那个部分，塔身由直筒开始逐步向上呈“外八字”扩展，至 218 米室外观光大平台，即“盖碗茶”碗口。这部分是塔体上部的重点，四根巨大的支撑与塔基“脚掌”正好相反，它像撑开长长的四根“仙指”，擎着空中的“盖碗茶”，专业术语叫“高空巨型斜向外倾悬臂变截面斜柱”。由于全系高空作业，施工难度大，风险高，安全监控更是严格。

这时，施工采用的高空内爬塔已顶升至 200 米，这是塔楼主体部分。由于塔楼呈喇叭形展开，塔吊就必须采用整体平移施工工艺，才能将所需的建筑材料吊运到施工工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高空内爬塔吊整体平移施工工艺，没有先例。为了使这项研究取得成功，以鄢仲军为首的科研课题小组，通过反复试验和测算，圆满制定出高空内爬塔吊整体平移施工工艺，顺利完成了省科委下达的这项科研课题。

建工集团总部给予《四川电视塔施工工艺》科研课题高度评价：“该技术成果的完成，为高耸构筑物工程、超高建筑、大型混凝土网架、大跨度结构工程项目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持。也标志着我国钢筋混凝土超高构筑物施工技术有了新的重要的发展和突破。”

在完成施工作业后，就要拆除高空爬塔，这仍然是一个高难度技术课题。由十三公司发明的《高耸构筑物施工内爬塔吊高空拆除工

法》，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内爬塔吊的拆除成本，而且极大地降低拆除作业风险，确保了安全施工。2010年2月，《高耸构筑物内爬塔吊高空拆除工法》荣获国家一级工法；2012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在几年施工实践中，四川电视塔项目部鄢仲军课题组共有四项科研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由于在四川电视塔建设工程中的突出贡献，2004年鄢仲军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站在室外观光平台向上仰望，“盖碗茶”茶盖上是直插天穹的电视发射架，在夜晚灯光的辉映下，它像晶莹剔透的水晶塔座，熠熠生辉。可谁知道，这个长87.5米、重186吨的钢桅杆是怎样吊装上去的？要知道，四川电视塔发射架吊装工程的施工难度和风险，在全国高塔施工中居全国第一。

吊装工程由某建科工程技术公司和安装公司共同完成。经过2个月的精心施工，提升时采用由穿心式千斤顶与预应力钢绞线组成的提升装置，两组千斤顶交错使用，分段提升，最后用8台千斤顶同步进行，达到整体同步就位，2004年3月23日吊装顺利完成。钢桅杆成功提升标志着四川在大型钢结构的整体提升技术上达至了国内先进水平。

2004年四川电视台试播启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率、交通频率和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等4套广播节目通过四川电视塔播出。339米高的四川广播电视塔正式开播后，广播信号覆盖范围提高4倍以上，覆盖半径可达8公里，直接覆盖人口1800万，可以发射8套电视节目和6套调频立体声广播节目。

浪漫打卡地

如今，高度339米的天府熊猫塔巍然屹立在新华桥桥头，与环绕天府熊猫塔而建的“成都339”帆船式大型商业综合体，已成为锦江夜游的时尚潮流地带，将以往寂寞冷清的猛追湾街、望平街、双林

路、滨河路以及三槐树路统统纳入天府熊猫塔商贸文旅圈，成为成都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网红之地。

每到傍晚，华灯初上，天府熊猫塔和“成都 339”以及周边建筑光电、霓虹灯、彩灯、射灯等炫彩声光电齐放，人们开始涌入“成都 339”购物中心和四周街道，享受夜生活的无穷乐趣和情调，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生活的文化韵味。

夜幕中的天府熊猫塔是府河边最耀眼的风景，入夜，塔体多色炫光变幻着不同的色彩，一会儿粉红色，一会儿迷彩蓝，一会儿迷彩紫，一会儿银白月光色。通体透明，炫光变幻不定的塔体，托着空中的“盖碗”，让许多人仰望着“天上的生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BN 978-7-5411-6121-6



9 787541 161216 >

定价：49.80 元